

自由的滋味

— 彭明敏回憶錄 —

多少年來，中國只是兩個是非，一個是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一個是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真正的知識反而不能發揮力量，我們要擺脫這兩個是非的枷鎖，我們更要放棄對這兩個政權的依賴心理，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自救的途徑。

彭明敏，台灣高雄人，法國巴黎大學
博學士，曾任台大政治系主任，目前擔任美
國外交事務協會（FAPA）會長，是
國際法專家。

如何從學院投入社會，又從台灣流亡海外
這段曲折的軌跡。文筆生動自然而流露血
淚，內容豐富紮實而充滿智慧，首次閱讀
本書的讀者一定有「非一下把它看完不可
」的衝動。

價：

幣壹佰柒拾元

幣叁拾叁元

幣伍元

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回憶錄—

自由的滋味

—彭明敏回憶錄—

發行人 / 鍾肇政

出版者 / 台灣文藝出版社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第2305號

編輯部 / 台北市興隆路2段196號8F之1

電話 / (02)9343174

初版 / 民國76年6月25日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釘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

新台幣壹佰柒拾元

港幣叁拾叁元

美金伍元

彭明敏小傳

彭明敏，原籍高雄，出生於台中大甲，留學日本東京第三高等學校文科、東京帝國大學。就讀帝大時，世界二次大戰正激烈進行，盟軍轟炸日本，他在長崎遭空襲美機炸斷左臂，差點喪命。

戰後，彭明敏返回台灣，轉入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後，擔任台大助教。曾獲「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赴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深造，得碩士學位，後再轉往法國巴黎大學深造，取得博士學位。其國際法造詣，深受當時國際學界重視。返國，以卅一歲之年受聘台大副教授，卅四歲升正教授，為當時最年輕的台大教授。由於學術上的傑出表現。曾當選為第一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當時，擔任救國團主任的蔣經國宴請「十大青年」時，彭氏借故不參加。

一九六一年彭明敏獲聘台大政治系主任。國民黨當局指派他參加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顧問。一九六二年蔣介石親自召見彭氏。國民黨高級黨官趁機邀他入黨，為其所拒。

此後，彭明敏開始大膽地公開討論台灣地位問題及台灣人民自決問題。一九六四年初，彭明敏與其兩位得意門生魏廷朝、謝聰敏發表一份「台灣人民自救宣言」。這份宣言的結語是「我們要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自救的道路」。結果，在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日，彭氏與兩名學生因叛亂罪遭到逮捕。彭氏與魏廷朝被判刑八年，謝聰敏判十年。國際輿論

譁然，在海外壓力下，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日，蔣介石下令將彭氏特赦。彭氏雖受釋放，但從此遭特務廿四小時嚴密監視。

一九六六年夏天，國民黨大張網羅，逮捕林水泉、顏尹謨、吳文就等二百多人。彭明敏雖欲往美、加任教，但遭國民黨駁回，而監視行動則更加嚴密，於是他開始計劃逃亡。彭明敏逃過國民黨特務的監視網，透過秘密管道，偷渡出境。他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抵達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得到瑞典政府的政治庇護，初嚐自由的滋味。彭明敏逃亡成功，國民黨的特務機關高幹即遭整肅。彭氏逃出台灣，過程離奇曲折，他爲了不願連累尚留在台灣的朋友，迄今仍未向外公開。

一九七〇年九月廿七日，彭明敏手持瑞典政府所發的無國籍者證件，輾轉各國，再度抵達美國，而後奔波美國各城市，向學術團體、教會組織、台灣人團體等，作公開演講。十餘年來，除了在美遊學演講外，活躍於在美台灣人社團組織。美麗島事件之後，曾參與台獨聯合陣線。他一向被視爲台獨陣營裏的溫和派。

一九八五年九月，美國台灣人公共事務協會（*FAPA*）改選第四屆中央委員，彭明敏以高票當選。是年十月廿日，*FAPA*於芝加哥改選會長，現任會長陳唐山以在美國聯邦政府任職爲由讓賢，公開推薦彭明敏出任下任會長，結果彭氏以高票當選新會長。目前，他辭去他職，遷居華盛頓，專心推展*FAPA*會務。

台灣人的良心——彭明敏的傳奇故事

在台灣，「六〇年代」是延續「五〇年代」而來的一段漫長的「黑暗時代」，大量政治犯在這個時期被一爐一爐製造出來。包括「雷震案」、「施明德案」、「蘇東啓案」、「彭明敏案」、「劉顏案」、「羅東案」、「統中會案」、「柏楊案」……都是震撼人心的大案。

其中，「彭明敏」案至今仍很少人敢於公開提起，因為該案主角彭明敏，目前是美國台灣獨立運動相當重要的領導人，他們涉案的理由也與鼓吹台灣獨立有關，在國民黨視台獨為大讎，必欲去之而後快的情況下，「彭案」就一直在私家之居輾轉相傳，尤其，當彭明敏於一九七〇年元月三日神秘偷渡成功，離開台灣，前往瑞典，轉往美國這一段秘辛至今未見公佈，更增添本案的神秘性。

彭明敏原籍台灣高雄，但出生於台中大甲。他的父親彭清靠先生，畢業於日據時代的台北醫學院，皈依長老教會，因行醫致富，在台中大甲購置大量田產，後來又搬回高雄老家，繼續在高雄懸壺，是治療卵巢瘤的專家。

彭明敏小學時候就讀於大甲的日人小學，中間曾隨他父親前往日本一年多，轉入日本的北浦小學，當他父親由日本進修完畢，回高雄開設醫院時，彭明敏也回到高雄，進入高雄的日人小學讀五年級，後來又進入高雄中學就讀。但彭明敏並未在高雄中學畢業，因為當時的中學是五年制，他唸完四年後，便前往日本投考高等學校，終於進入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其後並順利考進東京帝國大學。當時二次大戰正激烈進行著，盟軍飛機開始轟炸日本。有一天，彭明敏前往

長崎探視他在長崎醫科大學唸書的哥哥，竟遭空襲日本的美軍飛機炸斷了左臂，差點喪失性命。這個不幸遭遇促成了彭明敏日後以研習國際公法、航空法為畢生之志趣，他因而成爲這個學門的先驅和權威。

戰後，彭明敏與其他在東京帝國大學唸書的台灣學生，一起回到台灣，轉入台灣大學繼續學業。他們在日本讀的是法律、經濟和政治，但當時的台灣大學重點在物理及農業方面，日本人一向不喜歡台灣人涉獵法政方面，加上剛來接收台大的國民黨方面並沒有爲台大法學院帶來任何師資人才，於是彭明敏他們自己找到一些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律師和經濟學家前往授課，完成規定的學分，獲得台大政治系學位。彭明敏說他在台大唸兩年，修完四年的學分，除了磨練中文外，並沒有學到什麼。

台大畢業後，彭明敏進入黃朝琴主持的第一商業銀行工作，並兼任台大政治系助教。由於興趣不在於商界，彭氏拒絕銀行的高薪誘惑，只工作了一個月便自動辭職，專心擔任台大助教。當時台大法學院來了一位新院長薩孟武先生，薩孟武也曾讀過日本第三高等學校，並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與彭明敏一起擔任政治系助教的劉慶瑞，也是三高畢業，東京帝大及台大畢業，因而薩孟武對彭、劉兩人特別照顧，指導他們寫作，發表論文，並一再對外公開說，只有在日本教育制度下，才能產生像彭、劉那麼優秀的年輕學者。

值得一提的是，這時候的台大校長傅斯年，是一位開明的自由主義者，他來到台灣立刻察覺

到台灣的環境很特殊，他公開宣稱，他相信台大最後有一天應由台灣人來管理，而他這個信念成爲他的基本政策，他不但設法網羅台灣籍教授，並且努力培養已在大學裏的年輕台灣人。即使傅斯年不久即因心臟病去世，但是，他的繼任者錢思亮校長，上台之初，仍頗能執行他的這項培植台灣人的計畫。因此，彭明敏獲得「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名額，前往加拿大蒙特里的麥基爾大學新成立的「國際航空法研究院」深造。

在麥基爾大學兩年，彭明敏獲得碩士學位，他的許多學術論文以法文寫成，並獲得國際學界的普遍重視。這個時候，彭明敏的傑出表現被當時居住紐約的胡適博士深爲讚賞，贈送彭氏一年的獎學金，使彭氏得以順利完成學業。後來，胡氏還想推薦彭氏前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繼續攻讀博士，但彭明敏決定前往法國巴黎大學深造，經過一年，又取得博士學位。然後取道塞得港、喀拉蚩、孟買、新加坡、香港，回到台灣。彭明敏說他在船上曾遇到錢穆先生，當船在基隆靠岸時，蔣經國會親自去接錢穆。

彭氏出國三年，連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在卅一歲就被台大聘爲副教授，卅四歲升任正教授，是當時最年輕的台大教授。坐直升機般的竄升，曾使當時台大的一些教職員對彭明敏十分吃味，甚至有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提出質詢。在這幾年學術生涯中，彭明敏並未對實際政治發生興趣，但他是研究國際法的，對台灣的法律地位一直深感興趣，他在課堂上開始強調這個問題，並撰寫國際公法教科書，長達八百餘頁，至今仍被認爲是以中文寫成的最佳教本，政工幹校和軍法學

校也都請彭氏去兼國際公法的課。

一九五六年，哈佛大學的季辛吉 (Henry Kissinger) 教授，邀請彭明敏參加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辦的國際問題研究會，一九六〇年，彭氏再度應季辛吉邀請參加哈佛主辦的國際問題研究會 (在東京舉行)，同時彭氏也受派為參加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舉行的「中美文化合作會議」代表之一 (胡適博士為主席代表)。國民黨官方十分重視後面這個會議，由蔣介石親自主持歡送宴會，這是彭明敏第一次見著蔣介石。

這時候的彭明敏真是炙手可熱，意氣風發，分別被聘為「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國家講座」(胡適為該委員會主席)、「陽明山會議」代表、並當選第一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與彭氏一起獲選為十大青年的才俊之士，如林洋港、錢復，目前都是政壇上重要的人物，但是目前出版的中華民國商總會十大傑出青年名錄裏，並沒有彭明敏的名字，因為在他被判刑之後，即遭除名。報紙連續以大幅報導彭氏的傑出表現，已使彭氏成為風頭最健的人物。當時，彭氏認為他仍是一位「純」學者，因此當蔣經國以救國團主任身份宴請「十大青年」時，彭氏並未出席參加，使得隔天報紙刊登團體照時，獨缺彭氏的照片，立刻有各式各樣的猜測，認為彭氏與蔣經國不合才故意杯葛他。

但是，彭明敏仍然在一九六一年獲聘為台大政治系主任，同時，當局指派彭氏參加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的顧問。外交部長沈昌煥、特務頭子唐縱、中央黨部秘書長及副總統陳誠，紛紛約

見彭明敏。彭氏後來回憶，陳誠可能有意與他單獨交談，因為陳誠可能不願意與彭氏討論台灣內外情勢問題時有其他人在場，陳誠向彭氏說：「其他代表，昨日都在這裏用餐，我很遺憾來不及把請帖送給你。」與國民黨各領導人交談，彭氏深感他們「對各式批評都非常敏感」。一九六二年一月，蔣介石在總統府辦公室接見彭明敏。獲得總統召見在當時是任命官位的先兆，彭氏回到家裏後，立即有高級黨政官員要求他加入國民黨，並暗示他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任命，但彭氏未加考慮，終於與國民黨正式結下樑子。

此時，彭明敏更大膽地公開討論台灣的地位問題及台灣人民自決問題，這不能不說是一項非常大膽地嘗試，雖然他沒有公開討論「獨立」問題，但他開始在演講及文章中強調他的住民自決論。當時，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安排彭氏從事一項關於非洲的特別的研究計畫。研究報告的一部分題為「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發表在「文星」雜誌上，在這篇文章中，彭氏評論非洲為獲得認同和獨立所作的鬥爭，並呼籲注意一些人民因殖民統治而與過去斷絕關係，如今則正為掌握自己命運而掙扎的現象。「文星」的編者按語說，「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們可從這段思潮的激盪中，得到觸類旁通的領悟」。

我們可以看出，這時候的彭明敏在思想觀念上，已與國民黨當道者的想法愈離愈遠，而與殺頭的路愈來愈近了。這時候，彭明敏的學生魏廷朝與謝聰敏，經常到他家聊天，討論台灣前途的問題。師生三人愈談愈得意，他們認為在他們的談論中，已把國民黨治下的台灣內外情勢，分析

得清清楚楚，他們反反覆覆，一再地討論，國民黨政府宣稱代表整個中國是一個巨大的神話和騙局；他們強烈批評最近各界一致熱烈討論的中央民意機構問題、戒嚴問題、龐大的軍事預算問題、反對黨問題、教育問題、土地改革問題、特務、救國團問題……都在他們的討論之列。

然而，義憤填膺於私家之居，猶不能令他們感到滿足，彭氏師生三人於一九六四年初，決定把他們所分析的台灣問題草擬出一份綱要，分發給台灣住民（包括大陸人及台灣人），不久，他們即草擬一份短簡有力的宣言，定名為「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提出八大主張、三大目標和八點原則。在簡短的前言裏，他們提出台灣島上的人民，既不願被國民黨、也不願被共產黨統治，而是要自己統治；基於本身的利益和自保的需要，一千二百萬人民必需以自由選出的政府來取代國民黨政權，並以公共的福利為施政方針。最後宣言的結論說，「多少年來，中國只是兩個是非，一個是極右的國民黨是非，一個是極左的共產黨是非，真正的知識反而不能發揮力量，我們要擺脫這兩個是非的枷鎖，我們更要放棄對這兩個政權的依賴心理，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自救的途徑。」

彭氏三人却在這份宣言定稿後，發現「生命似乎有了新的意義」，他們期待這份宣言能產生宏大的影響，在各界引起廣泛的討論，而得到普遍的支持，他們認為，國民黨將因此而大動盪。於是，他們著手接洽印刷廠，決定印製一萬份。

經過許多波折後，他們終於印好一萬份傳單，僱了兩輛三輪車，運到已訂好的一家小旅社，

隨後又轉運到離總統府不遠的一位朋友家裏寄放著。接著，三個人回到旅社休息，才進門不久，就被七、八名便衣人員闖入逮捕，當天，是一九六四年的九月二十日，正好是中秋節，月亮高掛天空，渾圓而明亮，他們則將面臨一片黑暗的命運。

被捕之初，一如國民黨在「六〇年代」的秘密抓人作風，彭氏三人頓時從世界上消失。他們家人不知他們的下落，而他們正接受情治單位疲勞轟炸式的秘密偵訊。國民黨懷疑他們要在十月十日那天，陰謀推翻政府，或舉行群眾示威。國民黨又認為，宣言的文章，寫得太好了，一定有大陸人參與，否則憑他們三個台灣人不可能寫出這樣好的中文，於是國民黨懷疑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作家李敖可能也參與其中。不論如何，他們受到不眠不休的審問。而情治人員則前往他們的家裏大肆搜查，他們的家人才知道他們已被捕。但是，警備總部一直否認知道彭氏三人的下落，直到紐約時報駐台北通訊員告訴警總，他握有確切證據彭明敏等人已被逮捕，如果警總不發佈消息，美國報紙將予以揭發，警總才在十月廿三日發佈一段簡短的正式聲明，說他們三人因「從事破壞活動」而被捕。十月廿四日英文中國郵報第六版，報導「一教授和兩名學生，因判亂罪被捕」。彭明敏被形容為「傑出青年，四十一歲」。

彭氏師生三人，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才受到正式審判。雖然國民黨一再保持緘默，哈佛大學的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教授及季辛吉教授分別投書紐約時報，向雙橡園的中華民國大使館探詢，表示嚴重關切，彭明敏留學過的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也向大使館接觸，此外，巴黎

大學、海外台灣留學生也紛紛表示抗議，而駐紐約的蔣廷黻也打電報給國民黨當局，警告他們，這個案件必須謹慎處理。這時候，國民黨仍希望彭明敏能「回心轉意」，他們安排彭與國民黨軍方的高階層人士見面，王昇將軍當面對彭明敏說：「我們都認爲你是一位傑出學者，我任政工幹校校長時，曾聘你去教書，就在你被捕前幾天，政工幹校正式通過聘請你擔任政治系主任，當我聽到你被捕時，實在非常尷尬，臉都紅了，我正在軍事機構盡力提昇你的地位呢！」他們對彭明敏進行一連串的「再教育」，在整個「再教育」的會議中，他們還邀請薩孟武院長來感化彭氏，但薩先生始終保持沈默，一言不發，不斷抽那隻永不離口的烟斗。

彭氏家人爲他聘請了立法委員梁肅戎擔任辯護律師，但是，彭明敏則自己起草答辯狀，他知道答辯狀裏針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合法性提出異議，會愈弄愈糟糕，所以他以「言論自由」作爲答辯基礎，指出他們並未使用暴力，而批評也是愛國方式之一。結果，謝聰敏判刑十年，魏廷朝和彭明敏各判八年。

由於國際間營救彭明敏的努力不會間斷，對國民黨的海外形象造成很大的壓力，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日，蔣介石終於下令特赦。但魏、謝兩人則與特赦無緣，彭明敏出獄後，又被調查局的人員祕密監視著，黨部並多次派人來與他談，希望他接受「大陸研究所」研究員的職務，他則一概加以拒絕，他希望回到台大去教書。過了不久，當時在救國團裏工作的李煥，奉蔣經國之命，帶彭明敏去見蔣，彭向蔣表明回台大教書的意願，但終不能如願。此後，陶希聖又與彭明敏接洽

，爭取彭氏的合作，希望他進入政大「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吳俊才也親自登門拜訪，但都被彭氏一一推拒。

當時，彭明敏的姊姊彭淑媛擔任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校長，學校也常受到騷擾，有一天，在校園發現一張「打倒蔣介石、擁護彭校長」的海報，被迫辭職負責。

彭明敏回到家裏，許多人又開始往他家裏跑，各式各樣的人都有，包括大學生、議員、教員、當然也有特務夾雜其中，一來，他們又開始激烈批評政府，咒罵惡劣的官員和政策措施，二來，在嚴密的監視網下，他們竟渾然忘我而與海外台灣份子聯絡。機會又來了，國民黨透過一位大特務陳文英，混入談話陣中，一一串連，一九六六年夏天，終於大開網羅，逮捕林水泉、顏尹謨、吳文就等二百多人，著名的「林顏事件」、「羅東事件」即於此時不斷上演，而彭明敏本人則受到更嚴密的監視，幾乎已到了全天候寸步不離身的情況，調查局並再度「約談」彭明敏。這時，美國密西根大學寫信來邀請彭明敏前往任教，而加拿大麥基爾大學也發出聘書，彭明敏嘗試申請出境，却被國民黨回絕。監視仍持續進行，前往彭家的客人都要被攔截、質問、登記，甚至在農曆年也不停止，調查局的幹員王淦時常奉命去看彭明敏，彭對他說：「一年裏，到了農曆年節，國民黨在金門、馬祖的軍隊也要停火幾天，共產黨軍隊也是一樣，但你們對我在這新年時也不放鬆，顯然，你們把我看成比共產黨更大的敵人了。」

彭明敏知道他如果不逃命，可能又要遭逮捕，因而開始計劃逃亡。直到目前為止，彭明敏以

何種方式逃出台灣仍是一個謎，但是由這本回憶錄看來，他在飛抵瑞典之前，曾在琉球或者菲律賓停留過。他到達瑞典的時間是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瑞典政府立即給他政治庇護，在瑞典居住一段時期後，他終於到達美國，成爲美國的台獨運動的重要領袖之一。

長期以來，許多人懷疑彭明敏能順利脫出台灣，是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協助，因爲，他在二十四小時被監視的情況下，竟能逃過特務的監視網。所以傳聞彭明敏是在台中清泉崗基地搭乘美軍飛機離開台灣。真象究竟如何，有待彭明敏「再回憶」了。

目錄

彭明敏小傳

台灣人的良心——彭明敏的傳奇故事

第一章 我的台灣人遺產

第二章 一九四五年的長崎

第三章 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

第四章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

第五章 留學加拿大和法國

第六章 台大學術生涯

第七章 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

第八章 被捕

第九章 偵訊

第十章 軍事監獄和審判

第十一章 監視

第十二章 逃到瑞典

第十三章 從美國看台灣

附錄(一) 以言論自由推翻國民黨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六日「新聞週刊」訪問彭明敏

附錄(二) 助他一臂之力

——李敖談彭明敏

附錄(三) 台灣只要能自由演講一個月，國民黨就會倒

——鄭南榕、魏廷昱越洋專訪 H A P A 會長彭明敏

附錄(四) 一千九百萬人命運之所繫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彭明敏在美國眾院

亞太小組台灣人權聽證會證詞

第一章 我的台灣人遺產

生命中的三個世界

海島的最後一絲微光，在後面漸漸地消失了。我差不多已經到達了公海，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掌握。在我一生中，從未感受到這樣「真正」自由的感覺。過去十四個月的牢獄和近五年的監視，使我實在無法相信我遂於能夠從囚禁脫出。

自由的感覺是那麼強烈，幾乎使心身承受不住。更使我興奮的是想到我現在已能公開否認我曾被迫承認而國民黨用來羞辱我的那些「自白」和「懺悔」。我冒着生命危險逃離台灣這個事實，就已完全否定了那個政權和它想毀滅我的各種宣傳。

當我瞻望未來時，忽然領悟到，命運註定要我為着同胞的權利和期望，而公開發言。過去，我一直自認是一個純粹的學人。可是現在，一個新的命運將要劇烈地改變我的全部生活。一種深沉的宿命和幻妙的感覺，貫穿了全身。

過去幾十年，我生活過的三個世界，清晰而同時地浮現在我腦海裡：我種族傳承的華人世界；度過童年和接受早期教育的日本世界，日本曾一度統治過台灣；以及在思想知識上與我關係密切的西方世界，而此刻我正在向它回航了。

現在，我朝向着一片空白而不可預測的將來。不過，有一件事我能確定的，則是未來的生活再也不會與我度過的生活一樣。

我尖銳地意識到，我的經驗正象徵着整個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他們的生涯和他們的悲劇。

我的先人

我對於祖先所知有限。不過，在父系這邊，由於我是在台灣出生的第五代，應該假設先人是極為貧窮的農民或漁民，在一百多年前離開福建，移住於這個崎嶇的海島邊疆。

我幽默的老祖父總是愛說，他的祖父只穿一件單薄的褲子，抵達南台灣——窮得連一件衣衫都沒有。他在晚年，喜歡草擬家譜自娛，但是祇能從那位只穿褲子沒有上衣的祖先寫起。他似乎

記不得或沒有興趣去追溯台灣海峽對岸的家族淵源。我們確實知道在福建有一個村莊裏，彭姓非常普遍。但是，在台灣彭姓幾乎全屬於客家，他們的祖先大都來自廣東。我的家族却不是客家。

在一八七五年以前跨海到達台灣邊疆的華人，在北京朝廷的眼中，大都是「罪犯」或是「叛徒」，這是現代台灣與大陸許多不佳關係的背景。這個海島，當歐洲人最初來探險時，是個蠻荒叢林的地帶，只有獵人頭的印度尼西亞或馬來亞系的蠻人定居着。在第十七世紀，荷蘭人和西班牙人開始拓墾，發展農業，設立教會和學校，在西南部開拓道路，又從鄰近的福建引入廉價的華人勞工。於一六六三年，他們被一個叫鄭成功的冒險海王所驅逐，他就是西方世界熟知的國姓爺。鄭是華人和日人的混血，夢想征服大陸諸省，却被驅趕到金門和台灣。他未曾實現野心之前就死了。但他的兒子統治了台灣二十年，發展成爲一個海洋王國，完全與中國分離，却積極與日本、菲律賓和東南亞貿易。他也懷有與其父親同樣的夢想，直到最後，北京於一六八三年派遣一支遠征軍到台灣。這支軍隊摧毀了獨立的鄭氏王國。清廷在台南設置台灣兵府之後，又敕令嚴禁華人渡海移民。

這些敕令雖然一再重申，直到一八七五年仍等於空文，貧苦的農民和漁民根本無視之，因爲他們覺得福建和廣東的情況簡直無法忍受。他們有些到了東南亞和南洋群島，有些到了菲律賓，成千上萬的却潛往台灣。台灣是個開闢的拓荒地，管制不嚴，任何人只要膽子夠大，便能趕走原始土著，清理樹木叢林，取得一片新的土地。

到了十九世紀初，台灣西南平地已經墾殖得相當不錯，而冒險的農人也開始向北部推進了。我的曾祖父，那位沒有衣衫的窮人，就是那些成千上萬移民之一，切斷過去與中國的關連，冒險到台灣南部，尋求新的生活。他在東港沿海小村，大約在今高雄以南三十哩，定居下來。他在這荒僻的地區，娶妻成家。東港位在該區最大一河流的出口，距離縱貫台灣南北的中央山脈不遠。其時，從華南來的客家移民正向東推進，越過狹長的沿海平原，向鄰近的山脚處開拓，而不斷與較開化的原始住民排灣族發生爭端，這些原始住民仍然堅守祖先傳下的部落土地。往南沿海是一些「刼船者」和海盜所住的法外村落，他們稍有耕種，稍有捕魚，並刼掠不幸在附近擱淺的船隻。

大約在一八五〇年中，我的曾祖父和他的村人，一定開始聽到「洋蠻」，因為英美船隻已開始到達台灣西岸各地，伺機以銀元和鴉片交換客家人從山區帶出的樟腦。到了一八五五年，冒險的美國商人已在高雄（其時稱為打狗）圍樁內設立了一個據點，並在淺水入港處昇起了美國國旗。四年後，西班牙天主教教士在此港口登陸，向內陸推進了幾哩，在東港稍北的客家村埤頭建立了佈道所。這些大胆陌生人的出現，造成轟動，我的曾祖父一定也對他們感覺好奇。

祖父時代

一八六五年，大約我的祖父出生時，英國的長老教會傳教士也在高雄設立起來。這件事對我

們彭家的未來有深遠的影響。傳教士的領導人是馬雅谷（Dr. J. L. Maxwell），他是從愛丁堡大學以及法國和德國學校畢業的醫生。最初，他在高雄港開設一個小診所，數年後，又將其傳教所和診所遷到較大、而在高雄以北三十五哩的台南。我的曾祖父據傳是早期皈依基督教的人士之一。

其後二十年間，長老教會曾設立學校和印刷所，印行教科書和一份以羅馬拼音的廈門語報紙。他們並在台灣發展先驅的醫療服務，最後在台灣南部成立了約四十個禮拜堂和聚會所。我的祖父年輕時，受僱為傳教士醫生巴克里（Dr. Thomas Barkley）的廚子。他皈依基督教，直到一九四五年去世時，他一直是台灣人基督徒生活圈中虔誠而活躍的領導人。台灣傳教史裡稱呼他為「彭牧師」，可是，他似乎沒有正式受封為牧師。對於祖母，我們知道得很少，只聽說她的脾氣非常暴躁。她為祖父生了五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她去世後，祖父再娶一位寡婦，又生了一個女兒。

很明顯的，我的祖父跟外國教師和醫生相處得很快樂，對於西洋文化和在他周圍正在發生的迅速變化，也很感興趣。經歷兩次革命性期間，他逐漸地遠離傳統華人的生活。一八五〇年到一八九五年間，台灣常成為國際爭議的焦點。西方航海國家和日本要求清廷，如果後者宣稱台灣為其領土，則應在海岸點燈劃圖並維持法律秩序。他們也要求清廷取締台灣海域的海盜，並控制居住東岸深山裏獵人頭的原始土著。當清廷滿口答應，却不採取行動時，外國列強——英國、法國、

美國和日本——提出各種對付辦法。一八七四年，日本曾派了一支遠征軍，佔據了台灣南端，直到北京勉強地付出大筆賠償並採取一些改革措施為止。

一八七五年開始，兩位較進步的巡撫曾設法取消禁止華人移住台灣的敕令，並撤除了許多對於擴大墾居和經濟發展的阻礙。可是北京清廷未幾又失去興趣，台灣人再任由一群貪婪的中國人擺佈了。一八八四年，我的祖父青年時，法國封鎖了台灣，法國外籍軍團佔領了基隆。清廷再度派遣相當進步的巡撫到台灣，而法軍撤退了。其後五年，巡撫劉銘傳致力建設台灣成爲大清帝國內最現代化的地區。他建築了一條由基隆到新竹的鐵路，引進郵政和電報制度，購買輪船以利台南和東南亞的貿易，從淡水到廈門佈設電綫，嘗試引進電燈，在台北開設「西學堂」，試辦「官醫局」，並且清丈土地和清理賦課。一八八七年，台灣道昇格爲中國的一省。

這些改革所以成爲可能，因爲台灣人比大陸華人較無傳統的負擔。外商推動海洋貿易，外國領事又駐在港口，這刺激經濟，使其有了可觀的收獲。但是，一八九一年，劉銘傳被召回，而傳統的、既無效率又極腐化的由大陸來的官僚又使得大都改革歸空了。

在這個時期，像我祖父這樣的人，已經將注意力從傳統的中國轉移到西方世界了，北京的忽略和在台灣任期短暫的中國官員們的濫用職權，激怒了不少台灣人。

台灣割讓日本

然於一八九五年，北京遂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那時，日軍已在滿州擊敗中國軍隊，在準備向北京進軍。台灣乃被用來抵償消災。一八九五年四月，馬關條約簽訂了。同年五月，在日軍抵達接收之前數日間，台灣曾紊亂而又無組織地嘗試建立「台灣民主國」。這個企圖失敗了。六月，日本國旗升起於台北後，日軍便向南推進。成千台灣人躲入山區，加入武裝集團，展開游擊戰，絕望地試圖抵抗日軍。中國官員和士兵却已從北部潛逃回大陸。在南部台南一帶，清軍將領「黑旗軍」劉永福堅持到十月，而有組織的抵抗全部崩潰，劉永福則化裝成一名老婦，逃到了廈門。

北京決定將台灣割讓日本，事前未曾與任何台灣人商量過，日本却給所有台灣居民兩年時間選擇國籍。願意離開台灣者，可以帶走財產。願意繼續作清國國民者，可登記為「旅居外人」。但是，任何人在兩年期間不辦理上述登記者，則自動成為日本帝國臣民。數千台灣人回到大陸，數千人登記為外僑，但是，絕大多數——約三百萬——則決定繼續留在台灣。我的祖父便是其中之一。

那時，霍亂、瘟疫、瘧疾、肺病、黑河熱、砂眼和其他許多疾病蔓延台灣，使這海島惡名狼藉，除了劉銘傳曾在台北短暫試辦官醫局之外，沒有任何中國官吏想設法清理這個海島。公共衛生的觀念，對中國人是陌生的。新來的日軍，在四個月的鎮壓期間內，因病死亡或殘廢者，達一萬二千名。平民的死亡率也極高。日軍的名義總司令是一位皇室親王，而這尊貴人物儘管獲有細心的照顧，在南征途中，仍難免感染霍亂和痢疾，而死於台南。這件事震撼了日本。

日本帝國政府立即看出，如果想在這新領土上定居成功，勢非好好清理台灣不可。但是，在一八九八年以前，軍人總督將全神貫注於討伐在農田平地 and 山脚的游擊隊，公共衛生的問題只有讓給缺乏有關知識的軍官去管了。如果軍人和文官的死亡率繼續那麼高，日本便無法建立永久的行政。而且要殖民成功，也必須有健康的台灣勞工。然而，那時一般平民可以找到的唯一醫療服務，只有長老教會在台北和台南設立的傳道醫院和診所。顯然，大規模的醫藥服務，必須儘快設法實現。

因此，在一八九八年，當東京派第四任總督男爵兒玉源太郎將軍時，這位具有非凡見識的軍人便帶了一位醫生後藤新平同行，作為民政長官，掌管軍事以外的所有事務。有六年之久，這兩人嚴格執行一個政策，用來改組台灣行政、經濟和社會生活。沒有一個台灣人家不受影響。後藤的最先步驟之一，便是在台北設立一所醫學校，提供短期課程，訓練人才，投入於全島衛生清理運動。他招收學生，每月提供少數補助金。

到了這時候，我的祖父已成為世俗牧師，在英國人的長老教會服務。他是一個窮人，有五個兒子和三個女兒要供養。男孩子要上山揀拾木柴，也要到城裏作工，以幫助家計。祖父太窮，無法送所有的兒子上學。但當新政府提供補助金給醫學校學生時，他便鼓勵第三個兒子——我的父親——到台北進入醫學校。

日本人很難贏得台灣人的合作，因為其軍人和警察都太嚴厲了。台灣島民過去就常企圖推翻

中國人的統治，而且在一八九五年亦曾抵抗日本軍隊。而今將十年了，他們在城市裡仍然採取消極的抵抗，在較偏僻的鄉野則訴諸破壞和游擊行動。一般說來，雙方都互不喜歡、互不信任，這種情況持續了許多年。然而，我的祖父是個樂觀的人，心地善良，對於新思潮極感興趣。他在台南與傳教士和醫生的長期交往，影响了他，使他的眼光漸漸轉離中國和過去，而嘗試適應日本人決定要在台灣造出的巨變。他雖然缺乏正式教育，却是一個真正開明的人。

我的父母

我的父親年輕就進入台北醫學校。這位年輕外來者，曾在淡水和台北認識了長老教會圈中的教友。在那裡，他遇見我的母親。她是淡水加拿大教會女學校的學生。她的家人早就定居於八堵，在今基隆和台北間的路上。她的父母認識了最初經過那條路的外國人和北部地區的傳教士。一八七二年，加拿大人馬偕醫生（Dr. George Mackay）設立淡水教會，他們大概於其後成爲基督徒。我的外祖父母是釀造米酒的商人，所以比起彭家較寬裕。他們有足夠的積蓄，購買些稻田。外祖父是一位非常文靜、溫柔、隨和的人，把大部份釀酒的經營留給勤勞的祖母去作。日人來後，製酒變成政府專利，所有私人酒廠都由政府收購了。我的母親有二個兄弟和一個妹妹。她的大哥曾到日本京都的同志社大學求學，那是一個美國人的教會學校。他回台以後，成爲長老會牧師、馬偕醫院董事會董事長和台灣北部長老教會大會議長。母親的弟弟曾入淡水教會學校，以後

成爲商人。

我的父親畢業醫學校以後，在台北馬偕醫院實習了二年，而在這個時期，我的父母結婚了。他到台灣中部海邊的一個小鎮大甲，開設他的第一個診所。這個不到二萬人口的古老海邊小鎮，當時頗爲有名。它是非常繁榮的手工業社區，生產大甲草蓆和草帽，外銷到世界各地。在最好景期時，單單美國，大甲便輸出了近一千萬頂的大甲帽，外銷到日本的數目也非常龐大。

父親在大甲定居後，一切也順利發展。醫生的收入不錯，且在每一個地方都受尊重，而有影響力。因爲他是在家裡第一個開始賺錢的人，一有能力便儘快將他的兄弟們也送到醫學校。他們也相繼地發展，而兄弟們很樂於讓祖父的生活較舒適些。

祖父很驕傲地發現，他事實上建立了一個「醫生世家」：他的兒子的孩子，不是取得醫學學位便是嫁給醫生，他們的孩子們也陸續進入醫生這個行業。彭家約有廿人，包括五名女性，完成醫學學位，而第三代，包括我的二個兒子或一些姪兒姪女，也在醫學院就讀。

父親終生與其兄弟姐妹保持密切關係，而他們都熱心於教育，要使每個小孩都得到最好教育的機會。

父親在大甲行醫十八年，將積蓄投資於稻田，買了約四十甲田，依當時標準，這算不少產業。他想給每一子女十甲田。我記得很清楚，當我們時常搭乘火車北上時，他總是指著黃色的稻田，驕傲地說「那些稻田都是我們的」。

我出生於大甲，是三個兄弟和一個姐姐中最小的一個。我們長大後，發現父親確實是非凡的人，及爲什麼他贏得大甲地區廣大的尊敬和愛戴。他喜愛馬，有時畜養四匹，常有一名馬伕照顧。他會在清晨騎馬到遠處出診，這在台灣是很不尋常的事。我清晰的記得有一天他騎馬狂奔回家，後頭有一匹憤怒的水牛一路追趕他。還有一次，他的馬真的被水牛角抵傷了。

他的興趣很廣泛而奇特。他學會中國拳術，熱衷於園藝，培養菊花和珍奇蘭花，畫水墨畫，並學會小提琴。他與佃農的關係良好。記得他們常來討論未來收穫中應付多少收成，或來求父親諒解何以未能付出約定的份量。他在其大診所，也做了不少慈善。他心腸慈悲，不在意患者付不出診費，常給免費的治療。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在長老教會中擔任長老，並支持教會的慈善和教育工作。

記得有一個問題，擾亂我們家庭的和諧。當時台灣有一普遍風習，就是較富裕的人家「收養」女孩，在實際上，是作爲僕人。這些養女在五、六歲時則被帶到家裡，她的家人拿到一筆錢，做爲她作僕人直到婚嫁年時的代價。在有些家庭，這些女僕得到良好的待遇，但是，在有些家庭，她們則受到虐待。我們家裡常有這樣的女僕，還有當我的姐姐結婚時，一位親戚送了她一名這樣的女僕。我的哥哥進入高中以後，便攻擊這種習慣是一種奴隸制度，有時甚至說「你們自稱爲基督徒，而這些人在此當奴隸！」。雙親因此發窘，試圖辯護，指出在我們家裡的女僕受到良好的待遇，然我的哥哥從來不會爲此感到舒服過。

開始上學

我大約五歲的時候，曾被帶到中國。我仍記得上海有多冷，也記得南京中山陵的長階梯。父親的朋友黃朝琴，當時在南京外交部任職，帶我們遊覽這個首都。我年紀太小，不能完全理解所看到的一切，但這次旅遊却給父母一個機會將大陸中國人與被日人統治了幾十年的台灣人的生活情況，作一比較。當然，他們對中國的廣大，印象深刻，對祖先的土地，也感到有些鄉愁。不過，就社會發展、工業化、教育和公共衛生方面來說，他們覺得比起台灣，中國還有許多有待改善的。

當我的姐姐到了上學年齡時，父親在台北美國領事館附近租了一間日本式房子。母親與我們住在一起，父親則儘可能北上與我們團聚。偶爾，我們亦一起回到大甲與父親一起，而六十哩長的火車行程總像是一次大旅行。

進入學校後，我們開始遠離鄉下家庭的保護和溫暖，而投入殖民地都會較複雜的生活裡。在大甲，我們是望家子弟，有僕人呵護縱容，又有台灣朋友來往。在台北，經過嚴格考試以後，我們獲准進入最好的日人學校，學生大都是日本官員的子女。

那時情況，對於台灣小孩，是非常特別的。由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日本人為着在日人子弟，採取與台灣人隔離的小學教育。在日據時代初期，台灣人兒童不懂日語，這種隔離政

策還算有正當理由，但二十五年過去後，情況不同了。然而，隔離政策仍基於偏見而繼續存續。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台灣人發動第一次有組織地要求實施地方自治並廢除經濟、社會和政治上的歧視。歐洲戰爭中日本加入聯軍，刺激了日本工業的異常擴展，隨着城市人口和工人貧民區也相應的增加。與革命運動開始橫掃歐陸同時，日本都市的新無產階級也要求更廣泛的選舉權。俄國帝制被推翻，英國、荷蘭和法國的殖民統治也受到挑戰。美國威爾遜總統宣揚個人平等，並強調少數民族自決的權利。

在這種情形下，日本在凡爾賽會議中要求國際正式承認種族平等。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便立即要求日本停止其在殖民地學校的種族歧視。一九一八年，日本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平民首相，而東京當局在台灣也開始稍做讓步，例如經過二十五年的軍人總督之後，第一位文官總督受派任了；而於一九二二年，學校的種族歧視在理論上廢止了。在日本統治下的第一代台灣人開始成熟了，而他們大都懂得兩種語言。

當我達到學齡時，法律規定任何會說正確日語的小孩，都可進入從前只供給日人小孩就讀的學校。可是，實際上歧視仍然繼續存在。所有申請進入日人小學者，必須經過考試測驗。日本兒童佔多數的學校，師資設備都較好。我兄姐獲准進入建成小學和我入學大正幼稚園，都是經過嚴格入學考試的。在我的幼稚園裡，除我以外，只有一名台灣小孩。老師們很和善，可是，很顯然，我們被認為是榮幸的特權者。

讀完一年幼稚園之後，我也通過考試，進入建成小學，與姐姐一起上學。第二年，母親決定回到大甲。她携我同行，而將姐姐托給外祖母照顧。我轉入大甲的日人小學，全部學生只有約二百人。我相信我是該校唯一的台灣小孩。在那裡，日人校長特別疼愛我，總是要在公開場合問我別的小孩答不出的問題，而我常被推選為學生代表。

到日本

在這樣愉快的情況下我渡過了二年。但是，父親在大甲行醫十八年之後，決定停止診所，到日本進修一段時間。姐姐剛從台北第一高女畢業，正在準備到東京參加女子醫學院的入學考試，大哥在台北高等學校、二哥則在台北一中就讀。

在那些年，我們知道許多關於日本侵略中國和「上海事件」等事情，這些都引起我們很複雜的情緒。日本報紙登載的都是日本軍人崇高的行爲和日本爲了正義而征服落後中國的故事。學校的老師和學生都響應這類愛國的情緒。但是，在家裡我們却聽到父母談論英勇的中國人如何抵抗日本的侵略。

我們離開大甲那天，那日人小學的校長率領了全校學生到車站給我們送行。這實在是前所未有的，使我們驚愕。等到長大後，我開始發覺許多有思想的日本平民並不贊成政府的歧視政策。有許多無偏見的老師和知識份子真實想平等對待台灣人，並希望溝通日本人與台灣人間的裂縫。

首次到日本，將我帶入一個前所未有的世界。在台灣日人自覺是少數，約卅萬日人統治著四百萬台灣人，而兩個民族的差異是無法掩藏的。在東京我們一家人則迷失於世界都市之一的日本人海中，而無人注意到我們是台灣人。姐姐考試及格而進入女子醫學院，我也轉入北蒲小學，父親則進入醫院接受婦產科的特別訓練。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他每晨天未亮就起來，熱心學習德文，其用功程度不下於準備大學考試的高中學生，那時我們在日本居住了一年多。

那時我已成爲標準的棒球迷。當貝比魯斯（Babe Ruth）訪問日本時，我大胆地寫了一信給他，得到了一張親筆簽名，作爲我的珍藏。

回來高雄

當我們回到台灣時，父親決定在南部新興的港都高雄開設一間醫院。日本政府正在那裡進行大規模的工業發展計劃。日月潭水力發電開始供應電力，舊高雄港灣已挖深以容納遠洋輪船，碼頭、倉庫和工業區也在興建，以配合日本的東南亞及南洋的推進。這些都使高雄成爲一極興盛的都市。

父親在高雄購置了一間相當大的旅館，改成醫院，其中一部份則作爲小兒科醫院，由我一個伯父經營。能幹的母親協助處理日常瑣事。醫院立即發達起來，收入不錯，父親不久也贏得治療卵巢瘤專家的聲譽。

我當時十二歲，進入當地日人小學的五年級。此時我已有很明顯的喜惡。我最不喜歡毛筆和畫圖課，却熱衷於棒球。學校很重視棒球，棒球老師則像軍事教官，非常嚴格。我雖然是一個糟糕的打擊手，却是極佳的二壘手。我成爲學校棒球隊選手，而贏得全市冠軍。

自從孩童時代，身爲台灣人，使我在心理上愈來愈感複雜。我講的日語完美無缺，在學成績也不錯，但總是太清楚地自覺與日人同學不同。我的名字也使我尷尬。中文「彭」字，在日語發音爲「何」，每次在課堂被叫到，總引起哄堂大笑。母親穿的是旗袍或是洋裝，每當有公開場面，她來到學校，總令我尷尬不已，因爲她看起來與其他日人學生的家長那麼不同。

高雄中學

我進入高雄中學時，四分之一的同學是台灣人。他們都是優秀的學生，因爲他們必須經過嚴格的考試，這些考試是用來限制台灣人得到較高等的教育和職業。殖民當局將中等教學作爲台灣人教育的一界限。理由似乎是訓練台灣勞工習得起碼的讀寫能力是有用的，但是發展台灣人知識份子或專業人才的領導能力，是危險的。

進入中學不久，校長換了。原來的矮小溫和的校長，由一位高大嚴厲的校長取代了。新校長向以紀律嚴格聞名。他的嚴重酗酒使得他的頭部不停的搖擺，甚至他向學生演講時也是一樣。我們立刻遭到斯巴達式的嚴厲管理，除了要應付煩重的功課以外，每一學生還要在校園內整理和照

料一小塊的花園，挑好幾桶糞便做爲肥料，分組割草並做其他勞動。大家對這些都極厭惡，但這些都是必修的紀律，做爲將來兵役的預備訓練。與全日本帝國境內的中學一樣，我們都要穿上土灰色制服，戴鴨舌帽，綁腿，這些實在不適合於高雄的熱帶氣候。即使在校外，沒有穿制服就會受到處罰。我們不准穿涼爽舒服而便宜的木屐、不准騎腳踏車上學而必須走路，絕對不准看電影，違反者立遭開除。

我們年齡都在十三到十八歲之間，而那些限制使大家討厭。像所有男孩子一樣，我們也會冒一點險。我不會忘記，校長有一次參加本市另一邊的女子中學運動會。在這樣場合，女學生們都穿着短而緊的運動衣，而我們中學有些學生便偷跑到觀衆邊緣，想去偷看着緊身衣服的女學生。校長碰巧看見了他們，隔天早會，我們全校學生遭到校長兇狠的長篇大罵、叫囂、近乎歇斯底里的指責。我們心裡不服，私底下閒聊着那女中的游泳男教練，年輕力壯，却可以與女學生同泳。

校長是當時日本許多軍人和極端愛國主義者的典型。日本侵華再起，所謂「支那事變」，從一九三七年七月於北京附近蘆溝橋事件開始，一直繼續到一九四五年。全國的後備軍人被徵召，我們的老師也一個一個上前綫去了。我們學生參加提燈遊行，慶祝皇軍在中國的無數勝利。我們看到日人以淒冷的告別式，送走他們的丈夫、兒子、父親、兄弟，高喊「請你壯烈地戰死」！

我們有一位叫德永的中年軍訓教官，非常特異，却頗受學生歡迎。他爲人直爽，毫無偏見，

有時粗魯而風趣。他如果認為某一學生舉止不夠活潑，或有點娘娘腔，便跑去從褲襠上攫住該生睪丸，要「看看你是不是真正的男人」。他遂被送上戰場，我們都懷念他。後來聽說他餓死在低達卡諾（Guadacanal），還被同伴吃掉了，大家都很悲傷。

狂熱的校長和軍訓教官，反覆為戰爭鍛鍊我們，不停對我們講述中國人的落後和懦弱、日本人的英勇、和日本為中國所作的自我犧牲。台灣人學生發現自己處在痛苦和尷尬的境地。父親涉獵廣泛，熟知在中國發生的事情。我從小學時則開始喜愛讀報紙，小心閱讀每頁的新聞，這個習慣至今還保持着。所以，就在當時，我也比其他同學知道更多的消息。中國的戰事和外國的事情是我們家裡常談的話題。父母亦時與外國傳教士來往。我想同學中沒有人對外國的一切更感覺興趣。

我從中學一年時，開始學習英文，而且樂於此道，因為在下意識中我知道英語會成為向西方世界的一個通路。我的英文成績不錯。我的英文老師天士對我的成績也很感驕傲。

當時中學是五年制度，但第四年結束後，學生有權參加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而要這樣做則須得到校長的同意。所以我向校長申請他的同意和成績證明。可是他拒絕了。他不准任何學生這樣做。父親便去看他，提醒他每一學生應該有權這樣做。校長反駁說「那麼，你的兒子辦理退學吧」。我的父親回答「好。退學吧」。

關西學院的生活

我自己一個人向東京出發了，心裡充滿着對這位殖民地嚴厲校長的不滿。我先到姐姐處，然後到仙台參加第二高等學校的入學考試。姐姐已經畢業醫學院，嫁給一位慶應大學畢業而頗為成功的台灣商人。我考試落第，感到懊惱，但這對我也許也有好處。我一直是殖民地中學的好學生，但這是不夠的。那年我十六歲。

現在，我面臨難題了。我必須在日本找一所中學完成學業。在原則上，中學都不接受最後一年的轉學生。經過一番痛苦的尋索，終於有一所教會學校，關西學院中學部允我轉入。它位於國際商港神戶和工業大都大阪之間，距離古都京都只有一小時多的車程。這是一所貴族和富裕家庭喜愛的學校。其大學部並不是第一流的，中學部的水準亦不高。它被認為是富有的父母溺愛寵壞的兒子們的避難所。

我在不遠的郊區一個農家，租到一個簡素的小房間，從過去在家時的標準來說，這是極原始的寄宿生活，得自己洗衣服，打掃房間，那裡沒有自來水道，要依賴前門院裡的一口井，飲食亦很差。

那時，我的二哥已考入東京慶應大學醫學院。有好幾個月我很想家，有時甚至流淚。但是，這段過去以後，我開始感覺快樂了。這個學校的情形，與野蠻的高雄中學相比，太不相同了。關

西學院似乎集合了一批有趣、怪異的教師，他們喜愛教書，但與公立學校的呆板軍事規律，格格不入。功課並不重，但我努力用功。這是教會學校，每朝有三分的禮拜。有一位音樂教師，年青英俊，極時髦的西裝和舉措，給我印象很深。

學校有一嚴格的規定，禁止我們到附近的有名的寶塚少女劇場，那是全女子的歌舞團。

學校位於日本最西化的地帶，郊外住宅區有外國商人和外交官擁有豪華的宿舍。大部份學生都是從那裡來的。我在週末自由出遊，常到大阪或神戶閒逛，而到那裡都是平平等等，不再感覺是次等殖民地人了。

我發覺自己成爲校內頗受歡迎的人物。他們驚異於我日語的流利，和班上最好的成績。軍訓教官特別欣賞我，因爲我在高雄中學所受嚴格訓練，使我在散漫的同學中，顯得舉動無比的活潑而精確。結果，每次的閱兵行進，我總是被派掌旗，這是軍訓教官能授予學生的最高榮譽了。

考入第三高等學校

我每晚都爲畢業後的入學考試，讀到深夜。我申請投考兩所負有盛名的學校，一爲京都的第三高等學校文科，另一是東京慶應大學的經濟科。前者通稱「三高」。兩所的入學考試，我都被錄取了。這轟動了關西學院，因爲該校從沒有人考上「三高」。「三高」與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一高」）齊名，被認爲日本最好兩所高等學校之一。而我，一個台灣人，在關西學院中學唸

了一年，考上了。

我打電報告訴父母這個消息。他們極爲興奮，不過，對我決定不讀醫科，並不十分滿意，而有點迷惑。依當時情形，除了行醫，沒有其他有前途的職業，即使在醫學界，也只有一位台灣人當教授。

父母掩抑着他們的失望，給我恭喜和支持，並認爲最小的兒子可爲其所欲。已在慶應大學醫科就讀的二哥很瞭解我，當我面臨在慶應和三高之間，要作一選擇時，給我很好的忠告。如果進入慶應，則可以不必再經過很難的入學考試，直接攻讀學士課程。如果進入三高，畢業後要進帝國大學時，還要面臨競爭激烈的入學考試。慶應大學的錄取率大約是一比十六，三高學生的程度却是全國最高的。

我決定進入三高。從西宮搬到京都，我投入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個時期。這個學校以自由風氣而聞名。其校訓是「自由」。當我入學時，它正爲維持這個自由的傳統而掙扎。在一九四〇年，它正在受着軍國主義的巨大壓力。與中國的戰爭使日本在大陸越陷越深。大批日本人被徵召上戰場「壯烈犧牲」，全國經濟也因戰爭的升高而負擔極重。三高的教授們則爲了他們自己和爲着學生，要維持某種程度的知識和個人自由而掙扎。那種自由當時在日本已很稀罕，而且快要消失了。

我在聞名的十五世紀寺廟「銀閣寺」附近，找到一個房間。京都的傳統是學生寄宿不供應三

餐。每個人必須到附近許多包辦學生餐食的小店子用餐。洗澡也要在外面。我每天讀到深夜，也花許多時間在京都許多舊書店瀏覽。寄宿處的主人亦對我很親切。

父親每個月寄六十円給我為費用。這遠超過所需的膳宿費用，幾乎是一般學生花費的兩倍。我開始買書，我藏書之多，對一個高等學校的學生來說，是不尋常的。有一天，當我閒步於學校附近吉田神社旁邊時，忽然清晰地意識到這也許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刻。我沒有顧慮，可以買到所有想要的書。我那時十八歲，充滿着理想和希望。

我進入文科，不是理科。其課程密集而有系統地讀歷史、文學和哲學。一種驕傲感激激勵着我們。任何出版的東西都引發我們去研究；我們有永無鑿足的求知欲。每個人都自認是哲學家。我們在那個年齡是愛幻想的。同學間的友誼是深刻而感情的。我們在下意識中自認對世界和人生的瞭解比長輩或校外一般人較為透徹。自認是優異份子的強烈感覺使得我們以年輕而目空一切的態度來藐視世界。

我們活在戰爭陰影之下。日本青年，凡不進大專的，都被徵召服兵役。有些同學是真正的個人主義者。從十八到廿歲這種年齡，可以說是個性突然開花的階段，才能也會顯現。每個人可以自由追尋自己的興趣，而這些興趣却常在正式課程之外。學校制度的重心是密集的閱讀。

學校亦非常重視外國語文的訓練，而我對此亦很有興趣，下了不少功夫。我們在中學已完成五年的英文教育，雖然講英文的能力不完美，閱讀英文的能力則相當高。現在開始學另一外文，

法文。每星期有四小時的文法、五小時的閱讀和三小時的會話。而教師都是第一流的。外國語文教育的重點不是會話，而是閱讀能力，正如一位教師所說，我們不是要訓練成導遊，而是要訓練以吸收外國的文化和思想。

不久，我開始着迷於法國的一切，其歷史、語言、文學。我閱讀有關這方面的原著和翻譯，並參加由一位法文教授所組成的非正式小組，大清晨在正式上課前集會，閱讀和研究法國文學和哲學。

第一年，我們讀日譯的西洋哲學，而在第二年則要讀原著。我自己却極欣賞法朗士（Anatole France）和勒梅特爾（Jules Lemaitre），買了許多他們的原著和有關他們的論著。法朗士頗為嘲諷的觀點，對我有不少影響。

雷南（Ernest Renan）的作品，對我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影響，他有關「什麼是國家」的論文，分析現代國家的基本概念，即國家不是由種族、語言或文化所形成，而是以共同命運的意識作為基礎。沒有想到，他的思想和分析，終於成爲一九六〇年以後我對台灣現實政治的指針。

我們有一位非常特異的哲學教授，士井。他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穿著隨便，舉止散漫，公然反抗心身上的種種束縛，這等於向我們宣揚反抗精神，贏得了我們的欽服。一般說來，全體師生大多有強烈的反軍國主義的傾向。我們欲維護獨立的象牙塔，軍國主義者則要摧毀它們。因此，學生與軍訓教官之間，有了一種緊張關係。

有一天，我們竟於看到一場該人的衝突。一位新任的資深軍官，是現役的陸軍上校。他召開了一次集會。有位資深軍訓教官報告他有人違規。該上校即點出學生，盡情責罵羞辱他們，經過一再叫囂之後，又命令學生帶着重笨的槍械在操場四周跑步。這是極嚴重的懲罰。忽然間，有位學生衝出隊伍，向上校尖叫衝去，並且以槍托猛力打他，然後丟下槍枝，越過操場，向校門跑了。有好一會兒，大家都被這一空前未有的驚人舉動嚇呆了。然後才有些教官，開始追趕那個學生。當然，他被開除學籍，以後就不知道變成怎樣，學校爲此事件而震撼，軍方對有這種學風的我們學校，亦採取更強硬的警戒和彈壓態度。

心理學教授是一個安靜拘謹的人，曾在陸軍服役過。他的授課有系統，但相當沈悶。有一天，很意外地，他要我們一篇切身的文章，坦誠自由地表達我們自己的想法。他答應爲我們守密，我却開始寫一篇譴責日軍侵犯中國的文章，而一旦入筆，我便不停地寫，一口氣寫了十頁以上，責難日人對中國人和台灣人的歧視和輕視。雖然知道這篇文章如果發表於外界，我一定會被逮捕，我仍然將它交出去。幾天後，那位教授叫我到他的辦公室，悄悄地向我保證不會有人會看到我的文章，並對我所痛訴的情況表示遺憾。可是，他仍然警告我，以後還是要將我的想法隱藏，不要對人提起。

我對服兵役極感厭惡。從中學時即痛恨軍訓。學校要定期舉行長期操練，重裝行軍，在野外露營二、三天，通日通夜的軍事演習。有些學生會因體力不支而倒地。在三高的最後一年，我乾

脆不報到參加長期野外操演。學年結束而將近畢業時，有一天碰巧遇見主任教授，他却用鬆了一口氣的語調對我說，「恭喜，你總算可以畢業了」。我很吃驚，因為我從來沒想到我的畢業還會成問題。原來，軍事教官給我不及格，而教授會討論應屆畢業生總成績時，是否應讓我畢業，曾發生辯論。我的主任教授好不容易贏得辯論，使我能夠畢業。

有一位京都帝國大學經濟科的學生與我在同一房子寄宿，他是東京的一個富家子弟。儘管我們的年齡和學校不同。我們成爲好友。十二月有一天，他突然從樓上衝下來，大叫「東條這個傻瓜！他做了最糟糕的事。這樣，一切都完了」。他剛剛聽了廣播，說日本攻擊了珍珠港灣，獲得大勝利。

從那天起，學校陷入絕望氣氛，與校外馬路上喧鬧的群眾遊行，成正對比。對一般日人來說，在中國多年無結果的戰爭之後，珍珠港的大勝，確實使人狂喜。每個人都聽到多少美國艦船被擊沉，多少飛機被擊落，而到處都洋溢著驕傲和澎湃的狂熱。到處都有提燈遊行和慶祝活動。可是，在我們校園裡面，教授和學生却不那麼樂觀。關於美國，我們讀得太多，知道得太多了。我們心裡都感覺，將來還是完全的未知數。

第二章

一九四五年的長崎

戰爭高潮中的生活低潮

日本慶祝一個接一個的勝利。香港於一九四一年聖誕節投降，馬尼拉於一星期後陷落，新加坡於一九四二年二月淪入日軍手中。這些日軍向南方大進擊所獲得的漂亮勝仗，却因四月十九日美空軍杜立德（Doolittle）閃擊式的空襲東京而受一頓挫。這次空襲提醒了日人，美軍還是有能力攻擊日本首都的。遠在南洋、荷蘭、英國和美國領域內的居民亦不熱心與日軍合作，而在許多地方甚至表現堅決的反抗。在中國，戰爭仍在膠着狀態。東京當局決定全國總動員是必要的。

政府突然宣佈，高等學校理科雖然照常上課，文科課程則要縮短六個月。因此，我們必須於

一九四二年夏天考入大學，否則面臨服兵役。我須要儘快決定要考那一所大學的那一個科。

祇要日本台灣間的航綫暢通，我們就可以與在高雄憂慮的父母保持聯繫，他們來信勸我，設法進入醫科。就文科學生來說，這是不正規的，但只要我放棄進入帝國大學的念頭，而應考國立醫科大學，這還是可能。可是，我很不願意。我希望進入東京帝國大學的法國文學科。我實在太着迷於法國文學和文化。父母很耐心地勸說我爲了前途，應去學醫，法國文學不論在日本或台灣，都無法謀生的。

最後，我想出折衷的辦法。我願意放棄主修法文，而去投考東京帝國大學的政治科。將來成爲官僚或律師。經過許多信件來往之後，父母也不得不接受我的意願。

考入東京帝國大學

現在我必須非常用功，準備東京帝大的考試。這是日本學制上，最艱難的一關。當考期到時，我到東京，住進大學附近小旅館，接受兩天的試煉。大家知道，台灣人學生要想擠入這道窄門，必須考得比日人學生較好。殖民地人民，朝鮮人和台灣人，並不受歡迎進入這最高學府的文法科。這一次參加考試台灣人有多人，但是我們知道頂多只能有一人被錄取，不論其他考生的分數有多高。

考試結果公佈，我及格了。我打電報給父母。不久大學生活開始了。

開學不久，有一天，大學文科學生緩役的制度，忽然被取消了。我四周的大部份年輕人開始從校園消失。我是殖民地人民，在法律上不必服役，但有權當做志願兵。在台灣，很多台灣青年被迫當志願兵。有些人編入正規部隊，但是大部份則組成軍伕，派到海外前綫。所有在日本大學文科的台灣留學生都被召喚到軍訓教官辦公室，被邀簽請從軍。在東京帝大，受「邀請」的姓名公佈出來，我的名字也在裡面。

我立刻離開東京，要與當時就讀於長崎醫科大學的大哥商量。在那裡也與大哥一些台灣學生朋友討論此事。我實無法想像自己在日本軍隊服役。

一星期後，我回到東京，決定不志願服役，繼續上課。我的名字仍舊貼在公告板，是唯一還未志願入伍的。我開始害怕後果，連上課都不大敢去了。幸好，日本大學上課是不點名的，在東京的生活變得很黯淡。消費品缺乏，配給亦變得嚴格，黑市却興盛起來。一般人也感覺軍事局勢在惡化了。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日本根本沒有打過勝仗，藉以消除民心的憂慮和沮喪。

我們還算幸運，父親已經作了經濟上安排。大哥快要畢業長崎醫科大學，而到長崎郊外的小村爲石，主持一縣立診所。二哥因爲生病，中止在慶應大學醫科的學業，在台灣與日本的航海綫被切斷以前，回到台灣靜養。姐姐則因姐夫所服務的公司派他到中國大陸，他們全家已搬到北京去。聯軍潛水艇和飛機正在加強攻擊日本近海的船隻，造成重大傷亡。

避難松本

我終於離開東京，前往西邊山區中央一個美麗的古城松本。松本遠離軍事設施，我有一個堂弟彭明雄，正在那裡唸高等學校，曾寫信給我說，那邊的食物情況還算不錯。東京沒有人知道我的行蹤。我僅通知在長崎的大哥。我在松本最初的寄宿所，非常糟糕。我的書本，雖想辦法運到松本，但大都得留在笨重的木箱子裏，沒有打開，我現在已經沒有心情看書了。離開了學校，我即陷入於極端憂慮和絕望的低潮中。

有一個老工人與我合租房子。冬天來時，天氣變得很冷，這是一個雪鄉，四周環繞的高山雪白亮麗，但對於在熱帶出生的人，冬天是殘酷的。我們只有一點木炭取暖，在冰冷的天氣中，又沒有熱水洗衣服。然，東京大空襲的消息來了。我們驚懼地讀着新聞報導，成千上萬的人在一夜之間死亡，整個東京為火燄席捲。

留在松本的少數男子，變得很刺目而尷尬，在街上常被他人瞪眼。天氣好時，我有時一個人到古老城堡、公園或街上去散步。我所住的房間變得難以忍受了。它非常骯髒，又有很多跳蚤。我不得不另外找到一個較好的地方，把十幾大箱書本和行李，搬到一位老人和其女兒的家，在那家二樓租了兩個房間。這兩個人都很親切照顧我，他們亦高興在這困難的時候有一點額外的收入。

長崎——失去了左臂

這種沈悶又寂寞的日子持續了近六個月。偶爾接到父母來信，但我的信却很少能達到他們。然後，消息傳來，高雄市被轟炸，父親的醫院被炸毀，但幸好家裡無人傷亡，他們已搬離高雄，疏散到鄉下了。這以後，一直到戰爭結束回到台灣，我未再聽到父母們的消息。

我很迷惘，不知道怎麼辦才好。這樣的生活毫無意義，錢又愈來愈少，大哥已經娶了一位女醫，是父親在醫學校同學的女兒。他們帶着一個小女兒已搬到一小漁村爲石，負責一公立診所。如今我們都同意，最經濟的辦法是我到那裡去與他們一起生活，共同節約日絀的經費，靜待時局的演變。

日本在海上已在全面撤退。美軍大空襲已釐平了許多工業城市和港口，前途看來沒有什麼希望了。

在準備離開這個古城的時候，最先想到的是我所喜愛的書籍。我決定把它們寄到三高時代最好朋友西田次郎那裡。他已到京都帝大言語科讀書。由於健康不佳，他沒有被召服役，而回到九州鄉下家裡。我寫信給他，要他關照我的書籍。如果戰後我還活着，我會來取回，否則全部歸他。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的信和書。我保留了少些書，包括字典、法朗士和勒梅特爾的作品。這些書，我直接寄到大哥處。

火車票很不容易買到。我告訴火車站站長，我的哥哥正在醫院裏，他才勉強賣給我一張從松本到長崎的車票。堂弟明雄到車站給我送行。那是一次感傷的離別。他將完全孤獨留在寒冷的松本，而我則踏上一個漫長而危險的路途，長達三十多小時的行程。火車路經過名古屋、大阪、神戶、廣島、八幡，而這些城市都是當時常遭到激烈轟炸的地方。

我到達長崎火車站時，是四月某天的下午。大哥住的漁村是在約三十哩郊外，所以，我須在長崎市裡過夜。隔天，我可以於清晨乘坐卡車翻越山丘去，或是搭乘上午十點的小渡船到那個漁村。我決定坐船，雖然不論船隻大小，我總會暈船。這樣我可以睡得晚些，在三等火車廂裡長途旅行而坐得那麼久，我疲乏極了。

長崎是一個重要的造船中心，但還未遭到轟炸，景色如畫。食物也還相當充裕。在旅館裡，一位極漂亮的年輕女孩送來可口的晚餐，我用餐時，也陪我聊天。

過日早晨，安祥的夜晚和豐盛的早餐後，我帶着包袱，走向不太遠的渡船碼頭。一艘約三、四十噸的小渡船等在那裡，正準備要出發，大約三十個男女和兒童已登上船，他們或倚着欄杆，或安坐在甲板的墊子上，等待着短短的航程。天氣晴朗，我很高興看到海面很平靜。

我登上甲板，四處觀望，尋找一個可以坐的地方，突然聽到頭上一架飛機向下滑行，發出尖銳的呼嘯聲。它傾斜下來後，又以急角度朝上，帶着馬達遽然的吼聲。一瞬之間，我被巨音爆炸擊倒，昏在甲板上。

我恢復知覺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處在尖叫混亂和恐怖的情景中。我全身都是血，甲板上到處也是血，屍體和炸裂的肢體跌落四處，人們在嘶叫着，呻吟着，掙扎着想脫離那裡。我試着要站起來，發覺左臂從肩膀炸斷了，使我無法置信充滿驚怖。僅有餘留的一些肌肉和皮膚碎片垂掛着。碎裂的骨頭暴露出來，鮮血洶湧而出。「這一切完了」，我想，「我要死在這裡了，而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

求生的本能是強烈的。我以右手抓住垂懸着的左臂，發現它很重，奇冷，毫無感覺。那是極非常的時刻。我在震驚，並不感覺疼痛，同時感覺左邊太陽穴一定也受傷，因為溫暖的血慢慢流入眼裏又流下面頰。我掙扎站起來，感到一種奇怪的不平衡，勉力橫過滑溜溜甲板，走下碼頭，蹣跚地走入街路，在尖叫的群眾中，感到極度的孤單。一再地對自己說「要趕快找一所醫院，要趕快找一個醫生。」

我對於長崎市區一無所知，所以試圖向慌亂來回奔跑的人說話，但有二、三個人一看到我，即驚惶地別過臉去，因為我已滿身鮮血，看起來太可怕了。突然，有一個中年男人對我吼叫，似乎在盛怒中咒罵我。我駭住了，無法了解，我在這樣極端危急情況，竟有人要怒罵我。直到戰後好久我才開始猜想，那個人大概是要使用日本軍隊的技巧，以吼叫、重擊或震動，使一個即將昏倒的人產生震驚和緊張而甦醒。但在那時，我根本不瞭解他的用意。在經過似乎是永恆，或許只是一剎那之後，有人指引我到碼頭附近街上的一個小診所。我蹣跚走進門，便失去了知覺。

我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診所黑暗走廊的水泥地上，還有其他受傷者在我周圍。只有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正在竭盡所能給所有的受傷者做初步急救，以等待長崎醫科大學派來的緊急醫療隊。

我躺在地上，忽而昏睡，忽而清醒。一些醫生和護士跑進來了。使我大為驚喜的是其中發現有哥哥的同學好友，眼科專家楊醫生。上次我到長崎時，曾在哥哥家裏與他長談。這簡直是奇蹟！每次他從我身邊經過時，我踢他的腳踝，喊他的名字，想引起他的注意。我自認爲是大聲地喊，但可能我只是在呢喃低語：「楊醫生！楊醫生！我是彭」。

他在我身邊經過三、四次之後，終於俯身看出了我，雖然我全身又襁褓又是血跡。「什麼？你在這裡？」，他驚愕大喊，似乎無法相信。他立即召來護士，給我緊急檢查，盡力給我施救，直接對心臟打了兩次強心劑。當他把我送到醫院時，我顯然已失血過多，命在旦夕了。

我至今不能清楚知道其後的經過。我恢復知覺時，我已躺在手術台上，外科醫生正要切除左臂，左臂關節處被炸碎了。我在生死之間彷徨着。

楊醫師設法傳話給哥哥。他通宵搭乘卡車越嶺趕來長崎。我朦朧矓矓竟識到他的到來，感覺安慰。可是，那是可怕的夜晚。大哥離開我去與醫生們討論。我仍然沒有感到疼痛，但却感覺極端口渴。沒有護士，我自己試了一兩次想從床起來要水喝。由於大量出血造成的極度衰弱，和因失去左臂而產生的奇異的不平衡，使我每次都跌倒在地板上。在那黑暗的地板上，我痛感到這次

事故對我一生所引起的改變，是徹底而不能挽回的。

大嫂於隔天也到長崎來看我。但是他們住得太遠而且工作太忙，無法時常來看我。我須久留在長崎大學醫院，在三樓一間單人房。因為護士缺少，僱了一位老婦人，但她不久就開始抱怨要爬太多樓梯，還有我要她每天一大早外出購買當時發行量極有限的地方報紙。我們只有解僱她了。其後，又僱了女人，她做得不錯，但舉止有點古怪。因為蚊子多，每晚要掛蚊帳睡覺。她却要每晚裸露上身，溜進蚊帳裏面來，睡在地板上，使得我非常尷尬。有一位非常慈善的年輕護士，常在不當班時來餵我，幫助我步行。每當她來，我的精神顯著地變得較好，較快樂，這似乎也使她很高興。

日本的醫院都嚴重地缺乏醫護人員和各類醫用品。包紮我傷口的繃帶只能每隔幾天才能換一次，而藥品和器具似乎也未徹底消毒。我的傷口發現蛆虫，使我驚愕。尤有甚者，我雖失去左臂，却不時感到左臂極癢，然而無法搔起，有時簡直使我無法忍耐。由於繃帶未常換或消毒不夠，我終於感染了血毒，發高燒了。醫生們幾乎要放棄我了。我急需大量的輸血。

在那時候，日本人民普遍營養不良，既無血庫，也沒有人賣血。然而我非常幸運，長崎醫大的一些台灣留學生聽到我的需要，而自願輸血給我。我的血是O型，有四個學生願意輸血而拯救了我的生命。其中一位是排灣族，是平地山胞。

那時是六月中旬，長崎還沒有時時遭到轟炸，但是每當空襲警報響起，通常是在夜半，醫院

職員便必須抬帶所有病人躲在地下室避難。躺在病床上六星期多，沒有一點運動，使得我體力非常虛弱。這些半夜的移動，被抬運上下四層樓梯使我很痛苦，心理上亦非常恐慌，因為每當躲在黑暗的地下室，聽到頭上有飛機飛過時，總覺得炸彈會掉下來。這變成每晚都得忍受的惡夢。全日本城市都遭到轟炸。美國開始在長崎丟下傳單，警告市民離開長崎。

有一天醫院接到命令，將所有可以送別處躲避的病人遣送出院，只有少數人員留下照料空襲受難者。大嫂始終每星期來一兩次，給我帶來食品。現在我們都同意，我應該搬到他們家去。他們可以給我包紮傷口，而且因為鄉下糧食情況較好，海產和蔬菜充足，我也許會恢復些體力。然而，這次的旅程將非常慘苦，因為現在連卡車營運亦不定時，我必須利用任何交通，儘可能遠離長崎，然後自己走約一小時的陡坡石路，到達一個地點才會有卡車繼續往為石村去。

在痛苦的出發那天，大哥無法來長崎，所以懷孕的大嫂代替他來。如果沒有她勇敢的幫助，我可能沒有辦法自己走完這趟行程。雖然受傷入院至今已超過二個月，我仍然極端衰弱，而且沒有正常的平衡感覺。最後抵達大哥家裡時，我們已筋疲力竭了。我因為鬆了一口氣，也因為疼痛，又想到自己這樣的處境，不禁大哭起來。我沉入於絕望的深淵，前途完全不堪設想。

長崎的原子爆炸

不知怎的，遠在台灣的雙親也聽說我成爲一次空襲的受難者。他們嘗試打電報給大哥，但是

電報並沒有抵達。他們相信我已死了，而一連數週每晚都流淚失眠，甚覺痛苦，良心不安。他們責怪自己，沒有寄較多錢，使我不必踏上前往長崎的致命旅途。這就是父母對我的愛啊！我親愛的祖父也在這個時候去世，使父母更是悲上加悲。祖父一再提到我的小名「敏仔」，因為他很疼愛我。臨終時，家人聽到他說「我最大的慰藉是我將在天堂與敏仔見面了」。

我一點一點地恢復了體力和精神。巨型的B-29，新式的銀色轟炸機，每天飛過附近，負着致命的任務。六月十八日，日本喪失了沖繩。長崎報紙刊登的官方新聞和故事，大事渲染日軍英雄誓死抵抗和愛國的壯烈事蹟。但是，損失琉球的軍事含義，即使對於消息較不靈通的日本平民，也無法隱藏。在心理上，這是一個重大打擊，因為大家都了解，美軍不久必然會進攻九州。報紙已坦白報導大都市所受的大轟炸，和東京、名古屋、大阪等地的可怕情況。我們的小漁村未受轟炸，但離岸不遠的漁船常受到美機掃射。大家預料美軍隨時可能登陸。許多婦女削尖了竹矛，並練習如何使用。有些婦女和兒童都退避到山裡。

七月到了，有時候，炎熱和緊張幾乎令人無法忍受。經過幾個星期，我的傷口終於開始癒合，大哥巧妙地用竹子、鐵絲和布片，給我安裝了一個輕便的義肢。他覺得這樣也許可以幫助我心理適應新的情況。我患着長期慢性的消化不良，可能是由於生活太緊張和情緒不穩所引起的。台灣家裡全無消息。幸好，我慎選的一些藏書、字典、法朗士和勒梅特的著作等，都安全寄達長崎。但是寄到朋友西田處的較多書籍，却沒有消息。然而，我並沒有認真看書的心情。

八月八日，長崎報紙登載一則簡短的官方新聞，說「昨日廣島被轟炸，美軍使用了新武器，有重大的破壞」。但是對這類例行的轟炸新聞，已無人特別注意。許久以後我們才知道，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十五萬男女和兒童，一瞬間被消滅了。

三天後上午，我在室內看報紙，聽到頭頂飛機嗡嗡之聲。突然間，有眩目的亮光，好像房裡按了巨大的鎂光燈。差不多同時，有金屬性的巨響，彷彿整個地球被一把巨大的鎚子擊中了。房子劇烈的搖動。我不覺叫出「那是什麼？」。接着，往外看到長崎上空有黑白雲升起，而從晴空裡忽然飄起細雨。

不久，大哥衝進屋子，他接到緊急命令，所有醫生都被召集到一指定地點，等待乘車進入長崎。他匆匆吃了午飯，整理了醫療用品，便又衝出去了。

那天下午，我們聽說長崎已完全被摧毀了。美軍又再使用新武器了。傳言說長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當天深夜大哥回家時，他仍處在一種震驚的狀態。他簡直說不出話來，必須掙扎才能吞吞吐吐告訴我們他所目睹的景象，我們所熟知的長崎市全滅了。整個城市都死了。

隔天黎明時，大哥又出發到長崎，協助營救逃離廢墟的幸存者。他們的傷勢非常可怕，而從他們口中得知許多難以想像的悲慘故事。我們很興奮發現楊醫師活着。

原子彈爆炸的後果，實在難以描寫。有些水泥建築物仍屹立着，但是，裡面所有木料和其他易燃物都在頃刻間化為烏有。據說在學校教室內，從整齊排列的白灰燼所在可以看出在死亡瞬間

正坐在書桌旁的每一個學生。熱度竟有那樣強烈。大部份的醫科學生都罹難，其中包括四位曾經慷慨輸血給我的台灣留學生。他們有用的生命被消滅，我却仍活着，這真是悲劇的命運。

大哥至好朋友之一，林忠實醫生和太太，當原子彈爆炸時，正在長崎市區中心。然而，奇蹟地，他們却安然無恙。雖然在戰前他們未能生育，戰後倒生育了幾個正常的小孩。

那正是仲夏時候，不久這座死亡的城市散發出令人不能忍受的臭氣。善後工作，對於當事人是一種異常的考驗。大約有七萬名死難者，而許多受傷者只能搬動到市外附近。幾天之內，又有新的恐怖發生。許多生幸存者忽然開始由口鼻出血，毛髮脫落，不久便死亡了。大哥和其醫師同僚們對這種未曾有的新景象，深感迷惑。

日本投降

政府簡單宣佈長崎被摧毀了，但是誓言要繼續奮戰，八月十四日，宣佈天皇本人將親向全國演說。這空前的廣播開始時，大嫂和我正走在村裡街上。廣播接收極為不良，但我們聽懂日本已同意無條件投降。全國國民被要求「忍受不能忍受的」。不論如何，和平終於來臨了。

做為台灣人，我們不像四周的日本朋友那樣，對聲調頗高的天皇聲音，感到那麼敬畏。但是我們還是為其含義深深感動了。極大驚訝之後，便感覺有一種無限的欣慰。一個時代結束了。再來的將是什麼呢？在日本的台灣人將如何呢？台灣的命運又將如何呢？

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

第三章

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

告別日本

我們決定儘快回去台灣，而全無其他想法。我們出生在日本旗幟之下，有許多日本朋友。如果願意，大哥可以繼續在日本行醫，我也可在日本最好的大學完成學業。我們許多台灣朋友決定留下來。但是我們決心儘快離開，覺得一定得回家。

日本彷彿突然完全忘記了台灣。我們每天仔細尋找版上有關台灣的片言隻字，但在整個夏末，只看到一則簡短消息：蔣介石任命陳儀為台灣行政長官，父親的舊友黃朝琴則將任戰後台北的第一任市長。

現在我們一家已有六口。日本投降不久，大嫂生下次女，還有隨大嫂到日本的一位女僕。我們是爲石村唯一的台灣人家。

在天皇投降的廣播後，立即有美國飛機經常低飛我們上空。我們聯軍戰俘已被釋放，而美軍飛機正在空投糧食給他們。大家都相信美軍即將登陸。許多村裡的婦女躲避到山裡，帶着她們削尖的竹矛。她們曾聽說，而且相信所有的美軍都是魔鬼、野獸、強暴者。

日本投降後不到一個月，美軍開始在村裡出現了。我們在鄰近的山路上看到吉普車，而對這種新式車輛都感到驚異和興趣。白膚或黑膚的美軍開始來到村裏，而人們對美軍的形象立刻有了急劇的轉變。日人對美軍觀感從一個極端投向另一極端。大家所預期的魔鬼，原來是極友善而樂於助人。小孩得到糖果，老人得到香煙，還有許多初遇時的不尋常的故事。偶爾，也有一些強暴或搶劫的案子，但是，就整體而言，日本人對於征服者之竟然如此善體人意，很感驚異。比如，有一晚村裡的老舊卡車在山路拋錨，路過的美軍吉普很小心地運轉以車燈照亮現場，並幫助那個倒霉的日人司機修妥卡車。卡車司機或乘客們都感激得不知所措。

村裡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干擾。美軍巡邏車時常在村裡街上開過，但是村民未受到任何擾亂。有一天我在路邊與吉普車裏的二個美軍談起話來。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我自己很吃驚，第一次能這樣公開而驕傲地說明這種區別。

大哥整個秋天都繼續在村裡主持診所。我們都安全，過得還算舒適，然而仍然渴望回家。我

們沒有收到從高雄來的任何家信。在松本的表弟決定留在日本完成學業，沒有想到他在日本一待便是十幾年才有機會回台灣探親。我們亦沒有大姐的消息，她曾與姐夫一起到上海、北京。如今我的傷口已經痊癒，體力也恢復，我變得好動了。我偶爾到長崎去，那裡有許多美軍，許多新式車子和堆土機。堆土機是美國人在戰時新發明，用來清除炸毀的建築物，並清理道路。到處堆積如山的碎石瓦礫，使整個都市變成巨大垃圾場。

十二月下旬，有一天我從長崎搭乘村裡的卡車回來，發現家裡一片喧鬧。原來我們已接獲通知，立刻回台灣。我們僅准攜帶手提袋，而且在午夜以前必須趕抵長崎火車站，搭乘火車到佐世保港，由那裡搭船回基隆。

我想要帶走我珍惜的書籍，說服大哥讓我分置一些書於三個大人能夠攜帶的袋子和行李裏。我自己能帶的很有限。大哥還得應付兩個嬰兒和四個大人必需的用品。所有不能帶走的東西，都送給日本朋友和鄰居。

在長崎火車站遇到二、三十個台灣人，倖免於難的醫科學生、楊醫師和他的家族，以及其他的人，大家都渴望回到台灣。日本人軍官在美軍指揮下負責安排一切。在特別為撤離者和其行李而保留的車廂裡，我與一個正要回漢城的韓國少女攀談起來。我們都處於人生戲劇性轉捩點。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不再是二等國民，但却不知道未來到底是怎樣的。朝鮮已得到獨立的保證，台灣人也被保證在新的、改進的戰後中國下獲得自由，而被交給蔣介石手中。與韓國少女通夜

的交談，非帶愉快而親蜜。

在佐世保，我們被推上極擁擠的貨船，要自己找一個地方以備這段漫長的歸鄉航程。乘客大都是台灣青年，他們被徵召為日本軍伕。他們很粗魯、不安靜，不斷地吵架。然而，他們亦很高興即將回家了。

我們匆匆趕到佐世保又被推上船後，又極痛苦地在港口內隨船搖擺了約一星期。當我們終於離開港口而駛向大風浪的大海後，徹頭徹尾地暈船了。在這淒慘的情形下，我們又獲知這條船將要通過佈滿水雷的海面，有些遭送船隻會觸雷沈沒，失去不少生命。船客們乃組織起看守來，在整個航程中輪班依欄警戒水雷。

暗淡的台灣

我們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黃昏時抵達基隆。仍然沒有父母的消息，也沒有什麼親朋來歡迎我們。基隆的破壞程度令人驚訝，原來在琉球戰役期間，基隆市遭到百分之八十的破壞。它受到徹底的轟炸，以阻止日軍在那可怕的戰役中利用該港市。

下了船後，我們在碼頭僱了人力車，向一位有名的邱醫生的家出發。他是父親的同學和老朋友。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着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夫以鄙視和厭惡的口腔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在那位邱醫生家裡我們受到熱誠的歡迎，而首先獲得的最大好消息便是父母親都健在，但已搬回高雄了。雖然非常疲憊，我們仍然很興奮地談到深夜。我們聽到的，大都令人洩氣。從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之後，直到十月廿六日，陳儀正式在台北接管台灣行政，其間，日人繼續掌理行政。主要街道修復了，而在清理建築物和恢復公用設施方面也相當的進展。但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却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爲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暗淡的景象，但即使如此，我們仍很高興回到了台灣。

隔天黎明，我們便首次體驗了中國國民黨接管後台灣所遭到的改變。在戰前，日本政府在高雄與基隆之間，每日維持十二至十四次準確的火車班次，有的是特快車，有的是平快，還有的是普通車。戰爭對於火車路線並無太多的破壞。

台北附近的鐵路設施比中國任何地方都大，而且裝備較好，而這些也躲過了嚴重的破壞。

在十月移交的時候，火車車輛雖然陳舊，但還是完整的。如今我們發現在中國人經營之下，基隆與高雄之間，每日只有一班火車聯繫。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飢餓的中國兵，他們因爲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佔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

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

然而，再度搭火車經過島上美麗的鄉間，使我們無比的欣喜。當駛進大甲時，我們向外看著父親的田地，並熱切尋找與童年記憶有關的熟悉地點。我們在一路上與來來去去的乘客談起「天來，他們有的由車門擠進來，有的却從車窗口爬進來。他們的故事都是一樣，千篇一律對新政府表示不滿和失望。財產的安全已經變成過去的事了。火車一路時常停止，而不知爲什麼。這也使人談到有組織的竊盜團，他們剝取公共通信的銅綫，竊取信號設備，偷運到中國，當做廢鐵出售。有一個乘客嘆道「沒有人知道這班火車什麼時候會出軌」。自從中國人接管以後，用鐵路寄運貨物者，必須自己僱用私人守衛，一路隨貨跟住車廂或貨車。新來的中國官員自己也從劫掠中分贓。

經過十四小時的行程，我們的火車終於在天黑後抵達高雄。我已離家將近六年了。只有美麗的鄉間景色和與父母重逢的期待，使我們免於沈淪沮喪。我們走出火車站時，還不知道父母的新住址在那裡。但是有一位人力車夫知道父親的診所，我們立刻出發了。當我們的人力車隊走到一棟不太大的兩層樓水泥房子前而停下來時，已經是晚上九點左右了。這是街上一排商店中的一間，有父親診所的招牌，顯然樓下是診所，樓上是住家。

門以鐵柵緊閉着，沒有門鈴。我們大力敲打着，連人力車夫也跟着我們大叫「開門、開門」

，他們似乎也了解這家庭很久未相聚了。父母並沒有提防，因為他們也聽說由日本遣送回台的船隻已開始抵達，而且他們聽到大嫂的喊聲，婦女的聲音，知道這一定不是國軍劫匪。他們猜到大哥全家回來了。

當他們打開大門發現我也回來時，非常驚訝。他們一直相信我已死了。這真是一次激動的團圓。父母立刻要我們和他們一起禱告，感謝上帝帶領我們安全返家。父親淚眼婆娑地想安慰我斷了手臂，並安慰我生命中的重創。大家都欣賞新添了的兩位孫子。在其後幾個鐘頭激動的對話中，父親無法掩藏他對台灣前途暗淡的感覺，他一再重複「情況非常惡劣」。

此後數星期，親戚朋友來探望我們，我們也去拜訪他們。漸漸地，我從父親的言談中得悉日本投降、中國軍抵達高雄、以及其後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狀況。無疑地，國民黨正在把我們拉低到與中國大陸混亂生活一樣的水準。父親在戰前從未參與政治，但在日本投降後，高雄的日本官員立刻找他，邀請他出來担任地方委員會的主席，以便在中國人前來接管以前能夠維護地方的治安。他是受尊重的資深市民，日本人和台灣人都能夠接受他。與其他台灣人一樣，他很高興日人統治終於結束。儘管在日人統治之下，在經濟社會上有極大進步，有自尊心的台灣人莫不痛恨在社會和政治上所受的歧視。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人領袖和學生一直不斷地在要求自治。一九四五年聯軍戰勝，美軍以廣播和傳單向台灣人保證戰後在中國治理下自由的光明前途。父親便毫不懷疑地接受這些保證，答應担任委員會的主席，相信這樣可以協助實現這個光明的新時

代。

中國軍的劫收

一九四五年十月，消息傳來，中國軍將要在高雄登岸。父親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這個工作後來變成一場惡夢。他受到通知中國軍將於某日抵達。歡迎的準備工作，立刻進行包括購妥爆竹、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建臨時亭子，購置大批鹵肉、汽水、點心等。然又有通知說抵達日期延後了。準備好的易腐敗的食物不得不想辦法處分。同樣情形發生幾次，使得花費多幾倍。

美國軍艦緩慢地駛入高雄港口，在沈船之間勉強地找出通道。日本當局命令等待遣送的日軍排在碼頭，服裝整齊，紀律嚴格，準備向勝利的中國軍致敬。很多台灣人也好奇而興奮，到了碼頭幫助父親的歡迎委員會，並參觀這一盛會。

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邋的傢伙，像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担跨着肩頭，兩頭吊掛着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着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却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父親必想日本人不知對這些中國軍隊有何感想。他覺得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他用日語的形容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

鑽入了」。這些勝利的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伕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爲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導他們的中國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不久，這些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現在中國軍隊已經登陸，駐防軍也在高雄出現，較多的中國官員也開始冒險由台北南下。他們向父親徵求意見，又要他在接收時，代表台灣人。他立刻幻滅了。每一中國官員首先要問的，千篇一律，都是「市府在銀行有多少錢？」。那也許是任何政府都要問的問題，但這總是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還有他們問話的口氣，父親和其他台灣人對此印象極壞。顯然，這些由台北來的小官僚，比普通中國兵也好不了多少。不久，他們穿起很好的衣服，強佔好的房子。他們爲什麼能夠這樣，台灣人都心裡有數。他們都是強盜兼乞丐。台灣由北到南端，各式各樣的掠奪正在進行。在高雄閒蕩的士兵，乾脆由商店、住家和公路上，拿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高級官員由台北派來的新來者，在掠奪糖廠、倉庫、工廠設備和存貨。每天都有帆船裝滿糧食、廢鐵、機件、各種消費品，由高雄出發，載往大陸沿岸私自銷售。

幽默的父親常說，應有人蒐集出版新來中國人的荒唐行徑，尤其由大陸內地運到台灣來無知軍人的離奇故事。他們對於近代科技完全無知。有的從未看過、也無法了解自來水設備。有的從水電行取得水龍頭而往壁上的洞一塞，以爲這樣水就會流出來。看不到水，就到水電行去大叫。有一個軍人坐上理髮店椅子，理了髮，理髮師拿起一把電動吹髮器朝向軍人頭上時，那個軍人立

刻舉起雙手，臉色蒼白，害怕得發抖，以為理髮師拿的是一把手槍。

父親有他特別的難題。他的診所掛有個招牌說「婦產科醫院」。但常有中國兵來堅持要父親給他們治療性病，或帶來奇怪而無法辨認的藥品，要父親給他們注射。他們相信注射可以治癒百病。

每星期都有許多這類行徑或大規模竊盜的新事例。父親在公共事務方面非常活躍。市長時常找他諮商。他成為高雄市參議會議長。他的正直人格無人置疑，他的診所也忙碌。他的財務也由戰時的損失開始恢復了。因為我們的房子太擁擠了，他希望在焚燬的舊醫院院址重建。有一天，他偶然向市長提到，他打算清理舊醫院地址。「那不成問題」市長向他說。在幾天內便有三十多名日本兵到來。帶頭的軍官說，他們正等待被遣送回日，很樂意來幫忙。我們到舊醫院址，他們工作很認真。母親給他們茶水和食物。我自己則驚訝地發現竟然在「指揮」起這麼多的日本軍人。回想到以前在三高時糟糕的軍訓成績，不覺苦笑了。使我們很為難的，這些日本士兵不肯接受工錢。

那時，在台灣日本人的地位非常奇特。他們正等着麥克阿瑟將軍給他們回日本的許可令。那些以前在我們生活中有權命令我們的，現在變成要聽命於我們了。日本警察曾經是那麼神氣而嚴厲，如今已收起他們的制服和佩劍，爲了生活什麼樣的工作都願意去做。以前享有崇高聲譽的教員，也被迫排攤在路邊，出賣他們的東西。我看見有些高雄中學的老師，沿街兜售一些小物件。

有時，從前的學生幫助他們渡過這段艱難的時期。但也有的學生曾把以前過份嚴厲的教師痛打一頓以洩積恨。

在這段時期，父親都處在矛盾的處境。因為忠於友情，他得協助正等遣送的日本朋友。但是他也知道新來的中國人正掠奪日本人，包括日本醫生的醫療用具和醫藥品。有權勢的中國人覬覦一份產業時，他只需控訴那個產業業主曾在日治期間與日軍合作過，則可以達到奪產的目的。

進入台灣大學

這時，我應該為自己的將來，作些決定的時候了。父母大概認為我可以多留在家裡休養。但我的身體已完全復元了。我已經廿三歲，好動起來。青年時期的天性使我時而樂觀，時而又陷入失望的低潮。而且我也開始覺得無聊了。高雄市很少有文化知識上的刺激，我很渴望能再度回到書堆裡去。

因為我缺一年的學分才能拿到東京帝國大學的學位，所以開始查看有無可能在以前的台北帝國大學讀完以便拿一張文憑。台北帝國大學是日本人於一九二七年創立的，如今二十年後，已被新來的中國人接收了。最近，它改名為「國立台灣大學」，簡稱台大。日本會將它發展成為農學和醫學的研究教學中心，在人文和社會科學並不強。然而，它仍有一座不錯的圖書館，其他建築物和實驗室，以及廣大的校園。如今，它由新近從大陸來的理工學者管理。學校的重點在物理和

農學。

一九四六年夏天，政府宣佈所有由日本的帝國大學回到台灣的學生，都可以不經考試進入台大。我到了台北，我們大約有三十多個合於這個條件的學生，便聚在一起討論此事。我們讀的是法律、經濟和政治，都是在日本經過極激烈的競爭而進入日本最優良的學府。

我們去拜訪改組後的大學校長和教務長。他們都是學理工的，都不知道如何處理非理工的學生。我們要知道在日本大學修過的學分是否可以得到承認。他們不知道。儘管政府的公佈吸引我們到台北來，他們却毫無準備讓我們註冊。一切都需向南京的教育部請示。我們要知道他們是否準備聘請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教授，他們也不知道。這也得向南京當局請示。

到這時，大部份台灣人都已瞭解，陳儀的行政機關在台灣所做的承諾，很少是可靠的，而台灣與南京之間的聯繫也很混亂。我們決定儘量不要冒險。中國的大學制度是從美國制度演變，以四年制和鐘點學分爲基礎。日本的大學則由歐洲模式而來。我們細心研究中國大學有關法規，決定爲保險起見應該依照中國法規，選讀所有必修課程，以取得學位。這樣既不爲難自己，也不爲難台大當局。

我們一再與台大當局討論我們的問題，立刻發現他們不僅對自己院系以外的教育部規定不熟悉，而且根本不在乎。這也反映了陳儀政府的混亂和無能。他的教育主管是在中國學界名不見經傳的小卒，他在台灣第一次公開演講時，很粗魯地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其他有關人員對於大學根

本不關心，因為大學裡沒有多少錢可以搾取。大學怎樣做，對他們沒有多大興趣。

不久，一種奇特的情形出現了。我們文法科的學生不得不自己安排課程，尋找教員，等於台大這部份是由我們來負責的。我們通知學校當局，我們準備要選讀法規所規定的所有的學分，而且立刻要開始。當教務長說大學裡沒有我們院系的教授時，我們則向他担保可以為他找教授。

一開始，我們找到一些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台灣人律師和經濟學家，他們都有資格開課的。比如，一位年輕的經濟學者是日本傑出的經濟學家矢內原忠雄的徒弟。律師中之一曾在日本作過法官，是戰前台灣人在司法界担任最高職位的。

我們的建議為校方接受了。我們的興趣和決心也刺激了校方，他們開始向中國大陸聘請教職員到台大來服務。在一段時期，情況一直很尋常。我們學生自己非正式地負起校務，只要我們有辦法找到適當教師時，便立刻開課，根據教育部規定分配鐘點，安排課程表。如果教師可以供應講義，我們便承擔刻鋼版和油印分發的工作。當最初系列的授課完畢時，我們就整理筆記，油印供給以後的學生做參考。我們繼續搜求合資格的教師，也邀請了一些專家，他們都樂意到大學授課。有些課是以台灣話授課，有些則以北京話。那時，我們都會讀中文，而很快地也學會說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的學生生活非常忙碌，但也很易應付；與我們在日本時考試前的拼命用功，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有一條教育部的規定，我們沒有理它。依照規定，大學必須唸四年，

全部學分平均分爲四年修完。我們却加增進度，在兩年內唸完四年的全部課程。這實在是不合規定的，但我們却是特殊的一群學生。我們每個人都曾在日本帝國大學被證明自己的能力，但在戰爭結束時，我們在日本三年制的大學課程內，分處於不同年度和階段。如今，我們則全部一起在讀書，並適應中國的四年大學制。依我的建議，我們自稱爲「三三會」，表示法律、政治、經濟三個學系，以及日本的三年學制。這恐怕是戰後在台灣大學生所成立的第一個組織。我們與教職員以及其他同學相處得很好。但做爲法律、政治或經濟的學生，環看四周時，幻滅和憤怒逐漸加深了。我們在完成大學課程時，台灣全島經驗了一場血洗。

第四章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

台灣的地位

台灣的法律地位非常奇特。中國於一八九五年將台灣和澎湖割讓日本。日本讓島上居民二年時間選擇國籍。有數千台灣人選擇離開台灣或登記為中國僑民。可是，大部份住民並沒有那樣做，所以其後五十年，他們的子女和孫輩在法律上是日本國民。他們如想移住中國大陸也可以做到。有些人做了，但是絕大多數都留在島上。在日人統治之下，他們倒也得到法治的好處。日本警察非常嚴厲，往往很粗暴，而且日本殖民當局將台灣人當做次等國民看待。不過，在日本人的重整和引導之下，台灣經濟有了可觀的發展，生活水準急速提高，在農工業技術、交通、公共衛生

以及一般公共福利方面，在亞洲國家中，台灣已僅次於日本。我們祖父母那一代目睹了這個僅在名義上屬於中國的島嶼，從落後、惡政和紊亂中，蛻變出來。他們並不喜歡日本人，但他們重視這和平的五十年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在同一時期，在大陸的中國人却在忍受着變亂、軍閥割據和內戰。

父親和我們這一代，成千受良好教育的台灣人始終支持台灣自治運動。他們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織起來，因為美國總統呼籲世界承認少數民族權利而受到鼓勵。在整個一九二〇年代，台灣人領袖不斷要求日本政府讓台灣人參與台灣的行政和立法，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不得不開始讓步。由地方選舉成立地方參議會，投票權還漸擴大。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政府終於宣佈台灣人可與日本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權利。

但是這已經太遲了。日本已面臨着戰敗的命運，年輕的台灣自治運動領導者已知道美國對他們保證於戰後在民主的中國可以得到新的生活。對台灣人來說，這意味着參與台灣政治各階層的自由，並選舉代表參與中國中央政府。

日本於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在橫濱投降，將台灣交給盟軍。但是，在法律上，台灣主權的轉移，要等到和平會議正式締結條約之後。根據一九四三年開羅會議羅斯福總統對蔣介石所做的承諾，以及杜魯門總統在波茨坦會議所做重申諾言，美國命令台灣和澎湖交給國民黨政府管理，以待主權的正式轉移。在這過渡時期，盟軍並無保留任何權利，對台灣人權益也未作任何保留。與

一八九五年時不同，並無任何規定讓台灣人選擇國籍。所有台灣人，不論願意或不願意，一律交給中國政府。

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台灣真是一個極豐盛的戰利品。基隆和高雄兩港遭到嚴重的破壞，台北也未倖免，但基本的農工業結構仍然留存，倉庫裡囤積滿滿的糖、米、化學品、橡膠和其他原料，都尚未運送到日本。發電廠和糖廠也未遭嚴重的損害。日本人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將所有公共和私人產業作成一份精確仔細的清單，交給陳儀。據估計，這些被沒收的日人財產，其價值約合當時二十億美金。在重慶和南京，蔣介石周圍的各派系，軍閥、官僚、黨工和蔣夫人家族的豪門組織，彼此激烈競爭，覬覦這富庶島嶼戰利品的控制權。臨時省政府（長官公署）成立，蔣介石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在其周圍則精心安插了主要派系的代表，如陸軍、空軍、蔣夫人的集團等。宋子文曾僱用美國公司，為他私人調查台灣的工業資源，而這些調查隊遠在陳儀到達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和移交以前，便已抵達台灣了。

陳儀官員的無能和腐敗

美軍飛機和艦船將國民黨人員由中國大陸運送到台灣，一九四五年十月，台灣人熱烈地歡迎他們，以為一個嶄新的時代來臨了。不到幾個星期，台灣人便發現陳儀和他的官員輕蔑台灣人，而令人無法想像的貪污和腐敗。整整一年半，他們大肆劫掠台灣島。這些新來的中國人一生都生

活在內戰和日軍侵略的騷亂中。他們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儘管搜刮，把台灣人當做被征服的人民。

在十九世紀，台灣曾受一個無紀律的軍府統治，他們即使在中國也是以腐敗和無能而惡名昭彰。但在日本嚴厲統治半世紀後，台灣人學得了法治的價值。有契約，則應遵守；應推定自己的鄰居是誠實的人；在商店裡，固定的價目使每一個商人易於經營。台灣人已學習到現代交通、科學化農業和有效率的工業必須依靠誠實的量衡、遵守合約和正確準時等等，才能操作。

我們的新主人完全不懂這些標準。台灣人經常受到輕侮看待。外來的這些官僚和較有教育的搜刮者，很明顯地，將台灣人的誠實看做可笑的愚蠢。在戰爭期間中國人長期生活在狗咬狗的亂世，這些人得以倖存並且能達到目前的地位，主要是依靠詭計、欺騙和兩面話；這些通常也是他們能在中國城市生存的唯一法寶。由他們看來，老實的台灣人是鄉下的粗愚，極好欺負。

中國大陸人傳統一向看不起台灣，認為只是一個蠻荒的屬地。新任的教育廳長抵達不久，向學生演講，便極粗魯不客氣地這樣說出來，因而激起憤怒的抗議。另一方面，台灣人則公開嘲弄這些新來者，因為他們經常表現出不熟悉現代器具和組織。許多中國人古怪的事例，廣為流傳。他們不學習，便想開車，大概以為如果愚蠢的台灣人都會開車，他們為什麼不會呢？由大陸內地被拉來充軍的中國兵，對現代機器，一無所知。他們許多人不會騎腳踏車，而又偷竊來以後，將其背在肩上揚長而去。

一九四六年是幻滅日增的一年。在政府和經濟企業的各階層內，台灣人被解僱，以便安置陳儀組織的親戚朋友。陳儀的秘書長一口氣安插其親族七人在有利可圖的肥缺中。其中一人是負責數百萬美元的茶葉外銷。台中鳳梨公司，戰前的產量世界最大的，其新任經理是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的秘書，從未看過一顆鳳梨植物。高雄新任的警察局長據說安插了四十多個親族領薪。農林專員企圖沒收東海岸的許多私人船隻，藉口那些船隻在基隆政府監督之下可獲較好保養。其實，大家都曉得他的下屬正在那裡經營走私船隊。

一九四七年，緊張局勢瀕臨爆發邊緣。陳儀親族在公營機構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生產者被迫以一定的價格將其產物賣給公營機構，其後那些產品則以更高價轉賣於福建或大陸各地。財政、交通和工業主管彼此之間設計出一套複雜規則，使他們能完全控制並榨取台灣的經濟。任何外銷或進口都得付些稅金、佣金或其他費用。

在一段時候，我們這些攻讀法律、經濟或政治的學生，即三三會，繼續鑽研於書本和抽象的理論。我們雖未熱衷於實際政治，對於日增的危機，也無法完全矇蔽耳目。蔣介石的官員將中國的濫權帶到了台灣。這種濫權使他在大陸的地位削弱，以至於垮台。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陳儀的官員急切在進行其無止境的貪婪。他們要在國民黨政府垮台之前，儘量養肥自己。

父親當時是高雄市參議會的議長，還未受到騷擾。但是他知道不少勒索和非法沒收台灣人產業的事件。不少台灣人在過去五十年中，與日人合夥經營事業，任何無恥的中國人，若想佔有那

些台灣人的有利產業，只要抓住機會指控「漢奸」即可。

一九四七年初，我們正專心於讀書之際，陳儀一連串的措施激起了強烈的抗議。財政、交通和工業主管連同公營企業機構，發佈了一系列的新規定，加緊控制專賣，以「必要的國家社會主義」，榨取台灣人的財富，盡入政府高官和他們在大陸的庇護者私囊之中。南京的中央政府宣佈「民主的中國」採用了新憲法，但是陳儀却奉蔣介石命令，告訴台灣人，因為他們還不熟悉民主的程序，有些憲法條文必須經過一段政治開導時期之後，才可以適用於台灣。換句話說，在國民黨領袖們認可以前，台灣人無法在行政上享受有效的發言權。我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政府知道台灣大眾多麼厭惡它。一個突發事件終使衆怒爆發，幾乎將陳儀和國民黨逐出島外。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晚上，公賣局的查緝警察，粗暴地毆打了一名在台北圓環兜售私煙的老婦人。這使路人憤慨，要攻擊那些查緝人員。查緝人員被迫趕入於附近警察局。他們的吉普車被焚燬了。隔日，全台北群情激憤，到黃昏時，台灣人與佔領者中國人之間，展開了全面衝突。抗議狂潮的第一波，指向煙酒公賣局。公賣局的辦公室被搗燬，職員被痛打。民衆湧向公賣總局，要求緩和公賣局的專斷政策。群眾再向長官公署抗議，陳情。當他們抵達大門時，無武裝的民衆便遭到機關槍的掃射。

二二八事變爆發

台灣人壓抑已久的憤怒，全部爆發了。隔天黃昏時，陳儀的長官公署實際上已經癱瘓了。高級官員和有權勢的搜刮者，在台北北郊成立一個防衛營地，將妻子和大批私人財寶送到那裡，由重兵守衛。其他由大陸來的平民則躲在家裡，害怕會有大屠殺。

事實上，那種可能並不存在。台灣人沒有武裝，而警察任務已暫由嚴守紀律的學生接管。最初兩天，雙方都有暴力。陳儀的巡邏警察任意射殺人民，企圖恐嚇人民。台灣人也有時訴諸於木棍和拳頭。幾個公賣局職員被毆打重傷而致死亡。一些台灣人中學生曾到鐵路局詢問火車何時恢復營運，以便南下回家，他們都相繼失蹤，更激怒了一般民衆。

第三天，陳儀宣佈他願意聽取人民的意見。他指定一些著名的台灣人成立一個委員會，與他的代表會商，為解決這次事件，擬定一個改革計劃，以便送請中央政府考慮。他答應撤退市區街上的巡邏軍警，並保證不會讓軍隊進入台北。這個委員會具有相當的代表性，他們代理着已躲藏起來的陳儀部屬的職責。代表陳儀的人當中，竟有些出生在台灣而在一九二〇年代曾到中國大陸去，然後便為國民黨效勞的台灣人。他們於戰後回來台灣，在陳儀手下工作。這些人只能形容為「以台灣人為職業」，得到優厚待遇，以「台灣人」身份，向外籍訪問者為陳儀政府辯護。

在委員會成立時，陳儀宣佈他希望於三月十四日能夠收到一份改革計劃的意見書。台灣全島各城市因而成立了十七個委員會分會。每一個委員會，討論了台灣人的不滿，擬定了建議，然後送到台北的處理委員會。處理委員會在台北中山堂集會，每次會議，會堂大廳都座無虛席。

在事件發生後五天中，台北顯得沈靜，但氣氛緊張。商店重又開門，糧食也開始由鄉下運到市區。陳儀雖然信誓旦旦，却設法將軍隊由南調北，企圖在收受改革建議書前，先發制人。幸好，二月廿八日和三月一日的事件消息已傳播全島。新竹一帶頗有警覺的市民們，在一些地點，拆除鐵路，阻擋軍運火車。陳儀的欺騙陰險，更加深了台北市民的不信任和憤怒。在有些城市裏，爲反抗陳儀手下的控制，而發生暴動。有些共產黨員，在一九四五年底，依麥克阿瑟將軍命令而由日本監獄釋放出來的，試圖利用這場混亂。但是他們未能獲得追隨者。日本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採取的堅決反共政策，已使台灣人恐懼共產主義了。

台北群情高漲時，我們大學裡的同學也集會於台大醫學院禮堂，討論時局。但是我們沒有組織，討論也沒有結果。我們在校園裡的情況還算不錯，而我們仍然生活在與現實分離的世界。我們但願有更多更好的教職員，但在學業上沒有什麼真的可以抱怨。我們可以抱怨的都是個人的和一般的。如個人家庭和一般台灣人所遭受的困難、創傷以及損失。當我們的集會開散後，每個人都心照不宣地走上其認爲在這危機中所應該走的路。

陳儀和其重要手下，不時向民衆廣播，要求大家保持沈靜，並說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當的，而會得到慎重的考慮。但是我們却開始聽到謠言，隔著一百哩台灣海峽對面的福建，已有大批軍隊聚集了。因此，委員會匆促地完成改革草案，知道如果國民黨軍隊真的開來台灣，陳儀將根本無理會改革建議。

整個星期，報紙除了定期發行外，還有號外，讓讀者知道委員會進行的情形，中山堂的會議也常廣播出來。三月初一個星期，市民所談論的全是這個話題。三月七日，委員會主席，與十七個地方的處理委員會討論後（我父親也是地方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將改革建議，交給陳儀。

一些學生也擬就一份改革建議送交陳儀。他們在陳儀辦公室學到有禮貌的接待。陳儀的手下稱該建議很有用處，很有禮貌地請每一學生寫下他們的姓名住址。他們一派天真地照做了。

國民黨軍隊展開屠殺

在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則在高雄身歷着一場殘酷的經驗。高雄是成立處理委員會的十七個城市之一，而父親被選為主席。在這不安的過渡期間，他們要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還要磋商改革建議，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員會作參考。因此，委員會決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他的士兵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他的巡邏隊每看到台灣人集合在一起，便隨意射殺。父親率領的代表團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緝撤退那些巡邏隊，而在地方領導者應陳儀要求而集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住軍營內，不准外出。

高雄要塞司令部設立了一個能俯視全市和港口的山上。當我的父親和其他代表一進入司令部營地，他們立即被逮捕，並以繩索捆綁。其中一個代表涂光明，是一個衝動的人，他是由大陸回來台灣，曾一度在蔣介石對頭汪精衛之下做過事。此時，涂忽然破口大罵蔣介石和他所任命的

陳儀。他便被帶離代表團，以鐵絲取代繩索捆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塗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塗被槍殺了。

父親和其他代表隨後又被繩索捆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們也等待着隨時被槍殺。但是，在隔天父親忽然被釋放回家。這是因為彭孟緝出面干預，表示仁慈說「我們知道彭先生這個人是好人，我們沒有理由傷害他」。

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對於這些事，我在台北一無所悉。我們只能從收音機聽到各地衝突的消息。還有苗栗附近鐵路被拆除使陳儀軍隊不能進城的故事，以及謠言說山胞也由山區下山來幫助台灣人對抗中國人，等等。

我的外祖母是台北與基隆間的八堵的人，有許多親戚在基隆。三月十日下午從八堵來了一位驚惶的訪客，說大陸派來的軍艦已經到了。而且在未靠岸以前，便開始砲擊海岸和港灣。如此，基隆和台北便為恐怖所籠罩。國民黨軍隊一登上岸，便開始向基隆市街流竄，射擊或刺殺市民，強暴婦女，搶劫民家和店舖。有許多台灣人被捉到，活活塞進帆布袋，堆積在糖廠倉庫前，然後

一個個扔進港口海中。其他有些人乾脆只被綁起來或鏈鎖起來，從碼頭被推下海。

到了夜晚，國民黨部隊已抵達台北，開始向全島展開。同時，另一支軍隊也從海上開到高雄，與彭孟緝的軍隊會合後，重演與基隆和台北同樣的野蠻屠殺暴行。陳儀已下決心要恐嚇所有台灣人，並徹底消滅所有會膽敢批評他的台灣人。

直到三月八日以前，處理委員會的台灣人以及許多非委員的人士，不斷呼籲改革，並一再向蔣介石請願撤換陳儀和其手下要員，以較誠實的人取代之。到了三月十日，這些台灣人領導者們，大部份已被殺死，或被逮捕或躲藏起來而找尋途徑逃離台灣。三月十二日，國民黨軍機低飛於台灣各城市上空，散發「中華民國總統、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國民黨主席蔣介石」的文告。其內容却摘自他在南京向高級官員，就「二二八事件」所作的評論。他完全支持陳儀的政策。他說，「暴動」的領袖，是「共產黨徒」和「被日人奴化的台灣人」。他說大陸人曾「辛苦奮鬥五十年，以求光復台灣」，因此，台灣人欠中國人很大的債。

在這數週內，死了多少台灣人，沒有人知道。但一般估計是在一萬到二萬之間。處理委員會的委員首先失蹤。編輯、教員、律師、醫生等凡曾敢批評政府的人都被殺死或遭逮捕。那些曾攜帶改革請願書到陳儀辦公署，而天真地留下姓名地址的學生們，都一一被找到，而被殺害。數週前曾代理膽怯的中國人警員而維持秩序的許多中學生也被殺死了。從此，一九四五年以後，凡曾敢嘲笑中國人落後或批評政府腐敗的任何台灣人，都有性命危險。

在這恐怖的數週，我保持沈默，待在外祖母家裡，害怕而憂慮。我從未屬於任何政治組織或團體，我的名字也不會登上請願書或宣言。沒有軍人到我們家裡搜索。我雖在大學唸政治系，對實際政治却很隔離，而且非常天真。我仍然未發覺，此時對我們自由和權利的威脅，更甚於日本人統治時期。這時，我寫了幾封信給父親，對於發生於台北的恐怖事件，表達了憤怒。那時我不知道父親的信件受着檢查。直到有一天，高雄警察局長偷偷地警告父親，通知我不要再寫那種信。就這樣，我的名字也列入黑名單了。

在二二八事件中，以及國民黨軍隊抵達以後數週內，高雄的情況很慘。在這時期，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得到了「高雄屠夫」的惡名。比如，當許多高雄市領導人士聚集於市政府禮堂討論這次危機時，門突被關閉而受到機關槍掃射；家人被迫在火車站前廣場觀看父親或兒子被槍決；在槍決之前，還有許多慘絕苦刑加諸人犯。父親一生是樂觀的理想主義者，至此變得更加痛苦和絕望。

事變之役

台灣全島有名望或有財富的人，莫不遭到卑下國民黨官員的威脅和勒索，揚言以「反政府」罪名控告他們。例如，高雄市議會副議長便被幾個年輕軍官敲詐，幾乎被迫將年輕女兒交給他們。他本來是有錢的人，但因此近破產了。有一度曾有謠言說，我的父親即將被捕，並以曾任地方

處理委員會主席的罪名受審。他曾被監視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最後僥倖地逃過如許多朋友一樣的噩運。

台北漸漸恢復了平靜。陳儀被召回南京，任中央政府資深顧問。不久，蔣介石又任命他爲浙江省主席，一個大而重要的省份。他在台灣的繼任者是一個法學家，魏道明。他曾任駐華盛頓大使，有許多美國朋友。

我們學生也一個個回到學校。我們不敢隨便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聚會，而只能把我們的恐怖和憤怒在校園內三三兩兩邊走邊談地表達。我們已發現在校園佈有打小報告的線民。有時候，可怕的特務、憲兵或警察會突襲學生宿舍。被捕的，有不少是來自大陸的自由派的傑出學生。他們對政府的批評，與我們一樣的激烈。我們察覺到中國人最慣用的手段之一便是僱用錢民，他們得到的酬備便是一些現金或公職肥缺。

畢業台大

一九四八年夏天，二二八事件後十六個月，我從台大政治系畢業。我們這些三三會會員，在兩年以內修完四學年的學分，但事實上，除了磨鍊了中文以外，沒有學得什麼。可是，總算得到南京政府所承認的中國學位了。

如今，我必須在學術研究和商業界，做一抉擇。台北第一商業銀行給了我一份工作。這是一

個重要的機構。前任台北市長黃朝琴，因為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國民黨合作，而得到擔任該銀行董事長的酬勞。政府擁有該銀行股份的半數以上，因此可以說是半官方機關，但是允許黃朝琴專權經營，因此銀行幾乎變成他的私人事業。無疑的，我所以有這份工作，因為黃本人是父親的老朋友，他的妹妹又是母親的最好朋友，黃也把有錢的妹夫，納入董事會，他與我也熟識。另一方面，我亦被聘為台大政治系助教，可以作研究並協助系主任處理系務。

要選那一職業，真是一個難題。銀行的薪水約有大學助教薪水的三倍，而且如果我的表現不錯，可以昇遷得很快。但是我的興趣實在不在於商界。儘管如此，我先決定進入銀行工作看看，而到初級實習班報到。有一個月之久，我每天都報到參加訓練。但是自己愈來愈清楚，我沒有興趣一生在銀行裡工作。高薪的誘惑力消失了。三十天後，我自動辭職，回到台大當助教，如此，我的前程確定了。

第五章

留學加拿大和法國

擔任台大助教

國立台灣大學行政的混亂和變化無常，反映了此時所有國民黨機構的雜亂。中國內戰還漸在加緊，共產黨勢力不斷在增大，蔣介石政府陷於分裂，都無情地打擊着非共產黨的政敵，這些政敵包括認真提議成立第三黨以取代國共兩黨的自由派人士。這時，正直的人已很難在腐敗的國民黨政府中待下去了。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間，台灣也經歷着極大的混亂和剝削。這並不能歸罪於共產黨。當時在台灣無疑有共產黨特務存在，却沒有重要的共黨組織。陳儀的繼任者魏道明，他之所以被選擇，主要是因為他頗為華盛頓政界所熟悉。事實上，他不過是傀儡而已。一般相

信，魏太太在幕後操縱實權，並決定經濟政策。

雖然政治腐敗，台灣的學術界却開始顯露復甦的現象。因為共產黨在大陸上節節逼進，許多學術機構相繼瓦解，不少優良學者也四處流浪，輾轉到台灣來尋求一棲之處。一九四八和一九四九兩年，就有大約二百萬難民逃到台灣，一些公私立圖書館的藏書，研究資料以及藝術珍藏亦跟著搬來。一些著名的學術機構，曾經因為躲避日軍侵攻而東轉西徙，如今又渡過台灣海峽，在台灣復建。中國最著名的學術中心機構——中央研究院，因為無處可去，最後只好搬到台北。台大人是一九二七年創建的，由國民黨於一九四六年接收，現在也開始擴充了。有數百名從中國各省逃來的流亡學生也進入台大。

我進入台大政治系是從教員中最低的助教作起。法學院在從前日本高等商業專科學校的校舍。那時的系主任是萬教授，是一位能幹而有趣的人，但不久便不得不離開台灣。據說他在大陸時曾與蔣介石的政敵白崇禧、李宗仁等有過關係，因此很難在台灣待下去。一九四八年，蔣經國帶着特務組織進入台灣，開始清掃異己，以確保他父親能安全由大陸逃到台灣。其結果，凡政治思想不見容於蔣的人，如不遭殺害或逮捕，便被驅逐出境了。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與台北士林一地主的長女結婚。

薩孟武院長和傅斯年校長

我當助教不久，法學院來了一位新院長，薩孟武。他是大陸人，畢業於我就讀過的日本第三高等學校，和京都帝國大學。他個人對我和好友劉慶瑞特別器重，劉也是三高畢業生。劉與我同樣，後來進了東京帝國大學，不過比我低一班，戰後也回來台灣，與我同時畢業台大，也是三三會的一員，而與我的表妹郭婉容結婚。我們同為政治系助教，成為好友。

薩先生鼓勵我們二人寫作發表學術論文。每當我們寫完，他就費很大功夫逐句逐字以毛筆修改我們的漢文。作為一個院長，這真是不尋常而莫大的功夫，使我們衷心感激。如此，我們寫了不少論文，他也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修改它們。在他的鼓勵和指導之下，我們的漢文寫作能力突飛猛進，一兩年之內，大學的大陸籍同事莫不驚訝我們的漢文已經差不多與大陸長大的「真正中國人」一樣好了。這都應歸功於薩先生的耐心教導。他却一再公開說，只有在日本教育制度下，才能產生像我們這樣的優秀年輕學者。

不久，我們開始聽到一些較年長的大陸籍學者說，我們將成為法學院的骨幹。劉慶瑞專攻憲法，我則專心於國際公法，當台大合併前日本高等商業專科學校時，也同時獲得了有五萬冊藏書的良好圖書館。此圖書館再度擴張，把台北帝大買下來有關法學院藏書也收藏起來。在戰前，台北帝大圖書館擁有四十萬以上書籍，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西文的。如今，台大法學院又增加了中文書籍，但這些不斷增加的藏書並未好好分類和整理。我們常進入書庫，在書架間瀏覽，發現新的或有趣的書本。也就是在這裡，我偶然發現了幾部有關航空法的書。尤其一法文巨著李果夫（

Le Goff) 的「航空法」(Le Droit Aerien)，我讀了極感興趣。也許我所以對這方面特感興趣，因為過去在長崎的創傷，使我主觀地迷惑於飛機，尤其是戰時的飛機。

我再度沈迷於法文書籍，這次是法律著作。我決定將國際航空法作為專攻，開始廣泛閱讀有關文獻，並開始認真寫作。當時的論文還不算真正的獨創，但在中文方面，却可算從未有過的新貢獻。我接二連三發表了不少中文論文，有些登在大學刊物，有的登在校外刊物。在研讀這方面文獻時，有一個美國人的名字經常出現。此人就是約翰·考博·古柏(John Cobb Cooper)。他公認是這方面的權威。當時他在普林斯頓的高級研究院研究。我曾直接寫信給他，他很誠懇而親切的回信給我。此後一年，我們斷斷續續地通了一些信。

這時，台大來了一位新校長，傅斯年。他是一位開明的自由主義者，雖然有時作事顯得相當專橫。他立刻查覺到台灣和台灣人環境很特殊。他公開宣稱，他相信台大最後有一天應由台灣人來管理，而他這個信念成爲他的基本政策。他不但設法網羅台灣籍教授，並且努力培養已在大學裡的年輕台灣人。

傅斯年是個典型的北京大學人，也是胡適的好友。胡適的父親在滿清統治台灣快要結束的時期(一八九一—一八九四)曾被派到台灣當過小官。此時，胡適是「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的執行會長。此基金會是美國政府於一九〇八年用庚子賠款設立，藉以培養中國的青年學者，其總部設在紐約。

傅斯年透過他個人的關係，從「中美文化教育基金會」，爲台大爭取到二個獎學金名額，一個給教員，一個給應屆畢業生。傅斯年並訂了一個原則，即兩名獎學金名額中，至少一個必須給台灣人。不久，傅斯年因心臟病，忽然去世。當時，我有一種痛失良師益友的感覺。在這個計劃進行到第二年，我申請教員部份的獎學金，說明我願研究國際航空法。我竟然獲得了這份獎學金。

對此，一些長輩教授提出抗議，質問校方何以讓這樣年輕的台灣人得到這份榮譽。台大的新校長錢思亮在教授會議中被問起這個問題時，公開答覆說他相信這一選擇是正確的，而必會有令人滿意的成果。

當獎學金之事確定後，我立即寫信給古柏，徵詢他的意見，我應該到那裡去深造航空法。他立刻給我回信說，加拿大蒙特里的麥基爾大學剛成立「國際航空法研究院」，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有關這行的研究院，他將應聘擔任第一任院長。他認爲我當然應該到那裡，在他指導之下從事研究。蒙特里早已成爲國際航空事務的重要中心。聯合國「國際民航組織」和由諸航空公司所組成的「國際航空協會」都在那裡。

父親病重

我以極興奮的心情開始準備留學。那時，到國外留學的人很少。在加拿大或美國，連一個可

以打聽國外求學情形的朋友都沒有。我雖然讀過不少西文書籍，對於實際情況可說却一無所知。我意識到即將遠離家人，到異國停留一段時期。我的兒子在一九五〇年三月出生，如今將近十八個月大，正是最迷人、活潑、天真的時候。父親爲他取名彭啟。大都華人的名字有兩個字。但父親却非常特別，認爲他孫兒的名字只要一個字就夠了。他說，以兩個字取名毫無意義，若是只有一個字，寫起來比較簡單，而且省時。因此，他所有的孫兒女，除了二個在戰時日本出生的孫女以外，只有一個字的名字。

在接受獎學金而準備出國時，最使我痛苦的，就是父親的健康已經非常壞。他個性很急，如果一個字就夠的話，他就不願意浪費時間去寫兩個字。他也富於想像力，解決問題若有較好辦法，他就不願意接受傳統的束縛。儘管他脾氣急躁，大家都很敬愛他。至今我們都知道他在世的日子可能不會太久了。

在一九四五年與一九四七年之間，他曾過着很活躍的生活。但是經過陳儀統治台灣那段悲慘痛苦的歲月後，他徹底幻滅，最後，以絕望的心情從公共生活退隱，把全副心神放在自己醫院的工作上。他已六十多歲，健康已走下坡。身體檢查的結果，發現他的心臟肥大並有嚴重的糖尿病。醫生說他只能再活六個月。雖然醫生沒有告訴他，他自己看過胸腔的X光片後，也知道病情嚴重。

如果想獲得麥基爾大學的碩士學位，我至少在國外要待二年。當時，一到國外，再回來探親

是不可思議的事。所以我們彼此心照不宣地了解我大概再也沒有機會看到父親了。這真是一個慘酷的困境。依照傳統，父親去世時，兒子遠離他鄉，是最不孝的一件事。何況，我在出發以前就預先知道此事極可能發生。另一方面，在父親病危時倉促飛回台灣，不論在經濟上或手續上，都是不可能。依當時政府的規定，留學的人不能做短暫的歸國，不論任何理由，一回到台灣，護照就取消，必須重新申請出國，又得費時數月。

父親對這些事完全瞭解，堅持我不可錯過這難得的機會。他深知錯過這樣好機會，對我的學術前途簡直是無法想像的損失。他也清楚，我一向對西方世界與他一樣具有濃厚的興趣。他對如今騎在我們頭上的中國人及中國搜刮者的痛恨或許也加強了他要我把握這個留學機會的願望。正如他年輕時把握到台北去學醫的機會，然後，為他那一代的台灣人做了一點事，也許我留學回來後，也能為我們這一代做出更大的貢獻。可是事情不那麼簡單。有些親戚勸我不要出國。父親却勸我不可猶豫。我決定按照他的意思進行，開始辦理極麻煩的出國手續，花了數月時間才辦好。雖然讀過十五年以上的英文，我還是臨時到一位天主教修女處，補習英文會話。

一切準備妥當，護照拿到了，啓程日期也決定了，告別日子終於來臨了。我到高雄與父親做最後的聚會。醫生不許他走動太多，也嚴禁他旅行，所以我就陪他在高雄家過了幾天。離別的日子終於到了。我要搭夜車回台北。儘管我們反對，父親還是堅持要到車站給我送行。無疑地，我現在所做的，如果他在年輕時有同樣的機會，一定也會同樣地做。然而，對我來說，一想到這可

能是此生最後的訣別，簡直不忍再想下去。

母親、姐姐、哥哥，很多同事和學生都到機場給我送行。我向妻子和小兒子道別。他們不久要回到高雄，與父母住在一起，這給父親很大的安慰。後來，他們祖孫兩人感情極為親近。

大哥慢慢接管所有醫院業務，父親日夜陪着小孫子，在他的小房子和花園玩耍。

飛往加拿大

要飛到加拿大的第一站溫哥華，只有用繞道的方式，先到馬尼拉，在夏威夷停留數小時，又在舊金山過了一夜。爲了省錢，我從溫哥華乘火車，橫貫加拿大，到蒙特里去。在中途與一位表弟共聚一晚，他是神學院學生，剛在火車所經過的一小鎮教堂，做暑假工作。

我的英文會話能力還是很不夠，有時覺得很難堪。在火車上遇到二個少女，他們很親切友善，送給我蘋果，使我較自在地用英語交談。火車經過加拿大中部一片廣大的平原。餐車上精緻的菜單對我是個難題，很多菜我根本不懂，所以嚐試過一次以後，乾脆放棄了，改在沿途的車站隨便買了三明治果腹了事。這並不是一次愉快的路程。坐在火車裡一小時又一小時，我不斷在懷念父親，又懷疑自己的語言能力是否能夠應付未來的研究院課程，根本無遑欣賞展開在車窗外的加拿大景色。

我在晚間抵達蒙特里車站，乘了計程車，叫司機給我在大學附近找一間小旅社，住了一晚。

一切都陌生，覺得緊張又感憂慮，覺得精疲力盡。

第二天早上，帶着行李，到麥基爾法學院去。院長秘書菲麗絲·奧尼爾（Phyllis O'Neil）接待我，她非常親切可親，從那時起，我們的友誼，繼續到現在。我永不會忘記她那天所表現的仁慈。距離開學還有一個月，她暫時安排我住在一位日裔加拿大人姓山下的家裡。數週之後，我找到了一對可親的法人老夫婦家，安頓下來。雖然房間很小，但是便宜而舒適。我很喜歡我房東夫婦和他們的兒子，他們是個單純而寧靜的家庭。

我非常想家，而陷入極度的憂鬱中。很不巧地，我要再等近一個月才開學，除了在市區做漫長的散步以外，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好做。我找不到一個能瞭解我的背景和心情的人。夜夜我暗自流淚，想念父親，等待家信。這是一生中最悲傷最淒涼的日子之一。雖然每一個人都很親切，我覺得自己是異鄉人，非常孤獨。

終於，古柏院長來任了，學生也開始報到，我們這班也在九月裡到齊。這是研究院的第一年，有十幾個學生註冊。班上同學的組成很富於國際性，有三、四位加拿大人，一位美國空軍軍官，一位埃及民航局的律師，亦有來自德國、希臘、英國、匈牙利的學生，我們大家對這個新的學術領域充滿了熱誠，覺得我們是這門學術的先驅和開拓者。古柏是一個自學成功的人，並無什麼學位，憑自己的努力，一步步爬昇到泛美航空公司的副總裁。然後受聘在普林斯頓的高深研究院研究。他和他的太太都有迷人而溫暖的個性，這點幫助他得以發掘不凡的人才，並激勵他們發揮

所長。教授陣容雖不大，素質却很高。在古柏領導之下，我們迅速發揮了明顯的「團體精神」(esprit de corps)，過着愉快的學術和社交生活。我們作爲先驅者，是很特殊的一群。我們在輕鬆而活潑的氣氛中進行小組討論，這與我從前的求學經驗完全不同。那一學年，我是唯一的亞洲人，更奇妙的是，我是有華人血統的台灣人，說英語却帶有法國口音。那時，我的法文比英文講得好，很多當地的法裔加拿大人都以爲我來自法國。

我要求並獲准用法文而非英文，寫作論文。我的第一篇論文，寫於蘇聯人造衛星史普特尼克(Sputnik)震驚世界之前，是討論太空的法律地位。它獲得古柏重視，馬上設法登在加拿大魁北克律師公會主辦的刊物上，後來法國巴黎素有聲名的「法國航空法雜誌」也轉載了這篇文章。它是那年學生唯一獲得發表機會的論文，同時也是全世界首次論及太空法律地位文章之一，而成爲這方面常被引證的早期古典之一。

我的第二篇論文則登在巴黎「航空雜誌」上。它是從法律觀點探索由最早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爲止的空中轟炸史。我對這個題目發生興趣，是有原因的。我曾親身目睹了第二顆原子彈在長崎爆炸，至今，每一國家都希望那是人類最後一次使用原子彈。

我的另外一篇有關太空法論文登在日本東京大學「國際法及外交雜誌」上，這也許是日文在這方面的首篇論文。

如此，我在麥基爾大學的第一年，發表三篇論文，登在加拿大、法國及日本等地四個刊物，

受到相當的重視。我非常用功，但也很喜愛同學間的社交生活。父親仍然在世，我們時常通信。好友兼表妹夫劉慶瑞也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留學。在第一年中，我與班上二位同學特別要好，一位是易安·麥克富遜（Ian McPherson），加拿大人，在第二次大戰中做過駐歐洲加拿大空軍轟炸機飛行員，也曾住過香港，另一位是漢彌爾頓·狄瑟修（Hamilton De Saussure），美國人，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為美國空軍飛行員。在這個小班上，我跟另外幾位同學的交情也不錯，直到現在，我們的友誼仍持續着。另外，古柏太太和院長秘書奧尼爾也時常款待我們。

胡適先生

第一學年快結束時，我碰到一個難題。我的庚子獎學金，依照規定，以一年為限，但研究院課程却規定至少要兩年才能獲得碩士學位。在第一年，我們得完成所有學分，第二年則專心撰寫論文。面臨這個問題，我決定寫信給在紐約的胡適先生。我從未見過他，但是與他通過信。聽說他曾經告訴別人，他對我在麥基爾大學的表現印象極深。我與這位好心腸的名學者第一次通信時，很使我發窘，不過倒使他感覺有趣。一九五一年聖誕節是我第一次在加拿大過節，我寄出一些聖誕卡片。那時，我就想到在禮貌上也應該寄一張給在經濟上支持我的基金會的負責人。不久，我就接到胡先生寄來極友善的回卡。不過，在裡面他加了一段話說，他既然是我的長輩，他願意坦白告訴我，我寄給他的那張卡片，是專用於贈錢的。我還以為卡片上的一個洞只是做為裝飾的

哩！

如今，一九五二年春，胡適先生來信道，按照規定庚子賠款獎學金是不許延長的，但是他願與麥基爾大學當局以及其他有關方面商量，看看能否設法使我能繼續在麥基爾讀第二年。胡先生和古柏曾與一些私人、主要航空公司，包括泛美航空公司接觸，但沒有結果。過了一些時間，胡先生又來信說，他終於找到一個人願意在經濟上支持我完成第二年的學業，數目與第一年的獎學金完全同樣，但是這個人不希望透露名字。他又邀請我在暑假時去看他。

暑假到了，我便乘火車到紐約去。這是我首次到美國城市。我投宿於基督教青年會旅舍，住了幾天，也去拜訪了胡先生。他住在一間很樸素的公寓裡，房間裡，到處都是書。他是一位極溫暖仁慈的長者，對我在麥基爾大學的表現，讚賞不已。在談話之間，他也言及他父親在十九世紀末年到台灣去服務了兩年。當我告辭時，他送了幾本書，給我留念。

回到蒙特里後，我開始着手撰寫論文。它是有關和平和戰爭期間軍用機法律地位的研究，相當專門的。這是很不錯的一年。最使我感到快樂的，是我的父親仍然活着。第二年註冊的新生又有十多人，同樣來自世界各地。夏天的天氣炎熱而潮濕，冬天則非常寒冷，但是我的小房間相當舒適，我也很用功。第二年學期結束以前，我完成了法文論文，得到優等的評語，獲得法律碩士的學位。

到法國留學

我再度面臨問題了。下一步該怎麼辦呢？教授們和父母都鼓勵我繼續進修。在這專門的領域裡，我已有了好的開始，但現在要到那裡去呢？是美國還是歐洲？胡適先生來信說，如果我想到美國，他願意推荐我到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雖沒有法學院，他認為其政治系是很不錯的。經過相當的考慮以後，我決定到法國去深造，那是我一向嚮往的地方。我曾從二年的獎學金省下了一些錢，而父親也願意資助我一些，使我能繼續在國外求學。

一九五三年七月，我從加拿大起程，坐義大利的慢船。到英國南安普敦的一路上，風浪極大，而我仍然極易暈船。雖然如此，這是一次充滿了生氣和愉悅的航海。有許多學生搭乘這艘老船，有一天在甲板上我結識了二位活潑可愛的史坦福大學女生。我們一起在甲板打球、共進晚餐，觀賞晚上的表演節目。到了南安普敦後，我們又一起坐火車到倫敦。一位英國朋友為我訂了一間房間。房間雖然陰暗而不太好，我還是住下，每天與那兩位學生觀光英國數天。我那時對英國的印象並不很好。雖然那兩位女學生希望我與她們一起坐渡輪到法國，我則於一星期後自己飛往巴黎。

到巴黎後，最初幾天住在大學城的日本館，然後搬到希臘館。宿舍裡學生的一半來自希臘，另一半則來自其他世界各地。

抵達巴黎後幾天，整個巴黎的交通系統，因為戰後最大的罷工，而全部癱瘓。因此，我對這個城市的第一印象並不是在未來以前心目中那樣浪漫諦克。

不久，那兩位史坦福的女生也從英國來了。她們租好房子，遊覽巴黎，我也加入她們的日程，過着忙而愉快的日子。我們參觀名跡、拉丁區、吃餐館，到夜總會包括聞名的「紅色磨坊」。

有一天，我一個人走在蒙馬特區街上蹣跚，忽然眼前有一個東方人，看起來像個乞丐，瘦瘦的，穿著襤褸，又打赤腳。他一邊走一邊搖搖擺擺晃着一隻好像空醬油瓶似的東西。當我走到他身邊時，他看了我，突然以日本語大叫：「彭君！你不是彭君麼？真不能相信！」他是我三高的同學田淵。他於一九四三年從三高畢業後，進入了京都帝國大學的藝術系，其後已經十年不見了。他是我畢業三高以後碰到的唯一同學。其後，我也再沒遇見其他同學。我們都有很多話要說。他在日本結婚過，已有四、五個孩子，然拋妻棄子來到這藝術家心目中的聖地闖天下。他已到巴黎幾年，正在努力想在抽象畫界掙一席之地。他馬上請我到在附近的他的畫室去。它在一個古老建築的四樓，既無電梯，也無自來水設備，在那裡看到他的挪威籍女友。他的隔壁房間住的是一位日本的雕刻家。不到幾年，這兩位日人藝術家已成爲法國藝術界無人不知的名人了。

幾天以後，我就帶領那兩位美國女大學生去參觀田淵的畫室，讓她們見識一下巴黎塞納河左岸真正的波希米亞式的藝人生活。那位挪威女子似不大高興這兩位衣著入時的美國女孩突然闖入。她以不耐煩而鄙視的口吻問道：「妳們在史坦福唸什麼？家政系？」這兩位美國女孩是非常

聰明，見識豐富，又老於世故的，她們覺得受到侮辱，也不是沒有理由。

我註冊參加巴黎大學的博士課程。雖然功課很煩重，我開始欣賞巴黎的一切。我偶然認識了一位學音樂的法國少女，一起去了不少音樂會和戲劇表演。好友劉慶瑞已完成在明尼蘇達的學業，在環遊世界回台途中，來到巴黎看我。我們一起共渡很快樂的一週。

我的功課進行得順利，論文方面也是一樣，使我能比預計早一年完成學業。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完成了博士課程，最後的細節也處理好後，準備回台灣了。我帶著很感傷而不捨的心情離開巴黎，心想這一輩子恐再也沒有機會來歐洲了。我搭乘火車到義大利去，一些朋友來車站給我送行。我在熱內亞搭乘了一艘新而舒適的義大利船，預定一個月抵達香港。

又如往常，大多時間我都在暈船，痛苦漫長的航程，只有沿路在塞得港、阿典、喀拉蚩、孟買、可倫坡、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登岸小遊時，才稍覺舒服些。我在西方世界渡過三年，每次上岸在那些港口逗留，都使我有機會一瞥由殖民地而變成獨立國家的人民的實況，這些國家包括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錫蘭、馬來西亞、新加坡等。當輪船穿過麻六甲海峽駛向中國南海時，我敏感地意識到已經再回到東方世界了。

在香港，從漫長的航海和痛苦的暈船，稍微得到解放。在五天的逗留中，受到姐夫公司的同仁熱誠的招待，然後坐一艘古老的英國船向基隆出發。在這最後的航程中，我跟一位穿著長袍的中國老紳士共艙，起先我以為他只是傳統的樸素鄉紳。後來才發現他是頗有名氣的學者錢穆。他

後來出任香港新亞書院的首任校長。抵達基隆時，蔣經國會親自來迎接他，對他異常地客氣和週到。

我終於回到了基隆。最使我驚喜的是父親居然也從高雄趕來迎接我。母親、妻子、五歲大的兒子都來了。這是最快樂的天倫重聚，也是最令人興奮最難忘的片刻。

第六章

台大學術生涯

任教台大

我回到台灣與家人重聚後，父母留在台北休息了一陣，但是他們一回到高雄，父親的病情又開始惡化了。他彷彿以堅毅的求生意志，支撐到我回來，而見到我以後，意志鬆懈了似的。秋冬兩季過後，他的病情進入極端痛苦的狀態。他的心臟惡化到他難以呼吸，也難以走動。

我在大學教書，非常忙碌。一九五五年五月初有一天，一通緊急電話，催促姐姐、二哥和我趕回高雄，我們一路倉惶回到家裡。父親仍有知覺，但是他為生命掙扎的景況實在令我們不忍卒睹。忽然，在五月十二日，他喊道「我覺得較好了」，也堅持起身，與我們一起坐在桌邊，這是

好幾個月來的第一次，使我們驚訝。隔日，他便去世了，享年六十五歲。

那一年在大學的日子可以說相當艱辛。我從法國回來，便進入一種複雜的處境。從某種意義上，我在海外的學術成就，有時害了我。國際間對我高度專門性的論文，評價很高，台大一部份同事却感覺嫉妒。我確實在系內受到一種優先待遇。當我出國時，我是助教，我離職三年，而在這三年期間，我的家眷仍然領到全薪，使得有人不滿：「台大對待彭某太好了」。

台大教員昇等，是由助教昇到講師，經過三年令人滿意的學術表現之後，才昇為副教授。我由法國回來，則未經過講師，受聘為副教授。我只有卅一歲，依中國傳統的標準，我做副教授太年輕了，因此這亦成為喧鬧的題目。一些同事開始攻擊了。有的並不是對我本人有什麼興趣，只是想利用這個機會，攻擊法學院長和校長。開學以後的第一次系務會議中，薩孟武院長介紹我給同事，言詞之間充滿讚美和驕傲之意，這時，一位退休外交官而是與我同行的雷教授，忽然站起來，帶着雨傘離開會議室。這種同行相嫉的難堪表現，明示當時以及其後的一部份同事的態度。甚至有人在立法院，關於我的職位，提出質詢。

在這些難堪的爭論中，台大錢校長始終支持我。薩孟武院長更盡力駁斥批評者，甚至公言傳統的中國大學教育無法塑造如此年輕的學者。支持我的人似乎把我當成非凡的人，而我也在下意識中逐漸發展出一種知識上的傲慢，使較年長的教授們感覺不悅。當了三年的副教授後，我就昇為教授。我當時三十四歲，是戰後大學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

在這幾年中，實際政治並未引起我的興趣。我只關心自己的事業：教書和著作。我開的課，國際公法，成爲整個台大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直到一九六四年我被捕之時。同時，我漸漸瞭解，台灣當前不安定的國際地位問題，與學術理論一樣重要。我們正生活在複雜混亂的變動時代，台灣與中國大陸及海外中國敵友關係改變的時代。那是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時代，美國隔着台灣海峽與中共對峙的時代，也是北京叫囂「解放」台灣的時代。一八九五年杜勒斯的祖父曾到台灣，協助滿清將台灣割讓日本。杜勒斯本人在一九五一年與日本簽訂和約前後，也極力設法使台灣主權和國際地位留在未決的狀態。在舊金山和會時，他曾經排除中國代表，不論是國民黨的或是共產黨的。舊金山和約明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但却未經規定將台灣主權轉交中國。蔣介石憤怒地宣稱舊金山和約，對他所代表的中國沒有約束力。在華府的壓力和杜勒斯的督促之下，國民黨於一九五二年與日本另外簽署雙邊和約。而此和約仍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和澎湖的主權，並未規定中國取得該主權。所以，從法律上說，台灣和其人民的國際地位，並未確定。甚至，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美國與國民黨所訂共同協防條約，對於台灣的法律地位，也避而不談。

對於研究國際法的人來說，台灣的法律地位是一個極重要而有趣的問題，但我不能在課堂上自由討論這個問題。當我們討論到現代國家的組成要素時，我曾強調：

建國的基礎，不在於種族原始、文化、宗教或語言，而是在於共同命運的意識和共同

利益的信念。這種主觀的感覺，是由共同的歷史背景而產生，不必與客觀的、種族、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近代史上有許多例子，種族或語言相同的人們，分別組成不同的國家，例如盎格魯薩克森種族，組成了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不同獨立國民。他們有相同的血統、語言、宗教和法律觀念，但構成不同的獨立國家。相反地，也有例子，種族、語言等不同的人們，因為基於共同利益和共同命運的信念，組成單一的國家，例如比利時、瑞士便是。又如意大利在一百年前只是一個半島，擠滿了不同的域邦侯國，彼此戰爭不已，而且講不同方言，經濟結構也互異。

當時，新加坡已經獨立，那是一個由華人、印度人、馬來人等，基於共同利益和命運的意識而聯合起來形成的獨立國民。

這時，我對上述問題的意見反映着早期我對瑞南（Ernest Renan）有關「何謂國民」問題見解的欣賞。我在課堂裡引述瑞南的分析。沒有學生膽敢追問這個問題，但總有些學生面露會心的微笑。

我對這方面的興趣在這幾年中逐漸加深。在我祖父的時代，北京將我們的台灣割讓給日本，為的是要保護中國大陸的利益並避免日本進攻北京。那時，也許是第一次，台灣全島的各部落、各派系、各村莊開始自覺他們是島民。他們開始發展出共同利益的信念。其後五十年間，日本曾經推行其同化政策，想把台灣人塑造成忠順的日本臣民。日本在台灣重整經濟、發展交通系統，

推行教育，這強化了我們共同利益的信念，却未如願地將我們望成理想的日本臣民。相反地，年輕的台灣人領袖，代表了新興的中產階級，在自治運動中，更加磨鍊強化了台灣人的自覺。這些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直到一九四五年，繼續發展。在蔣介石統治之下，我們發現所有台灣人，我自己，我的同輩、我們的子女，又被迫要變成理想的中國人，國民黨的中國人。可是我們的「共同利益」在那裡？我們的「共同命運」又是什麼呢？

這時期，我的學術工作非常緊湊。我經常發表論文，又忙著寫作一本巨冊的國際公法教科書，長達八百餘頁。它至今仍被認為以中文寫成的最佳教本，甚至在我被捕以後仍有人盜印。

我的學術聲譽漸漸提高，我的名字也傳到每個學校。開有國際公法課程的大專學校大都邀請我去講課；政工幹校和軍法學校也曾請我去授課。這種兼課大多教授都做，藉以彌補微薄的薪水。我在周圍感到羨慕和嫉妒，因為我幾乎獨佔了國際公法的兼課，使得同事失去了賺取額外收入的機會。雖然我給學生的分數打得很嚴，學生很多仍然要我做他們的導師。當大部份的教授的指導學生不到十個時，每年却有近百名的學生要我做導師。

哈佛大學、季辛吉、蔣介石、「中美會議」

一九五六年，哈佛大學季辛吉（Henry Kissinger）邀請我參加哈佛大學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主辦的國際問題研究會。能夠再到西方世界，並擠身於國際知識份子之間，是令人快樂的一件事

。大約有三、四十名參加這次為期兩月的討論會。與會人士多彩多姿，有英國國會議員、錫蘭法官、德國記者、印度作家、日本女律師和科學家等等。我們在季辛吉主持之下，一起生活整個夏天，每天上午是全體會議或小組討論，下午則參觀學校、監獄、法院和其他機關。政治小組的主持人是Amherst學院的Latham教授，他非凡的機智和幽默，使我們特別高興。我也有機會聆聽一些著名人物的演講，並與他們討論問題。這是一個機會使大家就當前問題自由交換意見。因為這時台灣海峽正面臨一連串的危機和軍事衝突，亞洲是否會再受到全面戰爭的威脅，當然也成為討論的對象。

哈佛大學研究會結束後，我便飛往巴黎。在這次短暫的重訪巴黎期間，我發現從前日本三高的同學田淵已經成名了。已有一個畫廊買了他所有的作品。他已與日籍太太離婚，與那位挪威小姐結婚，在法國鄉間買了一座別墅，安頓下來。在飛回台灣以前，我又花幾天拜訪了在瑞典的朋友們。

一九五七年，我的第二個小孩，我寵愛的女兒晔出世了。

參加哈佛大學研究會並匆匆訪問歐洲以後，回到台灣，其後幾年，我每天忙於教書、兼課、著作。我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不少論文，於一九五八年，以法文出版了一本書。我仍然不認為自己是行動家，而是純學術人士，隔絕於實際政治活動之外。這時可以說是我這樣生活的最後時期。

一九六〇年，我再度應季辛吉的邀請，參加哈佛主辦而由他主持，在東京舉行的國際問題研究會。同時，我又受派為參加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舉行的「中美文化合作會議」代表之一。

對於我應邀參加哈佛大學在東京的會議，台北當局無多大興趣。倒是在西雅圖的會議，台北的政府認為非常重要。它是由當時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主任泰勒（George Taylor）所主持。幾個美國大學也將派代表參加，給台灣的政府在美國學術進行遊說並請求補助的機會。

胡適先生為主席代表，此外由四十多名學者由台灣去參加。全體代表都拿公務護照出國，而且彷彿要強調這次會議的重要性，蔣介石和夫人還邀請全體代表到他們的士林官邸，給我們一個歡送宴會，我是代表團中兩名台籍學者之一，又是最年輕的。當不滿的同事們質問何以我被選為代表時，胡適先生挺身為我辯護，明白給人一個印象，他是我的庇護者。我相信胡適先生所以偏愛我，因為我在麥基爾、巴黎、日本以及台灣的學術表現。我也確信他真誠的希望台大當局為了大學的將來認真考慮將我和一些台籍學者盡量栽培。

在這次歡送宴會中，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蔣介石。當他在客廳出現時，胡適先生即抓著我的手，領我到這位總統和國民黨主席面前，將我介紹給他：「這就是彭明敏」。其口氣好像以前已經提過我似的。蔣介石便問我「你的家人怎麼樣？」「有幾個小孩？」「有沒有什麼困難？」「有沒有什麼我可以幫忙的？」。在我的答話和胡適先生插話之間，蔣介石僅只枯燥地說「好！好！好！好！」，未令人感覺有真實的興趣或關懷，反而使我覺得好像帝王在問我要不要什麼恩惠似的。

蔣夫人却在午宴時才出現。

帶着蔣介石夫婦的祝福，代表團飛往西雅圖了。胡適先生做了主題演講。有些熱衷維護中國傳統的人認為他對傳統中國文化過份批評，太急於改變中國傳統的價值觀。這種論戰後來回到台北以後仍繼續進行。

在一次討論會中，國民黨政府當時派駐聯合國的大使蔣廷黻，突然提議研究如何改革國民黨政府，使得與會人士大為驚異。他一向被認為是政府官員中最開明、最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人，有一度他甚至公開主張成立一個真正的反對黨。然而，沒有人預料他會在這場會議中作這種建議。胡適先生，顯然非常尷尬，提議說這次會議不宜於討論這類事情，最好在其他場合再討論，而阻止了蔣廷黻。

結束了西雅圖五天的會議後，我飛往麻州劍橋，匆匆訪問了一些老朋友，然後飛向日本。在我參加哈佛會議以前，還有幾週自由的時間，所以我利用機會到京都、神戶等地。舊地重遊，有無限的感慨。我却沒有再到長崎。在京都時，我曾去探訪三高時租住的人家。離開那個堆滿書籍的房間以及滿腦子充滿對法國幻想的歲月，匆匆已是二十年了。從前的老房東很驚喜而熱烈地歡迎我。他說他早就預料我有一天會成爲大學教授。這次重訪日本是戰後在日本滯留最久的一次。所看到日本的一切，使我印象很深。日本被徹底打敗，舉國盡成灰燼，如今却無軍備的包袱，進步神速。我想到台灣，想到國民黨流亡到台灣，維持龐大的軍備，國防預算佔了總預算百分之八

十，如果我們也能解除戰備的負擔，像一九四五年以後的日本，不知道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台灣的國際地位和內部政治

這次在東京再度參加哈佛的國際問題研究會，使我非常高興，也能與上次一九五六年同我一起在哈佛大學參加會議的一些老朋友們重敘舊誼。這次會議也與上次一樣，為期二月，每天聚會討論，氣氛與西雅圖會議不同，參加者坦誠地試圖討論當前的問題，所觸及的問題非常廣泛。胡適先生若是參加這種會議，或許會較快樂些，因為參加會議者，對於維持現狀或光榮的過去不見得有興趣，倒是較迫切於尋求途徑來解決日漸複雜的國際關係。這是真正面對問題的努力。

在會議中我曾發言，發展一個政治思路。這是我第一次公開指出台灣的法律地位並未確定，而建議台灣住民對於自己前途應該有發言權。我的措辭雖然小心謹慎，但含義是明顯的。我開始認真思考我的故鄉和同鄉每日面臨的真正問題。一些與會者私底下找我，討論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我開始以現實政治的觀點，思考這個問題，而慢慢從抽象理論走向實際。一些在東京的台灣人來看我，他們總是要問台灣前途如何。這個問題，我遲早要去想的。

一九六〇年夏天，給我更多思考的機會。回顧過去，我們發現在台灣言論比較自由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接着是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嚴厲攻擊。任何人膽敢指出蔣介石的反攻大陸僅是幻想，立即受到制裁。國民黨流亡台灣已經十年，思慮較周到的人認為應該正面努力使流亡的大陸

人與台灣人團結合作。年紀日增的高級官員，數目日減，却將金錢和子女送到國外。軍隊士兵，台灣人已佔多數。台灣人口急速增加，與流亡的大陸人的比例已達五比一。流亡的大陸人與台灣人爲了共同的利益而一起努力的日子已經到了。

在我飛往西雅圖參加會議的前幾天，我以前的學生傅中梅（傅正）前來看我。他神情憂悶。他以前是國民黨青年軍，也擔任過政工，現在却在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社當編輯。雷震一直在建議政府允許反對黨的成立，將國民黨自由化，較實際地估量台灣真正的政治和軍事處境。他尤其主張大陸人與台灣人間的合作。傅告訴我，雷震的「自由中國」正受到國民黨特務日增的壓力，「隨時都可能出事」。如今，事情真的發生了。我在東京看到報導，雷震和一些人被捕了，其中也包括了傅正。這是一個令人寒慄的消息，也終止了成立反對黨、大陸人與台灣人的合作一類的談論。雷震，已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終於被宣判十年徒刑。傅正被送到綠島，單獨隔離監禁多年，不准他外界有任何接觸。

「國家講座」、「陽明山會議」、「十大傑出青年」

在東京的時候，我接到自台北來的電報，通知我已被聘任爲「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國家講座」。胡適先生爲該委員會主席。這個聘任是很高的榮譽，而且每個月可以得到補助五千元台幣，用來彌補在台大二千元台幣的薪水。「國家講座」目的之一，是要使受領人安心教書和研

究，不必再東跑西跑兼課。我過去曾在東海大學兼課，但自從接受「國家講座」以後，便不再到東海大學去了，雖然該大學曾一度提議我向台大請假，搬到台中，當專任教授。

從東京回來，就任「國家講座」教授，我的研究題目是「科技發展與國際法」。這是一個極嶄新的課題，很引起學界的注意。報界對我的新職位大事報導。回想起來，可以猜想，胡適先生與其他一些自由派的學界領導人可能是要顯示台灣人有能力在台灣學界最高層佔一席之地，而爲了國家利益應該栽培這樣的台灣人。

大約在這時，國民黨內較開明的人士曾答應召開一大規模的會議，藉以團結世界非共產的中國人。海外講求實際的華僑已開始認真估量蔣介石的將來性如何，並面對毛澤東已控制全國而且其力量漸增的事實。國民黨急須提出一些令人信服的證據，以證明它仍有活力。舉行一個大會議，爲國民黨內頑固份子所反對。蔣介石也不敢冒險由政府正式召開這樣的會議，恐怕它對國民黨和其領導提出不利批評。

其結果，產生折衷辦法，由國民黨政府從海外華僑精心挑選一些代表，參加一種諮詢性會議。會議分爲經濟、教育和文化三組。與會者將看到在國民黨領導下台灣的突飛猛進。當然，政府不會提及美援的巨大數額或戰前日本在台灣的長期建設等。

會議在陽明山舉行，因此稱爲陽明山會議。傳播媒介展開宣傳，給民衆加強印象，這是一極重大的事件，又說蔣介石本人將親自出席會議，並歡宴代表們。

應邀參加會議的海外代表們，大多是年老華僑，在各自的行業上是資深的領導者。他們不太可能會提出使國民黨發窘的問題，而返回僑居地以後也不會使國民黨難堪。政府高官、內閣部長，國民黨領導者亦要出席報告。在會議前夕，我從新聞報導知悉我竟也被選為代表之一。這使我很驚訝，當時我只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教授，因此可能是在與會者中資歷最淺的。

政府和國民黨官員的報告都嚴格遵守國策，預言北京共產政權必然滅亡，政府必能迅速光復大陸。與會者所提出的問題只觸及一些瑣屑的枝節，政府的基本立場和政策是不容置疑的。蔣介石在午餐時分批接見代表。會議結束時，有了一個盛大晚宴，所有的代表和政府高官都被邀參加。

不久之後，教育部也舉辦了一個全國教育會議，討論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台大校長和院長都是會議的當然代表。我也被邀請為代表。台大校長在會議中很熱心地為我介紹，雖然這幾乎已經不大必要，因為近年來新聞界對我的不斷報導，我在台灣已成爲風頭人物了。

台灣的青年商會，模仿美國，決定選出「台灣十大傑出青年」，各地分會分別推薦。在公佈獲選者之前不到廿四小時，我才知道我也被選爲十大傑出青年之一。這使我感覺很尷尬，因爲我已將近四十歲，但要辭退已經太晚了。廣播電台和電視大肆宣傳，報紙也有連篇的專訪報導和花絮新聞，整個過程是徹底的商業推展企劃。最後，還有一項精心設計的正式頒獎典禮，在圓山飯店舉行。我應邀作一簡單的演說。

當時，蔣經國爲青年救國團主任，他便邀請十位「傑出青年」茶敘。無疑，在這種場合，照例會拍攝團體照，而這些相片也必會被救國團拿來作宣傳之用。這些實非我能所接受。我仍然自認是超然、非政治性的純學者，我實不願我的學生看到我與衆人所畏怖的特務頭目而又自稱「青年導師」的人，公然在一起。

我寫了一封信請人送到蔣經國的辦公室，說明我有事往台中，不能參加茶會。過日，當全島報紙大登團體照時，我的缺席顯得太醒目了。立刻有各式各樣的猜測，爲什麼我要杯葛蔣經國的邀請。沒有想到，這事竟後日被列爲我「反政府」證據之一。

第七章 在聯合國——良心的矛盾

從政治系到政治界——聯合國

屢次受派出席各項國際和國內會議，以及年近四十而獲選爲傑出青年，等等，這些都過去了。一九六一年台大任命我爲政治系主任。這是相當大膽的任命。當官方對我愈表示信任時，正是我心裡對於整個政局的疑慮愈加深時。在政府裡面，想法似乎也分裂着。國民黨中有些年老官員，在流亡期間，變得愈來愈反動，另外的則變得較開明，試圖使台灣社會發展成能容納各種份子的進步社會。

系主任的職務，是八月一日開始的。但在九月開學前，有一天早晨，台大錢校長忽然派他的

車子接我到他的辦公室，說有緊要事商量。他看到後，便使我吃驚，說我將被派任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的顧問。那天下午，外交部的通知，確認這項任命。

從這個任命可以察覺政府非常緊張。聯合國中的中國代表權問題已經無法再拖延了。華府和台北必須改變策略，因為前一年聯合國大會表決是否讓中共進入聯合國時，支持國民黨的國家降至最少數目。尤其甚者，此年要決定是否允許外蒙古和茅利坦尼亞加入聯合國時，台北當局企圖一套抵制對壘。蔣介石政府仍欲自稱代表外蒙古，雖然它被趕出大陸已十年多了。蘇聯則支持外蒙古加入聯合國。如果國民黨政府否決外蒙古入會，蘇聯也將否決茅利坦尼亞的加入。但是，非洲國家却很希望茅利坦尼亞加入聯合國，所以如果因為國民黨政府否決外蒙而茅利坦尼亞無法入會，就會得罪非洲國家，國民黨會失去為維持其聯合國地位所需要的支持。有關方面告訴我，他們需要一個人，真正能在紐約工作，且具有國際法的知識，精力充沛，而能得到國際的尊重。

如今，我對官方事務的參與進入了一個新的階層。在得到外交部通知不久，我收到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一個通知，邀我去一談。跟誰談？談什麼？

接下去幾天，我忙碌極了。我的新職發表以後，報社的訪問、拍相接踵而來。這個任命獲得很廣泛的注意和討論。這是台籍人士首次受到這種任命。外交部長沈昌煥也召見了我。

我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與秘書長唐縱會面。在這個會談中，我個人的窘境很明顯地呈現出來。

唐縱單刀直入地要求我調查在美國的台灣獨立運動。這似乎在於我作為聯合國代表團顧問的職務之外。我謹慎地回答，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指出，從事獨立運動的人們，多在外國大學得到了學位，並不是單純天真的小孩，我是否能夠影響他們，值得懷疑，甚至他們的父母，對這類事情，恐也無影響力。

唐縱告訴我，有另一個人要跟我談話。他果然是張炎元，我後來才知道是個有名的特務主領之一。他也要求我去調查在美國的獨立運動，運用我的影響力，說服他們放棄這種運動。「看看他們吧。告訴他們回來看看這裡的繁榮。我們可以保證他們的安全」。

我離開中央黨部時，心情沉重。顯然，國民黨想利用我。難道政府、大學以及幫助我的人們，也都處心積慮要利用我？

我到了中央研究院，向胡適先生作禮貌性的拜訪，並向他辭行。他對我這項任命，似乎覺得很興奮和驕傲。在交談中，我無意中向他說道，這項任命或許不過是推出一個台灣人裝點門面而已。對我這種說法，他顯然感覺有一點震驚，反而使我覺得很歉疚。

外交部的代表團人員，早我幾日離開台北飛往紐約。我接到副總統陳誠，邀我到他公館。下午四點到達他家裡時，他一人獨處，神情愉悅。他端莊有禮地接待我，我們在平易輕鬆的氣氛中坐下來，茶和點心放置在面前。他說「其他代表，昨日都在這裡晚餐。我很遺憾我們來不及把請帖送給你」。這話使我感到驚奇。顯然這是一個禮貌的謊話，因為我一直在台北，請帖是隨時可

以送到我家裡的。我覺得陳誠或者是有意與我單獨交談，或者是其他代表要與他討論台灣內外形勢而不願意有一個台灣人在座。

陳誠開始談及他最近的訪美。他在華府曾遭到台灣獨立運動者的示威，這是在美國首次發生的。顯然他感覺得很不愉快，太沒有面子了。他似乎覺得美國當局應該防止這類事情的發生。

我告訴他，在美國每天都有示威，有的是贊成，有的是反對，而且其對象有時是想像不到的，例如，蘇聯把一隻狗送到太空做實驗，就有人示威反對。他點點頭，不再提及台灣獨立運動了。經一段交談之後，我辭退了。我領會到國民黨領導人們對各式批評是多麼敏感。

剩下沒有幾天，我到台大醫院病房探訪劉慶瑞。他現在是台大法學院副教授，憲法專家。他因患鼻癌而瀕臨死亡。他在入院之前已在準備草擬一部台灣憲法。這部憲法是為將來台灣人獨立時用的。到那時，大陸難民將在全島行政體制中得到他們應有的地位，並融入本地居民之中。我想起數月前發生的一件小事情。那時哈佛大學賴謝和教授（Edwin Reischauer）曾到台灣訪問。在一個學術人士集會中，劉慶瑞和我與他會晤。這個集會，大陸人和台灣各參半。當時，美國總統的選舉正受到世界的注意。台灣人也特別注意到總統候選人甘迺迪宣稱金門和馬祖外島對美國並不重要，所以必須放棄，以澄清美國對防衛台灣的承諾。但是，尼克森則主張國民黨應固守金門馬祖。提到這點時，賴謝和半開玩笑地說「現在讓我來作一民意測驗，你們希望誰當選？」於是，所有的大陸人都說「尼克森」；所有的台灣人則說「甘迺迪」。

我探訪劉慶瑞，明知這是最後的告別了。我到紐約十天之後，他便去世了。我的失落感無法形容。我常想到他的夢想：在台灣建立一個妥善、有效的憲政。

到了紐約，我住在帝國大廈附近一個落寞的旅館。代表團中並無台灣人，向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作一禮貌性拜會之後，我便每天盡職上班了。我與一個海軍武官共用一個辦公室，並被分派到聯合國大會第六委員會工作，那是主管法律事務的。

聯合國大會正式開幕前幾天，聯合國忽然面臨了重大危機。其祕書長哈馬紹（Hammerstein）因公出差到非洲時，因飛機失事，不幸遇難。當聯合國必須緊急選擇其繼任者時，蘇聯堅持採用所謂「三頭制」，即任命三個祕書長，以取代以往的一名祕書長，分別代表西方集團、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和第三世界。西歐國家則極力反對，直到最後一刻，雙方才達到妥協，折衷任命宇譚（U. Thant）。

在這次大會中，國民黨政府的處境特別複雜。蔣介石已公開宣稱將反對外蒙古加入聯合國，而蘇聯則稱外蒙古的加入如遭否決，它也將否決茅利坦尼亞的加入。因此，美國對國民黨正加壓力，要防止它對外蒙古行使否決權，對此國民黨很感惱怒。另有非洲國家，因它們很希望茅利坦尼亞加入聯合國，如其加入遭否決，則會遷怒國民黨，以致影響它們對國民黨代表權的支持。在代表團與台北當局間緊密往返磋商多回之後，蔣介石最後不得不讓步，讓外蒙古加入聯合國，而不行使否決權。蔣介石在世界面前丟了臉，要有人爲此做代罪羔羊了。蔣廷黻過了劫數，倒是駐

華府大使葉公超，雖頗有人緣，則成爲蔣介石不悅的對象。這又牽聯到國民黨官闈政治的幕後鬥爭。大家都知道外交部長沈昌煥向來與葉公超不睦，所以在此事端中，他也插了一腳。蔣介石召喚葉公超回台，聽了葉的解釋後，對他簡單地說「留在台北，不用再回去美國了」。

葉公超就這樣丟了大使職位，但因為他是陳誠副總統的人，仍被留在內閣裡。國民黨認爲他太過開明，從此便緊密監視他，派特務跟踪他。至此，胡適先生與蔣介石的關係也漸趨冷淡了。

蔣廷黻、蔣介石、蔣經國

有天早晨，蔣廷黻的祕書來找我，問我有沒有時間到郊外蔣的家裡，與他一起吃午餐。他派他的車子接我到他家。他的年輕夫人簡略歡迎我以後，我與蔣廷黻兩人便坐下午餐，開始漫長而不拘形式的談話。他的話坦白得使我有一點驚奇。那時，他六十二歲，而開始回憶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他出任駐蘇聯大使時，在莫斯科的日子。不久，話題轉到蔣經國身上了。我警覺到這或許是這個午餐的主要目的了。

大家都知道蔣經國年輕時，曾經與其父親非常不和，據說是因爲蔣介石對待妻子，即蔣經國的母親，極爲粗暴。蔣介石年約四十歲時，遺棄蔣經國的母親，娶了上海有財有勢的宋家最小女兒宋美齡，也就在那時，蔣經國離家，到了蘇聯。他到莫斯科孫逸仙勞工大學進修，不過，其後他的行踪不明了。蔣廷黻從此開始述說他的故事。他說有一天他收到蔣介石的電報說：「請找出

我的兒子，送他回國」。

蔣廷黻立刻求助於蘇聯當局，幾天之後便得到通知蔣經國的下落已經查到了。蔣廷黻邀請蔣經國到大使館，告訴他蔣介石打電報來，要他回去。蔣經國當時正二十多歲，回答說「我有一個問題，我已與一個蘇聯女子結婚了」。蔣廷黻便要他將那妻子帶來大使館。根據蔣廷黻說，這位蘇聯女子是一個非常單純的鄉下女子，她「連怎樣好好地使用刀叉都不懂」。蔣廷黻說「我告訴他，不論如何一定要回去，而且得帶着妻子同行，蔣經國同意了。我便爲他們準備了禮物，讓他們帶回去送給蔣介石」。幾年之後，蔣廷黻回到中國，很驚異地發現那位蘇聯女孩已經轉變成一位「典雅的中國淑女」，而且已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蔣方良。

此後，蔣經國便以父兄之禮對待蔣廷黻，對於後者似乎抱有對於那可畏的親父所沒有的親情。從此，蔣廷黻每次回去台灣，蔣經國一定親自到機場迎接，特別客氣招待他。

蔣廷黻在與我的談話中，特別詳述他們的關係。他說蔣經國並不「愚蠢」，而只是那種環境中的犧牲者。蔣廷黻說「有一次我坦白地告訴他，他的四周似乎總是圍繞著一些較差的人，他應該設法引用一些有才能的人，而他回答說：你認爲有才能的人願與我在一起嗎？他們都不願意，只有沒有人要的人才來找我」。蔣廷黻認爲這就是蔣經國不愚蠢的證明。他也提及蔣經國感覺與學生或較低階層的人在一起時較舒服，而與受有較高教育的人在一起時則感覺不自在。

蔣廷黻說他有一次找到機會率直告訴蔣介石，應給他的兒子一份較適當、較受人尊重的工作

，而不應該只給他做一名警察頭子。蔣介石的回答是含糊的：「他能做什麼？」這可以解釋為「他有能力做別的事嗎？」或「你有什麼建議嗎？」

蔣廷黻再說「蔣經國不是一個壞人，而且他也知道自己能力的限度，他需要有能力的人幫助他」。蔣廷黻這樣回憶過去，我却覺得有些奇異，他為什麼這樣向我坦率。

我們奇異的密談，並沒有別人在場，一直持續到下午四點鐘左右，然後他再派車送我回到旅館。在駛回市區的漫長路上，我回想蔣廷黻曾對蔣介石也非常坦率。他說有一次曾經勸告蔣介石削減軍隊，因為它花費了太多的預算，但蔣却不理這個建議，說「你也許懂得外交和政治，但對於軍事却一竅不通」。

九月至十二月間，國民黨代表團，爲了又將來臨的中國代表權的表決，展開緊湊的遊說，尋覓支持。從該年起，策略不得不變了。從前是以「不討論中國問題」的決議，年年拖延，但今年已經無法這樣做。如今則要主張中國代表權問題是一個「重要事項」，必須大會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才能變更，我除了第六委員會的工作以外，還要分析各國代表有關中國問題的演說。這些演稿一到我桌上，我就從國民黨的觀點審視其利害得失。最後投票的結果，國民黨險勝，維持了其在聯合國的席位。

中國代表權問題，因爲年年重複，國際間對它的興趣也變得遲鈍了。此事有關國民黨的命運，而台灣人的命運也隨着浮沉。聯合國討論這問題時，極少提到台灣人民，國民黨當然不承認台

灣人與它的利害並不一致。

有些台灣人不懂爲什麼我願意作國民黨代表團的一員，有的在紐約的台灣獨立運動活躍份子曾來見我，勸我找一個機會在聯合國大會中發言，突然戲劇性地提出台灣獨立的主張，並訴請聯合國採取行動。他們並認爲我應同時向美國政府尋求政治庇護。這種建議完全不切實際。我根本無機會在大會發言，而且我也沒有作這種戲劇性行動的心理準備。客觀環境也未發展到能使這種激烈舉動發生實際效果的程度。

從聯合國回來

大家都很清楚，國民黨除了對維持在聯合國內的席位以外，對於聯合國的其他事務，興趣不濃。所以代表權問題表決以後，高潮已過，代表團人員有的回國，有的出差到其他國家。我也在年底回到台北。

回來台灣，發覺我成爲學生以及各界注意的焦點。那時，我在自己專門的學術圈裡，正達到事業的高峯。國際太空法方面，我是公認的開拓者。作爲一個年輕台灣人而擔任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尤其轟動。演講的邀請，洶湧而至。在每次演講，我都試圖解釋清楚中國或台灣問題在許多複雜的國際關係中的地位。這些公開演講遠不如在我自己家裡或私人場合的討論來得有意思。參加討論的學生和朋友又帶着朋友，人數越來越多，討論到台灣前途時，總是氣氛熱烈，有時又相

當憂愁痛苦的。當然，我猜想在參加討論的人當中，有國民黨的特務在內。

我從紐約回來後不久，又被邀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十名左右的安全、情報單位人員見面，報告我對聯合國大會的觀感以及在外國的觀察。他們一再要問在美國台灣學生立場、想法和活動，以及台灣獨立運動的情形。我很坦白直率地告訴他們海外學生的想法和主張。我說，他們獨立的主張並不是私人的或個別的嗜好，而是對於國民黨基本政策的整個反應；他們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體制和結構；他們不滿足於僅僅參加省政而被摒除於「中央政府」實際權力之外；他們認為台灣人有繳稅的義務，却無參政的權利。

在中央黨部聽我說話的人，都表示很渴望改變留學生的觀點和想法，但我告訴他們，除非國民黨的基本政策改變，想要扭轉留學生的立場是相當悲觀的。這是一個極端敏感的問題。在場的人都很清楚國民黨的政策就是蔣介石的政策，我沒有說出政府應做什麼改變，也沒有必要說出。這些人不是傻瓜，他們約我來談談，是因為我是台灣人，又是國立大學的政治系主任，而剛由美國參加聯合國會議回來。談話結束時，他們表示感謝，他們似乎真正地欣賞我的坦誠。

如今，我的兒子已經上學，讀書讀得不錯，女兒已五歲，快要上學了。我們都很喜愛狗和熱帶魚。許多年來，我們養了各種不同的狗，牧羊狗、大丹狗、臘腸狗、北京狗、狼狗等等。也有一段時期，我們培育了貴賓狗。我還擔任過愛狗協會的副會長。有時，我和兒子把狗帶去參加比賽。

胡適之死

有一天晚上，台大法律系教授戴炎輝邀我到他家裡去晚餐。就在我們離開餐桌之後，一個緊急的消息傳來。胡適先生在中央研究院的一項會議上，心臟病猝發而倒地。我趕回家，並乘計程車到南港去，到達那裡時，他已經去世了，躺在地上，覆蓋一席白巾。我端祥他的面孔，他的神情就與他生前全神貫注說話時一模一樣。就在那裡，台大錢思亮校長告訴我，曾給我經濟支持，使我能夠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讀完第二年的，不是別人，就是胡適先生本人。在我們將近十年的交往期間，這位最仁慈、最親切的學者，對我始終隱匿他私人幫助我完成在加拿大的進修這個事實。我也太天真，太不夠經驗，毫無意想到有這種可能。於是，我失去了一位最諒解我而最不自私的前輩和支持者。

蔣介石的召見

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一個寒冷的晚上，大約八點鐘左右，一輛吉普車來到我家屋前，接着一陣劇烈的敲門聲，我太太去應門時，司機很粗魯地說要找「姓彭的」，並遞給她一份條子，那是一份請柬，要我過天早上十時與蔣介石會晤。

蔣介石的辦公室座落於台北市中心「總統府」大樓內。這是日據時代的「總督府」。就像沙

灘上的寄居蟹那般，他把別人的殼甲佔爲己有。這個建築，於一九四五年，遭到火災，但已修復，它本身很像一座大堡壘，在其前面的廣場可以舉行龐大閱兵，以滿足「反攻大陸」的幻想。

我從學校乘車到這幢紅磚巨大建築時，有點緊張。我把義手從口袋抽出來，讓它垂懸在外面。大家知道，蔣介石的衛兵奉命射殺任何在他面前有什麼可疑或突然舉措的人。不知道我失去左臂的衛兵恐怕會誤以爲我用左手在口袋裡握有武器。我想起一些傳說，例如在一次軍校畢業典禮上，一位上前從蔣介石接受畢業證書的人，緊張地要從口袋拿出手帕拭前額汗水時，當場被射殺。又聽說，蔣介石的車隊在高雄附近小路上疾馳時，正好有一個農夫在路邊大便，這可憐的傢伙看到車來，想急促想躲避起來，即被擊斃，因爲他行動得太突然了。

我到了總統府，就被帶往一間接待室，在那裡聽取拜謁規矩的說明，在何時何地要鞠躬，要行多少次，如果被邀請坐，就可以坐下，然應警覺蔣介石要終止會見的時刻，他會讓你知時間已到了，那時，在他面前告退時要鞠躬，到了門口還要轉回過去再鞠躬一次。

我的名字叫到，門打開了，我向前進入一間龐大的房間，在遠遠的那一端，矮小的蔣介石坐在桌前。在他旁邊，坐着一位筆記的人，可能也兼保鑣。我進入時，看到蔣介石在膝上手持一份書夾或卷宗，正在翻閱，我猜想那是有關我的資料，他正在預習。

我鞠了躬，慢慢走向他桌前時，他正抬起頭，以他通常的那種唐突口氣示意邀我說：「坐！坐！」。然他說「你剛剛從聯合國回來，很辛苦了。」，「你的家裡怎麼樣？你的孩子好麼？」，

「有沒有什麼困難？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來看我」。我對於這些老套問題的回答，不斷被他的感嘆詞「好！好！」打斷。這些沒有感情的感嘆詞封鎖了任何真正有意義的交談。十多分鐘後，他表示會見終了，我站起來，一如指示那般鞠躬告退。

爲什麼他要召見我？我已在他其他場合見過他，他也問我過同樣問題。大家都知道他通常會晤每一個被提名任命的人，尤其在考慮軍人任命的時候。聽說早期在大陸時，他一定要召見將軍或部長級的人，但到了台灣以後，他堅持較低層的人員也要召見。據說有時一些無聊的瑣事也會影響他的決定。當時流行着一個故事：一個倒霉的軍官患有無可救藥的近視，蔣介石召見他的時候，他看不清楚蔣坐在那裡，弄錯方向鞠躬，結果他的重要任命告吹了。

不久，一些高級黨政官員來訪問我，勸我加入國民黨。他們暗示如果我入黨，一定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任命。但我對此事，完全未曾考慮。

第八章 被捕

討論台灣前途

我從海外回來，正受黨政官員矚目之際，我與校外的接觸也逐步發展起來。在外面流傳的話似乎是我平易近人並歡迎任何人來談政治。我的房子總是擁擠着台大和其他學校的學生，偶爾，市議員和地方政治人物來加入我們的談話。

沒有人相信「反攻大陸」。大家都認為政府揚言代表中國是荒唐的；蔣介石對於新疆、外蒙古和西藏的主張也是荒謬的；對沖繩和琉球群島企圖作類似的宣稱，更是可笑的。我們感覺更嚴重的是政府對台灣本身所做的不切實際的宣稱：它代表中國和「自由世界」，以及島上人民一致

支持「光復大陸」。雖然沒有公開談論「獨立」，但是大家都認為政府如果堅持其立場和政策，它有一天必會從聯合國被驅逐出來，所以，最基本的問題是改革和重組，藉以創建一個與現實切合的政府。

我已不可能繼續作爲一個超然的旁觀者；對我來說，給人爲國民黨支持者的印象是很尷尬的事。

我接受一項特別的研究計劃，那是外交部次長楊西崑安排的。我同意準備一份有關非洲的研究報告。國民黨正努力對抗中共在非洲的日益擴張，而上述研究是由亞洲基金會資助的。研究非洲，與台灣形勢，並不是從表面看那樣毫無相干。我研究報告的一部份，題爲「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發表於台北的文藝雜誌「文星」，造成一陣騷動。我詳細評論非洲爲獲得認同和獨立所做的鬥爭。我呼籲注意一些人民因殖民統治而與過去斷絕關係，如今則正爲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掙扎。我並非有意要寫一篇政治文章，但是編者按語則說「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們可從這段思潮的激盪中，得到觸類旁通的領悟」。

有一天，我參加一個酒會，遇見了一位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 James Leonard，他開玩笑地說，如果看到美國大使館檔案中有關我的資料多麼厚，我會吃驚的。我也認識了美國大使館的其他外交官，其中有幾位曾到過我家，就國際和台灣的政治形勢作了極坦率的討論。有一次在中山堂的音樂會中，我認識了美國大使寇克將軍（William J. Kirk），他知道我的經歷，邀我到

他的辦公室長談。此事未安排好之前，他突然被召回華府了。

我常被邀在基督敎團體演講。我的祖父、父母、兄姐都與長老敎會有密切關係。我有幾位親戚是牧師，也有當過神學院長的。在我的學術背景和這種私人關係之下，我在敎會主持的演講會出現，通常都吸引了不少聽衆。

在一九六二年初，我向台南神學院學生演講。這是台灣唯一的學校，所有課程都使用台灣話，所以我用台灣話演講，而比其他任何公開聚會，還大膽地討論台灣人民自決的問題。

謝聰敏和魏廷朝

有一天，國民黨中央黨部副祕書長徐慶鐘來看我。他奉命要辦一份日文雜誌，叫做『自由中國月刊』由國民黨出資，在台灣編輯，在日本發行。他要我推薦一個人擔任編輯，中、日文都好的。雖然知道這是黨營事業，我決定推荐一位年輕人。兩年來，他常到我家裡，熱心談論台灣的前途。謝聰敏是因我的同事劉慶瑞而受到我的注意。他在劉指導下，提出了一份有關憲法的傑出畢業論文，於畢業台大法學院後，考入當時唯一的政治學研究所，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在那裡，他給大陸籍教授留下極佳印象，而被推荐到鳳山的軍官學校任教。但由於距台北太遠，沒有知己，且身處乏味的國民黨軍官之中，他不久就感覺不快樂。我推荐謝聰敏給徐慶鐘，覺得在台北作編輯較符合於他的性情。

在謝聰敏的朋友中，還有一位常到我家的客家年輕人魏廷朝，他是農家的兒子，具有勇敢、堅毅的性格。他也是台大法學院的畢業生，但是，當初他不願從事於與他學歷相稱的工作。直到他在煤礦工作數月之後，才往具有聲譽的「中央研究院」當研究助理。

謝聰敏和魏廷朝，在我家裡的談論中，總是將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內外，分析的很清楚。我們覺得遺憾，未能使更多人分享我們的討論。我們覺得，目前台灣局面是那麼荒謬而不平，要使人們看出這點是極合理而輕易的事。

僅在觀點相同的朋友之間討論，反反覆覆，總是停留在原點未能為解決問題而進一步行動，我們已感到厭倦了。如要解決問題，必須重組政府，並全面改革，使台灣人全面參予於政府各階層。

在本質上，我們一再討論下列問題：

- 第一、在台北的政權主張代表「中國」是一個荒謬神話，也等於一個巨大騙局；
- 第二、這個神話使得國民黨維持雙重機構，一是所謂「中央政府」，所有有效實質的權力都集中於由中國來台的中國人，另一是附屬的「省政府」，部份開放給台灣人參予；
- 第三、國民黨對外宣傳，這個「中央政府」是一「憲政民主」，具有選舉參與的「立法院」，但是「立法委員」大都是一九四七年在中國大陸依舞弊選舉中選出的。憲法所規定四年一次的選舉已經中止，俾使逃難來台的大陸籍委員無限期把持席位；

第四、把持統治權的少數大陸人士，爲這種政治歧視辯解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受過日本入五十年的統治所污染，所以准許分享各階層的代表權之前，需要長期的「政治訓導」；

第五、在所謂「中央民意機構」中，台灣籍代表僅佔約百分之三，雖然台灣人佔全島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第六、國民黨政府控制金門、馬祖，並展示「軍事行動」，使得政府能夠藉口「戰爭狀態」和「國家緊急」維持戒嚴，停止憲法所保障的各種民權。這樣故意永久持續「緊急狀態」，目的在阻止台灣人民在正常民主憲政中的參政；

第七、國家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耗費在軍事方面，包括精心設計的秘密警察和特務組織，這是全世界最高比例的軍事開支，甚至比越南、韓國、以色列還要高；六十萬以上的軍隊，不足以進攻中國大陸，却大得非台灣經濟所能負荷，只有大量的外援，使得這個規模能夠保持；

第八、真正的反對黨，不准存在，國民黨不敢面對一個真正的反對黨可能的挑戰；

第九、黨、政、軍，充斥貪污腐敗，台灣人民不堪其困擾和負擔；

第十、從幼稚園到大學，灌輸政治教條，扭曲學生心智，藉以製造對國民黨和領袖的盲目擁護；

第十一、青年救國團是國民黨準軍事性組織，大專學生被強迫加入，其效用類似德國納粹的「希特勒青年團」及其他極權政府的青年組織；

第十二、任何非傳統性行爲、創造性思想、批評性思考、獨立的精神，不但受到限制和反對，甚至受到懲處；國民黨要使台灣人民回復古代中國的狹隘和固守，其後果是可怕的；

第十三、任何真正的工會，不許成立；而在「國家緊急」的法令下，勞工遭到剝削；

第十四、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中國，台灣農工被政府重重剝削，如重稅、肥料換穀等；大肆宣傳的「土地改革」也無法粉飾；

第十五、每人要公開表示忠實於國民黨；愛國的唯一標準是效忠於蔣介石；任何考試，都要測驗效忠「三民主義、國父、總裁」的程度，甚至理髮師或駕駛執照也要考三民主義。

「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一九六四年初，我們決定將上述看法草擬一份綱要，將台灣的處境和所面臨的問題，分析清楚，分發給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相信大部份大陸人也不滿於國民黨的專制，對前途也感覺恐怖。謝聰敏自願起稿，魏廷朝同意幫忙。

不久，有一天晚上，謝聰敏到我家裡，帶着一個鼓鼓的包袱，打開來，竟是一份厚達百頁的手稿，闡釋人權，從法國人革命、美國獨立宣言談起。我告訴他，我們所需要的是短簡有力的文章，不是大論文，於此決定以宣言形式寫成精簡的聲明。

其後，經過密切的商討，多次的修改，在魏廷朝的幫助之下，以流暢的中文完成定稿，剛好

可以符合於報紙一樣大的型式。如此我們能將台灣內外問題，分析得非常清楚，並指出我們應走的未來路途。這份文件的最大功臣，首推謝聰敏。

我們決定將這份宣言稱爲「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在簡短的前言裡，它指出台灣島上的人民，既不願被國民黨、也不願被共產黨統治，而是要自己統治。基於本身的利益和自保的需要，一千二百萬人民必須以自由選出的政府來取代國民黨政權，並以公共的福利爲施政方針。我們提出八點基本主張：

一、世界必須承認一個中國和一個台灣。國民黨政權所以能夠倖存，只是因爲美國的支持，然而，美國的政策也漸漸移向承認中共。

二、反攻大陸絕不可能。國民黨軍隊只能防衛，其裝備完全依賴美國。其數目小得無法反攻大陸，却大得不適合於和平時期，消耗了百分之八十的國家預算。國民黨一邊大言不慚民主自由，一邊却任意蹂躪人權，壟斷政權，利用秘密警察，強行獨裁。政幹制度削弱軍隊，並減低效率。被徵召的台灣兵正在取代逐漸老弱的大陸籍士兵，他們雖然穿着國民黨制服，却是國民黨沈默的敵人。

三、「反攻大陸」的口號，成爲國民黨政權的藉口，對外適合一些美國人對共產黨和中共的嫌惡，對內則可作實施戒嚴的理由，使得延續獨裁統治。

四、國民黨政府既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台灣。它於一九四七年選舉後二年，則被驅逐出中

國。佔台灣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人，在「中央」立法機關的代表佔約百分之三。國民黨雖然在宣傳上宣揚台灣人與大陸人合作，在實際上却用各種手段分化彼此，使他們互相敵對，以防止他們彼此合作，推翻其獨裁政權。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分化派系，在此也延用到人民。

五、極煩重的軍事費用和極高的出生率，是二個極嚴重的問題。一九六四年的統計顯示軍事費用佔全部國家預算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這還不包括其他許多隱藏和間接的開支。失業問題日趨嚴重。主張節育者被視為失敗主義者。鼓勵高出生率據說是要用來充實二十年後的兵源！

六、黨軍領導者所追求的政策是要摧毀中產階級的經濟基礎，以消滅反對勢力。一九四七年當各地領導者起而反抗國民黨統治十八個月來的壓制和剝削時，二萬名以上的台灣人被屠殺了。隨着於一九五〇年，又推行所謂「土地改革」，欲使受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窮困。

七、經濟政策不合理，它只是想支持龐大的軍事開支，而不是要發展適合台灣資源和人力的健全農工生活。農民因人為的價格制度負擔重重，農產主要是以餵養軍隊為目的，不是要供給有生產力的勞工。真正的稅制改革必須以削減軍費為前提。社會的不穩日趨尖銳，因為少數與國民黨合作者變得富有，而多數的農工却極貧困，又要負起苛稅的重擔。

八、台灣可以成爲一個獨立國家嗎？事實上，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便獨立了。就人口而言，台灣在聯合國會員國間，排名第三十。我們必須放棄強權的幻想，面對現實，建立一個小，但却民主而繁榮的社會。有人說，蔣介石已成爲一個皇帝，我們只好等待他死亡。但是我們不能忽

略一個可能性，即絕望的小蔣將台灣轉手給中共，也不能一刻或忘，台灣可能再度成爲國際強權政治下的犧牲品。我們不能被動地等待「進步的改革」。國民黨的歷史清楚顯示任何與它的妥協，不是幻想便是欺騙，是個陷阱，藉以誘捕期待和平轉移的天真知識份子。我們必須警告任何與國民黨合作，以獲取經濟利益的台灣人。他們必有一天向憤怒的人民付出極大的代價。

我們將上述各點說明以後，摘要訂下三個基本目標：

第一、確定「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團結全島人民，不論其出生地，共同推翻國民黨政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和新的政府。

第二、制定新憲法，建立一個具有實效並向人民負責的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真正民主。

第三、以新會員國身份加入聯合國，與其他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爲世界的和平而努力。

上述原則，在宣言中，清楚地提出來，國民黨政權的缺陷也明白地指出來。比如，我們強調民主原則必須確定，國家元首應依普選而產生，而不應該是作爲崇拜的偶像，既不可享有絕對權力，也不可免於受批評。他應該是一個專心致力於服務大眾的公僕，而且應該接受民意代表的控制。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以及反對黨的合法地位必須得到保證。政府中的貪污腐敗必須消除，軍人和公教人員的待遇必須改善，並增加政府的效率，建立健全的公務員制度。司法獨立必須確保，並廢除所有侵犯基本人權的法律，從此防止非法的逮捕、審訊和懲處。

我們又說特權制度應予廢止，根據民主的原則，規劃警察的職務，積極培養人民守法的精神。每一個人都應該有權不受限制地通信、自由行動、自由旅行於國內外。軍隊的負擔應該減少到自衛所需要的程度，並應保障退伍軍人的地位和生活。

我們最關切的是個人的自由和有條理而公正的政府。先談這些後，才能談論扭曲的經濟、黨軍特權份子，牽親引戚問題。大量減少軍事開支以後，才可以發展長期經濟計劃。台灣的物質和人力資源一直大大被誤用了。我們提議增加國民生產、減少失業率，提高國民生活水準，減少貧富的差距。國民黨沒收日人財產，吞沒外援，藉以自肥，以低廉勞工供應工業，強行「肥料換穀」辦法，剝奪農民的正當利益。一般民衆也深受苛刻的間接稅之苦。

最後，宣言的總結說，我們既不要國民黨極右的黨綱，也不要共產黨極左的教條。我們呼籲大家支持台灣人自決運動，以打破國民黨的獨裁，使所有台灣人在具有建設性的民主政策之下，團結起來。

我們經過數月直接和間接的討論和推敲，終於同意最後的定稿，而非常興奮，充滿了成功的感覺，同時也覺察到我們現在已走上一條危險的路途。生命似乎已有了新的意義。我們期望這份宣言能對所有台灣人和流亡的大陸人，都會產生宏大的影響，比較起來我們路途上的障礙便變得不足道了。任何能思考的人們都會意識到我們所提出的問題，至少其中一些，確實存在，我們所做的，只是將那些問題更清楚地呈現出來，為大家界定那些問題，或至少幫助每個人界定而釐清

各自的問題。如果這份宣言在各界引起討論，則可能得到普遍支持，國民黨的獨裁政治則會受到公開挑戰，特務制度也受到威脅了。

直到那時，我們所做的，只是知識的運作而已。我們已有寫得很好的宣言稿，但是從此開始，我們便必須與警察國家控制人民的各種手段，如暗藏後巷的間諜和特務、政府和黨所控制的新聞電台、經濟壓力和威脅等等，開始做實際的鬥爭。我們計劃將宣言分發給台灣人和大陸人，各界領導者、生意人、醫生、教師、各級民意代表、各層公務員、軍人等。如果我們能夠突然間在全島散發宣言，國民黨和特務便無從搜索所有的傳單，無法箝制我們主張的傳播。政府不可能逮捕每一個收到宣言的人，況且他們都是被動的收件人。國民黨必大動盪。至少我們那樣想。

印刷廠走漏消息

我們決定印製一萬份宣言。接着的問題便是在那裡及如何印製呢。

我們決定油印是不切實際的。這個宣言，看起來應該較正式，不應該像街上廣告傳單，看過便可扔掉。經過考慮，我們決定採用印刷的方法。謝聰敏的父親最近剛寄來幾萬台幣做為投資生意之用，所以我們想用這筆錢買一部印刷機。但是我們不懂印刷技術，而且一部印刷機在私人家裡也無法隱藏。所以我們只有去找陋巷裡無執照的印刷所。

謝聰敏花很大功夫準備了一份假稿件，能夠交給植字工人而不會引起疑心。在這假稿件中，

他將宣言中提到國民黨的字句，全部改換共產黨，這樣，表面上看來彷彿是一份反共宣言。另一面，我們搜集各職業團體的會員名冊，選定分發對象的名單，請人打字。

謝找到一間小型印刷廠，專門替人植字，與老板談好，替我們排植信稿的版本。他同時又四處找尋所需鉛字，以便代替排好版面裡一些字句，使其恢復本來面目。

這樣又過了數星期。當一切都準備妥當，單身的謝則在萬華區一個小旅館租了一個房間。有許多男人租這種房間做爲幽會之用。謝包紮笨重的排好版面，僱了三輪車，載到旅館去。我和魏廷朝也到了那裡。大概旅館老板懷疑了，不久他便以修理水管爲藉口未經敲門突然闖入房間。但他只看到我們三個人在聊天，便喃喃道歉退出了。版面放在床底的。這個插曲應該足夠使我們警惕，要極端謹慎。我們正在複雜的萬華社區，但却太天真，還不知道每個巷弄都有特務，每間旅舍都有受特務津貼的綫民。國民黨從大陸搬到台灣的唯一具有效率的機關，大概就只數特務系統了。

我們在那個旅舍房間裡，將已排好的假稿，用買來的鉛字，改換了應該替換的部份，如此恢復了宣言的原來面目。接着要辦的便是購買紙張了，這件事很容易解決。然後，謝又在萬華區找到了一間極小而無執照的印刷廠，他們因常偷印黃色書刊，所以，做事偷偷摸摸，不敢聲張。其老板答應印刷，由我們供給紙張。

約好那一天，謝帶着笨重的排字版先到印刷廠，一方面等着魏帶紙張來，另一方面監督印刷

廠老板將排字版按在印刷機上。過了一段時間，魏還沒有來，謝不耐煩了，便走出印刷廠到門口街上去看看，不久才看到魏僱了兩輛三輪車載着一大堆紙張到了。當謝和魏將紙張搬入印刷廠時，其老板突然說他已不願印了。謝和魏都驚駭，但也沒有辦法，只好又把紙張運回紙店，把排字版帶回謝所租住的房間。

此後約十天，我們靜待着。在印刷廠附近探消息的朋友告訴我們，其附近正在流傳說有些共產黨曾企圖印刷東西攻擊國民黨和蔣介石。於此，我們才發現爲什麼印刷廠老板在那一天忽然拒絕印刷。當謝將排字版按好在印刷機上，而走出印刷廠到街上去等待魏那幾分鐘間，印刷廠老板已趕快把印刷機一轉，盜印一份，看了內容，嚇了一跳，不敢再印了。

我們緊急作商量。印刷廠老板不知道我們身份，所以請人間接警告他，如果報警，對他不利，因爲其工廠沒有執照，又常印黃色書刊，這個事件一報上去，一定會招來很多麻煩。我們以爲這事這樣就會過去，等一段時間以後，可以再進行印刷了。這又是我們極天真的地方。我們被捕以後才知道，原來那印刷廠老板還是把他盜印的那一份宣言拿去報警，其結果，全島警察和特務都接到通知，有人計劃印刷「反政府」傳單，特別加強監視和警戒了。這事，我們完全不知道。

等約一個月，謝又開始找尋願接受這個生意的印刷廠。他終於在市政府旁邊赤峯街找到一個有極老式印刷機的老板兼工人。那附近有一間小長老教會教堂，已經約好我於月底去作有關「人權」的演講。那個老板年紀相當大，同意接下這筆生意，在下一星期天印刷，剛好是中秋節那天

到了約好那天，魏幫助謝搬排字版和紙張到印刷廠去。他們穿着軍服，口操北京話，自稱軍事學校教官，要來印刷考卷，要嚴格防止試題外洩。這在台灣並不是不尋常的事，那個老板似乎也不感覺異常。

他的動作很慢，既無助手，機器又老，工作了很久，自從早上九點一直作到下午三點左右。其間，魏站在印刷機旁，小心監督着。到了中午，謝才來替換。最初幾張印得不好的，也都收起來以免流出，可以接受的一萬張終於印妥了。每一份宣言，如果適當運用，都可以成爲一枚政治炸藥。謝迅速檢閱最後一份，發現無誤後，便帶幾份來找我，說可以準備下一行動了。

謝和魏付錢給老板後，僱了兩輛三輪車，把笨重的一萬份傳單，運到已訂好的附近小旅舍房間。我們帶了二個大旅行箱，把傳單裝入，然後，謝留在旅舍，魏和我再僱三輪車運送兩十大旅行箱，到衡陽路離「總統府」不遠的一位朋友家四樓貯藏間。這位朋友是一位女孩，她沒有問箱裡放什麼東西。我們打算把宣言暫時放在那裡，等到郵寄名單準備好以後，才在全島同時分發。

被捕的一刻

把一萬份宣言收好之後，魏和我即回到旅舍，三人會合休息，謝在床上打盹，魏和我則將那些印壞的幾份拿到房間廁所燒却，把殘灰投入便器，放水沖掉。那時已經黃昏了，我正想應快離

開，到一間日本料理店應約。

忽然有人用力敲打房門。我們還沒來得及開門，便有七、八名便衣人員衝進來，轉動左輪槍，喝道「舉手」。

當謝聰敏從床上爬起來時，被揍了一頓。他們命令我們站在一邊，然後徹底搜查整個房間。那時，我看到一個便衣人員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皺皺的我們的宣言。那並不是印在我們所用質料較好的紙張上。我立刻猜到，那是第一個印刷廠老板利用謝跑到馬路上去等候魏的幾分間，匆匆盜印下來的。

在被捕的最初情緒激動的時刻，我們彼此簡單的交換了一些話，同意既然他們已知悉一切，我們將只說出有關我們行動的事實，不要牽涉他人。他們命令我們不准講話，除了服從以外沒有他途。

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却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真正瞭解多少台灣人已腐敗到甘願為國民黨服務。每一可鄙的綫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舍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爲。我們天真的假設，印刷廠老板都遲鈍而未受教育，不會太注意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天真得沒有想到他們一報告，就可以領到一筆賞金。

我們被帶出旅舍，當我們走下旅舍大廳時，發現旅舍伙計畏縮進去，還有一個瘦弱三十歲左右的女傭人，把臉掩起來。我立刻猜到他們就是向警察密報我們帶着大旅行箱進出旅舍的人。

旅舍前的街巷擠滿了好奇的群眾，爭着要看到底警察抓誰，和爲什麼。他們向後退縮，讓出一條通路，使我們走到警車和吉甫車。警察粗野地把我們推進車裡，便開動了。

我發覺自己不斷在自問，「將被關在監牢多少年呢？」。很奇怪的，「七年」這個數目，不斷出現在我腦裡。我想到我的家人、妻子、兒子、母親、姐姐、親戚、島內外的朋友。

我懷疑我們三人能否有機會再見面。我後來才知道，魏廷朝曾經受到毆打和死亡的威脅。他曾經要求立刻槍斃我們。謝聰敏也遭到毒打。

在夜晚的街道開不了多久，便到了圓環附近的警察局。一九四七年引發二二八事件，就在這附近。

那是中秋節的晚上。月亮懸掛在東邊天上，渾圓而明亮。可是，今夜我們的家人和朋友不能歡慶佳節了。我們的前途非常黑暗。

附錄台灣人自救運動宣言

一個堅強的運動，正在台灣急速地展開着。這是台灣島上一千二百萬人民不願受共產黨統治，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自救運動。我們要迎上人民覺醒的世界潮流，摧毀蔣介石的非法政權，爲建設民主自由，合理繁榮的社會而團結奮鬥。我們深信，參加這個堅強運動，使這個崇高的理想早日實現，是我們每一個人的權利，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一、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早已是鐵一般的事實！

不論歐洲、美洲、非洲、亞洲、不論承認中共與否，這個世界已經接受了「一個中國，一個台灣」的存在。

即使在亞洲政策上陷於孤立的美國，也只有少數保守反動的政客，在炒「不承認主義」的冷飯，輿論主流，尤其是知識份子，都要求在法律上承認「一個中國，一個台灣」，以謀中國問題的最後解決。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正在往這個方向發展。爲什麼美國還在口頭上把蔣政權當作唯一

合法的中國政府？因爲美國要藉此與中共討價還價，以達成有利的妥協。美國跟中共在華沙談了一百幾十次，美國一直強調了只要中共放棄「解放台灣」的要求，美國對中共的門將永遠開放着。

蔣政權只靠美第七艦隊苟延殘喘，我們絕對不要被「反攻大陸」這一廂情願的神話蒙住眼睛，走向毀滅的路上去。第七艦隊一旦撤退，蔣政權在數小時內就會崩潰。「反共大陸」云云，只是蔣介石用來維持非法政權和壓榨我們的口實罷了。

二、

「反攻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凡是具有起碼常識的人們，都會毫不遲疑地下這樣的判斷。蔣介石控制下的軍隊，頂多是一個防禦力量，而絕不是一個攻擊力量。它的存在完全依賴美國的軍援，而美援的目標，又僅在保持美國太平洋的防衛線，因此它不可能獲得超過防衛需要的攻擊武器。它的海軍無法在海上單獨作戰，因爲它不但沒有主力艦，連保養一隻軍艦的設備也沒有。它的空軍由短程戰鬥機組織，攻擊所不可欠的運輸機和長程戰鬥機却少得可憐。它的陸軍，仍然以輕裝備步兵爲主力，機械化部隊和重炮兵只不過是裝飾品而已。

台灣沒有支持反攻經濟的能力，蔣介石儘管全力支持軍隊，不惜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預算做爲軍費，但憑這彈丸之地，維持數十萬軍隊平時已苦於奔命，戰時怎能夠供給龐大的戰費？又怎

麼能夠補人力的毀滅？

戰爭的目的已不存在，蔣介石雖然在號召自由民主，但處處蹂躪人權，一手把持政權，以特務組織，厲行暴政。有人說，大陸來台人士返鄉心切，容易受蔣介石的驅使。其實，中共國勢的強大，已使百年來飽嚙外侮的民族主義者揚眉吐氣，他們相信，這絕不是貪污無能的蔣介石政權所能望其項背的。我們究竟爲誰而戰？爲何而戰？蔣介石已失去了使人信服的戰爭目標，誰願爲這個獨夫賣命？

蔣介石的官兵，把一生奉獻給這個獨夫，請問他們得到什麼代價？一旦年老力衰，不僅不能享其餘生，且被擯去民間，流浪街頭。這種騙局怎麼不令他們痛恨？因此，退伍軍人常說「亡大陸的固然是退伍軍人，亡蔣介石也將是退伍軍人」。

現役官兵的生活，更是慘不堪言，他們常常說，「毛澤東斷了我們的祖宗，蔣介石絕了我們的子孫」。狂者鋌而走險，狷者鬱鬱終日，官兵越規犯禁層出不窮，指揮官能多方寵賂，結果兵比官驕，軍紀掃地。

至於代退伍軍人而入伍的台籍青年在他們的記憶中仍然留着蔣介石在二二八事變中屠殺二萬台灣領導人物的仇恨，他們雖然三緘其口，始終還是蔣介石的「沈默的敵人」，在軍裝的鐵面孔下，固然看不出他們的思想，他們無論如何不致認賊作父，受蔣介石的奴役。政工制度牽制軍事行動，減低軍事效能。軍事行動的優點，在於能迅速動員人力物力，完成任務。政工制度則徇教

條監視軍事行動，政治目的重於軍事目的，政治責任抵銷了軍事效能。雖然軍中明理之士，如孫立人等，曾提出異議，但却被戴上莫須有的罪名，迄今含冤莫白。官兵常說：「一旦動員，先槍斃政治指導員」。

想一想，一枝欠之攻擊能力的軍隊，在沒有戰費，士氣消沉，效率低落的情況下，和強大的中共作毫無目的的戰爭——這個戰爭叫做「反攻大陸」，而頑強的五星上將蔣介石，却效法唐·吉訶德高舉一技破爛不堪的掃把，向風車挑戰。

三、

爲什麼蔣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陸」？因爲這個口號正是他延續政權，驅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來，他一直藉這一張空頭支票，宣佈戒嚴，以軍法控制了一千餘萬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陸」的把戲，實在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

國民黨官員何嘗不知道這個騙局不能持久，他們一面將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來的財富送往國外，準備隨時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共大陸」的延命丹餵給死在眼前執迷不悟的蔣介石。

讓我們看看這個口號有什麼魔力：

第一、蒙蔽人民，利用人民心理的弱點，以苟延早已喪失存在的蔣政權。部份大陸來台人士

，思鄉心切，可因「反攻大陸」的幻想而支持蔣介石，部份台灣人則因盼望政治壓力和經濟負擔減少，而姑信其有。

第二、可利用非常時期的名義，排除憲法和法令的正當行使，陷害愛國而富於正義感的人們，進一步限制言論，封鎖新聞，控制思想，實行愚化政策。

第三、挾中共以自重，向美國討價還價，作為勒索美援的工具，當中美交涉不順利，或美國向蔣介石施以壓力時，立即在香港放出國共和談的消息，使有恐怖中共病的美國不知所措。

總之，「反共大陸」的口號，對外可以要挾中共以自重，對內可以厲行恐怖政治，延續政權
四、

蔣介石政權代表誰？

國民政府自稱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他認為現在的國民大會、立法委員、監察委員都是經過人民選舉而產生的，包括中國大陸和台灣代表在內。我們知道，這些選舉都是十八年前（一九四七年）舉行的，我們也知道不到二年（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人民已痛恨蔣政權的腐化無能，蔣介石雖然擁有數百萬軍隊却很快地被趕出了中國大陸。顯然，大陸人民已選擇了另外一個政府。當時的國民政府已不能代表當時的大陸人民，何況在十八年後的今天，新的一代已經成長，蔣政權顯然不能代表現在的大陸人民了。

那麼，蔣政權能否代表台灣的人民？三千餘人的國大代表中，台灣的代表只有十餘席，四七三人的立法院中，台灣的代表也不過六名，他們的任期已分別於十二年前和十五年前屆滿當然不能代表現在的台灣人民，何況二二八事變時，蔣介石屠殺了兩萬的台灣領導人物（當時台灣人口只有六百萬），雖然台灣人一直忍氣吞聲，但他們一直是蔣介石「沈默的敵人」。

談到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必需指出，蔣介石政權雖然在口頭上高喊「台灣人與大陸人必須攜手合作」，其實却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所以極力挑撥離間，無所不爲。這種政策，在選舉中表現得最爲突出。蔣政權分化台灣人和大陸人，使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獨立，以便操縱與統治。因此蔣政權一直防範台灣人和大陸人的竭誠合作，協力消除蔣介石的專制，實現民主政治。當雷震求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的途徑時，蔣介石終於撕破了臉皮，不顧國內外輿論的指責，張牙舞爪地將雷震戴上紅帽子。蔣介石深知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實現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權瓦解之時。

或者說，蔣介石政權是國民黨的代表，並且根據他們的傳統的「黨國合一」論也就是代表中國。其實，蔣政權甚至於不能真正代表國民黨。國民黨本身只有獨裁，而沒有民主，絕大多數的黨員，沒有說話的權利，他們的代表，在大會中，只能恭聽頭目的訓詞，鼓掌鞠躬而已。他們只是一群「點頭人」，只能一致通過頭目的提案，至於提案的內容，是不能也不敢過問的。黨內又是派系分立，在蔣介石的權力鬥爭中，如兩廣勢力，胡漢民、張發奎、李宗仁等被清算的派系固

不必說，其他不得寵的派系也不能進入權力的核心。這些被排擠的多數黨員，當然是憤慨而不滿的。黨內明智之士或避口不談政治以作無言的抗議，甚至於積極抨擊，成爲反對蔣政權的主流。

我們可以說，蔣政權只是國民黨內的少數小人集團的代表。它既不能代表中國、又不能代表台灣，甚至於不能代表國民黨。

五、

台灣經濟的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龐大的軍隊組織，一是激增的人口。這是不負責任的蔣政權在「反攻大陸」的虛偽號召下自我毀滅的陷阱。

根據蔣政權本年的統計，軍費支出佔預算百分之八十以上，這個數目，並不能概括所有的軍事費用。每年由糧食局供給軍隊二十萬噸米的價格遠低於市價，而且遠低於局定的價格；軍隊的運費、電費以及其他應付公營事業的費用，從未結帳；軍需工廠所得與美援物資拋售所得也歸軍隊所有；軍隊的消費，已超過資本的形成。

激增的人口，也減低了經濟成長的效果，影響所及，失業問題日趨嚴重，尤以農村的情形最爲惡劣。台灣的勞動人口約有四百萬人，而失業人口至少在一百萬人以上，約佔勞動人口的四分之一，每平方公里的耕地，要擠一千二百三十人，受大專教育的優秀青年迫不得已，紛紛出國，每年都在千人以上。蔣政權不敢面對現實，將問題的解決訴諸自欺欺人的「反攻大陸」上面，雖然有些知識份子正直呼喊著，但仍然無濟於事。他們說，主張節育的人是失敗主義者，而把希望

寄託在剛出生的嬰孩，認為二十年後，這批後代將為他們執干戈而「反攻大陸」。

許多人以為台灣的土地政策是蔣政權的德政。其實，蔣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的動機，却是為了削弱潛在的反對力量。從清朝以來，台灣傳統的政治領導人物，都來自地主階級。蔣介石深知政治人材的興衰對他的專制的影響，因此，先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時屠殺了兩萬台灣領導人物，又在一九五〇年實施土地改革，打倒傳統的政治領導階級。當然大陸人不屬於台灣地主階級，也是土地改革能實施的主要原因。由於蔣政權傾心消滅地主階級，地方力量終一蹶不振，而農民却在農產品價格的抑制、無從逃避的重稅、以及肥料換穀政策的重重剝削下，每日為糊口掙扎而無餘力。

經濟政策應該有一套長期發展計劃，但蔣政權所做的，只是不顧經濟原則的盲目的投資，以及表面而臨時性的應急措施。他們為了維持軍糧，不惜殺雞取蛋，榨取農民。他們深怕軍費一時中斷，所以不敢面對現實，改革它命脈所在的稅收制度，而任它腐化。他們為了鞏固政權，更與財閥勾結，抑制貧苦大眾，造成貧富懸殊的不安定社會。

讓我們看到了山窮水盡的蔣政權的最後面目，一方面將它們的劊子手們放在重要的位置加緊暴力統治，他方面以所得「十二億公債」都市平均地權、及變賣公共事業等，來榨取人民，屢次派遣他的掌櫃徐柏園到中南美疏散民脂民膏，大買地產。

六、

台灣足以構成一個國家嗎？

國家只是爲民謀福利的工具，任何處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們都可以組成一個國家。十餘年來，台灣實際上已成爲一個國家，就人口面積、生產力、文化水準條件來看，在聯合國一百十餘國中，台灣可排在第三十餘位。其實許多小國的人民反而能享受更多的福利和文化的貢獻。如北歐各國、瑞士、南美的烏拉圭，都是很好的例子。我們應拋棄「大國」的幻想和包袱，面對現實，建設民主而繁榮的社會。

有人說，蔣介石已成了裸體的皇帝，我們可以坐待他的末日。但是我們不能不想，走到窮途末日的蔣政權，將台灣交給中共。我們更不能不憂慮，台灣將被國際上的權力政治所宰割，所以說我們絕對不能等待。

許多知識份子們仍然在迷信「和平轉移政權」與「漸進的改革」。我們必須指出，如果回顧劣跡昭昭的國民黨史，我們立刻就可以發現，只要剛愎狂傲的蔣介石睜着眼睛，任何方式的妥協不是夢想，便是圈套——專門用來陷害知識份子的圈套。所以我們絕不能妄想「和平轉移政權」而妥協。

我們還要坦誠的誠告與蔣政權合作的人們，「你們應立即衷心悔悟不再爲蔣政權作威作福，不再做蔣政權的爪牙耳目，否則，歷史和人民將給你們最嚴厲的制裁」！

七、

在台灣這種正在開發中的地區，經濟發展實際上是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的大革命，而政治則爲一切推動的源泉。台灣儘管具有現代化的良好基礎，可是只要腐化無能的蔣政權存在一天，我們距離現代化仍然非常遙遠，所以我們絕不能期待「漸進的改革」。

基於這種認識，我們提出下列主張，即使流盡最後的一滴血，我們也要堅持到底使它實現。
甲，我們的目標

(一)、確認「反攻大陸」爲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

(二)、重新制定憲法，保障基本人權，成立向國會負責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實行真正的民主政治。

(三)、以自由世界的一份子，重新加入聯合國與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邦交，共同爲世界和平而努力。

乙，我們的原則

(一)、遵循民主常軌，由普選產生國家元首。他不是被萬人崇拜的偶像，也不是無所不能的領袖。更沒有不容批評的教條。他只是受國會監督與控制，熱心爲民衆服務的公僕。

(二)、保障集會、結社和發表的自由，使反對黨獲得合法的地位，實行政黨政治。

(三)、消滅特權，革除貪污，整肅政風，改善軍公教人員的待遇。

(四)、樹立健全的文官制度，實行科學管理，提高行政的效能，確立廉潔公正的政治。

(五)、保障司法獨立，廢除侵犯人權的法規，嚴禁非法的逮捕，審訊與刑罰。

(六)、廢止特務制度，依民主國家常軌，規定警察的地位和職務，並樹立人民的守法精神。

(七)、確保人民對國內外通信，遷徙與旅行的自由，維護開放的社會。

(八)、以自衛為原則，裁減軍隊，並保障退伍軍人的地位和生活。在經濟方面，由於國防負擔大減，我們可以根據長遠的目標和計劃，充分利用人力物力，加速經濟的成長。我們將以民主方式分配經濟權利，廢除個人和階級經濟特權，保障機會均等。我們將建立直接稅制，加強累進所得稅與遺產稅，消除貧富懸殊的現象。我們計劃擴大國家的生產力，消滅失業，普遍提高國民生活水準，使人類的尊嚴和個人的自由具有實質意義。我們將改造農村傳統的生產方式與維護溫飽的觀念，建設科學化、機械化、現代化的農村社會。過去蔣政權盲目投資、無理干涉企業、以低工資支持資本案、以肥料換穀辦法剝削農民、以消費稅和戶稅增加一般大眾負擔所造成的各種問題，我們將予以徹底解決。

我們確信社會的目的在維護個人的尊嚴，增進人民的福利，因此我們反對蔣政權統治下的恐怖、貪婪與妨碍團結發展的多種措施，而要建立一個互信互助、友愛的社會，使每一個人都能過完美積極幸福的生活。

八、

多少年來，中國只是兩個是非，一個是極右的國民黨的是非，一個是極左的共產黨的是非，真正的知識反而不能發揮力量。我們要擺脫這兩個是非的枷鎖，我們更要放棄對這兩個政權的依賴心理，在國民黨與共產黨之外，從台灣選擇第三條路——自救的途徑。

讓我們結束這個黑暗的日子吧！讓我們來號召不願受共產黨統治、又不甘心被蔣介石毀滅的人們，團結奮鬥，摧毀蔣介石的暴政，建設我們的自由國土。

愛好民主自由的同胞們，千萬不要因看到暗澹的現實而灰心，而絕望。讓我們告訴你們，國內外的情勢對我們越來越有利，而我們的自救力量正在急速地擴大中。在政府機關、地方團體、軍隊、公司、報社、學校、工廠、農村到處都有我們的同志。我們這個組織，已經與在美國、日本、加拿大、法國、德國的同志們取得密切的聯繫，並且得到熱烈的支持，一旦時機來到，我們的同志將會出現在台灣的每一角落，跟你携手合作共同奮鬥。

同胞們！勝利就在眼前，團結起來！！

這就是我們的標誌。從今天起，它就隨時隨地出現在你們的面前，記住！當你們看到它的時候，這個組織正在迅速地擴大着，這個運動也正在有力地展開着。

第九章

偵訊

在警察局

在警察局門口，我最後看到謝和魏，然後立刻被帶到三樓一個燈光刺眼、像會議室似的大廳。他們命令我坐在桌旁，並以鍊鎖將我的右手鎖在桌腳。一個穿制服的年輕警察沈默地坐在我旁邊。窗門緊閉，整個房間悶熱得令人難受。

我們都聽過警察如何對待犯人的故事。我想我就會被毒打一頓，並受各種酷刑了。一個官級不高、年老而穿制服的警察進來，看了我一下後說「如果這是十年前，你會被槍斃，但是現在，我想你是不會的」。他並沒有再多說什麼，就離開了房間。我坐在那裡大概有一、二小時，一遍

又一遍地要求水喝。因為我不能舉起手來，那沈默的年輕警察必須替我拿着杯子就我嘴唇。幾次之後，他顯出不耐煩，不願再做了。

一個矮小、中年、其貌不揚的大陸籍便衣人員走進來，才打破了僵局。他自我介紹是特別調查組的組長。他最初的幾句話，使我知道他已經與謝談過話了。他似乎對我們宣言的內容沒有多大興趣，倒是想知道我們準備過程中的技術問題。他說「你們所做的極為專門，無法做得更高明了」。

當他知道我還沒有用晚餐時，便派人向附近的飯食攤販，買了一份飯盤，有飯、菜、肉、湯等。我的手銬鬆開了一會兒，但是我沒有胃口，大部份食物都沒有動。我硬起心腸要面對即將開始的苦刑，或至少痛揍。我的手銬再扣上了不久，走進一個身材高大、態度自滿的人，他沒有自我介紹，沒有穿外衣、外表冷靜，看起來官階較高。我感覺他只是來查看我一下。他沒有待多久，也沒有講多少話。他說「這是一個政治案件，不必太就心。這並不很嚴重。當然，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政治意見。這並不算什麼犯罪。有批評才能有進步」。他似乎想慰解我，減少我的恐懼。他走了以後，那個矮小中年警察又進來，他帶着紙筆，要我寫下自傳，從祖父開始，寫下所有我想得起的細節。這實在是荒謬的習題，但是我只好慢慢開始寫了。

焦慮和疲倦

那時，大概已經午夜以後了。我才寫完二、三張時，三個高大的男人走進來，他們粗魯地告訴我，不用寫了，要即時與他們一起走。我們走下馬路，黑暗而靜寂，爬進一部美國製軍車，兩個守衛夾着我，坐在後座，兩個人在前，擠在司機旁邊。他們都武裝着。我們離開靜靜地市區，穿過士林郊區，轉向一個訓練特務的營區地帶。提到這個禁區，一般民衆都會心跳。這裡好像是軍營，許多人在走動。我被帶進一個小而赤裸的房間，四邊都是水泥牆。大約有十二平方呎大，只有一個簡陋木桌子和兩把椅子。還有兩塊石頭大小約如蜜瓜，放在房間一角，給我很深的奇怪印象，我不斷地想，這兩塊石頭是不是與拷問有關。

他們命令我坐下，這次沒有釘上手銬。在警察局對我講話的那個高大人物走進來。他在我對面坐下，又再說這並不是什麼暴力犯罪，也不是破廉恥的行爲，與個人人格無關，他又說，這是一個政治問題。另外一個，官階似乎更高的人，走進房裡，在我後面站着，也重覆同一論調，並加上一句「你與他合作，一切就沒問題了」。然後，他就離開了。

偵訊開始了。坐在我對面的，看起來並不是面目獍猛，但是全無表情，像機器一般，既不帶同情，也不帶憎惡。他面前放著一疊紙，開始單調的正式訊問，姓名、出生地點、出生日期、父母姓名、家庭狀況、職業等等。他的口氣也平坦如機器。他終於進入審問的主題，他說「說明你所做的」。

我們二個人在那間赤裸而不舒服的房間，面對面坐着，至少有四個小時。天亮了。我聽到營

房那邊傳來起床點名的聲音。我的偵訊人出去一會兒，帶來麵包和茶。他說，「你想吃什麼就吃」，然後走出房間。我並沒上手銬，但在門口則有衛兵守着。我疲倦極了，但是無法在那張僵硬的椅子上，直直坐着睡覺。隨着時間進行，我可以察覺在外面有許多活動進行着。大概是中午已到，有人送進一碗飯和一些菜。我只是坐着，扒在桌上，把頭埋在手臂彎裡，太疲累了，全不想吃。整個下午，僅有一個人進來。一個彪悍大漢，粗糙的臉孔令人厭惡，他實在非常醜陋難看。使我吃驚的是，他竟然說我們曾見過一次面，在我從法國留學回來不久時。我完全記不起看過這個人，但他堅持有這麼回事，並說，他聽說我在那裡，所以「進來瞧瞧」。他說完就離開了。我覺得莫名其妙，也想到以那種身材面貌，他或許是我的拷問者之一。

就這樣，我整個下午都一個人坐着，只有到過隔壁的廁所一、二次。當黃昏時，我又察覺外面營房有相當的活動聲音。我雖然累極了，但還是睡不着。我後來知道謝和魏也在附近受審問。還有替我們收存那二個旅行箱的學生，也被帶進來審問。

在警備總部

突然有人進來，沒有說明自己身份，要我在一張印好的保證書上簽名，這似乎是一種例行公事。那文件印着「我不得將在此處所見所聞，告訴任何人。否則願受嚴罰」。簽好後，我便被帶到一部等候着的吉甫車，兩旁坐着便衣警衛，開回台北市區，經過火車站。警衛和司機都一言不

發。我已累倦得近於崩潰邊緣。當我們沿着我熟悉的街道開着時，我就心我的家人、即將開始的台大及其他學校課程、我的親友、以及我前已經答應的一些事情如在長老教會有關「人權」的演講、到韓國大學的訪問、到泰國開會事等等。

經過火車站後，我警覺到我們正走向台北市最可怖的地方，警備總部在北門的安全單位。這個巨大的建築在一九四五年以前是日本人的佛教寺廟，叫「西本願寺」。地下的墓穴，原來存放骨灰的地方，於中國人接收以後，將骨灰予以清理，改成監牢和審訊室，從那裡沒有什麼聲音可以達到外界。許多人在被送到監獄執行刑期或處死刑以前，曾在這裡受審問或酷刑，所以在一般市民眼中，它已成爲拷問和酷刑的代名詞。它位於市區中心，四周高牆，裡面有幾棟軍事建築物。我感到我的命運將在這裡決定了。

我們的車子直接開進營區裡，沒有在門口盤問。顯然事先一切都安排好了。車子停在寺廟旁邊的一個建築。在黑暗中，龐大的寺廟如要威脅似地屹立着。押走我的警衛沈默地對我揮手示意，要我下車。在門口有一個穿制服的軍官等着我。他自我介紹是魏參謀。他極客氣地對待我，幾乎有如對待貴賓，稱呼我「彭教授」，說很抱歉這樣麻煩我到這裡。他還謙稱「招待不週」。在我目前的處境裡，聽到這種客套話，使我吃驚，也哭笑不得。這位魏參謀，口操福建口音，非常客氣謙虛。

我們走進一個內室。他對我說，這就是我的房間。這與我剛才被拘留的十二呎平方大的赤裸

偵訊室，太不同了。這個房間有冷氣，中間有一個圓桌，周圍擺了五把有椅墊的椅子，在一角的牆邊擺了一個整齊的單人床，枕頭毯子也都已鋪好。魏參謀再一次道歉說房間的設備太簡單，要我委屈忍受一點。他並說他不是偵訊人，只是負責照顧我的生活起居，所以在這方面如有問題，隨時可以找他。他又說「這是政治問題，並不嚴重。你只要對於偵辦人員坦白說明一切，問題不難解決」。他離開以前又叮嚀一次「如有什麼個人的需要，向守衛要求找魏參謀好了」。

一個士兵進來，例行公式般地搜查我，帶走了靴帶、皮帶，及身上一切東西。這對一個人的自信和自尊，是一個極大的打擊。他必須拖着沒有鞋帶的皮靴走，又要提着沒有褲帶的褲子以免其滑落。他會感到孤零無助，無防無衛。

晚餐送進來，是標準的軍隊菜式。吃完後，我問正在門口探望的年輕人，「可不可以洗個澡？」。我在盛夏中已經兩天沒有洗澡，感到全身又黏又髒。他似乎被我問得有點驚愕，走出去，大概是去請示。一會兒後，他回來，很正式地告訴我「你可以洗澡」。他帶我到我房間斜對面的一個浴室，叫我不要把門完全關閉，要留個縫。在這小浴室有一個抽水馬桶，一個水槽和水龍頭。我迅速地洗了一個冷水澡。浴室有一個小小的窗子，三尺外便是高牆，牆外即是街道和自由世界，可以聽到附近電影街的熱鬧喧嚷。

不眠不休的審問

我回來房間不久，便走進五個男人，他們臉上都不帶表情，看不出有任何感情，一個較矮小的，在此後漫長的時間中，從頭到尾，未發一語。他們沒有自我介紹，也沒有表明身份。一個人領頭說「我們要你詳細說明一切。甚至毛澤東，一旦進來這裡，也必須全部招供。你沒有辦法隱埋任何事情」。

在這句話裡隱含着威脅，有必要時，他們有辦法逼我招供。就此，真正的審問開始了。

我無休無止地被審問七十二小時以上。同樣的問題再三重覆地提出來。當場並無做什麼紀錄。但是我立刻察覺到我們頭上甘蔗天花板裝有錄音機，將一問一答錄音下來，或者傳送到另一房間，由別人監聽。大約每二小時，便有另一批審問人進來替換，那個矮小沈默的則大多時間都在場。過了一段時間後，每隔幾小時便有一個自稱醫生的中年人進來，帶着醫具，測量我血壓，聽診我的心臟。他在檢查我的時間中，審問就暫停，等到他點頭示意而離開後，審問便再繼續。吃飯時間，休息約一小時。我吃的很少，想辦法利用這段時間睡覺，但五人審問小組總是又回來繼續審問。

在這無休止的審問過程中，漸漸有一個模式顯現出來。審問者似乎斷定我們準備宣言，只是一個大陰謀的一部份，後面有強力的後台在支持着，「誰在背後支持你們？」，「有多少人？」，「什麼外國組織？」，「這只是你們的初步行動，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你們有外國的經濟援助，美國政府在後面不是麼？」，「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在所有國家都有特別單位，推翻他

們所不喜歡的政府，如李承晚、吳廷琰等，現在輪到蔣介石？」。

我們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廿日被捕的，他們以為我們計劃在十月十日雙十節國民黨國慶日那天，陰謀推翻政府，或至少群眾示威，讓參加閱兵大典的外國人親眼目睹反政府的抗議行動。我們後來知道，安全單位預期這是一個大規模案件，會清理了好幾個監獄，準備逮捕幾百人。我們在宣言中曾宣稱我們有普遍的民衆支持，有一個龐大擴張中的秘密組織，在全島各地都有小組。現在却非常困難使偵查人員相信我們上面的話實在是誇口，只是要向國民黨做心理作戰而已。我們相信我們的想法和主張有很多支持者，但是我們並沒有什麼組織。宣言的目的就是要激發大家的關心和信心，藉以贏取全島的支持，來抵抗國民黨。現在治安人員真的相信我們的誇言，要我說出細節了。他們又認為宣言文章，寫得太好，一定有大陸籍的人參與其間，否則台灣人不可能寫出這樣的好文章。其結果，他們至少懷疑到二個人，一是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另一是作家李敖，他們兩位都是我的朋友。但這完全是冤枉。

現在我了解經過了二、三天不眠不休的審問之後，實在沒有什麼必要再求諸肉體的酷刑了。犯人已經心身疲乏不堪，只要施以最輕微的苦刑，他就會讓步，會承認任何事，簽名於任何文件。他會大叫「讓我休息，讓我睡覺。我會說任何你們要我說的話，會簽名或懺悔任何事。讓我安息，不要再管我！」。

偵查人員一再強調，許多人攻擊警備總部施用可怕的酷刑，以求犯人自白，而他們一再要我

注意，並承認我並沒有受到拷問。但這或許也是一種暗示，爲了得到全部自白，如果需要進一步用刑，他們並不遲疑。

他們不相信真如我們所說的這只是我們三人的單獨行動，並無其他人牽連在內。

經過三天極緊迫的審問之後，步調稍微緩慢下來，審問的間隔時間，拉長起來。直到最後，有一個高級將官出現，他穿着白色便衣，冷酷強硬的樣子，其他的人都對他非常敬重。他表示他不相信我們所說的我們背後並無更大的陰謀、我們只是要分發宣言並無準備立即的集體叛變。他聽了一些偵查人員與我的一問一答之後，又說「你還在掩藏了些事情，這不是像你所說的那麼簡單」。他在離開房間以前，用一種輕蔑的口氣說「你瞧，政治是世界上最骯髒的事情！」

獄卒的話

大約一星期後，審問終止了，生活變成極端無聊，沒有報紙、沒有書籍、沒有紙筆。只有偶爾年老的大陸籍衛兵進來房間聊天，談他們在大陸的家園，才打破這種單調的生活。有一個高高瘦瘦的衛兵特別愛講話，他告訴我他怎麼樣於一九四九年被帶到台灣，與他的其他同僚一樣，都相信不久就會再回去大陸。那時他已經結婚，並有一個女兒。有一天，他在街上被拉伕強迫充軍，帶離家鄉，翻過一省又一省，最後被運送到台灣。他說「假如我知道會永遠留在這裡，我早就逃掉了」。他在台灣已經十數年，他的兒女現在已經成年，大概已經結婚了。然他大概此世不可

能再見到她了。他說這類的事情，他已不堪再去想了。只有在中秋節晚上，與其他年老的戰友們，帶一瓶老酒，到山上坐在一起，一邊懷鄉感嘆，一邊流淚。

他來找我聊天幾次，其後忽然不見了。我猜想他的大膽怨言可能被錄音了。其他還有幾個衛兵偶爾也進來與我聊天，有的還帶牙籤、泡菜等來給我。還有一位甚至帶着他自己的晚飯，到我房間的桌上，與我一起進餐。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人，總是談談他們的過去，懷鄉念舊，埋怨微薄的薪給。有一個使我覺得很有趣，他感慨地說「其實，你真的不像一個壞蛋」。有一天，有個穿着廚子白色圍巾的人，親自給我送來晚飯，當他把飯盤放在我面前時，小心地低聲道「我曉得你是誰。我有一個姪子是你的學生，不要告訴別人」。

我收到家人送來的一包襯衫和內衣褲。但是沒有片言隻字。魏參謀給我安排偶爾洗一次熱水澡。在肉體上，我已沒有什麼不舒服。當我被捕時，我的口袋裡有些錢，他們將其保管起來。現在，我可以用那些錢去支付送去外面洗衣的費用。

疲勞訊問終止以後，除了極度無聊之外，沒有什麼可以抱怨的。經我一再要求之後，魏參謀帶來紙筆，使我能寫下台大法律系學生補考的試題。他答應將其送到台大法學院，但我後來發現他們並沒有那樣做。

密告者獲巨額獎金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因為我們的被捕而在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凡對我們的逮捕有幫助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報酬。通報的旅館女服務生、盜印報警而拒絕印刷我們宣言的萬華印刷廠老板等，都獲得巨額賞金。替我們印刷宣言的赤峯街印刷廠老板，事後也立刻向警察局報告我們的行踪。據說，他拿到賞金之後，變得很害怕「共匪」的報復，在床頭上裝了一部電話，以備於緊急時可以打電話到警察局求援。曾處理我們案件的治安人員却獲得晉升。率領逮捕小組的警官晉升兩級，昇任為分局局長，魏參謀也得到晉級和一枚獎章。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得到嘉獎。

蔣介石震怒

我被捕以後，蔣介石並未立即得到消息，結果，給台大錢校長一個異常尷尬的場面。每年九月下旬的教師節，蔣介石照例要選邀一些教授學者，與他一起吃晚飯。我秘密被捕之後幾天，一封邀請參加那宴會的正式請帖送達我家。當我未能在宴會中出現時，蔣介石便問台大錢校長「彭明敏在那裡？」。錢雖然已知我被逮捕，却不敢做將此消息首先告訴蔣的人，所以極尷尬的支吾其辭；好不容易編出我缺席的理由。其後，當蔣介石獲悉我被捕和其原因時，極為震怒。

謝聰敏和魏廷朝分別拘押在與我同一營區的地下室，而與我一樣的被審問。他們未曾受到有計劃的酷刑，但有時被掌摑或扼住脖子，要強迫他們說出事實上不存在的大陰謀。偵查人員對我

們每個人都說，其他二人已經全部招供，所以每個人都要全部說出，口供細節一定要吻合，否則會受到嚴罰。顯然，謝和魏所待遇遠不如我。

我得悉每次審問時都在場而不發一言的那個矮小便衣人員是警備總部政治作戰部的特別代表，姓王，是在場監視這個案件處理的情況。他以後告訴我，他的太太曾經是我的學生。他從頭到尾與這個案件有關。

政府被迫發佈消息

因為我於星期日下午與謝聰敏離開家裡以後，一直沒有回來，而到了午夜，治安人員洶湧而至，在我家裡大肆搜查，我的家人知道我被捕了。雖然治安當局保持沈默，消息還是洩露出來，謠言立刻傳遍全城。紐約時報一位通訊員到警備總部查詢此事，但是所得答覆是「我們並沒有拘留這樣的人」。

顯然，我失踪了。大學新學期已經開始，但我未來授課。我還預定要到韓國參加漢城大學的一個會議，也應到泰國曼谷參加由一個宗教服務團體（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主辦的國際會議。警備總部繼續否認我的下落。紐約時報通信員經一再詢問而仍不得要領後，終於告訴警備總部說，他有確切證據彭明敏等人被逮捕，如果警備總部不宣佈此項消息，美國報紙將予以揭發。這才迫使他們，於我們被捕一個月又零四天之後，發佈一項簡短的正

式聲明，說我們三人因「從事破壞活動」而被捕。

台北的英文報紙，經過警備總部事先檢閱以後，被允許發佈我們被捕的消息。十月廿四日的英文中國郵報埋在第六頁，有一則新聞，標題爲「一教授和兩名學生，因叛亂罪被捕」，我被形容爲「傑出青年，四十一歲」，文章內容只是說「台灣警備總部在昨晚發佈的簡短消息中說，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於上月在台北從事破壞行動時，當場被捕；此地，如今在備戰狀態之下，涉及叛亂顛覆罪名者，一律依軍法審判」。

封鎖消息和醜化運動

全島所有中文報紙都將警備總部所供給的消息照登不誤，既無引伸，也不評論。

所有我們的朋友們聽到此消息無不震驚，幾乎不敢置信。有些朋友，在私下責怪我們過份天真，竟想企圖印發批評政府的文件。事後回想起來，我們想要做的，如果與任何極權國家的反政府活動、美國民權運動者或反戰份子所做的比較起來，並不更爲激烈或狂熱。那些活動包括示威、阻撓別人上工、破壞徵兵文件，甚至綁架政府官員。我們唯一的錯誤是我們沒有成功。如果我們成功，相信不會有人批評我們過份天真。我後來逃出台灣的企圖也是一樣。如果我失敗了，一定會有許多人批評我天真和魯莽。

國民黨各單位立即展開運動，盡力誣蔑我們所做所爲，歪曲我們在宣言中所說的一切。國民

黨典型的手段弄出來了。我們被醜化為「可惡的罪犯、背叛國家」。我們行動的真正本意和我們宣言的實質內容、我們所提出的改革主張完全被遮掩起來。不但如此，國民黨將我們宣言的內容全部黑白顛倒，開始作極惡毒的宣傳。比如，我們宣言裡明白地主張台灣人與大陸人應該互相合作，實現民主，發展台灣。國民黨却廣為宣傳我們主張殺死所有大陸人，或把他們丟到海中，或將他們做為醫學實驗的材料。宣言各點都被扭曲、被誣解。國民黨並偽造證據，在各級黨務會議中提出來宣傳和討論，藉以鼓吹對我們的反感和憎惡。

造謠是國民黨無二法寶，他們利用軍隊、學校、各機關的黨務組織以及其他每一個可能的孔道裡，歪曲誣捏。他們召集無數的「彭明敏案檢討會」，佯稱要說明此案真相，實則在會中顛倒是非，極盡誹謗和中傷之能事，如此，盡量在台灣青年學生眼中貶低我們的形象，同時用來嚇唬大陸籍人士：「這個政府也許不完美，但是如果讓台灣人接管，我們都會被殺光了」。這是要聯合漸趨衰弱的大陸人士，以對抗台灣人日漸增強的正當要求。隱藏在這些醜化運動的背後，實有國民黨的真正恐懼，認為如果多數大陸人與大多數的台灣人合作的話，國民黨必然瓦解，政府必然垮台。

說起來實在難以相信，然而又是千真萬確的，不少大學同事竟然相信這些惡毒宣傳，他們非常驚訝並憤慨，彭某原來就是這樣邪惡的傢伙。有的則半信半疑地說「這有可能嗎？」。台灣籍學生們對我們的被捕和其後對我們的猛烈誣蔑，深感震驚。後來有人告訴我，在許多場合，我們

變成「殉道英雄」。可見，國民黨的怪誕宣言，未必能夠達到全部目的。

「宣言」流傳到海外

在我們被逮捕的時候，或在其後的調查期間，顯然一部份宣言落到私人手裡。在後來正式起訴書裡提到的，只有九千八百多份的宣言，而事實上我們確確實實印了一萬份。這表示着在處理我們的密件的過程中，有人取去了不少份。

有一份傳單流入某民意代表手裡，他把一份複本送給一位日本在台北大使館的外交官。這份複本又送到東京，據說就保存在日本外務省的保險櫃裡。以後，我被釋放時，日本外務省官員即將宣言出示給在東京的朋友們，於此，宣言全文便在日本印行出來。我們的宣言，本來還沒有印上標題和標幟，我們曾在宣言前面留了一片空白，等待以後才印上標題和標幟。可是，在東京印發的宣言，雖然內容完全精確，却加上一個標題：「台灣獨立宣言」，亦加上一個標幟。

我們原來想把宣言稱爲「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將台灣的內外問題做一個總結，藉此表達我們的觀點。警備總部猜疑我們會將宣言偷運海外，因爲不久在香港也有這份宣言流傳。可是，這並不是我們的功勞。

國民黨於十月廿四日簡單發佈新聞後，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審判前，並沒有公開正式提到我們的案件。儘管如此，它對於外國的反應，極爲敏感。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曾投書紐約時報，表示關切。有人連絡英國倫敦國際特赦組織，使它開始調查我們的案件。哈佛大學的季辛吉教授也向在美的國民黨大使館探詢。我在加拿大的母校，麥基爾大學法學院院長和同學們也向渥太華的國民黨大使館接觸。在加拿大的台灣留學生曾在大使館前，示威抗議。其時，國民黨司法部次長查良鑑碰巧出差到加拿大，碰到加拿大各界爲我們案件的抗議，大費周章，強辯解釋，回台以後曾對人搖頭告白「幸好，我懂得英文，並有些法律知識，假如換到別人，恐怕不知怎麼樣應付了」。加拿大國際法協會也寫信給渥太華的國民黨大使館和台北的「中國國際法協會」，表示關切。我在法國的母校，巴黎大學法學院教授們也向駐法國的國民黨大使館抗議。在海外的台灣人刊物報導了許多有關我們的文章，並提出強烈抗議。在紐約的蔣廷黻也打電報給台北當局，警告他們，這個案件必須極謹慎處理。這些海外的反應——震盪和呼籲——都給國民黨深刻印象，十分瞭解國際間對此案件，非常重視。從海外看，這個案件已成爲自稱「自由中國」的一個試金石。駐台北的美國大使館則保持慎重沈默。

謝聰敏的弟弟及其他

謝聰敏有一個弟弟，於我們被捕時，正是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撰寫並油印一份簡短的抗議聲明，分發出去。不久，他又再度利用油印，準備一份嚴厲批評國民黨的文件，拿去分發。有兩位大陸籍同學參予此事。他們三人，終於被捕、被刑求。謝弟精神徹底崩壞，而發狂

了。他半夜裡尖叫、有時陷入暴亂狀態，把所有能拿到的東西，到處亂丟，最後被送到台大醫院精神科住院。有一次，他躲過守衛耳目，走出醫院一天未歸，弄得治安人員大起恐慌，在全島各地到處尋找，但是後來他又自動回去醫院，他被關在醫院病房一段時間以後，又被押回監獄。後來經過軍事審判，判了三年半徒刑。他的一位大陸籍朋友被判四年，其他一人大概是被送到管訓。

國民黨的「思想改造營」中，最可怕的是「綠島獄營」。那是台東東邊海上的一個小小的多岩礁島。在那裡大部份的政治犯所服的刑期大多是十五年或無期，幾乎都被外界遺忘。按照國民黨的制度，如果有人被捕後發現是無辜的，他還是要找一個保證人才能釋放。同樣，一個人被判刑而服完刑期，必須找一個保證人出來，否則不能出獄。這對犯人來說，非常困難。誰敢去擔保一個被判重刑而已經有十數年沒有見過面的人？所以，在綠島有不少已服刑期滿，但因找不到保證人而仍被羈留的人。尤其戰後來台的大陸人，很多在台灣無親無戚，既無人為他們奔走，更無人願做擔保。

在我們的宣言和謝弟的事件以後，國民黨向所有的學校、機關、工廠、軍隊等單位發出命令，凡擁有油印機者，必須注意，尤其在夜間無人看守時，必須鎖起來，以免被「非法」使用。治安機關再進一步命令，電話簿只許印姓名和電話號碼，不許印出地址。這是一種「安全措施」，以免「顛覆份子」，將「非法文件」，寄發各方。所以，甚至一向馴服的輿論也提出抗議，不久

這個命令取消了。

一位青年理想主義者吳俊輝

日子過得非常無聊。再一個月過去，晚秋的時候了。有一個士兵忽然出現，說「要搬地方了」，立刻將我帶上一部軍車裡。這次我的右手銬鍊在車，二個武裝守衛坐在旁邊。車子穿過市區，經過和平東路、溫州街我家的巷口，經過郊區到達三張犁一個軍營。它在一個小丘，稻田圍繞着，並有圍牆。我被帶到一排低矮木造營房中的一小房間。裡面放一個木桌子，兩張行軍床擺在兩旁，也可權充椅子。壁上貼着印好的規則「肅靜」，另有一奇異的規定說「不可同坐在一張床上」。

我進去不久，一個年輕的陌生人，剛洗澡回來。我們自己介紹。他是東海大學化學系的學生，名叫吳俊輝，台中市人。他被捕已經二年，同時被捕的近二百名，是個「大陰謀」案件，所牽連到的幾乎包括每所大專及一、二所軍事學校的學生。成百的人被訊問，有的已被槍斃了。吳曾聽過我的名字，但看到我也被捕而與他共命運，非常震驚和興奮。在過去二年中，他被用刑，從一個單位轉到另一個單位，轉來轉去，既未送去裁判，也未受判決。他是被遺忘的政治犯之一。

這個營地的氣氛，是極端的可怕、陰森，和絕望。在這裡走動的守衛和士兵，似乎特別挑選的，都極嚴峻而殘酷。有一個隧道通向山腹，深入的內部便是有名的刑求處。管理我們的守衛非

常粗魯，對待犯人有如對待動物。配給我們的食物也異常的壞。我們的房門總是鎖着，如要上廁所，必須大叫守衛來護送往回，而他們一直站在我們身邊。有時候，在晚上，簡直無法叫醒他們來執行這項職務。

吳俊輝是我所遇過的青年中，最富有理想的。我們談論一切，我們的家庭、社會、歷史、和台灣的將來。他在研究一種新的羅馬拼音，可將台灣話，以現用的打字機和印刷機，表現出來，這樣可以與傳統的中文書寫，切斷關係。他對蔣家的憎惡極不尋常。他認為自己可能被槍斃。但是如果不被槍斃，活下去的快事，是要親眼看看國民黨和其政府的垮台。

偶爾，我們並肩同坐在一張床上，或試圖以耳語方試交談，但是守衛就立刻跑進來，咒罵我們，不准我們那樣做。這使我們開始懷疑這間牢房設有盜聽或錄音裝置。顯然，他們把我們二人關在一起，看看我們會不會在私談當中透露些他們要知道的秘密消息。在這期間，沒有人偵訊我們。

我們開始失去時間的觀念。吳告訴我一個辦法，將日子刻在我們被准購買的肥皂上。我們必須自己洗衣服，吳却堅持要替我洗。有一次我收到家裡送來的一包東西，裡面有襯衫、一些食物和一本聖經。但是一些食物已經腐爛，水果也乾壞不能吃了。因為全天沒有什麼事可以做，我將聖經從頭到尾，讀了一次。這是我一生的第一次。

我們變得絕望、悲愁、和生氣。我發現謝聰敏和魏廷朝也關在同一軍營。有一天，我高聲歌

唱聖詩，忽然聽到從遠處傳來回音，所以，我便以日語高叫「加油」。結果造成一陣騷動，四、五個獄卒衝進囚房，後面跟着盛怒的獄長。他們咒罵我，我回答說「貼在壁上的獄中規定並不禁止唱歌呀」。他反駁說「它明白規定不可喧囂。你是想與別人通話的」。

押回西門

我與吳俊輝關在一起，沒有偵訊，經過兩星期。有一天忽然衛兵進來說，我又要搬家了。那是在我被捕期間，最痛苦，最不安的兩星期，但是要與吳離別却非常難過。我們雖然很誠懇地互相勉勵，互請「保重」、互道「再見」，心裡知道我們或許不再有機會相見了，這是很感慨悲傷的離別。

我被押上吉普車，手銬鍊在車上，衛兵坐在旁邊，開進市區，又經過我家附近，看到鄰居面熟的人們在馬路上走動，心裡想他們不知有沒有看到我。原來我要回去警備總部西門，我原先住過的那相當舒服又有冷氣的囚房。到達了不久，有餐飯送來，却沒有人來看我。

次日早上，檢察官進來。他把厚厚的一堆資料放在桌上，開始問問題了。面前那些資料就是前二個星期我與吳俊輝同住時，我與他二人對話的紀錄。這證實了在那囚房裡裝有錄音機，我們二人無所不談的對話全部紀錄下來。他們從我們的對話中，指出一些片段，要我更詳細說明，譬如我們提到一些人名，他們就要較詳細知道這些人的言論立場，或我們引述一些人的意見，他們

便要進一步知道這些意見的內容。爲了不連累別人，我得花了不少功夫，裝傻充楞，閃避回答。這次審問之後，我又待下了很久。連日的無聊，簡直令人無法忍受。既無書報可看，也無筆紙可寫，早晨一醒，即開始煩惱這漫長日子，怎麼度法。有時候，有人會進來問我一些特定人物，有些我認識，有的我沒有聽過。有一次他們要我批評台北市長高玉樹，另一次則要我說明與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的關係。如果他們要我寫東西，所用紙張都要前後小心清點，所用鉛筆和未用紙張都在檢點以後，立刻收走。

如今已經十一月底了。在這段長時間裡，我可以從房間的窗戶看到警備總部辦公大樓前庭。我時常看到台大的一個職員姓孔的進進出出。我們都知道他是國民黨派駐台大的「安全人員」，負責供給大學教職員和學生的「安全資料」。

從那時起，我的家人可以偶而送來一些水果和其他食品。除此以外，我與外界完全隔絕了。守衛也不再進來與我聊天了。那是還算舒適的隔離監禁，不過，不論如何，還是隔離監禁。因入獄以後，未曾理髮，我已披頭散髮，滿面于思了。

寧俊興將軍

有一天，魏參謀出現，說「你今天要去拜見一位重要人物，必須要理髮」。不久便有一位理髮小姐進來，爲我理髮修鬍子，我的皮帶和鞋帶也還給我。天暗後，魏參謀穿着整齊地來了。一

部黑色轎車在外面等着，他帶我上車，這一次我的手沒有上銹，也沒有警衛跟着。我心裡非常好奇，猜疑着到底是什麼場合呢？

當我們到離「總統府」不遠的一個辦公大樓時，魏參謀緊張地，又帶很重要的口氣說「你是要見警備總部政治作戰部主任寧將軍」。

寧將軍是一位非常客氣有禮的人。他開始便說「我們很難過發生這樣的事件。這真是不幸。他們有沒有虐待你？請讓我知道。我也是大學畢業的。我原來是學農學的。你的學問比我好得多我不能與你辯。我們只是在職務上，不得不處理這件事」。

後來，我才知道寧將軍剛剛昇任這個職位，便接到我們這個案件，恰好給他一個好機會，藉以表現他的辦事才能。他似乎比較單純而誠懇，作為一個高級軍官，他實在很努力，比一般軍人好得多。早先參加多次偵訊，而不發一言的王軍官便是他的心腹，幾乎等於他的私人祕書。

我與寧將軍見面約三十分鐘，他客氣得對我幾乎有如貴賓。他說他要安排我與一些重要人物見面，由他們來給我講解台灣的形勢。我得到一個印象，到目前為止，他們不打算嚴罰我，而是要給我再教育，看看能否利用我。魏參謀一直在外面走廊上等待。寧將軍以父兄的口氣說「不要絕望。你有過很傑出的經歷。大家都很看重你。這種事情發生，非常可惜」。

當他結束這次會面，而叫魏從走廊進來時，他又再度提到希望我與一些重要人物見面。結尾時，他放低聲音，像要道歉似地問「我把你們那份宣言給他們看，你不介意吧？」。他這麼細心

關切的態度，使我感覺很意外，也給我很好的印象。

在我們車子開回去營地的路上，魏參謀顯得緊張，一再問我「他說了些什麼？」。寧將軍是警備總部政工部主管，那是最令人畏懼的單位。我被那個單位請去談話，辦理我們案件的人員當然很怕我攻擊他們處理不當。

幾天之後，又接到通知，寧將軍要親自到營區來看我。整個營地緊張起來。理髮小姐又來給我修一次鬍子。囚房也清理得很乾淨。獄官們都穿起制服來。寧將軍和其助手們這次的訪問是很拘謹而正式的。他問我是不是一切都可以，還要知道我吃的東西是什麼樣的。一位獄官立刻插嘴說，我吃的是最好的，與軍官伙食團吃的東西一樣。十五分鐘後，訪問結束，寧將軍臨去時說「政府有天還需要你的」。

「再教育」、薩孟武沉默不語

幾天之後，又接到通知，要我準備再去一些重要人物。翌朝，我被帶到一個軍中會議室。有十名左右的人，圍坐在一會議桌旁。由安排這次聚會的寧將軍，主持會議。台大法學院薩孟武院長和國防部的一個代表在座。其他，有數名軍校教授。還有國防部政戰部主任王昇，一般認為他是蔣經國得力助手，他任政工幹校校長時，曾請我去講課。另有何浩若也在場。他曾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讀經濟，當過高官，在聯合國代表團服務過。但是國民黨流亡到台灣時，他相信一切

都完了，所以向蔣廷黻大使建議將代表團存放在紐約銀行的存款大家分贖算了。蔣廷黻憤怒地將此事報告蔣介石，因此，其後有一段時間，他不准來台灣。後來，前教育部長張其昀爲他說項，才能夠來台，但仍無法得到重要職位，祇能做些曖昧不明的工作。因爲他寫了幾篇漫罵台灣獨立的文章，竟被視爲「台獨專家」，如今，我們的事件發生，他便乘機要成爲「彭明敏案件」的權威了。

參予會議的人士，一一發表意見。我可以察覺我們的宣言擊中國民黨的要害，因爲他們的言論都爲政府辯解。我們在宣言中攻擊軍隊的無能，他們或許是首先聽到這麼直率的批評。寧將軍顯然想要利用他的新職位，表現新的作風。他和王昇都說他們在年輕時也是革命份子，曾下決心改革曾使中國如此衰弱的官僚政客。他們講話似乎是誠懇的。王昇還感慨地說，「你不知道我們也多麼討厭那些立法委員」。談到我個人，他繼續說「我們都認爲你是一位傑出學者。我任政工幹校校長時，曾聘你去教書，就在你被捕前幾天，政工幹校還正式通過聘請你擔任政治系主任。當我聽到你被捕時，我實在非常尷尬，連臉都紅了，我正在軍事機構中盡力提昇你呢！」

代表國防部的年輕將軍，很正式而緊張，他開頭說「我今天很榮幸到這裡來報告軍事形勢」，而似乎忘了他只是被叫來「再教育」一名政治犯人而已。他強調軍方忙於準備反攻大陸，而且成功的希望愈來愈大。

有一個人提到政府歧視台灣人的問題。他直率說「政府裡較少台灣人，這是真的。難道你不

知道職位有限，甚至我們（大陸流亡來台者）自己都要彼此競爭，那裡有足夠的職位給台灣人？外省人如被台灣人取代，我們要怎樣處置他們呢？」。他這麼坦白，反而使人覺得可愛。

在整個這「再教育」會議中，薩孟武院長，始終保持沈默，一言不發，不斷抽那枝永不離口的烟斗。使他陷入這種窘境，我覺得很難過和歉疚。

何浩若却經常不請而自做評語。有一次他以英文旁白，說「你要知道，蔣介石是不可或缺的邪惡（Necessary evil）。我們如要生存下去，就不能缺少他」。

召集這些比較「開明」人士的目的，是要給我再思考和反省。兩小時後，會議結束，我被送回囚房。

謝聰敏和魏廷朝也被送到軍中會議室參加同樣的「再教育」會議。據說，魏廷朝衝口而說「槍斃我吧！但是你們在場的，也都值得槍斃！」。其時，王昇便作勢要脫下外套說，「來吧！我跟你拼！」

再過幾天，我再接到通知，要準備好晚上外出。八點左右，魏參謀仍以黑色轎車，護送我到市中心新設立的「國軍歷史博物館」。這個博物館的目的是要誇示國民黨軍隊的光榮成就。館長是一個將官。我到達時，看到全館燈火通明，館長親自在門口迎接我們，然後極客氣地帶領我們參觀全館。我們參觀了檔案文件、地圖、圖片，和一些據說屬於孫中山的物件。我們還得聽教條式的講說，費時一小時半，館長對待我一如貴賓，而不是被迫接受「再教育」的囚犯。他們相信

我對中國過去五十年的史實完全無知，才會做出這種「反政府」行爲。我們一樓接一樓、一個展覽接一個展覽地巡看，館長偶爾會插入些英文在說明中，想要加深我的印象。最後我們總算被送到門口，館長則以極客氣的口氣說「什麼時候，你想要再來看，請隨時通知我」。

再下一步的「再教育」，是兩個國防部政戰部的高級文官來看我。一個年紀大的，自稱從前在中國大陸教過國際法。他告訴我，他們奉命來向我解說，政府爲了準備反攻大陸所面臨的困難是多麼鉅大。我只有靜聽他們所說的，而覺得我們是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裡。

其後，我每日所受的待遇似乎有改進。魏參謀偶爾進來與我聊天，有時候在晚餐之後還帶來些餅乾糖果。他說「我相信你不久會釋放，因爲政府需要你。我們也向上面這樣建議。可是，當然你了解，最後決定還是上面做的」。

案懸未決

檢察官或偵訊人在晚餐之後偶爾會來找我聊天。在談話中他們坦白表示他們對台灣人的想法知道很清楚。他們爲政府辯解，並爲低階級的官兵吐苦水。他們說「在中秋節我們所得到的賞金是一塊月餅」。當他們拐彎抹角地提到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和陳儀的倒行逆施時，他們承認台灣人的抱怨是有理由的。他們並未對我說那個事件是「共產黨的陰謀」。他們以委屈的口氣描述一般士兵是多麼的貧困，尤其日本剛投降的時候：「我們做勝利遊行時，必須輪流穿褲子，因

爲有些士兵連一條像樣的褲子都沒有」。

後來我得知，在這段時間，爲了我們的案件所組成的一特別委員會，正在討論如何處理這個事件。這個委員會，包括警備總部司令，國民黨祕書長、總統府祕書長、蔣介石的顧問陶希聖（中央日報社長），行政院院長等。

那特別委員會所受的壓力很大。他們都知道我在學生和青年間很受歡迎，且有影響力。他們想利用我來避免激烈的反政府行動，也不願把我塑造成一個比現在更受尊敬的殉道英雄。他們似乎無法了解像我這樣有良好地位，又常受優惠的人，爲什麼竟然變得這麼不滿現狀。在他們的世界裡，一切關係基於個人的忠誠或仇恨，並無餘地允許個人奉獻於抽象的理想，如民主或人權。他們也非常關切國際的，尤其美國的輿論。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支持使他們能夠維持權力，而海外的台灣人則在努力要就國民黨獨裁的不公正，喚起世界的注意。

在國民黨的眼中，所有對政府或蔣介石的批評都被視爲對蔣個人的冒犯。任何政治案件都必須向他報告，必須由他裁決。他是國家的家長，全權的家長，家裡每個成員的生死大權操在他手裡，他也許會選擇寬大原諒，或許會選擇嚴格懲罰。他可以推翻或修改法庭判決。他最親近的顧問都知道，爲政治案件而與他衝突是很危險的。國民黨上上下下，對於政治批評都反映着上述心態。他們都很驚訝我在享受那麼多個人的榮譽和恩惠之後，竟然膽敢批評政府和蔣介石。他們無法接受我的說明：我只是要批評、暴露、改革政府的不當。

十二月中，一個穿着粗陋西裝的瘦小男人進來，他看起來像一名微不足道的書記。他沒有說明自己身份，打開他的小提箱，拿出一疊空白十行紙，開始正式再度問我那些我已被問過好幾次的例行問題：「你的姓名？」「你的生年月日？」「你的職業？」等等。我感覺得很奇怪，有如再重做一次惡夢一般。這次審問繼續到次日，最後結束時，他要我在紀錄上簽名，做為正式的供詞。其後十天左右，我完全孤獨留在囚房裡。後來得知，所有的正式手續都已完畢，所有的偵察人員，特別委員會和顧問們如今都在等候最高當局的裁定。

被送審判

此時，我心裡相信，我即將被釋放。因此，有天早晨，魏參謀進來告訴我，已接到命令，要立刻將我移送監獄，接受軍事審判時，我極為震驚。他似乎也茫然不知所措，只是一再安慰我，「這是必須經過的程序，僅是一種手續」，似乎在暗示我最後還是會被釋放。

我收拾了東西，又再度簽了保持沈默的誓約書後，便從有冷氣的營房，被送到離台大法学院不遠的軍事法庭拘留所。

第十章 軍事監獄和審判

報到

我到了這處拘留所，意外地，接我的竟是大約十天前再問了我許多反覆過的問題，記下我的回答、要我簽名紀錄的那個衣服粗陋的瘦小書記。原來他就是我的檢察官。現在他已準備好一份打好的正式紀錄，與我一起花了二、三小時，小心一一核對我們問答的內容。最後，我又得在上面簽名。

女囚的聖誕歌

天暗下來，晚飯時間到了，我才被帶到監獄囚房第二號室。房裏有兩張床，一個水龍頭和馬桶，但是沒有桌椅。我發現一個大陸籍的軍官已關在裡面，他犯了貪污罪，正等待審判。我警覺到隔壁的囚房關了幾名女囚犯。

晚餐送進來，因為沒有桌椅，只有把餐盤放在床上，蹲下來吃。這晚我沒有食慾了。

我的床旁，有一個窗戶，但不准我們關上。那時是十二月了，所以感覺相當寒冷。當我們用飯的時候，監獄長，姓張的，出現在鐵欄杆窗戶之外。他是陸軍少校，肥胖，面相狡詐，而又多嘴。

那天正是十二月廿四日，聖誕夜。晚飯之後，隔壁的女囚們開始唱起聖誕頌歌，聲調那麼哀怨，簡直使我難過得無法忍受。想到虔誠的母親和基督信徒的親屬，也回想幸福的幼年，感傷得幾乎流下淚來。

等待審判

其後六星期，我等着正式的起訴。依照監獄規則，未正式起訴以前，不准寫信或收受信件，不許接見家人，也不得聘請律師。我唯一能做的，便是觀察周圍監獄生活的景象了，如今，我能從新的層面去了解許多監獄的特性。這些監獄的恐怖使得台灣人屈服。「民主」或「人權」，對一般人來說，不過是抽象的概念，而監獄的嚴厲則是具體而切身的。

我被關的房間，原來是作爲病房的。聽說雷震和蘇東啓也曾關在此房。犯人必須自己購買所需日用品，如牙刷、肥皂、筷子、洗臉盆、衛生紙、飯碗等，也可以買到筆紙。從我們的房間，可以看到監獄操場。每房的犯人被允許輪流在操場放封十分鐘，一星期四次。但是當其他犯人被允許在那裡放封時，所有面向操場的窗戶都要關閉，以免犯人暗通信息。

我們囚房的對面，隔着操場，是圍有鐵柵，像動物籠子的較大囚房。每一個大囚房關着一、二十名犯人，他們睡在地板上，常受突擊檢查。這個看守所，本來只是關閉着審判前的犯人而已，但是現在却混雜各種不同的犯人，有些在服十年以上的徒刑，有的在服無期徒刑，還有些是等着死刑的執行。那裡沒有餐廳，所以所有犯人都要在戶外圍着大飯菜盤子，蹲着吃飯。下雨的時候，他們就要擠向走廊旁邊。這些人大多從事勞役。有的在廚房工作，並要送飯給其他犯人，有的是在洗衣工廠工作。監獄與政府機關、軍隊等訂有合同，以廉價洗燙制服、床單等。監獄也有製衣廠，利用犯人，縫製各種制服。另外還有一個建築小隊，常由守衛帶領和看管，到外面做些公共或私人的建築工作。這些廉價勞役可以賺得龐大利潤，由監獄軍官和職員分贓。

後來，我在被釋放後，認識了一名曾任大學講師的大陸人，他曾被指控爲共產黨而被捕，在各地不同的監獄裡輾轉關了十三年。據他描述，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〇年間，這些監獄的情況，簡直令人無法想像。那時，蔣經國正在島上施行大整肅，以便確保他的父親能夠安全撤退到台灣。據他說，當時監房擠滿了犯人，所以無法同時躺下，而必須輪流睡覺。當時，政治犯很少受到

正式審判，大多以點名方式宣讀刑罰，十年、十五年、無期、死刑等，而且也無法上訴。

最使人寒慄的，便是目睹被判死刑的犯人。依中國傳統，犯人一被判死刑，即在法庭就將腳鐐焊接在犯人腳踝上，一直到執行死刑之前才除去。我們常看到被判死刑的犯人在監獄操場走動，那在窗外郎鏽響的腳鐐聲音，實在令人心痛。有時，犯人戴着腳鐐二、三年，等待上訴的結果。一被判死刑，上訴是自動的。如果上訴被駁回，在黎明前，獄卒便來打開囚房的門，那利那，犯人知道自己的命運了。死刑即刻執行。所有的犯人都明白如果早晨四點之前監獄辦公室的燈光亮起來，便表示有人即將被帶去槍決。接着是獄卒用鐵槌打開犯人腳鐐的可怖敲擊聲音，還有時會繼續一、二十分鐘，整個監獄都會醒起來，而那敲擊聲音會刺痛每個人的心房。我看過好幾個人被帶走。有一次，一位高大的大陸人被帶出去。他要唱歌，並高呼「毛澤東萬歲」，但立刻嘴裡被塞入毛巾，被毆打，猶如綁去屠宰的大豬一樣，尖叫地被拖走。每次有了犯人被槍斃，監獄裡所有犯人都變得非常淒涼，空氣裡瀰滿着無限的悲痛。

全台灣都知道廖文毅的嫂嫂的故事。她關在我們隔壁囚房，年已過七十，又有高血壓。她的兒子則被判死刑，帶上腳鐐，一週四次在監獄操場來回走動，他母親從窗戶可以看到。直到廖文毅決定放棄台灣獨立運動，從東京回到台灣，他的嫂嫂母子才被釋放。

元月過去了，一九六五年二月農曆新年的時候，謝、魏和我都收到一份寧將軍送來的禮品，肉乾、皮蛋等。寧將軍仍在努力，要使我們改變想法。二月，我們正式被起訴了。我們收到起訴

書，被控「以不法手段圖謀推翻政府」。

與家人會面

正式被起訴以後，監獄生活改變了。現在可以與家人通信，每星期可以寄收家信一次，每信不得超過二百字。在兩百字內實在不能寫些什麼，但是反正也沒有多少准許我們寫的。現在家人於每星期四可以來看我，每次見面十分鐘，我們已經有四個多月沒有與家人連絡了。

在我家人要來看我的前夜，監獄長顯得很緊張。他說，在犯人被捕後初次與家人見面時，常發生很尷尬的場面。有時，犯人已有二、三年沒見到家人，所以有的婦女會大哭大叫。他要求我儘量控制情緒。我感覺到他是害怕我們可能會對我們的處境，表示不滿。

當家人來時，他們先在外面辦公室登記，通知單送進來後，一名守衛就護送我到一間小會客室，它的一邊以厚厚的玻璃板隔開。我可以看到我母親和妻子，但是不能接觸。我只能用傳話筒互相對談。有一個紀錄員在旁邊記下我們的對話。我知道，像我這樣的犯人，一定也有錄音。在玻璃板下的長櫃子邊，不僅只有我們，還有其他犯人在接見家人。

我們受嚴禁討論自己的案件，所以只有談論健康、孩子等小話題。我的母親，那時已近七十歲，一再吩咐我要讀聖經和祈禱。

聘請律師

在這第一次見面時，我母親提出僱請律師的問題。因為我已經簽了自白書，國民黨也已經把我起訴了，我告訴她要自己來辯護，沒有必要再花錢去請律師。但她很憂慮，覺得聘請一名律師有些方便；她只有這樣暗示，未明白說明。幾個星期之後，我終於同意，由她們去決定要聘請誰。

我已經開始準備答辯書。針對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合法性，提出異議，是沒有用的，所以我決定以「言論自由」作為辯論基礎，指出我們並未使用暴力。

我的家人決定請梁肅戎當我的律師。他是國民黨黨員，屬於所謂「開明派」，東北人，於一九四七年在大陸被選為立法委員，與我差不多同齡，曾在日本留學，雄心勃勃，與國民黨內要員私交不錯。我的家人並沒有什麼幻想，因為梁曾經也是「自由中國」雜誌社雷震的律師，而雷震終被判徒刑十年，那時還在服刑中。雷震被捕的真正原因是他企圖與台灣人合作組織反對黨。

梁肅戎因我的家人選僱他做我的律師，非常驚喜，立刻去報告國民黨，與他們商量。他對他們強調像我這樣的台灣人願僱用大陸人來辯護政治案件，是一個很好的徵兆。他告訴他們他千萬要接受這個案件，如此可以成為台灣人與國民黨之間的橋樑。但我知道他也格外小心，會避免去招惹已下令起訴的蔣介石的憤怒。

依照規定，犯人的辯護律師可以探訪犯人，討論案情，所以，梁律師來訪時，我就被帶到一個小房間。每次我與律師會面時，檢察官竟也帶着錄音機在場，坐聽我們的對話！

準備審判

審判預定在三月下旬舉行，雖然我還不知道。現在，警備總部政工人員的那個王軍官，常來看我，要「使我的起居儘可能舒服」。我的家人第一次來看我的時候，我曾抱怨有一個多月未能洗澡。顯然，這些話被錄音下來。沒有多久，公共浴室再開放了，我們每星期可洗澡一次。王軍官也常去看我的家人，向他們說我生活得很好，也告訴我，我的家人過得不錯。他說，「當局對此案件非常小心」。從他的談話口氣，我感覺當局擔心我在審判時可能會激烈攻擊國民黨或批評監獄行政，所以在盡量安撫我。

在這期間，我曾三度出庭，由一法官做簡單的初步聽證。這些聽證是非正式而非公開的，只有一名書記在場，問的問題都很簡單，每次都不超過一小時。

審判

在正式審判前二天，我接到通知，我的家人也受到通知應將把我較好的西裝送來給我。理髮師也來給我理髮修面。自從九月廿日以來，我第一次感覺到多少恢復些舊日的體裁。當局顯然認

爲這是一個極重要的場合。法庭內外，由犯人重新油漆，王軍官也一天中來看我幾次。營區裡充滿緊張，當局好像擔心將會發生什麼事似的。後來得知，國民黨恐怕我受審那天發生學生示威或市街暴動。三月廿七日，開庭當天早上，整個區域緊密巡邏，動員了軍隊，交通受到管制。整個城市都警覺到這個事件的重要性。

當局派了一部車子去接我的母親、妻子、和兄弟到法庭。他們受到極客氣有禮的接待，被帶去參觀營區。營區內外都已刻意油漆修飾一新了。

這樣「公開審判」，對於國民黨來說，已經是一個大讓步。但是所謂「公開」，却是有名無實，幾十名旁聽人是經過謹慎挑選，而憑券入場的。他們包括有立法院、青年商會、報社、學生團體的代表。美國大使館會要求並得到兩張旁聽券，但僅派一名代表來，停留一會兒觀看一下營區，在審判開始前便離開了。大概因爲美國常被誤指幫助台獨運動，他們要避免任何嫌疑。結果，法庭內沒有外國人在場。

所有的旁聽者、律師們，和三名法官都入席，上午九點正，準確開庭。令我驚訝的是，當我進入法庭時，所有在場的人都站起來。我站立着，其他人都就座，審判開始了。審判過程很短，因爲他們早已確定了罪狀，這不過是要滿足法律手續的形式而已。我發覺那個衣服粗陋的瘦小檢察官已由另一比較像樣的取代了。

上午，聽取檢察官的說詞。他引述我們的宣言，指摘我們宣稱反攻大陸是不可能的，彷彿講

這句話本身就是高度叛國的。我們在宣言裡曾嚴辭指責政府，用了「推翻政府」的字眼，並說必須採取任何手段，「以汗和血」，來達成目的。檢察官一路辯下去，依照我們宣言內容，一個問題接着一個問題，如此，在上午的審詢告一段落以前，在場的所有旁聽人都已熟悉我們的論點了。

旁聽者，不論任何理由，一旦步出法庭，便不准再進入法庭。所以，有的到了廁所以後，便不能再入庭旁聽了。

我被送回囚房，謝聰敏和魏廷朝接着被帶出接受審問。

被告的答辯在下午四點左右才開始。這次，我們一起被帶入法庭。這是我們被捕以來第一次見面。我們互相凝視，點頭，並肩站着，但不許講話。他們兩位，看起來都還好。

答辯

我們的答辯主以言論自由作為根據。我們說，愛國並不只是呼喊口號或高呼領袖萬歲，批評也是一種愛國的方式。我的律師梁肅戎猶豫而又膽小，只是呆板地將我的論點重覆一次。謝的律師則很機警又有力，辯論更爲尖利。他提出一點，整個案件的核心似乎是犯了批評蔣介石的「罪」，但是依據法律，這頂多只不過是一宗誹謗罪，由蔣介石告訴乃論。有些旁聽者，聽到這裡，不覺爆出生聲，檢察官和法官顯得很尷尬。

我們感覺到聽衆大體上還能了解我們的論點。我們和我們的律師都沒有大聲呼籲，或作出戲劇性舉動。我們誠懇而堅定，未曾爲我們所爲找藉口，也沒有自任是英雄豪傑。我們儘可能顯示我們是講理的，而爲了要改善台灣的處境，曾願意冒這個大險，並不是狂熱份子。

後來得知，我們的態度，曾給那些受挑選的旁聽人留下良好印象，可是，因爲我們未依中國傳統，痛悔前非，乞求寬恕，使得某方面感覺不滿。

當被告答辯完結，我們三人都講過之後，法官則邀請被告家屬，如果願意，可以講話。也許他期待至少被告家屬會依照傳統請求寬從。我的母親，兩位哥哥和妻子都在場，但却拒絕發言，謝的兄弟也同樣保持沈默。我們都感覺抗議或乞求都是無效的，審判結果早已由最高當局決定好了，這場審判不過是裝門面而已。

比較之下，魏的弟弟却使法庭震驚。他站起來，開始憤怒的斥責整個過程，說它是非法的，政府本身是非法的，戒嚴法也是非法的，我們三人根本就不應該受審判。

我們被帶離法庭，審判就此結束。此時已近晚上八時，我們發現整個看守所的作業都停止了，犯人等到此時才開飯了。但是我太興奮，太疲乏，吃不下飯了。

過天早晨，王軍官一大早便急忙地跑來看我，說審判後有一位在場的新聞記者，大概是新近派駐台北的美國華僑，到警備總部詢問我是否受到酷刑，因爲他注意到整天審判中，我的左臂都垂着不動。警備總部發言人不得不立刻公開解釋，我曾在戰時因美機炸彈而受到重傷。

那天，全島中文報紙關於審判的報導，千篇一律，一字不差，都說三名被告都對於攻擊政府反攻大陸政策，自承錯誤，在法庭上全部「悔過」，請求「寬刑」。

我年老而堅強的母親，非常憤怒，她一看到王軍官便大發脾氣，說「看看這個，你們全部都在說謊」。

警備總部派遣一名代表到台北兩家英文報社，要知道他們將如何報導，要求事先檢閱。這兩家英文報的有關新聞非常簡單，大體上正確，省略了為國民黨保留面子的「請求從寬」一類謊話。

判決

這次審判的快速，確實不平常，三個人在一天之中受審完畢。很明顯，他們事先安排好，要儘量避免宣揚和緊張。我們都沒有想到很快就會宣判。因此，未到一週便受命令再度出庭時，很感驚異。這個速度更證明早在開始審判以前，其結果已經決定了。

四月二日，我們再度被帶進法庭。進去的時候，我們三人再有機會彼此點頭示意，但除此無他。這次，旁聽者除我們的家屬以外，不超過十人，包括五、六名新聞記者。

我們再度站在三名法官之前。主席法官站起來宣讀判決。謝聰敏判十年徒刑，魏廷朝和我，各判八年徒刑。新聞記者們對此重刑，似乎感到驚訝，有的搖搖頭，臉上露出同情的神色，甚至

愛嚼口舌的獄卒後來也對我表示吃驚。我們的家人都被如此嚴厲的判決呆住了。

後來獲悉，由於我們未在法庭上乞求從寬量刑，被認為傲慢，本來只計劃各判五年徒刑，但最高當局對於我們毫無悔過，很感不悅，改變原意了。

我們立即著手上訴。上訴僅以書面提出，而不再舉行法庭聽證傳訊等。我和律師草擬上訴書，再申論我曾在法庭提出的論點，把公文送上去。依照規定，法庭必須在六十天內答覆，可是七月、八月、九月、十月過去了，我仍沒有得到回文。我們想，這或許是一個好徵兆，表示最高階層意見未定，不能或還沒有作最後決定。

獄中生活、來自海外的兩封信

獄中的生活起居，稍獲改善。我獲准閱讀一些書刊。監獄規則不許閱讀小說和報紙，但是我也得到特准由家人送來大眾小說雜誌。未幾，我得到全套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邱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和法文平裝本戴高樂的回憶錄，英、法文的國際法書籍、英文法律辭典等。最後，終於獲准閱讀「新聞周刊」、「時代周刊」和「讀者文摘」，但都要經過監獄官緩慢而小心的事先檢查。我也拿到幾本法文文法和會話書每天上午花了幾個小時閱讀和練習。這對於囚犯是一項很好的心智運動。

我被捕以前，曾在英文「讀者文摘」中，看到一篇有關「國際特赦組織」的文章，它是一非

政治團體，承擔營救世界各地政治犯的困難工作。令我很驚訝的，我在獄中竟於收到一封凱琳·葛威爾夫人（Karin Gaveli）寄來的明信片，她是「國際特赦組織」瑞典分會的會員。顯然有人向該組織報告我們的案件。

這是我從海外收到的第一封信。第二封則來自加拿大麥基爾大學的同學伊安·麥克法遜（Ian McPherson）。他已成為加拿大航空公司首席律師。司法部次長查良鑑訪問加拿大時，他要求查良鑑回台時轉達此信，查照辦了。以後知道，這只是海外寫給我許多信中的兩封而已。其他的，我都没看到，但是單單這兩封便使我感動得幾乎流淚。它們證明海外朋友不但知道我的處境，還深深關切我。對於一個被禁閉的囚犯來說，沒有一件事比知道他並未被外界遺忘這個事實，更使他感覺無限的安慰和鼓勵。

春季和夏季幾個月格外悶熱而潮濕，尤其犯人在操場放封而我們必須緊閉窗口時，真令人難以忍受。大多時間，我都是情緒緊張而懊惱，一點瑣事都易使我發怒或沮喪。我不斷與獄官因為語言問題而發生爭執。看守所副所長，姓謝的，是一個討厭的傢伙，眼睛詭詐，內心陰險而卑鄙。他堅持我與家人會面時必須用「國語」（北京話）交談，我指出監獄現則並沒有禁止人家講台灣話。他說「紀錄員不懂台灣話，所以無法紀錄。」我回答說「你應該去找出一個懂得台灣話的，來作紀錄」。我氣憤之餘，寫了一封長信，給警備總部司令，提出控訴，謝某才軟下來，因為知道我的信會引起高層的注意。他們一面假意安撫我，一面仍威脅，所長提醒我雷震住在這第二

號病房時因不守規則，曾像小孩一般地，受到處罰。

有一名年輕的軍校學生，因捲入與吳俊輝同一案件而被捕，因受拷問而左手殘廢，總是得用繃帶包着。他的一些同伴已被槍斃，他的其他兩個兄弟也被逮捕，其中之一在衛兵看守下由台南押送台北途中，「因企圖逃亡，由火車上摔下死亡」，另一個則關在與我同一看守所內，已經兩年多了，仍在等候審判。他已神經失常而被綁着，時常整夜尖叫大罵，把大家吵醒。好幾個月以後，不見了。

另一中國籍犯人，在偵查期間，精神錯亂，不斷以頭撞壁，企圖自殺。他有時在晚上被帶到我隔壁的第三病房，用鎖鏈綁在床上。他沒有尖叫，但我可以聽到他掙扎着要毀滅自己的聲音。

強烈颱風來襲時，營裡充滿興奮。有時候，整個地區停電了。通常我們整夜都得忍受天花板光禿刺眼的燈光，但因停電而整個監獄陷入一片黑暗時，守衛們頓時緊張起來，提高了警覺，所有的門戶都立刻鎖上，走廊上點起蠟燭。

有一天，獄官通知我，要重新油漆我的囚房，我被移到第四號病房，過了三天，又被移回。立刻有一油漆工人藉口要找刷子又跑回來我房間，他原來就是魏廷朝的叔叔，正在服十年徒刑。等到守衛隔我們稍遠時，他突然低聲向我耳語「在天花板上，裝了一個竊聽器」。

偷傳紙條

我關在第二號病房，謝聰敏在第四號，魏廷朝則在第六號。魏廷朝有時在晚飯之後，高唱民謠。我們有時彼此發出高聲，只是爲了要讓彼此知道我們還在這裡。每次，獄卒都要跑到我們門口。不久，謝聰敏開始想辦法使我們彼此之間，能傳送紙條。每天早晨，我們必須自己清掃囚房，然後，有一名犯人工役來，帶着一個垃圾桶，一間囚房、一間囚房去掃收垃圾。謝用食品賄賂那個工役，把我們的紙條，綑綑捲捲弄得像紙屑一樣，趁機丟進各人囚房。

魏和謝冒着受報復的危險，大膽批評監獄行政。謝着手控告我們在旅館被捕時毆打他的警察。兩人並控告在偵查期間虐待他們的調查員。他們的控訴書，由監獄辦公室，轉到上面，警備總部也派人來調查，但是沒有結果。魏總是爲了信件檢查，與獄官爭吵。有一次，他寄給家人的信件被檢查的獄官更改，他即着手控告他們，理由是他們可以削除文字，可以退還信件，甚至可以丟棄信件，但無權更改信件內容。這使得那個姓謝的副所長，大爲光火。有一天我剛在操場來回走動放封，看到謝某跑到魏的門口，隔着鐵柵，與魏講話。不久，兩個人聲音愈來愈高，大吵起來。謝某大罵魏「你這個叛徒！」，魏則回敬說「你這隻豬，國民黨的走狗！」。我有點驚慌，向魏叫道「算了，算了，講了有什麼用」。我害怕魏會遭到報復，但是幸好沒有什麼事發生。他們仍小心對待我們，我們案件顯然也在慎重處理，但是對於我們的上訴，仍無下文。

蔣經國訪問監獄

有一天，得到通知，將有要人來訪，整個監獄緊張起來，這才稍微打破監獄的單調生活。每個犯人都得徹底清掃自己的囚房，白色床單發下來，每人一條，但只是爲了那一天而已。時間到了，我們的窗戶都被關上，訪客到達時，大門響起一連串歡迎的爆竹，在監獄牆內響起奇異的回聲。我們聽到營內有人走動，從縫隙偷看，赫然發現來訪者竟是蔣經國。他穿着整齊的暗色西裝，皮鞋擦得光可鑑人，一邊檢視操場、走廊、大囚房，一邊微笑點頭。他的來訪，與我們案件無關的。他也沒有到我們囚房這邊來。他滯留約一小時，便離開了。

我關在看守所的幾個月，蔣經國共來訪了兩次，每次的迎接方式都一樣。他那麼忙碌，爲什麼特地要來探訪監獄呢？不知道他是否也去訪問其他監獄？目的是什麼？他的心態如何？恐怕別人無法回答。

特赦

初秋，我的上訴裁判的法定期間，已過了很久，母親和律師，經過長久討論，並與親友商量之後，得到了一個結論。目前最緊要的，是想辦法把我弄出監獄。在國民黨獨裁之下，任何要把我變成「殉道英雄」的想法，都是徒勞無功，不但愚蠢，而是浪費生命，必須採取任何可行辦法

，使我安全出獄。然而，凡熟知中國人政治和心態的人，都瞭解蔣介石必須顧全面子，若想把我弄出監獄，也必須顧及此點。一旦我走出監獄，就有足夠機會否認和反駁國民黨的各種說詞。

很久之後，我很有趣地發覺，甚至美國政府在亞洲國際政治上，也採用了亞洲人特有的辦法。當美國軍船 Pueblo 號人員被北韓俘虜時，美國爲了獲得那些人的安全釋放，同意向北韓「認罪」，雖然在整個事件中，美國始終否認有過任何不法行爲。然而，在人質獲釋之後，美國立即否認曾經「犯罪」，宣稱上述「認罪」僅僅是爲了得到船上人員的釋放，如此而已。

雖然，這完全不合她的胃口，母親終於同意親自向蔣介石提出要求，她覺得這是被迫，世人必能瞭解。在家人探監的短促對談中，我們並沒有談論這些，但我祕密紙片中，我得到暗示。

母親的親函，送達蔣介石。當家人開始送來西裝、領帶、白色襯衫，和一束鮮花時，我預感到新的變化，或將發生。那束鮮花頗使獄卒感到納悶，他喃喃地說「真奇怪，還有人送花？連一個花瓶都沒有，那來地方放花呢？」

十一月三日，我在下午五點吃晚飯，大約六點，天將黑的時候，看守所長派人召我到他樓上辦公室。他一個人坐在辦公桌邊，桌上攤着一些公文。他撿起一張，嚴肅地說「你的上訴，已遭駁回，八年徒刑確定了」。沈默了一會，他又說「這裡還另有一件公文，總統已下令，把你特赦了。你將可以回家」。

我立即問道「謝聰敏和魏廷朝呢？」他說「我不知道，公文沒有提到他們兩人」。我再問「

我什麼時候可以回家？」，他顯然要最後一次再玩弄一下他的權威，而寧可含糊其詞，說「或許今晚，或許明天。你回去房間打點準備好。我們還有一些手續要辦」。

我回到囚房，把這個消息，告訴同房的犯人，他向我恭喜。

不久，王軍官來了，他有點緊張，問道「現在，你不會去遊街，或來個大慶祝吧？也不會去燃放一大串的鞭炮吧？」。我向他保證「不會的，我對於鞭炮沒什麼興趣」。

士兵進來，包紮我許多書籍，帶着這些，陪我到監獄辦公室。意外地，沒人要求我簽什麼文件或保證書，或找保證人。我的所有東西受到檢查。這使我擔心焦慮，因為我隱匿着一些我在獄中寫的東西。這些文章，後來在外國出版了。

十一月三日晚上九點四十五正，我走出監獄大門。他們把我釋放的時間故意這樣精確安排，使得這個消息趕不上晚報的出報，但又能趕上晚間最後的新聞播報。到那時候，我已回到家裡，我家門口便不會有歡迎的人群會聚了。

看守所長和警備總部政戰組的王軍官陪我坐進一部車子，已有司機在內，同乘跨過市區。當我們的車子開進台大宿舍區的巷道時，我注意到另有一部吉普車已在那裡。我們車子開到我家門口，我走下車來，回到了家裡。

第十一章

監視

特赦之後

家人激動，興奮得淚眼婆婆地迎接我歸來。母親、妻子、兒女，和在台北的二哥都在家裡，還有我的律師也在場，房子裡到處都是鮮花。看守所長、王軍官、律師等，幾分鐘後便識趣地藉故離開了。

家人在那天下午稍晚得到通知，但嚴格受命不得把我即將得到釋放的消息，對外宣揚。我們澈夜傾談。勇敢多謀的母親告訴我一切的經過，如何起草羞辱的悔改聲明，以達成釋放等。

翌天早報都登載了我被釋放的消息。我的律師發表聲明說我已「悔改」而得到特赦。所有的黨政宣傳機關都得意地宣傳我已經「認錯」，得到寬恕。其含義是，所有國民黨的批評者、知識份子和台灣人不滿份子，終於清楚認識了領袖的偉大和美德。很明顯地，國民黨自認已獲大勝了。國民黨政權在基本上缺乏安全感，因此，以「認錯」、「悔改」來羞辱反對者，成爲重要政治技巧之一。他們似乎不瞭解，在任何形式的肉體或心理威脅之下強迫出來的「自白」或「悔過」，不但沒有用，反而對他們的政權有害。他們無法了解，爲什麼歐美的重要左派知識份子譴責古巴卡斯楚政權，以脅迫取得古巴有名詩人 *Herberto Bodilla Lorenzo* 的所謂「悔過書」，在那份明顯粗製濫造的「悔過書」裡，他被迫形容自己爲「卑鄙的、不公的、怯懦的、虛偽的、說謊的」一個人。

我被釋放後幾天，加拿大廣播公司曾從蒙特里爾打國際電話來，想以電話訪問我，做爲其節目「This Hour Has Seven Days」的一部份。因我知道電話是被錄音的，所以未能暢所欲言。

軟禁

現在應該如何安排我的生活呢？我很快地發現我被監視着，我的房子外面經常有人徘徊。我一出去便受跟踪。我寫信給台大校長，要求保留教職的信，一直沒收到回音，甚至他是否收到我

的信，也無法知道。我沒有收到聘書，所以我與台大的關係終止了。然而，我們仍住在台大宿舍，沒有被要求遷出。

被釋放後二、三天，我和太太一起到台大校長公館作禮貌上的拜訪。我在門口向錢校長說「多謝你的關切」，他的答覆冷漠閃爍，我們很快告辭了。那是我最後一次看到他。

我知道了我在獄中間家人是如何過日子的。有一部吉普車經常停在我家附近，警察監視房子，注意誰進出我家。調查人員不時找我太太，除此之外，家人沒有受到什麼騷擾。幸好，兩個孩子經過起初的震驚以後，沒有遭受什麼麻煩，可是，他們很孤單，因為從前的朋友都不敢再接近了。

其後幾個月，給我和家人一個機會，能夠分清真偽朋友。長駐在我們門口的吉普車，給我們的日日生活，投下一道大陰影。有的朋友，在馬路上遇到，便裝作不見，或故意躲開。大學裡的台灣籍同事們都避得遠遠。有的學生，以前經常來我家的、經常恭維我的、或誇口熟識我的，現在都矢口否認與我有關；有些甚至要求校方將我曾擔任他們指導教授這個事實，從紀錄上去掉。所有這些，都使我傷心。我感到孤獨、寂寞。但是這些挫折有時得到一點補償，因為仍有些人，冒着生活和事業的危險，膽敢來看我。有些學生悄悄地來看我太太，探詢情況，表達關懷和慰問。有的大膽地帶着書籍或水果，來送給我。

誰是真正朋友，誰不是，很快就分曉了。我沒有主動去要與老朋友們重敘舊誼。在我目前處

境之下，只有讓他們去主動決定要不要維持友誼。

我從監獄出來沒多久，寧將軍爲我開了一個精緻的宴席，王昇和軍中親近蔣經國的將領們也都應邀參加。席上沒有認真談論什麼，他們只是恭喜我獲得釋放，又賀我「新生」。

在理論上，我今可隨意外出，也可以在島內自由旅行，但不斷受著監視。如果我搭乘計程車外出，便有一部吉普尾隨。如果我到飯店吃飯，安全人員便坐在不遠的桌子邊，也在那裡用餐。如果我乘火車南下到高雄探視母親，便衣人員也隨行左右。

大多時間，我都留在家裡，補閱坐牢期間錯過的書籍雜誌，或紀錄下在獄中被迫無聊時想到的一些事。有一度，我執迷地幻想有一天我會再回去大學教書，那是我真正的希望。

有一天，王軍官帶了一位高先生來找我。高某以前是共產黨員，現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六組的組長。他們說是前來討論我的出路，並建議我接受黨部「大陸研究所」研究員的職務，薪水不錯，並將有一棟舒服的宿舍。顯然，當局覺得必須爲我安排一個工作，但不願見我再去與學生接觸，所以使我在黨部工作，一方面易於管看，另一方面可以解決我的生活問題。

我當場拒絕了這個提議，坦白告訴他們我絕不會接受這份工作。他們在我家停留了近兩小時，一再勸我接受，最後，我有點不耐煩，帶着些火氣說我寧願在路邊擺攤子賣書，也不願接受那份工作。他們終於離開，那位高某後來寫了報告，抱怨說我驕慢而不合作。

長老教會受到威脅，我姊姊的麻煩

其後幾個月，我注意到台灣長老教會所遭遇的困境。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基督教徒在台灣雖然為數不多，却形成一個重要的少數團體，幾乎是優秀的領導階層。他們所發揮的影響力遠超過其人數在全人口中所佔的比例。經由教會和其所辦的學校和醫院，台灣人與西方世界所作接觸，已有一世紀的歷史。在日治時代末期，教會受到重大的壓力，因為基督教徒在學校和教會禮拜中，仍繼續使用台灣語，對於天皇崇拜和日本神道，予以抵抗。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長老教會較未受騷擾，但從一九五〇年以後，情況變化了。一方面，國民黨極力恢復傳統的中國民俗，藉此想恢復並加強與中國大陸的心理關係。那些民俗長久以來是日本人和基督教會所排斥的。另一方面，過去在中國大陸的許多傳教士和基督教各種教派，在半官方鼓勵之下，陸續進入台灣。首任駐台北的美國大使藍欽（Karl Rankin）曾在其回憶錄裡稱道在其任期內，在台灣傳教士和其家族，自一九五〇年的三十名增加到一九五七年的七百多名。

一九六五年，情況大變了。國民黨顯然覺得台灣人基督教徒，尤其歷史悠久而且組織完善的長老教會是一個眼中釘。它為要消除台灣人意識，強迫使用北京話，將孫中山偶像化而崇拜他，隨而，對其「繼承人」蔣介石也要敬仰。

台灣長老教會早已參加總部在瑞士日內瓦的普世教協（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作為會員。當該組織的一部份會員開始主張承認中共時，國民黨當局非常憤怒，要求台灣長老教會與普世教協，斷絕關係。可是，基督教會拒絕了。長老教會大會議長被傳到警備總部，被告以應為努力使長老教會退出普世教協。教會領袖和教友們均受騷擾。當時，有幾個日本人牧師到台灣訪問，回國以後以日文出版了一本刊物，發表他們對台灣和教會的觀感。他們並請了台灣長老教會大會議長寫一短篇的序言。那本書在日本出版後不久，議長被捕了。警備總部給他看那本書，裡面有一日本牧師寫了一篇文章，為台灣人教會的處境，作了不利於國民黨的記述。議長被嚇壞了，不得不簽名於「認罪」的自白書。然後，他們又告訴議長，既有了這份「自白書」在手，政府隨時都可以起訴他，使他入獄。現在他必須努力運動，使長老教會從普世教協退出。當時，我的表弟兄台北神學院院長，他也被傳多次，並受到同樣的指示。後來，有五位台灣牧師應邀訪問日本，但在台北機場登機之前，護照被吊銷，不能成行了。

在這段時期，長老教會領袖們却為美國極端保守派牧師馬金太（Carl McIntire）的屢次來台，深感困惑和尷尬。他每次來台，都要公開攻擊普世教協，在禮拜中，總是大聲禱告，祈求上帝「使蔣介石早日反攻大陸」，並不斷鼓勵蔣介石立刻開始發動進攻。

在繼續不斷的強大壓力下，台灣長老教會屈服了，很勉強地表決退出普世教協。

我的姐姐彭淑媛是長老教會主辦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的校長。她從來對於政治不感興趣，可是在我受軟禁期間，和普世教協問題發生以後，她的學校終也成為國民黨騷擾的對象。一個晚

上，安全人員偷入校園，將寫有「打倒蔣介石，擁護彭校長」的海報，貼在壁上，企圖用此手段，造成事端，迫使校長辭職。

蔣經國的召見

對我的監視仍繼續着。大多時期，都非常嚴密，然，忽然會鬆懈幾天，過程古怪，無法知道是政策如此，或是監視人員有時懶惰。

一九六六年初有一天，有部車子開到我家門前，一個人走到門口，遞來一張名片，寫明是「青年救國團祕書」。他說是奉蔣經國的命令而來，問我當天下午三點是否有空，因為蔣經國希望「請教」，想該時派車來邀請我到他辦公室。

這個意外的邀請，措辭非常客氣，我直覺必須警惕。我想起上次當選「傑出青年」時，曾婉拒他的邀請，而引起普遍臆測。如今，這個帶着名片的陌生人，他的身份是否可靠？這不是一個陷阱，我一進入他派來的車子便會永久失蹤？我也想起二二八事件時林茂生那出名的故事：一部車子到他家來，說是台大校長要請他去開會，他坐車一去，永遠不再回來了。

我告訴那個人，我不要車子，會自己想辦法去，請他告訴我地址。

到時，我將正確地址留給太太，僱了一輛計程車出發。蔣經國的親信李煥接待我。他講話溫和斯文，請我就座，並沒有立刻帶我去見他的老闆。他花了近一小時，詳細說明「青年救國團」

的所有活動，努力表示他們是多麼開明，多麼盡力幫助青年學生，我沒有什麼好說的。他們似乎仍在努力要說服我，甚至爭取我的合作。最後，他終於站起來，說「我去看看，蔣主任有空了沒有」。他走出去一下，回來說「好了，他正等着你」。

當李煥帶我往走廊走時，我即從玻璃窗瞥見蔣經國坐在書桌邊，在我進入其辦公室幾秒前，看見他站起來，小心地在整理上衣和領子。我一進入，他便從書桌後走出來，微笑着與我握手，請我坐下。我跟他沒有見面過，所以他的第一句話「好久沒有看見你了」，使我有一點驚訝。他又問「好嗎？」，「身體怎麼樣？」，「令堂好嗎？」。他未曾看見過我母親，可是，她爲我釋放的努力和她有時所做的強烈抗議，必定在有關大小官員之中盛傳了。他還問及我姐姐，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的校長，她那時正遭到很多麻煩。

談了一些家常之後，他轉了話頭，嚴肅地說「很多人都非常關心你」。當他又問「有沒有什麼困難？有沒有什麼我們可以幫忙的？」的時候，我很坦率地說「有的，我還沒有工作。坦白地說，我很希望能再回到台大教書」。他臉上閃過一絲尷尬神色，轉向李煥問道「有沒有與錢校長談過？」。這一下輪到李煥尷尬了，他避開正面回答，支吾地說「我們會與他商量這件事」。

這場會談約三十分鐘，還算輕鬆而不拘束，其後我的感覺是複雜的。蔣經國本人似乎遠不如其照片所給人的印象那麼粗鄙。他的談吐頗帶溫暖，這在其父親唐突陳腐的問話中，找不到的。雖然問話形式是一樣：「有沒有什麼困難？有什麼事我可以幫忙？」，蔣經國令人感覺較有誠意

陶希聖的斡旋

如何安排我的將來，繼續成爲國民黨高階層的一個難題。不久，國民黨元老之一，陶希聖開始與我的律師梁肅戎，開始接觸。陶希聖以多謀著稱，曾周旋於國民黨與非國民黨各派系之間，以使蔣介石從中取利。有一天，他來看我。經過轉彎抹角之後，談到正題。柯喬治（George Kerr），在英美出版了一本書「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詳細記載他目擊台灣在沒有條約正式變更主權以前，如何被送入蔣介石手中，如何被國民黨政權剝削摧毀。柯喬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曾任職於美國在台領事館，在書中描述台灣人於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提出的改革要求，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變以及其後蔣介石派進五萬大陸兵屠殺台灣人的血腥報復。那本書在台灣被禁，但在地下流傳，而且在台美軍圖書室裡可以看到。陶希聖抱怨說「那本書攻擊我們政府。我們要有人反駁他」。我曾經讀過那本書。讀到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台灣和台灣人遭國民黨、蔣介石和其家族，劫掠慘殺的史實，無人不曾悲憤慷慨的。但是現在，我則假裝不知道陶希聖在說什麼，他只好改變話題了。後來知道，國民黨曾強迫廖文毅寫信給紐約時報，抗議該報刊登載羅勃·登布爾（Robert Turnbull）對於該書善評。

不久之後，陶又透過我的律師，希望我進入「國際關係研究所」。它原是國防部一部門，如今，表面上已脫離軍部，名義上，另成一機構，却與國立政治大學聯繫。其所長和重要成員都是國民黨高級黨員，國民黨給予經濟補助，被視為蔣經國智囊團之一，致力研究國際情勢和共產世界。現在，他們要我成爲該所研究員。

該研究所所長吳俊才，有一天早上來看我，他非常客氣，聊談了一會兒，便遞給我該所的正式聘書。由於面子關係，我無法當場把聘書退還給他，只有誠懇地告訴他，我實在無法接受。我們都知道，我如果接受這個聘約，便等於國民黨的大成功了。他留下聘書在桌上，告別而去。

我等了幾週之後，才於一個晚上到他家拜訪，把那封聘書和一封辭謝信交給他，這件事才算結束。

大約在此事，發生了一插曲。有幾位台灣人和大陸人政界人物，其中有國民黨開明份子、黨外份子、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省議員，包括齊世英、郭雨新，決定邀請美國大使一起吃飯，討論時局。大使答應了，時日也決定了。然而，大使館要看當天出席者的名單。原預定約十人出席，我也在內。可是，翌日大使館秘書通知說如果我也出席，大使會覺得非常尷尬，所以，我只有自動退出。我知道我的被捕，已使我變成美國大使館的禁忌了。台灣人一直對於華府和國民黨的關係，尤其對於華府那麼關心蔣介石的敏感，却不關切台灣人的正當要求和意願，感覺非常困惑。美國官員都知道國民黨如何壓迫人民自由和權利。在我被捕以前，我曾認識一些美國使館官員

，經常有機會見到他們。寇克大使（Kirk）曾約好我去談話，雖然最後無法實現。我的案件發生以後，我與美國使館的關係，切斷了。

我的出路，非解決不可。被迫待在家裡這麼久，使我焦慮和不快。我不得不接受我不能再回到大學教書的事實了。母親笑道「你以為他們還讓你回去大學，腐化青年麼？」。有人向陶希聖提起我應進入中央研究院時，我終於表示同意。可是此事又不明不白地未能實現了。

在這個時候，加拿大的國際法協會，透過其會長，邀請我寫一篇法律論文，題目完全由我自選。我知道在加拿大的同行和朋友們，對於我的工作和生活，非常關心。他們想藉這友善的行動，為我鼓勵士氣，並以稿費名義，給予一些經濟支助。加拿大舊識同僚們這種關懷和體貼，使我深深感動，永久懷念。

調查局的介入

一九六六年，我的案件由國防部警備總部，改由司法院調查局負責處理。這是很大的變化。調查局可比擬於德國蓋世太保，直屬於蔣介石獨立而專權。國民黨政府大小官員都知道，調查局裡有每個人的安全檔案，以備蔣介石隨時調閱。每一市民也都知道，如果他受到注意，調查局必有其檔案紀錄。蔣介石透過調查局，對於政府各部門，嚴密監視和控制。這是獨裁政權裡，最令人恐懼和憎惡的機關。

警備總部和調查局間微妙的對立和競爭，由來已久，蔣介石則巧妙利用這種矛盾，鞏固地位。

我的案件發生時，國民黨裡一定有人主張應予嚴罰，立即把我毀滅；也有人辯稱過份重罰可能引起台灣人的深仇大恨，所以應該對我施以再教育，把我爭取，用以幫助國民黨統治台灣。我的特赦，顯示後一想法取勝了。可是，我被釋以後，一再拒絕國民黨所提供的職位，甚至揚言寧願在街頭賣書，也不願接受黨的安排。這證明寬容政策已經失敗，也就是警備總部處理我的案件失敗了。

國民黨所有安全機構的負責人，十名左右，定期聚會，協調工作。會議由蔣介石本人主持，並做最後決定。要把我的案件從警備總部移到調查局，大概是在這種會議中決定的。

調查局的一個處長王淦，透過歷史家和作者李敖，邀請我吃飯。他的開場白便是「警總把你的案子辦得這麼糟，而竟然沒有辦法給你安排一個位置，實在抱歉。胡適先生在世的時候，我是奉命保護他的。你也知道，這些軍人都是老粗，很笨拙的。從現在開始，我們會好好照顧你」。

我與警備總部的關係，從此完全終止了。寧將軍、王軍官、魏參謀和其他警備總部有關人員都失去了面子。不久，我便察覺到警備總部與調查局這兩個對立的特務組織，其人員和作法，有顯著的不同。像寧將軍這種人，多少還保持傳統中國軍人的本色，臣服於學儒官僚的帝王制度。這些軍人直率，認真執行任務，對於文人學者，深為尊敬。他們或許認為文人書讀得太多了，有

點古怪、複雜、難以理解，但這些文人却代表中國偉大的文化。相對之下，我感到調查局的成員大部份是國民黨中最糟糕的份子。這些替蔣介石幹骯髒勾當的特務，大多是詭詐、邪惡、陰險、狡猾、不可信賴，而令人嫌惡。

王淦現在時常來找我，並與陶希聖連絡，想安排我的出路。調查局長沈之岳，一位傳奇人物，邀我吃飯。他大概是最令人恐懼，而又最得蔣經國信賴的人。他曾潛伏在共產黨組織中，在那裡待了十多年，甚至得到毛澤東的信任，昇到高職後，才又回到蔣介石手下。

調查局在和平東路把一棟日式房子改成爲招待所。他們派車來接我。當車子開近招待所時，我注意到便衣安全人員在街角閒蕩，也有人躲在門口電線桿後面。沈之岳很有禮地接待我，他矮瘦、緊張，並不給人什麼特別印象。這個晚飯，李敖也同時受邀。彼此客套一番，又用過茶後，我們便被引進飯廳，開始精緻的晚餐。我立刻注意到日本式的天花板已被拆下，代以有無數小孔的甘蔗夾板，而我待過的幾所監獄，已使我對這種天花板，相當熟悉。我看看李敖，又抬頭看看天花板，他即時領悟，我們的對話，一定被錄音的。沈之岳則鼓勵李和我，坦白暢談。後來李與我談起那個場面，禁不住大笑了。沈說「請自由自在地談談，任何對政府的批評都可以說出來，這樣才會有進步」。他強調，調查局並非政治性的，其主要職務是調查和消滅貪污，而不管對象的官階多高。主客沒有具體地談論到什麼。飯後，我們被送回家。離開招待所時，我又注意到門口電線桿後面有一個便衣人員躲着。

特務陳光英——一個大陷阱

幾個月過去，較多人較敢來看我了。他們與我討論當前局勢。他們都指出，國民黨政府裡，台灣人愈來愈多，而大陸籍高官則將子女送到外國，並將私產盡量移到國外，時間似乎對於台灣人有利。

政治上活躍的份子，頻繁到我家裡來。他們包括大學生、議員、教員等，其中有些想參加競選，以圖在體制內促進改革。他們批評政府，並咒罵惡劣的官員和措施，但他們並未談到暴力革命。他們只是想依「合法」途徑，逐步改變國民黨政府，並想以非黨員姿態參加競選，為此討論如何有效發揮力量，如何成立堅強的聯合陣綫。

蘇東啓有一位親戚吳文就，也常來我家參加討論。他很得人緣，也受敬重。有一天，他帶一個人叫陳光英，說是他的好友。陳是斗六人，做小生意，台北的人都不認識他。在大家談論的時候，他都沈默着，我以為或許因為他的教育有限沒有什麼意見。有一天他獨自來找我，說將要去日本，我祝他旅途愉快。

大約一個月以後，陳光英回來了。他說在日本看到流亡在日本的一些台灣人，包括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的作者。他說在日本的台灣人要向我問候，又遞給我一些在日本出版的獨立運動有關刊物。當我說真了不起，竟然敢冒險偷帶這種刊物入境時，他笑了。然後，他又從口袋

中拿出一種小廣播器，說可以向鄰居廣播，以及二十萬日幣，說這些都是史明要送給我的。我把日幣退還給他，說我不需要。

一、二週後，他又來找我，說他將再去日本，參觀塑膠工場，問我可否替他寫一封介紹信給史明。我說他已見過史明，我却未曾見過他，似無介紹的必要。他則堅持，史明一定認識許多日本商人，我如果正式介紹給他，他一定會給陳較認真幫助。我很勉強地給他用日文寫了一張便條，說「來者是位認真的台灣青年，請予關照」，署名牧山，告訴陳可以向史明解釋那便是我。

一九六七年三月初一天早晨，陳忽然跑到我家，神色顯得驚惶，說吳文就失蹤了。他說「二月廿七日晚上，我整晚與吳在他家裡，幫他油印隔天（二二八事變紀念日）要散發的傳單，隔天早晨，我們口袋中塞滿傳單，分路出發，那便是我最後看到他的了」。

其後幾天，我們都非常耽心。我警覺到我的一舉一動，被嚴密跟梢，我的房子，更被嚴厲監視。有些朋友，很憂慮地來找我，問「我們應該怎麼辦？」，不久，他們也一個一個被抓去了。有些人不論走到那裡都被跟蹤。陳光英則一再來找我，說他得幫忙吳文就的家族，因為吳留下一些債務。他便四處向吳的朋友募款，說是要資助吳的妻子。有一天，他又跑來，說有一個朋友託他來問我，可否跑到美國領事館，尋求庇護。我說「那是沒有用的。他們會把你趕出來，因為他們對我們的問題沒有興趣。告訴朋友們不要害怕，也不要因舉措不自然而顯露恐懼，那樣就會惹來嫌疑」。那晚，當他又再來一次時，我開始為他的安危耽心，所以，決定我故意出外散步，使

監視我房子的特務跟踪我，然後，他才從旁門悄悄溜走，而不引人注意。他照辦了。

大約兩星期後，吳文就的家人，忽然收到他的一明信片，郵戳地址是新竹，信上簡單說「因臨時有要事，我必須離家一會兒，請勿耽心」。我們相信，吳被捕以後，被迫寫出這封騙人的信，以誘騙朋友誤以為安全無事，而不會企圖躲藏，或逃離台灣。

很使我們驚訝的，此後一直到仲夏的時候，沒有進一步發生什麼事。監視仍然繼續着。不論我走到那裡，總有一部吉普車跟隨着。有時我行走時，特務也跟着走。我如果忽然轉身，特務便趕快閃躲。有時候，他們偽裝成學生模樣，帶着書籍筆記簿，跟着我上下公共汽車，但是如果我狠狠地盯着他們，他們便看着別處，或假裝要下車。有時我帶着照相機，突然回頭，假裝要拍他們相片，他們總會立刻躲避起來，匆匆離去。只有一次，在我家巷口附近，我假裝要拍照他們時，忽然其中一個，猛撲過來，不發一言，將我的相機強奪過去，向大路逃跑了。我立刻打電話，向調查局王淦抗議，並向管區警察局報告搶劫。當日下午接到警察局通知「有人檢到」我的照相機，要我去領，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這時又發生一小插曲。有一天，我看見一部美國車子，開到我門口停下來。當監視的特務們向前擁上的時候，一個高大的西洋人，帶着一大疊紙包，走下車來，他不理會那些特務，走向我的門口，原來就是史坦福大學教授馬克·曼可（Mark Mancall）。他以前來過台灣幾次的時候，我便認識了。這次他又來台灣，前來看我，我們相約，隔天中午，在國賓大飯店，一起吃飯，

，放在桌上。我猜是錄音機，要竊聽我們的談話。那天下午，曼可教授便離開台灣，不久之後，他的台灣入境簽證被取消了。

一九六七年仲夏，我的朋友們陸續被捕了，有些人曾企圖躲藏，但都被找到逮走。

有一天，李敖緊急地告訴我，他有一個軍人朋友，駐在外島，說軍隊都接到通知，有人陰謀武裝叛變，有書面證據證明我也牽涉在內，據說有一文件，由我簽名，與這陰謀有關。我感到困惑，這個謠言非常奇怪，到底我寫過什麼東西，被這樣解釋？

到了那年年底，我的朋友們大都被逮捕了。我的親屬也開始感到新的壓力。我在台北的二哥，雖然從來不管政治，却因為我的關係，銀行拒絕給他商業貸款。

色厲內荏的特務

蔣經國從日本訪問回來後不久，十二月的一天，調查局王淦便來找我，說沈之岳局長要再邀請我吃飯。他在談話中故意暗示，蔣經國一定帶回來一些東京的台灣獨立運動有關消息。一星期以後，他又來一次，約好某日下午五點鐘。

到了那天，王淦來接我。在調查局招待所，有二個面孔獐獍難看的，在門口接待我，自己介紹說是調查局的科長。他們道歉說沈局長因臨時有事不能來，只由他們來招待，沈局長或許稍晚

也會來加入。從他們的言談舉措，可以認定兩人都非常粗魯，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我被引進客廳，室中有一棵閃亮的聖誕樹。我輕鬆地指着那棵樹，說幾句話。彼此談了幾分鐘後，其中一人忽然嚴肅起來，一副要辦重大公事似的面孔。

「彭先生，我們有些問題要問你。你有沒有寫過信給海外的台獨份子？」

「沒有」。

「請你再想一想，確實沒有麼？」

「確實沒有」。

「好吧」。他站起來，走入另一房間，立即帶着一個棕色公事紙袋出來，從裡面抽出一張紙張，那是我用日文寫、向史明介紹陳光英的。

「這不是你寫的麼？」

「是，我寫的。但這只是一張介紹便條，並不是信」。

「你認識史明麼？」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我想解釋事情的經過，但是他們不理會。

「你不知道這個傢伙是共產黨，曾到過延安過嗎？你不知道他與劉少奇有關麼？您不知道他是通緝犯麼？」

「這些，我都不知道」。

「你不是經過陳光英收到二十萬日幣、一個廣播器和一些台獨刊物麼？」他並指出陳光英每次到過我家的正確日期時間。

「陳光英帶這些東西到我家來，但我把日幣當場退還，那些刊物也毀掉了。至於所謂廣播器，那不過是玩具，在日本到處都可以廉價買到」。

「你知道那筆錢是要給你做政治活動的」。

「我沒有收下那筆錢。陳光英說是朋友送給我的禮品。那玩具是在日本百貨店四、五百日幣就買得到的。我經常收到人家送來的各種刊物，有的我都要毀掉」。

他們不接受我的解釋。「你與日本的台獨份子有聯繫。你知道過去一年，我們已逮捕了許多你的朋友。他們都承認曾陰謀破壞、爆炸和暗殺，而且都說你在幕後主使。有的人已背叛你了，說都是你害他們的。他們都說是聽你的話去行動的，所以僅祇處罰他們，而不處罰你是不公平的。我們知道你是青年學生的偶像，但你是一個煽動家，罪惡之源」。

在這長篇大論痛罵中間，王淦一直保持沈默，頻繁地走出房間，一會兒又回來，我猜想他是不斷去打電話，向上層報告這次審問斥責的進展情形。兩個特務中，年紀較大的，言詞較為緩和，讓另外一個，大概是下屬，盡情對我指控辱罵。

這場怒罵，持續了近兩小時。開始時，我曾試圖解釋，這些被捕的青年們曾與我所討論的是合法的政治活動，他們只是計劃參加競選，反對一黨制度。我一再強調，我從來沒有聽過什麼陰

謀、爆炸、暗殺等，最後我發起脾氣，答道「你們有辦法叫人承認任何事情，我知道。我已經看過太多了。」

在這整個過程中，王淦跑出跑進，我想是在請示。這種情況，似乎有點脫軌，這些粗暴的特務，或許把審問和脅迫，做得太過份了。最後，王淦終於開口，建議大家進去隔間用餐。

大家就座後，酒杯也斟滿了。整個氣氛，說冷冰還不夠的。令人驚愕的，那個特務，一方面，請我用菜飲酒，另一方面，還冷酷地威脅說「我們不怕任何外國人。不要忘了我們隨時都可以把你毀滅、把你殺掉。你要清楚這點」。

晚餐用畢，大家又回去那棵漂亮晶晶的聖誕樹旁喝茶。我那時想，大概會在當場被捕。不料，王淦說他要陪我回家。那時已經半夜了。

王淦與我同車，沈默不語，當車子快到我家的時候，我看到我太太正沿街奔跑。她因為到了這麼晚我還未回來，極度耽心，決定跑步到調查局招待所去探詢。我從車裡叫她，接進車裡，回到家裡，儘管已經很晚了，王淦還是跟着進來。我們沒有什麼話可說，他顯得困窘而不安。如果那些粗魯傢伙，把調查局對我的真正態度，透露得太多，王淦便要負責。我很生氣衝動。我的朋友中，可能有人在酷刑拷問之下，背棄了我，被迫捏造什麼暴力陰謀，來陷害我。但是我也知道大部份人都是與謝聰敏和魏廷朝一樣，誠實堅定。

一個事實，完全明白了。陳光英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特務線民，他不但利用吳文就打進我們

圈子裡來，還費盡心機，以史明、介紹信、廣播器、台獨刊物、日幣等等，設上圈套，為調查局製造理由，可以把我幹掉。吳文就和其數十名朋友們所以被捕，完全因為陳光英向調查局打報告。後來，這些朋友們受軍事審判，被判重刑時，陳光英還公開出庭，為調查局作證呢。

我向王淦憤怒地說「你始終都在場，那些人有道理麼？他們簡直是禽獸一樣，而竟然是你們調查局的幹部。我已準備再度被捕，但絕對不接受那種對待」。他把這些話推到一邊，很尷尬地說了幾句安慰的話便走了。

沈之岳的禮品

我告訴太太，「要作心理準備，我將會再度被捕」。

翌日，我打電話給律師梁肅戎，告訴他整個經過，並告訴我已準備隨時再入獄了。然後，我寫下兩篇長長的備忘錄，一篇用中文，一篇用英文，說明現在發生的事情，交給朋友，請他們我一旦再被逮捕時，將它們發表。

梁肅戎是立法委員，幾天之後，他在立法院遇到調查局長沈之岳。梁便找一個機會，私下告訴沈我曾說給他聽的那種遭遇，並說我極端憤怒。梁還向沈指出，即使調查局對我所控的是事實，也不該用那種方法來對待我，因為其後果將會與調查局和國民黨所期待的，完全相反。

幾天之後，在聖誕節日早上，王淦出現在我家門口，還帶了兩大籃的禮物，糖果、咖啡、蘋

果和其他昂貴的水果。他說「這是沈局長要送給你的。他很抱歉最近他的部屬對你的誤解。他絕無意思讓他們那樣對待你。」

我的母親，看到那些禮物，對我笑道「你想我們還敢吃這些東西麼？」

沈之岳一方面做勢道歉，另一方面，監視更加緊了。特務們現在已不再隱隱藏藏，不再躲在樹幹或電線桿後面，也不再避入門廊。相反地，我一走出門，他們便前後左右包圍着我。不論我在馬路上，或搭乘公共汽車或火車，他們都像要挾持似地，與我在一起。

有一次，我坐火車到高雄，由高雄火車站僱了一輛計程車到我大哥家，達到以後付錢而把車子遣走了。不料，十分鐘後，該計程車司機又轉回來要見我。顯然，他不知道我是誰。他是跑回來要警告我，我被跟踪。他說我大概有什麼私人仇怨，因為我下車以後，他便被攔住，被問了許多他無法回答的問題。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調查局辦理我案件的人員，終於正式向上面簽呈，要求將我槍斃，然後，釋放所有被捕的我的朋友們。可是，這個建議並未得到高層的批准。

一天，有一位很大膽的美國朋友來看我。任何外國人在我家附近出現，總會使特務們大事緊張。這個美國人一從我家出去，即時受到特務們跟踪。於是，他便大跑起來，特務們想要捉住他，趕不上他了。

在這時候，又發生一個插曲。中央研究院主辦一個社會科學的會議，十多個美國學者也應邀

參加。會議日期接近時，監視我的特務們，變得非常不安。他們害怕我設法與美國學者見面，或者美國人想辦法來看我。甚至普通警察也奉命嚴密監視我。在會議期間，王淦每日都來拜訪我，以確保我一直都在家裡。有一天，他告訴我，美國大使館打算宴請與會的學者，而調查局知道我也將也會受到邀請。他堅決勸我不要接受。可是，其實根本沒有這麼一回事。

密西根大學的聘書——嘗試申請出境

在密西根大學教書的朋友，向該校中國研究中心，提到我的名字，不久，有一位該校教授來到台灣，找到一個機會，與我討論到密西根大學去的可能性。

一九六八年，我接到一封聘書，由該校法學院和中國研究中心聯名發出的。大致同時，我也得到加拿大我的母校麥基爾大學法學院的聘書。這些聘書，使被迫隔絕於學術生涯之外這麼久的我，深深感動。

當國民黨知道這些聘書之後，問題來了，透過我的律師、陶希聖、黨部、調查局，向我施壓，要我拒絕。他們都客氣，但堅定地要求我不申請出境。因為既無可能被准，提出申請，只有使當局為難罷了。

另一困難是，即使要申請出國，也必須有一個保證人，保證在外國期間，「思想純正」而「行為良好」，而這種保證人又不得是近親，如父母、兄弟姐妹、太太、或堂兄弟姐妹等。這種保

證，須以書面提出，負責保證被保人在外國的思想行爲。如果被保者沒有滿足國民黨期望，保證人便要受到懲罰。保證書用詞含糊，但是任何申請出境者，都得提出這份保證書。我是曾被控以「企圖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而被判重刑的政治犯，到那裡去找保證人呢？光是這一點，就使我對於出境，連申請都無法申請了。因此，我不得不向密西根和麥基爾兩個大學表示謝意和歉意，簡單說明我根本無法申請護照的理由。

密西根大學在寄聘書來的同時，還寄了一份表格，要我填寫。除了一些個人資料之外，他們還要我提出研究計劃大要。我在回答時，說我想做政治犯罪有關法律的比較研究。顯然，我與密西根大學的來往通信都受檢查了。後來聽說駐華府的國民黨大使曾向密西根大學探詢要聘請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九六九年密西根大學不顧這些，又再度送來聘書，使我加倍感激。那時，對我的監視，比以前更爲嚴密，我再度受到警告，不要申請護照。然而，在那種情形之下，我決心不顧一切，要提出申請了。國民黨改變態度的希望渺小，但是，我覺得迫它明白拒絕我的申請，留下紀錄，是很重要的。我託人偷帶出信件，告訴海外的朋友們我如何打算，並說明這將是我要「合法」離開台灣的最後一次嘗試。在加拿大的好友麥克法遜（Ian McPherson）曾請加拿大國際法協會打一個電報給蔣介石，要求他讓我到國外，繼續我的專業。國際特赦會瑞典分會也同樣打了電報，還有其他外國朋友們也運用各種辦法，對國民黨當局，施以壓力。

最後，我找到一個勇敢的人，願意做我的保證人，爲我在保證書上簽名蓋章。帶着護照和出境的申請書，以及其他必要文件，我親自到僑務委員會去辦理手續。一個職員接過我的文件，說大約兩個星期後可以得到回音。我走出那辦公室時，雖然沒有抱着成功的希望，却有一種奇異的快感。在這件事情上，我終於逼使國民黨陷於守勢了。

兩個星期以後，我又回到那個辦公室。那位職員，微笑着，有禮貌地告訴我，我的申請正在由上層審核中。一個月以後，我收到一正式公文，只說我的申請未得批准。我的申請曾在蔣介石主持的安全單位聯合會議中討論過。在決定拒絕我的申請時，據說蔣介石曾批示要照顧我的日常生活。其結果，我的親近朋友們被情治人員詢問過，國民黨官員也開始到處打聽我的個人和經濟情況。上項批示，通過無所不在的黨部組織，甚至達到我女兒就讀的國民學校。有一天，她被老師請去，問她父親生活怎麼樣、經濟如何等。我的朋友們和十歲女兒，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對我私人生活的關切，都感到困惑。

監視繼續着。我時常抗議，有時在電話中對於王淦，很粗魯而不客氣。我曾向我的律師抗議，向陶希聖抗議。現在，來我家看我的客人都被攔截，被質問、被登記。這種干擾甚至在農曆過年期間也未停止。王淦仍奉命時常來看我。我察覺到他也對於這項差事已感覺非常頭痛。在農曆新年時，我曾對他挖苦「一年裡在這段時候，國民黨在金門馬祖的軍隊也要停火幾天，共產黨軍隊也是一樣。但你們對我在這新年時也不放鬆。顯然，你們把我看成比共產黨更大的敵人了」。

第十二章 逃到瑞典

決心逃亡

我還有些朋友，與特務組織，有私底下的聯繫。他們警告我，現在我已非常的不安全，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逮捕或「意外事故」，想要把我除掉的人，都會設計出來。我聽說安全單位已經決定，台灣如果發生動亂，有三個人要立刻毀滅。一個是台北市長高玉樹，一個是省議員郭雨新，第三個便是我。我們三人，在安全機關檔案中提到時，是用特別記號的，即，三個同心圓。監視我的特務們，整天分成三班輪值。我的妻子被跟踪得更緊迫了。我家附近，與全市其他地區一樣，在街角巷口，有小攤販的違章建築。它們常是退伍軍人非法搭起來的，政府不管它們

。我家巷口，靠近我們門口的攤販，竟成爲監視我的特務們的中心。我們知道那個老小販的年輕太太，以前是個妓女。她竟將其陋小違章建築，變成特務招待所，服務他們，送茶水、毛巾，提供椅子，讓他們坐下來抽煙閱報。

我很小心注意特務們的動靜，不久發現，他們有時在深夜一段時間，不在那裡。他們大概是覺得太無聊，偷偷溜走去散散心。在那時候，我也可以偷偷外出，不受跟蹤。

我不時感覺極端的絕望和沮喪。這樣過日，實在不像人的生活，既沒有工作，朋友圈子又愈來愈縮小，一天一天，一小時一小時，被捕的威脅，不斷懸在頭上。在這樣孤獨隔絕的情況下，我感覺幾乎快要窒息了。

王淦的來訪，變成一種刺痛了。國民黨「開明份子」仍然要我妥協，仍然想說服我靠向他們，仍然想使我公開向他們認同。他們繼續在談要爲我找一個職位。王淦不斷勸我接受他們的安排，他說那樣一來，既有工作，生活問題又可以解決，而且對我造成這麼大痛苦的監視，也可以結束了。

然而，相反地，我決心要逃亡。

精細計畫

我已願意要犯任何危險，但不敢告訴家人我決心要脫出台灣，或在這個企圖中身亡。依照國

民黨法律，如果家人知道我的計劃而沒有立刻報警，他們便會被看成同謀共犯，受到嚴罰。

有一個晚上，我悄悄地溜出，未被特務發現，按照事先約定，在一個地點與幾位親信朋友見面。我告訴他們，已下決心，要脫離台灣。這使他們震驚得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大家心裡清楚，這要冒多大的險。我提出可能成功的一個途徑，向他們說明。經過沈默躊躇，和熟慮之後，他們終於認為或許可以付諸實施。於此，我們開始一步一步檢討我們所須解決的難題。

第一個問題便是我到底要到那裡去？

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我到那裡去，便會使美國政府為難，國民黨會立即要求引渡，會使問題非常複雜，並且拖延很久。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為已有許多例子，日本警察與國民黨合作，將流亡在日本的台灣人引渡給國民黨，以換取日本欲從台北取得的好處。我要去的國家，必須是與國民黨沒有外交關係的。然，我不願意到共產國家，因為中共政府，與國民黨同樣，恨不得將台灣獨立運動消滅掉。我提出瑞典，朋友們都同意了。

於此，第一步驟便是寫信給那個非凡的組織，國際特赦協會。我有些朋友曾長期幫助我，將信件帶出島外，也從島外帶進來給我。在他們幫忙之下，我寫了一封短簡到斯德哥爾摩（Stockholm），請他們能否將我的案件告訴瑞典政府，問問如果我突然在瑞典港口或機場出現，身上沒有護照和簽證，能否得到政治庇護。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得到肯定的答覆。有些朋友勸我立刻離開，因為他們深深關切我的安危

。可是，那是不可能的。太多的細節須要安排，而且這些都必須依靠很間接而極費時的通信辦法。我們完全不能信任普通郵政。所有信件的寄收，必須在東京、香港、美國或歐洲，而必須等到有可靠的朋友出入台灣時才能託他帶出或帶入。我須要在台灣與瑞典中間幾個接頭站，找出既可靠又肯幫助的人。還有經濟問題也必須解決。我必須安排好一筆款項，在中途以及到了瑞典之後，作為費用。

旅途的計劃佔有了我的全部精神和時間，簡直好像要設計到月球的旅行一樣，其間實有太多的變數，不可知數和危險了。一個獨臂人要環繞地球半圈，而不被發現，是不容易的。

到了春末，大多細節都安排得差不多了。朋友們又勸我早走。可是，化粧的問題，是最大的困難。我認為在冬天可能容易些，因為那時可以穿大衣戴帽。我嘗試了各種化粧的方法，試留鬍子、把頭剃光。母親覺得我越變越古怪了。

仲夏，我開始讓監視我的特務們習慣於我長期不出門。我一出門，不論到那裡，他們總是跟着。我如果買東西，他們便擁向前看我買什麼，然後又要問店舖老板一些問題。有時候，我待在家裡整整二、三週不外出，然後再出現，坐計程車、公共汽車去買東西，或去餐廳、飯店等。有時候，我只在大學宿舍區附近走走，讓特務們看看我還在那裡。到了年底以前，他們已習慣於長久未看到我而不感奇怪。其實，我却常在半夜偷偷溜出，處理事情或看看朋友。

到了秋天，我開始感覺非常興奮，感覺生活有意義起來。我有事情做，有希望在將來，儘管

前途充滿着極大的危險。我發明了一套英文電報密碼暗號，送到島外朋友手裡，作爲緊急連絡之用。例如「祝女兒誕生」「叔父入院」「請速寄樣品」「書籍已寄出」「祝新婚快樂」等等，藉以表示我何天出發、出發延期、安全抵達等等。沿途接力站也都安排好，在那裡會有人接應我，並提供所需幫助。

有一段時期，看起來整個計劃似乎要垮掉了。紐約來的一封信說，那裡會有人聽到人家說「你知道麼？彭明敏可能從台灣逃出來」。是不是消息走漏了？差不多花了一個月多方查證之後，才發現那不過是有人信口開河，隨便猜臆而已。計劃照原來進行了。

整個計劃中，另一精細的部份，便是在出發日期決定以後，安排某些朋友，在適當時期到台灣來。有些對我是陌生人，由居間幫忙的共同朋友安排擔保，挺身而出面合作。他們是依照事先約定的信號，要認出化裝了的我，有的是要負責從頭到尾盯住我，一直到我安全離開台灣爲止。如果我被捕或當場被殺，他們則可以作證人。

脫出前夕

因知道我的房屋將會被徹底搜查，我開始整理文件，燒掉大部份。我的妻子、兒女似乎覺得這幾星期來我的行動相當奇怪，尤其兒子頗起疑心，但沒有說什麼。我花了許多時間，伏案寫遺囑給我妻子兒女、母親和其他親屬。另外，我還寫了一篇聲明，解釋我決心離開台灣的理由。蔣

介石以慈悲姿態特赦了我，但是我於出獄以後的遭遇，却使我日子無法再繼續下去。所有我的朋友和同僚却因為我的關係，都有危險。如果我被捕，以任何手段從我榨取得到的「自白」或任何所謂我親寫的文件，我在那份聲明中，事先予以否認。這份聲明將祕密存放於台灣，其副本三份則先送到香港、日本和美國，萬一我逃亡失敗，便將之公佈。我從少年時代一直保存起來的日記也全部燒掉了。

我小心計算要長好相當的鬍子需要多久，然後把鬍子刮得光亮，公開再露一次面。這時，要最後一次到高雄探視母親了。監視我的特務們已習慣於我南下高雄，因為我在過去也到過好幾次。我的母親那時身體不舒服，大多時間都待在二樓房間裡。他的房子是我大哥的緊鄰。她的電話裝在一樓，每有電話，她便需要走下樓梯。我這次去看她，決定給她裝一個分機在二樓，免得她為接着電話跑下跑上，覺得這是我能為她做的最後一件事。我去叫電器商安排這件事。然後我買了一束鮮花，到郊外拜掃父親墳墓。

後來才知道，母親那時以為我想自殺。她並沒有透露她的猜疑，但是我快要搭火車回台北前一兩個鐘頭，她突然很嚴肅地對我說「你必須要相信上帝，你一定要相信永生」。她帶着幾乎生氣的聲音說「你一定要有信仰，一定要相信，不然的話，你的生命沒有用了」。

我的心情非常沈重而悲傷。這將是我最後一次看到她，而我們的分離竟沒有比這樣稍微溫暖一些。以後才瞭解，那時她正在努力抑壓她內心深處的激動。

我回到台北，立刻隱居起來，開始養起鬍子。幾個星期之後，所有必需打的電報都已發出，化裝也準備妥當，依照事前安排，由海外也有人抵達台北。

最後一天到了。我打算半夜以後離開我家。要佯裝冷冷靜靜，若無其事，非常困難。我的兒子向他母親提醒我的動靜相當古怪，但是她避開了這些問題。當我的兒子女兒準備就寢的時候，我把他們叫過來，量一量他們的身高，他們覺得很迷惑。當我向他們道晚安時，其實在我自己心裡却是在說「何時再見？」了。

所有必需品，早已一件一件運到別處了。所以，我能夠如往常一般，半夜之後溜出家門，越過市區，到達一朋友家裡。第二天整天我都待在那裡。負責聯絡者，已與由海外來台的護送者見面，我還需要與也是由海外來、但未曾見面的一個人，依照預先約好的檢明身份方法，當面商討。也許由於人性弱點，我忍不住再與家人連絡，告訴他們我有事必須到台中一趟，然後還要環島旅行，約一星期以後才會回家。然後，我託付朋友兩封很厚的大信封，一封是我逃亡失敗時要打開，另一封則是要等到他們聽到我成功脫離國民黨掌握時才打開。第二天在朋友家裡，大都時間花在修飾化裝，使自己更能舒適習慣於這個新外貌，他們並為我照了一些照片。我發覺自己並沒有過份緊張，有的只是一種奇異的安靜感和懸而未決的心情，意識到我必須走最後、最終一步棋的時候，已經到了。

成功脫離台灣

我慶幸自己有能力控制情緒，甚至當在我心內默默向兒女說再見時。可是，在這最後晚上，我的朋友們使我再也無法自制了。在那最後那天晚飯時，他們開始唱起熟悉的聖詩，我忍不住跑入房間，哭泣起來。自從在日本和後來在加拿大，因太想家之外，我已很久沒有流淚了。朋友們相當尷尬。

按照計劃，還有兩小時我才離開那裡。有人提議玩撲克牌以打發時間。有一個朋友回憶說，他在結婚典禮之前也玩過同樣牌戲，以減輕緊張。果然，我們得以把令人難受的緊張，減少一些。

應該出發的時刻終於到了，大家反而鬆了一口氣似的。我們的計劃是分秒精確的。依照安排，我在此後的每一步行動，都有目擊者在附近，但我們要假裝彼此陌生，不得互相打招呼。我到達啓程地點，在那裡我立刻認出此後幾個鐘頭將在附近守候觀察的人。其他的人也安置好在適宜地點，密切注意我的一舉一動。

有一時刻，好像忽然發生阻礙，我陷入於被捕的危險，護送和守候的朋友們，後來告訴我，他們曾爲我捏一把大汗，幾乎要「死掉」了。

通過最後一道難關時，我回頭做了再見的手勢。我一直凝視台灣島嶼和其燈火，逐漸在視線

中消失。六年以來，我第一次，在精神和肉體上，感覺從無比的重荷，獲得解放。

中途路站

在第一個接待站，接應我的是我以前就認識的一個朋友，他已經爲我訂了一個旅館房間，整夜陪伴我。他只打了一個電話給他的太太，告訴她一切進行順利，我也很好。我們一直談到清晨三點，但是到了那時，我也睡不着。我開始感覺到這些日子來我所經歷的心身緊張。早上四點半，我們被叫醒，在黎明前黑暗中叫了一輛計程車，到達了出發地點。後來，這位朋友曾寄一信給其他朋友，描述他所目擊的情形：

我猜想不到他到底裝成怎麼樣子的了。然，我終於看到……，而在他後面，跟著這個笨拙的不得了披頭派。我的天！我已在當地旅館預定了一個雙人房間。因為時間不早，而我們又預計早晨出發，所以我想在旅館過夜是個好主意。這樣也較不會有人認出。還有，我們這個地區，每個人的立場如何，很難確定的。我們就是不願……認出……：……前往青年會旅館，我則與老彭在一起。老彭那麼興奮，根本沒想要睡覺，對於成功脫出台灣，好像還無法置信似的。我們一直談到三點半，我求求至少睡一個鐘頭。那混頭的旅館帳房竟於四點半就把我們叫醒（我要他於五點半叫我的），所以等於沒有睡一樣了。老彭五點半起來，開始梳理（化裝）亂髮，又調整拳擊手套，這真是一個天下奇觀。看到他把粗重的裝束一層一

層剝下來，又是最可愛景象之一。當他終於恢復人樣時，則可以看到這幾個月來他煩惱勞心的結果。他確實瘦得多了。可是，他的精神和閃亮眼神却一點兒都沒有變。

大約六點，我們叫了一部計程車，沒有多久就到了……。我花了幾天功夫研究所有的可能性……而發現每一可能性都有其潛在的危險。老彭不怕在……，所以同意我的計劃。我們覺得在……待一個至八個小時，總比在這裡等那麼久，來得安全些。但願我們的決定是正確的。

老彭很興奮，他開始走下樓梯，甚至忘了說再見。他忽然自己察覺到，轉過身來說再見和謝謝。我徹頭徹尾感動了。（又及，當我們坐在床上聊天時，我對彭說「想到世界上有那麼關心某些人的人權、尊嚴、自由和自我表達，而且還有人願意熱心幫助他，這不是太美妙了麼？」，彭想了一會兒後說「那就是這整件事情使人多麼謙恭的地方」。

我回到觀望的地點。上午七點十一分，注視着……。

這是我們所喜愛的人們新希望的開端，一個嶄新日子的開始。

在第二個接應站，我感到較安全，更輕鬆。在那裡閒盪了幾個小時之後，我又繼續旅程。在抵達瑞典的前一站，我由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給在里登戈（Lidingo）的哥威爾夫人（Mrs.

Gawell）。自從一九六五年我出獄以後，我們一直在互相通信。我知道哥威爾夫人以及瑞典國際特赦協會的朋友們，非常擔心我的命運。當電話接通，我告訴她我已成功地逃出台灣時，她高

興地大叫「這不可能是真的！」。我告訴她我抵達斯德哥爾摩的時間。

安抵瑞典

大約半夜十二點半，正月黑夜時，我抵達斯德哥爾摩。那天恰時那年最冷的一天。瑞典官員已獲通知我將會抵達，身上沒有任何旅行文件。氣溫是零下廿五度。有三對瑞典夫婦來迎接我，帶來了毛衣、長筒靴、手套、圍巾和皮帽。他們堅持要我當場將這些東西全部穿戴起來。我看起來一定很古怪可笑。我們便到一辦公室逗留約十分鐘，警察只是簡單記下我的姓名，然後很有禮貌地要求我隔天再回去辦理手續。我真萬確進入另一種世界了。

這些瑞典的新朋友們都非常仁慈。他們都是國際特赦協會很活躍的會員。他們知道我將要離開台灣的大概時間，所以直到接到我的電話以前，都非常擔心和緊張。他們知道這幾天在每一個政治逃亡者的生命中，是最緊要的一刻。後來聽說，那天來迎接我的朋友之一，隔天一早便接到另一位也是國際特赦協會會員的電話。當被問道「他怎麼樣？他看起來如何？」時，她答道「他看起來糟透了！」。顯然，我的化裝和鬍子給我一個最不引人的模樣。

他們用車把我運到一對夫婦家裡。他們非常熱誠地歡迎我，雖然那時已經清晨二點半了。在我的小房間裡有一束鮮花，又有卡片寫說「歡迎到瑞典」。我洗了澡，跌入床裡，筋疲力竭。可是，即使如此，在我入睡以前，腦海裡清楚地浮顯着二個不同世界的強烈對比，一個是這個文明

世界，另一個是我剛逃出的那個充滿恐怖和醜惡的政治世界。

第二天早晨，主人倫登先生（Lunden）和他的英國籍太太和哥威爾夫人陪我去補辦入境手續。第一件事，我須要作的即是向瑞典當局證明我確實是彭明敏本人。幸好，幾年前我曾把我一本法文著作，親筆簽名，送給哥德堡（Goteborg）的一名著名教授，現在他自願出面證明我的身份和學術聲譽。他們並去詢問其他熟悉台灣問題以及我在加拿大和法國的學術研究的人。瑞典移民局官員在每一個問題上都非常客氣，但他們仍然很謹慎小心地問我問題。我們面談過程超過三個鐘頭。

在瑞典要求政治庇護，必須得到內閣的正式批准，因此，須要等待一個月左右才能得到最後決定。在倫登夫婦家裡住了四天之後，我受邀搬到瑞典最負盛名的科學家伯納（Carl Gustaf Bernhard）教授家裡。他是諾貝爾獎委員會委員之一，後來就任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院長。他的家是一個大宅第，位置極佳，可以俯瞰斯德哥爾摩港口。我在瑞典期間，很幸運能一直住在那裡。

發佈新聞，台灣事後封鎖出口

瑞典入境手續辦妥，我能安全留在瑞典後，第一個問題便是何時、如何發表這個消息了。消息不能拖延太久，但是我們早先曾有約束，必須等到由海外到台灣來幫助我的人安全離開台灣以

後，才能發佈消息。當一切都妥當時，他們會以暗號拍電報給我的。

我離開後已十天了，但沒有信息傳來。我的逃亡隨時有被發現的可能。他們是不是被發現，被捕了？我開始深深煩惱的時候，信號終於傳來了。原來，於我離開後，他們感到極輕鬆，決定好好利用機會，悠閒地作環島旅行十天。

一到斯德哥爾摩後，我寫簡簡給在紐約的一個朋友，告訴他我已安抵瑞典，要他準備發表我已擬好的簡單聲明。可是，這個消息在紐約走漏，驚動了在日本的朋友們，打電話到瑞典來找我。於是我們決定應該立刻發佈聲明。然而，我首先打了一封公開電報給我太太，說「很抱歉不告而別，我現在安全，一切都好」。

我的太太收到了這份電報。電信局通知國民黨當局，但他們絕不以爲這是真的。他們首先認爲是同情我的人，故意打這種電報來，想引起困擾，或認爲電報拍得太早，我一定還在島內。立刻，緊急警報佈達全島，所有漁港、飛機場、基隆、高雄等都封鎖起來，凡要出境者都得經過仔細檢查。許多我的朋友或政治活躍份子都受詢問，他們的房子受到搜查。謝聰敏、魏廷朝、李敖被拘留幾天質問。

當局知道我逃亡後，立刻拘押我的太太、兒女和其他親屬。我的大哥在高雄被捕，以飛機押送台北受詢問。他們都受到廿四小時的疲勞審問，被釋放以前又受警告不得透露這場遭遇。他們都對這種嚴厲審問，表現得很堅強。

獲得自由後最初幾天，我在瑞典新朋友們圍繞下休息。但是非常擔心家人的處境。我的事件發生以後，從頭到尾，他們都表現出高度的勇氣、鎮靜和諒解。沒有任何人抱怨過。我的母親、太太、姊姊、哥哥們，還有我的兒女都給我極大的支持和精神力量，對抗國民黨、軍方、調查局和特務們的壓力。他們雖然不知我的逃亡計劃，却給我勇氣付諸實行。我的兒子，於我被捕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初中學生。他能感覺出這個事件對我們家庭生活的重大影響，但沒有抱怨。在我被捕以前，他在學校的表現非常優秀，事件發生以後他的成績跌落一些，但後來又回升起來。一九六四年九月，我的女兒還沒滿八歲，年紀太小，不能瞭解整個事件的意義，但仍很清楚這是個重大危機。我們的房子被搜覷，又被嚴密監視，但是她從來沒有表現出害怕的樣子，也沒有向她母親提起過，如此爲我太太省却了極不容易的解釋。在我逃走的時候，二個孩子在學校裡都表現得很好。

特務被整肅

我的逃亡成功，倒攪得賊窩大亂。國民黨高級官員起初確定我不可能在瑞典，因爲根據他們的紀錄，特務的報告，一直到我逃亡的消息在瑞典發表那天，亦即我離家約三星期後，我還不斷在台灣到處旅行呢！根據這些報告，我在這段期間，還住過台灣最好的旅館，在最好的餐廳吃飯，還看電影。在他們手裡的證據，却是特務們以監視和跟蹤我作理由所報銷的開支單。事實很明

顯，在我時常隱居起來的那些日子裡，或可能甚至從一九六五年我被釋放以後，以及我已離開台灣以後的幾個星期裡，監視我的那些特務和警察們，一直在呈繳虛偽報告，偽造收據和帳單，從中飽。

調查局許多高級官員失去職位，王淦被革職。局長沈之岳，以中國人方式，「自請處分」。雖然他被放過，副局長則被革職。那些應該廿四小時監守我的特務們被關起來。還有調查局的監督主管，也很可能收取一些比例回扣的人們，都不能倖免，上次曾在調查局招待所的聖誕樹邊，那麼惡毒威脅我的科長，變成被關的人中職位最高的。他是最高階層中的代罪羔羊，如今竟被控迫我得太厲害、太過份，才造成我的逃亡。

謠言滿天飛

在國民黨鼓勵之下，謠言開始散佈開來，謂我離開台灣是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協助。許多人懷疑中央情報局，因為他們無法想像，任何人沒有中央情報局的協助，怎能逃出台灣。不幸，因有許多人牽連在內，爲了不危及那些忠實的朋友們，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說明如何離開台灣。然而，我可以說除了給我政治庇護的瑞典政府以外，我未曾獲得任何外國政府的幫助。

我知道許多曾經支持我、主張對我寬大、對我表示同情和友愛的人，現在因爲我的逃亡，也許受到了騷擾。爲了要盡我所能來回報他們，我寄出一些信，說明我決定逃亡的理由。我却希望

這些信會被中途攔截、閱讀。給我的律師梁肅戎的信中，我簡單地解釋我覺得在國民黨特務政權之下生活已經無法忍受，並謝謝他過去對我的幫助。我逃亡以後不久，梁肅戎竟於公開聲言我是接受「共匪」資助的。對有些人，我為給他們這麼多麻煩，表示歉意，請他們諒解我所作的決定。

消息發表那天，我寄住的主人伯納教授正好舉行一個宴會。客人中有一位斯德哥爾摩最大報社的編輯。伯納教授以為可以幫忙他採得獨特新聞，便將我介紹給他，並簡單說明我以政治流亡者身份剛剛抵達瑞典。他很客氣，但似乎沒有多大興趣。隔天早晨，他頗悠閒地到市內編輯部辦公室上班時，立刻發覺許多電文從各方不斷湧來，探詢我逃亡的消息。他即時打電話給我，要求我廿四小時內不要對其他報社講話，這樣他可以做獨家採訪。其後幾天內，國際間激起了強烈興趣，歐洲、美國、日本報刊都對此事件做詳細的報導和評論。美國「新聞周刊」，也令其英國倫敦特派員飛至瑞典，來到伯納家訪問我和拍照片。有一個週末，伯納夫婦帶我駕車二小時多，到他們在海邊的別墅去渡假，忽然斯德哥爾摩電視台來電話，希望當晚要播出現場訪問，他們便派專車來，又把我接回去。

立刻有一怪信來，由「瑞典中國友誼協會」一類的會員寫的，那大概是國民黨在世界各地資助，進行游說的。這封信的收件人是我，却寄到蘇聯大使館！最後由該大使館轉交移民局，然後才送到我手中。信中罵我是個叛徒，又是個共產黨徒。

日本人的怪誕行爲

無名怪信之類，是預料中的事，並不重要，但是，對駐瑞典日本大使館的反應，我却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在我逃亡的消息公開以後，惱羞成怒的國民黨，立刻要求世界各國攔阻我，不准我入境。他們對於美國和日本，特別注意強調，因爲在這兩國，台灣獨立運動的勢力，正在增強，台灣人口也最多。國民黨對我發出通緝令，每一個國民黨單位却獲指示，對我加強攻擊誹謗，標明我是猙獰罪犯。

那時我還不知道華府的反應如何，但是我知道日本並無政治庇護的觀念，通常對這類問題非常冷淡。我聽到日本政府將我的問題提到內閣階層去討論，最後決定要與國民黨合作。剛在那時，日本與國民黨有一個爭執。佐藤內閣正受到國內很大壓力，要迅速擴展與中共的貿易，同時，日本却在台灣有巨額投資，其與台灣的貿易也獲利極大。國民黨則不斷對於日本與中共的貿易來往，提出抗議。我的案件，剛好給日本政府提供一個好機會，不花代價而能多少安撫國民黨。日本政府裡面似乎沒有人對於這類案子所包含的人道問題，感覺任何興趣。事實上，在日本已有前例，亡命在日本的台灣人被引渡給國民黨，成爲無情的政治經濟交易中的犧牲品。

駐在斯德哥爾摩的日本大使，接獲指示，要探知我下一站計劃到那裡去。結果弄得自己貽笑

大方。顯然，他們以為我會想設法潛入日本。於此，日本大使曾親訪瑞典移民局長，而被告以瑞典不清楚我的未來動向，也不管此事。其後，日本大使又派祕書到移民局，明白表示日本不會允許我入國。我根本不打算到日本去，所以這已夠可笑，而使得事情更加離譜的是日本大使又正式向瑞典政府提出要求，防止我到日本去。驚訝的瑞典官員只有指出，防止我進入日本，是日本政府的事，不是瑞典政府的責任，更何況，瑞典既無義務、也無權利指令我應該或不應該做什麼。

開始工作

在等候瑞典內閣裁定我的政治庇護請求期間，瑞典朋友們即開始為我找尋工作。大概是經過這幾年摧磨，我仍然感覺心身非常疲倦，但是為了生活，實在需要一個工作。幸好，國際特赦協會一位活躍份子的先生，是斯德哥爾摩人類博物館亞洲部門的主管，兼管斯文希登（Sven Hedin）探查旅行有關資料；那些書籍、文件、地圖都還未分類整理。博物館有這筆工作的預算，因此，我暫時得到了這份「分類專家」的工作。我寄住的主人伯納教授，非常親切幫忙，每天要到他教授醫學的卡洛林斯卡學院（Karolinska Institute）去上班時，順道用他的車子，載我到博物館工作。

一個月後，瑞典政府正式批准了我的政治庇護，發給居留權，我可以自由旅行了。這使我鬆了一口氣。

我又請求瑞典政府允准我的家人來瑞典，這也很快照准了。那時我已得知，我太太已經直接寫信給嚴家淦（行政院長兼副總統）請求允許帶兩個孩子離開台灣。她指出雖然我的兒子將到兵役年齡，因為甲狀腺分泌過多，不必入伍，有醫院紀錄可查。這封信曾以雙掛號寄出，且已有收條。可是對此並無回音，我只有認為我的家人被扣留做人質了。

美國的新聞報導我逃亡到瑞典的故事。立刻有些老朋友寫信給我。經過「新聞週刊」倫敦辦事室轉來從前的史坦福大學兩個學生寄來的信，她們都已結婚，一在紐約，一在加州。她們說願意盡力幫助我，其中一位曾在其朋友間展開寫信運動，希望能使美國國務院准我到美國。

很使我驚訝的，駐斯德哥爾摩日本大使館的奇怪活動仍然繼續着。或許日本千方百計想給國民黨一個特別恩惠，或許國民黨對於日本所急想要的某種事，開出了價碼。在我開始在人類博物館工作後不久，日本大使館的一等祕書便邀請博物館的亞洲部門主管共進午餐，並無技巧地想探知我如何找到這份工作、我生活得怎麼樣、我的將來計劃如何等等。他還是非常擔心我會企圖偷渡到日本，並明白表示如果我偷渡了，將會被捕並送回台灣。他又要求那位主管，如果我沒有去上班或顯示有離開瑞典的意向，便立即通知日本大使館。博物館主管直率地告訴那日本人祕書，他沒有意思為日本使館打我的小報告。這件事本應該就此結束，但是日本使館還是不時打電話到博物館查問我是否仍在那裡上班。

後來，一位我好友的日本人教授，聽到我講述這個故事，非常尷尬，很誠懇地為他政府的古

怪行爲，表示歉意。

訪問英國和瑞士

我在博物館工作了大約一個月，清理出一堆積壓而未分類的資料。伯納教授有一別墅在海邊，大約二個半小時的車程。我常隨他們和孩子一起到那裡度安靜的週末。

不久我開始收到國際特赦協會歐洲各分會寄來的信件和詢問。倫敦的占松館（Chatham House）、國際事務研究院、倫敦大學東方研究院、國際特赦協會倫敦總部等都邀請我到倫敦演講台灣問題，並討論政治犯的問題。時間表大都安排出來了。

沒有意料到，當我申請英國簽證時，問題複雜起來了。一延再延之後，邀請我去倫敦的主辦者向英國外交部探詢之結果，說是還在審查考慮中。層層官僚上去，直到有一星期日，我接到電話說我的問題正在由有關官員與英國外交部長本人商量中。最後，在我預定出發時間前不到廿四小時內，我才得到簽證批准。雖然那是星期六，在斯德哥爾摩的英國領事館通常不上班，一位官員特別設法讓我去，在文件上蓋章。

到達倫敦以後，我又再驚訝了。英國外交部指示其上下官員要避開我將參加的任何社交應酬或正式集會。比如，我在占松館演講時，並沒有外交部的人員在場。有人通知我，這種迴避不是針對我私人，而勿寧時與中共有關。當時，北京政府正扣留着一些英國人，英國與中共的關係，



極爲微妙。我則被形容爲「台灣獨立運動領導者」，而中共與國民黨一樣，堅決主張台灣應屬於中國，不論台灣人民願不願意。在英國外交部的立場上，如何得到英國人的釋放，絕對要優先考慮，任何會得罪或刺激中共的行爲都應盡量避免。

這是我第二次訪問倫敦。一九五三年初夏，我作爲年輕旅客去時，未曾留下深刻印象。這一次我深深愛上這個大城市了。在那裡的一星期，我差不多每天都去國際特赦協會的總部。有朋友事先告訴我，總部辦公處非常純樸，佔一棟古老狹窄的四樓房子，過度擁擠的房間裡塞滿了桌子、椅子、資料文件和人員。十多名專任職員，一些半工人員加上志願工作者們，以極奉獻的精神和很大的精力，推進工作。散亂的外表掩藏着他們極有效率的操作。我發覺這個組織實在能夠吸引了一些一流人材。它好像我這樣新近才得到幫助而重獲新生的人，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我回到斯德哥爾摩，又到博物館上班工作。不久，我又受到邀請到倫敦參加國際特赦協會英國分會的年會，發表演講，從那裡飛往瑞士日內瓦，訪問普世教聯（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與有關人士交換意見。

安排我到日內瓦討論台灣情勢，主要是由法蘭克夫人（Mrs. Richard Frank）負責的。她和她的先生都是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她的先生曾在美國國務院工作過，目前則在瑞士一個私人公司服務。她則在普世教聯日內瓦總部的國際事務委員會擔任行政助理。我在斯德哥爾摩的一次會議中認識了她。她年青美麗、充滿理想、爲實現較有人道和自由的世界，獻身努力。她對

於台灣和台灣長老教會的問題，深感興趣，特別爲我安排到日內瓦訪問，使我有機會與一些宗教的領袖們交換意見。

我由倫敦飛到日內瓦，法克蘭夫婦到機場迎接我，帶我到他們在郊外的家裡住宿。當天晚上，他們招待我到一個鄉村飯店。這是十年來，我第一次再度瞥見法國風的鄉村景色。我們舒適地坐在法克蘭夫婦家的客廳裡，幾隻大牛就在窗外安詳地吃青草。我們討論遠東局勢，以及台灣在中國世界的邊緣那不幸的處境。

其後數天，我接二連三，與普世教聯的一些幹部見面，討論台灣的政治和宗教情勢。我也與國際紅十字委員會本部的代表們見面。他們與我談話有一點不自在、客氣而冷淡，小心翼翼地想保持他們超然、中立、非政治的立場。他們在原則上是與政府、而不是與個人打交道的。相反地，日內瓦的紅十字協會則態度較開朗，似乎真正關懷任何人道有關問題。我提起我家人的問題，告訴他們我太太曾經上書行政院長，請求給予出境許可。他們也指出，既然「壞蛋」已經走了，而且瑞典政府又願意接受我的家人，國民黨實無理由再扣留我家人。顯然，國民黨是要留置他們，作人質的。其後，紅十字協會會非正式地向國民黨探詢，但沒有得到回應。

瑞士的訪問結束了，法蘭克夫婦送我到機場。後來他們搬回美國，先生在華府開業律師，專門接受「公益」(Public interests)有關案件，太太則在美國國會工作。我到了美國以後，每有機會到華府，都往見他們，有時投宿在他們在喬治街家裡。那時他們已有了二個小孩。到了

卡特當選美國總統，他們同時進入仕途，先生就任太平洋氣象局長，太太則任白宮內閣會議副祕書長，雙雙官運隆通，一時傳爲華府佳話。卡特下台，他們也隨着下野。先生重操律師業務。以後，不知什麼緣故，他們終於離婚了。

飛往加拿大

我回到瑞典以後，接到美國和加拿大朋友們來信，希望我去與他們見面，所以決定經由倫敦前往。我申請加拿大觀光簽證未發生什麼困難。所以經過倫敦飛往蒙特里爾，然後再到多倫多。在那裡與許多老朋友們，重敘舊誼，也與不少台灣留學生見面，忙碌了十天，飛回倫敦，停留約一星期。

在倫敦那個星期，非常有意思。我很高興能再與國際特赦協會的人士接觸，也看到台灣同鄉。這次，我有機會與「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的編輯交換意見。在那裡並且認識了印度駐倫敦的高級專員。我離開台灣時，他正派駐在北京。他說中共曾經公開叫囂，有時與國民黨的叫囂，不易區別。我是「中國的叛徒」、「美國從台灣引出的走狗，從事於兩個中國的陰謀」，等等一類說法。中共電台、雜誌，包括英文「北京週報」(Peking Review)都作尖銳攻擊，使得在北京的外國使節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在倫敦接到斯德哥爾摩伯納夫人打來的一通緊急電話，說她接到一個陌生人的電話，自稱是

剛由台灣抵達的中國人。他說渴望能與我見面，但是繼續對話下去後，伯納夫人便開始懷疑和困惑起來。他英文不流利，又夾雜一些俄語和幾句瑞典話，口氣有點魯莽。當伯納夫人告訴他我不在，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回來的時候，那個人變得激動起來，帶着諷刺的口吻說「彭與你們住在一起，而妳說妳不知道？那麼這是個祕密了？我再問妳一個問題，他拿的是什麼護照？」。伯納夫人很堅定地再告訴他她不曉得，然後掛斷電話。她感到非常困擾。她記得幾年前有一個政治亡命者在瑞典被槍殺，兇手却能搭飛機逃走。她便向警察局報告這件事情。

我離開瑞典一個月後回到斯德哥爾摩時，機場的警察主任在飛機旁守候，伯納教授也在場，帶着他的彪大德國狼狗。我們安全返抵家門，覺得非常快樂輕鬆。隔天，我們就到海邊別墅，駕船渡假。

第十三章

從美國看台灣

抉擇去向

我一直寄宿在伯納家裡，一切都 very 舒適愉快，但是不是就這樣在瑞典永住下去？我猶豫難決。

瑞典是高度的福利國家，當局對我的生活和工作，相當關心。不久，接到通知，我被任命爲人類博物館的正式研究員，待遇也算不錯。在這個美麗、人情又濃的國度裡，定居下來，安心工作，實在是一個大的引誘。可是海外台灣人，尤其在北美洲和日本的，強烈要求我應盡早想辦法，移居北美或日本，因爲那裡台灣人最多，台灣人運動也因我來到海外而急速發展起來。

在我內心的奧底，無可否認，有一重沈重的責任感，使我深深感覺，我實在有義務爲了台灣和台灣人的將來，盡一點力量。對於大多台灣人來說，我在這「天涯海角」的瑞典，安逸久居，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

還有語言也是一個問題。雖然瑞典人大多能講流利的英、法或德語，我到達以後，不論要做什麼事情，未曾遇到任何不方便，但是如果我決定久留，還是要學得瑞典語，這在時間、精力和心理上，對我將是相當的負荷。

所以，我決定探究到北美的可能性。

密西根大學

我與美國學界再度聯絡上。

我於一九六五年被釋放而受軟禁期間，密西根大學曾連續兩年，寄來聘書，雖然我無法前往。如今，該大學法學院教授格雷（Whimore Gray）來信說，他們對於過去我在台灣時與他們討論過的研究計劃，仍有興趣。那時，他剛要到莫斯科一趟，打電報給我說他願意到斯德哥爾摩某時某地與我見面，要我打電報到布拉格他將住宿的旅館，確定這個約會。我打了電報，到了他所定的時間前往他所指定的旅館去，但沒有看到他。約十天以後，他才由密西根打電話來，說在布拉格沒有接到我的電報，所以沒有去瑞典。他問我對於前往密西根大學研究是否還有興趣，我

答說有。

在其後接着的長久通信中，我對於密西根一直對我有興趣，願意給我研究的機會，表示感激。密大的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穆爾飛（Rhoads Murphey）教授也加入通信來往，最後決定，我的聘書由密大法學院和中國研究中心共同發出，法學院提供研究室，中國研究中心則成爲我的研究基地，我的研究題目將是國民黨佔領下台灣的現行法律制度。

密西根大學問我能否自一九七〇年四月開始工作。那時已是二月，而有許多手續要辦，包括申請美國簽證等。

當我的瑞典朋友們知道我打算到美國時，他們都極力反對。從瑞典人的觀點看，我這樣做，是非常危險的。歐洲報紙每日載滿着美國城市裡的暴力、法律和秩序的崩潰。他們認爲我此時到美國是等於要自殺了，國民黨容易計劃把我暗殺。我在與美國的通信中提出這個問題，也向前來訪問我的美國記者們詢問。他們却都認爲在美國許多城市裡街頭暴力雖是個嚴重問題，國民黨如想傷害我，則愚不可及，因爲國際輿論的指責將會嚴重損害國民黨的名聲，甚至可能成爲致命傷。

雖然我很清楚，政治行爲，尤其國民黨中國人的動作，未必會服從理性，或遵循朋友們所提出的邏輯，我還是決定申請簽證，前往美國。

美國領事的躊躇

一些美國朋友，曾向國務院爲我私下探詢。在正式申請簽證以前，我們要確實知道，我的申請有獲准的可能。美國國務院並沒有承諾什麼，可是大家都比較樂觀，認爲可能會有拖延，但問題總可以解決。

有一天，我帶着伯納教授的一封介紹信，到在斯德哥爾摩的美國領事館，填妥申請觀光護照的表格，遞交給副領事。他講得令人洩氣：我是個政治亡命者，又無常久職業，難以視爲真正的觀光客。不過，他答應將我的申請呈送華府。

一九七〇年四月廿四日，兩位台灣青年，在紐約一旅館門前，企圖槍殺蔣經國。我的朋友們因此變得悲觀起來。他們相信現在國務院一定極不願批准我到美國。據說國務院覺得我逃離台灣所造成的傷痕，在台灣和中共，都記憶猶新，現在批准我到美國，仍嫌過早。

新的學年日漸接近，我們決定採取行動。七月卅一日，我提出密大的聘書，再正式申請，這次申請的，却是「文化交流」簽證。美國領事館已等著我再度前往，請我進去與一位領事和女副領事談話。我開頭便說，我瞭解這是複雜的事情，但是開學在即，密大和我都須要知道此事如何決定。

領事雖然客氣，但也坦白表示使館爲此事感覺爲難。他問「你申請簽證的目的是什麼？」。

我指着桌上的密大聘書說這不是很清楚地說明我的目的麼。

「你會不會從事於政治活動？」

「你如何為政治活動下定義？」我問道。我指出我的專門是公法和政治學，我一生只致力於研究和教學。我認為我的專業職務包括讓世人知道我對時事的看法。如果我到美國，這將也是我職業的正當範圍之內。依照我的觀點，對於政治提出專業的評論，並不構成政治活動。

領事說「不過，假如一個退休的大使建議承認中共，我便會認為那是政治活動」。然後，他問我，是否要尋找新聞界人士，表達我的看法。我說「我不知道會不會去尋找他們，不過，如果他們來找我，我不會拒絕評論當前的時事」。

領事下一個問題，使我有一點驚異。他說「你會不會讓你的名字被用作信紙上頭銜？」。我回答說那不太可能，我從來沒有想到那種事情。然後，他又問我，如果我的申請不獲批准，我會怎麼辦。我只能說我不知道；心裡却很想告訴他「我不會因之自殺的」。

領事又指着申請表格上細字註釋，說「也許你已注意到這一條裡，有一項問題，關於犯罪紀錄的。你有沒有看到？」我回答說，當然看到了，但我不認為我的案件是個犯罪的紀錄。

他又問道「可否請你將你案件的細節寫下？」我回答說那大可不必了，在台北的美國大使館裡有我的完全檔案，相信如果去要，他們一定會提供全部資料。

領事似乎有一點訝異，說「你要瞭解，每一個領事館都是獨立作業的」。

在這種相當尷尬的氣氛中，談話結束，領事最後說，最終決定是在華府做的。

姐姐被迫辭職

中國傳統觀念的「罪及九族」，起了作用。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自從創辦以來，一直由我姐姐擔任校長。自我被釋放以後，當局便開始加以壓力，要強迫我姐姐辭職。可是該校董事會，不管董事長蔡培火與國民黨的勾結，一直抗拒這種壓力。但是如今我逃離台灣，國民黨的態度，蠻橫起來。董事會接到通知，如果我姐不自動辭職，教育部將直接干預，命令解散董事會。國民黨有人告訴我姐姐，勸她自動辭職，暗示廖文毅的例子：他的嫂嫂被判十二年徒刑，她的兒子則被判死刑，直到廖放棄在日本的政治活動，回到台灣接受等於俘虜一般的生活時為止。

這樣的暗示已夠清楚了。主辦該校的長老教會提早召開總會，於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接受了我姐姐的辭職，但拒絕當局的要求以「無能」作為理由。

同時，有位遠房堂兄的太太，她一向喜愛到國外旅行，忽然接到通知，她的護照已被吊銷，從此不准再出境了。

獲得簽證

自我申請美國簽證之後四週，在美麗的夏日與伯納一家人在一起，我開始知覺我多麼深深愛

上瑞典這個國家、多麼喜歡瑞典的朋友們。我可以猜得到，伯納一家人暗地希望我最後不能獲得赴美。伯納教授因公出差到紐約和波士頓，在那裡，他曾與一些出版社接觸，想解決我的經濟問題。回來以後，他勸我不要再想到美國去，說「留在這裡，寫一本書吧」。

除前往密西根大學以外，我還沒有心情構想長期嚴肅的計劃，而且我又沉醉於斯德哥爾摩美麗愉快的氣氛以及伯納和瑞典朋友們的溫情裡。我們喜愛一起談笑，也多次到海邊別墅歡渡週末。

六個禮拜過去了，我還一直等着美國領事館的回音。九月有一天早晨未到八點鐘，電話鈴響了，年輕的副領事的聲音傳來，「恭喜！華盛頓來電說你的簽證批准了。還有一些手續要辦，不過請你先去作身體檢查」。

九月十七日，我帶著文件到領事館領收簽證。這次接待我的是與前不同的領事，氣氛也顯得較愉快，他也恭喜我，還恭維了一番。顯然，他已對我過去的經歷，相當清楚，他遞給我一切文件，裂嘴笑道「當然你瞭解你是要到大學去作研究的，我們希望你不會與你原來的目的走偏差了」。

當消息傳開，我已獲准到美國時，國民黨立刻向美國駐台大使提出強烈抗議，駐華府的國民黨大使也親自到國務院，強調國民黨的反對。

當我獲得簽證時，我接有兩項邀請，一是到瑞典一所大學演講，另一是到在挪威奧斯陸（

Oslo)舉行的國際特赦協會全球年會演講。前者不得不取銷，因為我決定取道挪威和英國赴美。

要離別伯納全家和瑞典朋友們，以及離開瑞典是件非常傷心的事。這個國家、這些朋友們，在我性命危險時，給我庇護和照顧，溫暖仁慈地接納了我，這使我永遠難忘。

在國際特赦協會演講

國際特赦協會全球年會，在挪威奧斯陸郊外山區極優美的滑雪勝地舉行。在那裡又遇見了許多倫敦和斯德哥爾摩的朋友們。我以全世界政治犯代表的身份，發表演講：

世界各地因以言語或行動忠實表達良心而遭受懲罰的人們，雖然時間和空間把他們隔開，雖然他們彼此未曾晤面也不認識，但他們之間似乎有一種無形的心靈聯繫，使他們緊緊團結在一起。這種聯繫所以使他們感到親密如戰友，不只是因為他們處於相同的困境，更且特別是因為他們對於某些基本人權有共同的信念（雖然他們對於某種政治和社會問題，立場不同）。基於在這些人們之間所存在的無形心靈團結，請容許我代表他們，講幾句話。

首先，我代表那些像我這樣，曾遭懲罰，關在監獄裡一段時間，然後倖倖地能擺脫那不幸的境遇而重獲自由的人們——謹代表他們我想說的是，言辭無法十分表達我們對於國際特赦協會的感謝。我們能重獲自由，深受這個團體的幫助；它使我們重新發現自由的真正價值。

第二，我代表那些已被國際特赦協會接受，但是仍在世界各角落的鐵窗後面受難掙扎的政治犯們——我謹代表他們，對你們已經所做和目前正在做的努力，表達最深的謝意。他們知道責會的努力未必能使他們立刻獲得釋放，但是這些努力不斷提醒他們，他們並沒有被遺忘。他們感覺鐵窗外仍有人關切他們，這帶給他們無限的安慰和喜悅，如果在牢獄內還有什麼喜悅可言。他們雖然生活在心身苦刑、痛苦羞辱之下，你們給他們活下去的唯一希望，給了他們道德力量，鼓舞激發他們，使他們不致對於人類完全失去信心。

第三，我代表那些因為忠實表達良心以致身繫於獄，但還未為外界和責會所知的人們——我謹代表他們，想傳達他們拼命呼救的聲音，緊急呼籲對於生活在黑暗和絕望的這些人們，儘速給予一切可能的救援。

最後，我代表那些因為忠實表達良心以致招惹麻煩，雖未被捕，却有隨時可能喪失自由的人們，我謹代表他們渴望責會的存在能發生防阻作用，其全球性活動能減輕他們所面臨的危險，對他們發生某種保護的效果。

不幸，我們已習慣於在口頭上以不同的方法將此世界區分起來，例如西方與東方、基督教與非基督教、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自由與奴役、文明與非文明、開發與未開發，諸如此類。然而，相信我們之中有許多人已經活得夠久、見得夠多，而十分瞭解這種二分法是多麼膚淺而且無意義。

如果必須將此世界區分為二，唯一有意義的分法便是一個世界認為自由誠實的良心表達是最高的美德，應予表揚，另一個世界却認為自由誠實的良心表達是個無可寬恕的罪惡，應予嚴罰。

我誠摯希望國際特赦協會不僅是「良心犯」的保護者，將來更能成為「人類良心」的守護者。

謹代表上面提到的所有人們，從心底最深處再向你們致謝。

抵達美國

在一九七〇年國際間頻繁發生劫機事件時，我由奧斯陸，經由倫敦、蒙特里爾，飛往底特律。在倫敦機場，所有旅客都須經過搜檢，所有行李也都要卸下，實施徹底檢查。

九月廿九日下午，我通過底特律海關，十年來首度再進入美國。上次我到美國時，我拿的是國民黨發給的外交護照，這次我却作爲政治亡命者，手持瑞典政府所發的無國籍者證件。

第二天，我便到密西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見其主任穆爾飛教授，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談話。

他很技巧地想知道我在美國是否打算作政治活動、關於此點，我與國務院之間有無諒解，換句話說，國務院有無從我取得承諾，限制我的言論和行動的自由。我告訴他我如何向斯德哥爾摩

美國領事說明此點：我仍然自認是個學人，打算專研法律和政治，而在我研究的過程中，無疑將會對當前政治問題，提供意見。

穆爾飛教授接着就說，他看不出理由，我為何不能享受與美國同行教授一樣的自由。

我應邀到密大，可以研究自選的任何題目，我曾提出計劃，要研究「台灣「國家緊急狀態」的法律和政治」。密大最初發聘書給我是一九六八年，其後我雖然受着監視，他們還是繼續發給聘書。對於許多研究中國的學者來說，台灣只是「中國的一部份」，也是他們能夠接觸並前往研究的唯一部份。所以，他們之間產生了一個疑問：彭明敏在「中國研究中心」的存在，是否會危及它與國民黨的微妙關係呢？研究中心有些同事曾建議，應對我警告，不要參與政治活動而影響研究中心的利益、傷害其與國民黨的關係或損害密大在台灣的研究計劃。但是，他們經過討論之後，決定由個別同事讓我知道他們每個人的想法。有的，照辦了。

我發現密大的學風，刺激鼓舞。不久，我的研究計劃擴充到包含近一百年來台灣在國際上的地位。

演講旅程

不久，我開始受到邀請，向學術團體、教會組織、國際關係的公衆論壇、台灣人學生和其他團體，作公開演講。我利用週末、假日或學期間空檔，奔波於美國城市間，出席討論會，會晤各

界人士，向對於國際事務有興趣的團體演講。報紙和雜誌也向我索取有關台灣問題的稿件，或派記者訪問。

我首次離開密大的一次旅行，是到堪薩斯曼哈頓的州立大學，參加近三百名台灣留學生舉辦的感恩節餐會。那些學生們的熱情，使我深深感動。

我也被邀到西海岸諸大學，如加州理工學院、史坦福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等。有一度我到哈佛大學法學院滯留二週，向法學院學生授課和公開演講。其他，美國主要大學和學術團體幾乎都過有我的足跡。

論及台灣問題時，我所強調的是下列幾方面：

一、台灣島內的政治情勢，有如時鐘停擺了廿多年似的。台灣的政治日曆仍指着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流亡到台灣那一年。從那時起，一直在停滯着，國民黨所持態度，一成不變，堅持它是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共產黨控制中國，只不過是共產黨一時「叛亂」，國民黨不久會「收復」全國。說過去廿多年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是以「虛構」和「神話」作為根據，已沒有什麼新奇了。它是「虛構」，因為自稱是全中國的政府；它是「神話」，因為它說不久會收復中國。

二、內政上，一九四九年國民黨在台灣宣佈戒嚴，繼續到現在，而且依其說法，這個戒嚴將維持到它收復中國為止，也就是說，要無限期維持下去。廿多年來，國民黨所實行的，可以說是「國家緊急政治」，憲法的保證已被停止，示威、請願、罷工都受禁止，違者可處死刑。它以應

付「國家緊急危難」作爲藉口，採取「緊急」政策，通過「緊急」法令，建立「緊急」慣例。這種情況的荒唐怪誕處是那些所謂「緊急」措施的引用，已經不是真的爲了要解除國家的危險，而竟是爲了要延續「緊急」狀態本身，因爲祇有這樣，國民黨的權力和壽命才能維持下去。國民黨爲了保存其政治神話，實施多年的「國家緊急」政策，已經對於台灣社會產生毀滅性後果。

三、國際局勢也不令人樂觀。國民黨政權，事實上已不代表任何人，却廿多年來在國際場面，在名義上繼續代表中國，這實在是天下怪事，嚴重破壞了國際秩序。我們說國民黨不代表任何人，因爲中國人於廿多年以前已很明白地摒棄了它，所以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它也無法代表台灣人，因爲廿多年來它未曾在台灣舉行中央級的普選，台灣人佔全島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中央立法機關却僅有百分之三左右席位。

四、另一方面，在其他國家一些開明進步的領導者之間，產生了一種令人擔憂的新傾向。他們對於國民黨的荒謬神話，極感厭惡，因爲這種神話對他們的理性、智慧和常識，確實是一大侮辱，其結果，他們亟思排拒之餘，倒向另一極端，竟於擁抱另一套新的神話。這些新神話，比較舊的，更不切實際、更無建設性。這套新神話如下：台灣一向是、所以將來也必須成爲中國的一部份；爲了要使中國恢復完全主權、重建國家自尊，必須乾脆讓它併吞台灣。

五、那些只不過是另一套神話，但是它爲強烈的衝動情緒所支持和滋養，而其原因是不難理解的。第一，西方列強由於長期對待中國不公並常加羞辱，所以時常有一種深刻的罪惡感騷擾其

良心，徘徊不去；第二，其結果，西方列強常有一種欲望，想向中國彌補這個罪惡；第三，西方目睹新中國令人目眩的誕生、成長、躍進和痙攣，不覺迷住著魔了；第四，西方面對中國崛起成爲主要核子強國的可能性，心裡的恐懼難免纏繞漸長。這些情緒——罪惡感、迷惑、著魔、驚惶、害懼——在某程度上，是正當的。可是，出於上述複雜的情緒，溫馴地接受中國的一切要求，無條件地將其認爲正當合理，是極不負責任的。那些趨向這套新神話的人們，其真摯動機，不容置疑，但我不得不懷疑他們對於台灣的情勢，到底有多大瞭解。針對這套新神話，有關台灣的一些事實，必須指點出來。

六、第一個新神話：「台灣一向是、所以將來也必須成爲中國的一部份」，這點必須從歷史和國際法的觀點加以檢討。誠如研究台灣史的一位學者所指出，台灣的歷史主要是島上住民追求自決和自治的紀錄。綜觀台灣歷史，在這塊邊遠島嶼上定居的漢人移民，一向不斷努力掙扎要減少大陸中國人對此島嶼的影響，甚至企圖完全擺脫大陸的控制。這可以從每一研究台灣史者都熟悉的一句話得到證明：「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另一方面，中國歷來對台灣的態度又不是什麼關懷照顧。中國一向將台灣看作蠻夷島，住的都是叛徒、土匪、海盜、怪人和鴉片中毒者。或許台灣確曾如此。十七世紀，由於台灣帶來太多麻煩，北京朝廷甚至考慮將島上漢人全部撤走。直到十九世紀末葉，當外國遇難船隻的船員登岸而被台灣原住民屠殺時，中國政府竟謂它不能爲「在其管轄外」所產生的行爲負責。一八六九年，中國政府甚至允許台灣原住民的十八個部落

首長，正式與美國締結條約。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這造成台灣住民極大不滿，怒責中國竟拿他們來做犧牲，導致台灣人企圖擺脫中國和日本的控制，自己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民主國」。這個國家只維持了一百四十八天，但是這個事件實象徵着台灣和中國的歷史關係。日本統治台灣半世紀，其間，台灣在政治和文化上，與中國完全斷絕關係。然於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黨接收了台灣，但是四年之後，於一九四九年，台灣又再度在政治上與中國分離，從那時到現在，台灣和中國分別由不同的政權統治。換句話說，一八九五年以前，台灣與中國的聯繫極爲鬆散，幾乎只是名義而已，而且其關係動盪不已；台灣不斷試圖脫離中國的控制。更有甚者，自一八九五年到今天的七十五年中，台灣和中國政治統一只有四年，即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而那四年却絕不是台灣史上最快樂的時光。就在這段期間，發生了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事件，台灣全島蜂起反抗中國統治，結果二萬以上台灣人領導精英，全部被中國人屠殺了。

七、台灣居民到底是誰？全島一百四百萬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台灣人。當然，他們是漢人後裔，但是他們祖先在十三世紀便開始移住台灣，一直繼續到一八九五年，日本領台以後，禁止漢人移住台灣，切斷了與中國一切接觸。台灣住民幾世紀來所經歷的，是與中國人完全不同的體驗，其結果，他們產生並發展與中國人不同的性格和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約二萬萬中國大陸人加入了台灣當地人的經驗，進一步塑造了台灣的特性。時至今日，要將台灣人看做

中國人，是與將美國人或澳洲人看作英國人一樣，並不正確。

八、從國際法的觀點來說，自從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以後，直到現在，並沒有任何條約或其他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將台灣重新劃歸中國。一九四三年開羅宣言和一九四五年波茨坦宣言都宣稱台灣將給予中國，但這些宣言並無法律約束力，只不過是盟軍戰爭目標的聲明而已。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日本簽署於投降文書，接受上述兩項宣言，這最多也不過是日本承諾將來願意放棄對台灣的主權而已。一九五一年日本與盟軍所訂和約和一九五二年日本與國民黨所訂和約，都僅規定日本放棄對台灣主權以及其他一切權利，但這些條約並未曾指明日本放棄台灣以後，誰取得台灣主權。另一方面，一九四一年大西洋憲章明白規定「任何領域變更，不得違背有關人民自由表達的願望」；聯合國憲章第一條規定「權利平等和人民自決的原則」，應為國際關係指導原則之一；聯合國憲章第一〇三條又規定如果聯合國會員國在憲章下的義務，與它們在其他條約下的義務，互相衝突，則在聯合國憲章下的義務，應該優先。依據上述，有關台灣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不但原就缺乏法律效力，並且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規定和精神，應該視為已由後者所取代。因之，從法律觀點來說，台灣只能說已由日本剝離，但並未隸屬於任何國家，也就是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台灣的國際地位，一直未曾確定。當然，我不能說一切國際事務都能完全依照法律解決，但是，鑑於台灣目前內外情勢，其國際上地位還未解決這一事實，應對其將來有極大影響。

上面是我針對於「台灣一向是、所以將來也必須成爲中國的一部份」這種新神話，所提出的一些事實。從這些事實，可以清楚看出，這第一個新神話是多麼的誤謬。

九、第二個新神話是：「爲了要結束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爲了要使中國恢復完全主權，重建國家自尊，必須乾脆讓它併吞台灣」。但是，如今的事實是，共產革命之後經過廿年，新中國已經結束了從前的半殖民地地位、已經獲得國際承認爲完全主權國家、已贏回了國家自尊。也許西方人的良心，應爲過去西方對中國所加諸種羞辱，深感困擾，可是，西方國家不應出於這種罪惡感，將新中國所提出的各種需求，無條件接納。無論如何，中國有關台灣的情緒化主張，實在與其半殖民地地位、恢復主權、國家自尊等，沒有關係；它是與內戰、國民黨的苟延殘喘，有關係的。事實是，在本世紀初，中國在努力掙扎要贏回主權和國家尊嚴時，台灣從來未曾是主要問題。中國已經接受了台灣已經在法律上永遠與中國分離這個事實。毛澤東本身已經承認台灣永與中國分離了。只是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黨流亡台灣，在美國支持之下，繼續向中國挑戰，宣稱要收復中國，並作煽動性宣傳——在這時之後，中國才開始對台灣提出這麼情緒化的主張。

當一些西方國家，基於上述第二種新神話，認爲應將台灣交給中國，作爲西方與中國和解的代價的時候，上述歷史事實和實際現實，必須提出來強調，提醒各界。

十、如果揚棄一切「虛構」和「神話」，認真尋求台灣問題的真正解決，有一些基本要點，必須考慮到；第一，就美國而言，如果它認爲可以永久維持軍事基地在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

第二，就中國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併吞台灣，那是不切實際的；第三，就國民黨而言，如果它以為可以永遠在台灣實行極權統治，那是愚不可及的；第四，就台灣居民而言，因為台灣的政治地理關係，如果他們以為可在與中國處於敵對狀態之下生存下去，那是不切實際而且愚昧的；第五，對於台灣人民來說，要無視他們獨特的歷史以及其所產生的民族特性和認同，並否認他們自治和由本身來決定自己命運的願望，是極不公平的。這種願望是自然、天性、正當的。在討論台灣問題的解決辦法時，必須接受一個基本前提，即：除了台灣人以外，沒有人能代表台灣人發言；無人有權指令他們應歸屬於何處或何人；沒有人有權要求他們接受某一外來勢力的解放，因為真正的解放只能來自有關人民本身。

真正解決台灣問題，應由台灣人自己來探求，也就是說，台灣人應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

十一、我知道中國人不易瞭解現代國家的建立不是以種族、文化、語言或宗教等，作為基礎，而是以共同命運和共同利益的信念，作為根基。後者是從共同的歷史所產生的主觀感覺，未必與那些客觀的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等因素有關。在近代歷史上，有許多例子，相同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的人們，却分別成立不同的國家，因為他們缺乏上述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相反，也有許多例子，種族、文化、語言、宗教背景不同的人們，則構成為單一國家，因為他們具有共同命運、共同利益的信念。沒有一個國家有權單單基於某地域住民的種族、文化、

語言背景與其相同而對該地域要求主權，而無視該地域住民的意願如何。

十二、中國必須接受一個原則，即一群住民，在某種地理和歷史條件之下，有權決定自己的政治前途，甚至構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不管他們的種族、文化、語言、宗教的背景如何。

中國人必須捐棄那種陳腐封建的成見，認為任何漢人後裔，不論在歷史上和地理上與中國多麼隔閡，都應屬中國統治。中國人必須學習將種族、文化、語言與政治、法律，區別清楚，不再認為凡種族、文化、語言上與中國相同的，在政治法律上，也應該屬於中國，不再把要求自決的漢人後裔，咒罵為「漢奸」。有些中國人，為自己方便，歸化為另一國家公民，如美國公民，並不是對中國的叛逆，同樣道理，一群漢人後裔，基於歷史和政治現實，表示正當願望，要求成立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建立自己的國家，也不應當做叛逆。中國人應該瞭解，一個人可以為漢族和文化遺產，感覺自傲，但同時仍希望在政治和法律上，與中國脫離關係，就如同艾森豪將軍，驕傲自己是德國人後裔，但這並不阻止他領導盟軍，攻打德國，顯赫永代。

十三、國際組織，尤其聯合國，如仍有存在價值，在國際政治中欲扮演重要角色，那麼，台灣問題正是一個典型案子，它們應該採取行動，幫助設計公平解決的方案。

十四、那些主張根據自決的原則，解決台灣問題的人們，被視為「台灣獨立運動者」。很明顯地，台灣人痛恨現在台灣的獨裁政權，但他們同樣反對中共政權。他們渴望從中國國共兩黨永無止境的衝突糾纏中，徹底解脫出來，所以一旦有自由選擇的機會，台灣人必會建立自己的政治

體制，與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隔離。

十五、因爲中國對台灣的強硬主張，有人對於台灣做爲獨立的政治實體能否生存，表示懷疑。中國不斷誓言要解放台灣，是因爲國民黨繼續在台灣，不斷公言要攻擊中國，故意在台灣海峽從事挑撥，藉此拖延內戰，使得台灣與中國之間永遠處於敵對地位。可是，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國民並無怨恨，相反地，願意與中國人，友好共存。台灣人一旦從國民黨政權下解脫，自己建立一個真正的代議政府時，他們會向世界宣佈，與過去中國人的內爭，完全斷絕關係。這個新政府將不會遺餘力與中國建立密切的經濟、商業和文化關係。祇要中國不干預台灣內政，不阻撓台灣社會、政治、文化的自由發展，台灣甚至將願意與中國研究出一套可能方式，以利兩國基本外交政策的協調。如此，台灣將可以自由而極力幫助中國的經濟、社會和工業建設。同時，台灣也會盡力與世界所有國家維持密切而友好的關係，不管它們的政治思想如何。

十六、中國應該瞭解，承認並尊重自由台灣，比強迫併吞台灣，獲利較多。他們實無理由要堅持征服台灣，那樣只有對它自己的形象、聲望和基本利益，造成極大的損害。如果真的像一些人所說，中共領導者們，儘管經常發表激烈言論，其一舉一動却相當謹慎而講求實際，那麼，他們總會有一天被說服接受上述安排，會發現這種安排是實際、公平，對大家有利。如果中國夠實際到能容忍只要數小時即可以拿下的香港存在，或不到幾十分便可以拿下的澳門存在，如果它夠實際到能容許新加坡的獨立，儘管新加坡國民絕大多數是漢人後裔，那麼，有什麼理由中國不能

對待一個友善和平且提供相當好處的台灣，也一樣地容忍、講理和實際。台灣的地位，當然與香港、澳門，新加坡不同，但是中共領導人們，儘管言辭好戰狂熱，有一天必不得不趨向實際，所以，一旦向他們挑戰的國民黨除去之後，談判和妥協的可能性不少。台灣前途的各種障礙和困難，不可低估，然而，台灣的僵局是沒有簡便的方法可以打破的。

國民黨的侵擾

當我旅行各地的時候，國民黨特務的反應，都有些共同的型態，不論在麻州、密西根州、加州、威斯康辛州、俄亥俄州或加拿大。顯然，他們以為散發一連串謗傳單，形容我為「共產黨徒」、「失意政客」、「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務」、「日本走狗」，這樣就能毀滅我。紐約一中文報紙，好幾天連載有關的專文，幾乎描寫我成為強姦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大壞蛋。

每當公佈我將在某地出現，國民黨特務便事先散發這類傳單，接着是動員該地中國留學生。國民黨領事和其他代表會邀請中國留學生吃飯，會中說明我的「叛國劣跡」，鼓勵學生抗議我的出現，其方法包括舉牌遊行、騷擾會場、打斷討論等。在每次場合，都有中國學生提出相同的問題來問我，使我感覺這些騷擾計劃缺乏創造性、不富於想像力。他們所問的，千篇一律，有的簡直莫名其妙：「你說台灣沒有自由，那麼，你怎麼能夠逃離？」我的回答是「如果有人設法逃出了監獄，這並不表示監獄裡存有自由或民主，恐怕只是證明逃出的人比看守的人，較聰明而已」

。聽衆總是會大笑起來。

另一必有的質問是：「你說台灣那麼糟糕，那麼，你怎麼能夠在那裡教書、當教授系主任，又任聯合國代表團顧問呢？」我答說我是依靠本身的學術成就成爲教授的；我是研究政治的，而越研究台灣的情況，越覺得不能忍受。

貫穿所有質問的，是對我的道德批評：我在台灣從蔣介石獲得私人恩賞，得到高位，如今我竟於背叛了他。我必須向聽衆保證其間並無所謂個人恩怨：假如我想享受更大的個人榮華，想在台灣側身要職，我早可以做到。但是，相反地，我選擇了亡命者並不舒適的生活。

另一標準質問便是：「你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是一個中國人，你怎麼可以這樣做？台灣永遠是中國的一部份」。對此，我只有提醒聽衆，如果過去的聯繫可以成爲要求領土主權的基礎，那麼，英國可以要求麻州或維吉尼亞州的主權，西班牙可以對美國南西部主張主權了。我又提醒他們，在十七世紀，首先向文明世界打開台灣門戶的，是歐洲人，不是中國人；而且，一直到一八七五年中國法律尚且禁止中國人向這個島嶼移民。直到一八八七年，台灣才在名義上劃爲中國一省。其後不到八年，中國便把台灣割讓給日本了。台灣人祖先移住台灣，並不是爲了要擴大中國主權或擴張中國領土，而是要脫離中國的悲慘生活，違犯禁令，冒險偷渡台灣，爲着子孫尋求新生命、開拓新天地。

當獲悉這些中國學生，每一質問可以從國民黨得到四十美金的報酬時，我並未感覺驚訝。

有一次，我到威斯康辛大學，就主辦者所指定的題目「過去二十年台灣的政治生活」，發表演講。這個題目是一般性的，與台灣獨立運動沒有直接關連。一切進行得相當順利，直到自由發問時，有一個中國學生，站起來要求我談談「我的」獨立運動。我提醒他那不是「我的」運動，而且這不是當晚的主題；如果我受邀講那個題目，我很樂意討論台灣的前途問題，一如我多次在別處所做一般，但是我不願在這短促時間裡，以隨便而片段漫談的方式來談這個問題。其後發生的是典型的反應。當一個國民黨特務報導那次威斯康辛大學的演講會，發表在香港雜誌時，說我是一個愚蠢的傢伙，如果一個美國政治家拒絕討論美國的前途，還要求給他時間去考慮這個問題，那無異於政治自殺，云云。

一九七一年二月，我到美國西岸巡迴演講時，有一個中國人任職美國西岸最大學術機構之一，到處跟蹤我，他是向服務機關請假來執行這項特殊任務的。他是要公開盤詰我，想給我難堪。我在洛杉磯加州理工學院演講完畢，到了自由發問的時間，他想回答我向聽眾提出的一個問題，但他的態度荒謬無理、英文又拙劣，引得聽眾不覺大笑，弄得其他在座的中國學生，尷尬異常。當我到達三百五十哩外的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時，他又在聽眾中出現，忙著作筆記。幾個星期之後，便有一連串的報導，登在香港和美國的中文雜誌上，這些所謂「內幕」報導的標題諸如「我怎樣與彭明敏談話」、「我面晤彭明敏」等，內容則純屬幻想子虛。

每次我作公開演講時，總有些國民黨官員在聽眾中，有時甚至在課堂也是如此。在公開演講

的場合，國民黨特務常站在門口，企圖分辨識別每位參加的台灣學生。例如在史坦福大學，特務用照相機拍下每位站起來質問的台灣學生，顯然是要威脅和辨別可疑的學生。史坦福大學主辦單位對此抗議時，竟遭到特務們挑戰性狡賴：「這是公開集會，這是自由國家，不是麼？」。

這些集會的國民黨式報導，常刊登在美國、日本、香港的中文刊物，而將我演講的內容和會場的情況，常常曲解、甚至倒反。最標準的說法是我的英文奇糟，表達拙劣，對國民黨無理毀謗。他們有一次捏造報導，說我會被聽眾迫問得無法回答，竟藉口肚子痛走下講台！

有一次在威斯康辛大學演講台灣的國際地位時，聽眾中有幾個國民黨特務，還有一個我以前在台灣教過的中國學生，現在芝加哥區當國民黨僱員的。幾個星期之後，密西根大學也安排了一個同樣的學術討論會，而其通知一直到當天早晨才張貼於校園。儘管如此，當天晚上開始集會時，那個人也已趕到了會場，還帶來二個高大強癲的黑人，似是想以他們粗壯的外表和舉止，來威嚇我。

當我加拿大母校麥基爾大學慶祝一百五十週年校慶，同時也慶祝「國際航空法研究院」（現已改稱為「航空和太空法研究院」）成立廿週年時，我被邀在慶祝宴會中演講。後來得知因為主辦者請我講「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該題目太過份敏感，在加拿大一些方面引起驚慌。因此，我建議另請其他較不引起爭論的演講者來代替我，可是，主辦者還是堅持要我接受。我演講以後，有些聽眾似乎有一點驚訝，因為我將演講內容嚴格限制於這個問題的純粹法律層面，而不

涉及現實政治。這次演講幾乎是我唯一的公開演講，而沒有國民黨特務參加的。

我在公開演講中所遇到的一次最惡劣的經驗，意外地，却發生在加拿大。那時，加拿大已經承認了中共，雖然國民黨官員已經撤走，還留有相當數目的特務學生。溫莎大學（University of Windsor）爲我舉辦了一次公開的學術演講。在演講中，我試圖解釋在台灣極大多數的台灣人與兩百萬大陸籍中國人間的微妙關係，突然有人站起來打斷我，向我挑釁，說我作爲學者，應該引用何書、何章、何頁、何行，來確實證明在台中國人的數目是二百萬，不多也不少。以後，我每說一句話，他們就叫號，要我引經據典來證明我話的真實。顯然，他們有意擾亂會場，有一度幾乎作勢要攻擊我，擔任主席的該校教授不得不以逐出會場來威脅他們，會場秩序才稍微回復。

有一天，我在紐約應邀參加一個教會組織主辦的午餐座談會。主辦者太晚才很尷尬地發覺，國民黨駐聯合國大使也接受了這個邀請。我們相見了，握了手，但是那次午餐對於該大使來說，是個極難堪的場合。他對於直接的問題，避而不給直接的回答，寧願漫談些什麼「共產黨的罪惡」、「自由世界與奴役世界」等。主持者頗不客氣地想要迫他談得較具體，並討論台灣問題，但是沒有成功，他還是不肯談論正題。

不久以後，「國際人權同盟」（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the Rights of Man）的幾位著名幹部，想要與國民黨駐聯合國代表團官員約會，但是反應非常冷淡，因爲國民黨官員一

聽到「人權」兩字就覺得滿身不舒服，而且也不清楚這個約會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他們一再拖延之後，終於不得不接見「人權同盟」的三位代表。這三位代表便正式要求國民黨代表團向台北當局轉達一項請求，即，基於人道的立場，准許我的家人出境，讓他們到海外與我團聚。接待他們的國民黨官員粗暴而憤怒地回答「彭是個罪犯，他遺棄了他的家人，違反中國倫德！」，這激怒了訪問者之一，他反駁說「難道拆散人家的家庭就沒有違背中國倫德麼？」。這個請求未受理會。

國民黨駐華府的大使，繼續向國務院抗議我留在美國。我在美國的每場公開或半公開的演講，都一一被紀錄下來，我討論台灣的國際地位和前途，都被指控為顛覆活動。他們向美國治安當局控訴台灣人正計劃在美國進行暴力活動，比如，再一次的暗殺企圖。這些抗議和誣控都是要設計來堆砌美國政府對台灣人和我個人的偏見，藉以刁難我的美國簽證的延長。密西根大學也接到通知，國民黨對我的行為提出強烈抗議。

環視有感

一、我經常發現在北美洲的華人和華人刊物，有一種無心而幼稚的浪漫傾向。他們強烈批評蔣介石和國民黨，而直到乒乓外交開始、尼克森總統宣佈訪問北京之前，這些華人在公開場合也會小心地批評中共。然而，他們總是要談他們「偉大的中國」，雖然他們夢寐難忘的那種「美麗

中國」，事實上並不存在，對他們來說，所謂「中國」不過是在他們幻想中存在的一個抽象概念而已。而他們堅信台灣人應該屬於這個抽象的東西。這些「愛國華人」既不願住在中共體制之下，又不願接受國民黨統治，舒舒適適定居在美國，却想指令一千四百萬台灣人去接受他們自己早已脫離、而且也沒有意思回歸的政府的統治，這實在是過份卑鄙的越俎代庖，使人對他們感到無限的輕蔑。

這些「愛國者」會說，大家都知道國民黨和共產黨都很糟糕，但是，有一天整個中國必須統一（他們還是將台灣看作中國的一部份），即使要等五十年或一百年。我則指出，他們定居在美國又舒服又安全，很風涼地說「台灣必須回到中國」，這是很容易的；可是，台灣人現在已受夠了苦難，應讓他們盡早從現在的政權解脫出來，讓他們現在就享受自由；至於後代，到那時才讓他們去自由選擇，五十年後或一百年之後。

二、現在北美有幾萬台灣人。他們大多是研究生或各行各業的專門人材，但是即使在這裡，他們還是受到極大的束縛。國民黨的騷擾，其方式千變萬化。因此，有的保持沈默，有的則除了匿名捐款給台灣人社團組織以外，不敢做什麼。每一個台灣人都知道在北美主要大學校園裡都佈有國民黨特務，監視台灣人，打小報告。台灣人一旦被列入黑名單，其後果極難預料，他們在家鄉親人可能喪失公職，銀行貸款可能不准，護照可能被吊銷而被迫回台或在外國尋求政治庇護。

上述騷擾主要是針對台灣人，不是針對所有批評國民黨的人。有許多中國人，手持國民黨護

照，却敢激烈批評國民黨或公然對中共表示同情，這都是國民黨當局熟知的事實。但是這些人從未被吊銷護照，因為他們未曾犯過一個不可寬恕的罪行，即主張台灣人應有自決的權利。

國民黨一向煞費心機要摧毀台灣人的意識。最近幾年，要離開台灣的每一個留學生都受到警告，不得在國外參加任何台灣人的組織團體。他們被告以應該參加「中國人」的團體。儘管如此，在較大的校園都有台灣人的社團組織，而這些團體的負責人或幹部都被列入國民黨的黑名單。另一方面，却有許多中國人的團體以中國某特定地區作為基礎，例如同鄉會等，而它們並不受敵視；只有台灣人社團為國民黨所禁止。

三、有時候聽到有人批評：台灣的政治極需要劇烈的轉變，這是正確的。但是海外台灣人的活躍份子只是企圖將權力從國民黨特權份子轉移到台灣人中的優異份子手裡而已，這些台灣人領導者們，大多是地主、富商、或專門人才的子女，不關心台灣大眾的社會經濟情況。他們對於一般群眾的權益不感興趣。所以這些人即使能從國民黨奪權過來，這對於一般群眾沒有多大意義。

這種批評既不公平又係無知。要求台灣人的自決，並不是一個政黨運動，而是針對一九四五年以來國民黨的獨攬剝削而產生的全面反抗。它已成爲自從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悲慘經歷以來，絕大多數台灣人希望的象徵。那次的經驗已撲滅了對中國人的信心，回復了十八、十九世紀台灣與中國的傳統敵對關係。我們堅持國民黨必須徹底改變，開放政府讓台灣人參予，制作一個架構，讓島上所有份子能夠自由競爭。農民的慘重稅賦，必須減輕，這些稅收是用來支持國民黨的

龐大軍隊以及台灣本身的政府以外的一個所謂「中央政府」。全體人民應有權利選擇其政府的型態，不應被迫接受外來政權或軍事統治。

現在海外台灣人諸種運動的領導人們，確是一種知識優異份子，但是他們是來自台灣各種不同的經濟階層。在許多國家裡，有很多無助的群眾，他們甚至還不知道自己受着經濟和政治的剝削。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觀察力、有思考力、有表達力的優異份子便有責任使群眾覺醒，使他們瞭解其權利所在，鼓勵他們行使這個權利，要求改進。歷史上許多最有力的革命領導人都來自中產階級，如周恩來、朱德、胡志明，和其他法國和美國大革命的領袖們。謝聰敏是一個商人的兒子，魏廷朝是一個農人的兒子，他們爲了台灣人不知奉獻出多少犧牲。

三月，我得到消息說謝聰敏和魏廷朝再度被捕了，同時被捕的還有李敖和其他朋友。他們又被控企圖推翻政府，檢察官要求判謝魏死刑，判李十數年長期徒刑。

四、有些美國的激進和開明份子，顯得被「偉大中國」迷惑了，他們與十九世紀傳教士和近年來情緒化地無條件支持蔣介石的「中國之友」，其心態並無不同。他們支持「台灣必須是中國的一部份」的說法，其熱衷程度，與忠誠的國民黨徒或共產黨徒，並無二致。他們也批評台灣人自決運動爲海外少數優異份子所領導。他們完全忽略了一樁事實，即台灣人民被迫緘默，除了暴動以外沒有途徑表達自己。這些美國人非常聰明，是高度的個人主義者，富於批評精神，不受傳統拘束，幾乎對任何權威都要叛變，然而，一談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中許多人便變得軟

弱無力，失去獨立判斷批評的心智，只是盲目崇拜歌頌中共所言所爲。說起來非常矛盾諷刺，他們極端輕蔑那些接受國民黨邀請訪問台灣、在那裡備受熱烈招待、回來美國便歌頌讚美國民黨的人們，但是他們與中共的關係却完全一樣。令人極難理解的，他們在美國對於侵犯個人自由或嚴格管制的任何企圖，都那麼深惡痛絕，却又能對中共政權滿口讚美。他們都是爲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不懈鬥士，却對於一千四百萬台灣人的基本人權和願望，無動於衷。或許，他們不是完全沒有私心的。他們渴望被邀請到北京，受統治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政府歡呼爲英雄。如果主張應重視台灣人的權益，便會傷害他們朝聖北京的機會。

有些人甚至爲了辯護自己，捏造出一套劇本。事實上，他們批評台灣人運動，主要是因爲中共反對它。他們還誣指台灣獨立運動只不過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掩飾。他們的劇本則是：美國已認爲蔣介石無法再維持下去，所以推動台灣獨立運動，作爲退守之路，美國支持台灣獨立，便可以維持在台美軍基地。

我認爲如果台灣人的利益，偶與其他國家的利益互相一致，我們不必爲此抱歉、辯明。我們只要求從各方面盡能客觀檢討台灣問題。如果要對此真正做公平、非政治性的學術研究，那麼必須對台灣人的歷史、性格、主張，意願，作徹底探究。如果因對國民黨或中共有所嫌忌，而不敢言真，那就等於一種政治行爲，有背於客觀的學術研究了。

時期已經這麼遲，不敢奢望了。因爲中美關係突然解凍，許多著名學者專家開始展示強烈的

個人政治興趣。從前因怕觸怒國民黨而不敢公開討論台灣問題的，現在更加害怕那種討論會危及他們在北京的利益和希望。很少人顯露出像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那樣勇氣，在討論承認中共和台灣的命運時，敢然提出台灣人的權益問題。

說來很不幸，「自決」這個名辭，在美國政治詞彙裡，尤其在美、中、台關係中，已不受人欣賞。美國在越南，犧牲那麼多而一無所獲，就爲了越南「自決」的理想。一九七一年，越南的一人競選總統，激起了美國輿論界全體的憤怒攻擊，可是，對於蔣介石的終身總統、國民黨在北的所謂「中國中央政府」的虛構，還有所謂「立法院」的萬年議員，批評又在那裡？譴責在那裡？

台灣人要站起來

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和聯合國辯論中國代表權問題，又再度顯示了台灣問題的癥結。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開幕前夕（這個會終於表決通過中共在聯合國的席位，驅逐了國民黨代表團），台灣人的領導人和代表們在紐約聚會，表達對於台灣前途的極端關切。他們想要代替台灣島上絕大多數的人發言，因爲島內的人都被國民黨強迫沈默不敢言。在當天的記者招待會，我作了下列報告：

一、美國和加拿大的台灣人參加此會者超過一千二百人。鑑於他們散居北美各地的事實

，這個參加比率是極高的。這個台灣人數目已佔美國和加拿大台灣人總人口百分之十以上。比如，假使美國黑人人口以同樣比率參加，其數目將超過二百萬。我們也收到來自日本和歐洲的許多電文和信件，表示與我們團結在一起。

二、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第一次最大的自動自發的台灣人政治集會，不論在島內或是島外。參加的人來自台灣的各行各業，以及台灣各個地方，包括學生、家庭主婦、商人、學人、醫生、律師、宗教人士。所有參加的人，在台灣都有親戚朋友。所以，這些參加者具有高度的代表性，他們能為台灣絕大多數人發言。這種集會無法在台灣島內舉行，甚至在島內無法想像，這個事實便足以證明國民黨政權的本質如何，在台灣的政治情形如何。

三、所有台灣人都一致堅決要求，他們應有自己決定其政治前途的權利。真正的問題，不在於台灣應否獨立，而是在於一千四百萬台灣人關於本身的將來，有無發言權。過去四百年，台灣人總是被人踢來踢去。我們已經聽夠了中共對台灣的說法。我們聽夠了沒有代表任何人的國民黨對台灣的說法。我們也聽夠了美國政府對台灣的說法。所有參加這次集會的人，想要問的，只是一個問題：「台灣人的意願呢？」

這個會議，發表了下列聲明：

一、台灣問題不得以如處理一件地產糾紛的方式來解決。在辯論、談判和解決的過程中，必須牢記其中牽連到一千四百多萬人的命運。

二、這一千四百萬人——包括一九四五年以後來台的在內——將堅持為自己決定政治前途的權利。他們的基本利益和正當意願絕不可再度被忽略，一如於一八九五年和一九四五年被忽略一般。過去的悲劇絕不可在再度的擅專轉移中重演。

三、台灣的主權問題應該在有台灣人民真正的代表所參加的國際談判中，予以解決。外
界的人無權指示台灣人民應屬於誰。不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或美國政府都不能為台灣人發言。

四、現在台北的國民黨政權從來沒有合法地為大多數台灣人民發言，將來也不可能，除非發生徹底改變，而多數台灣人在政府的每一階層都得到充分的代表。

五、台灣人要求，至少有一段合理的時間，俾使造成上述改變，以準備為主權問題作最後的抉擇。台灣經濟繁榮，住民教育普遍，只希望和平生活，不威脅任何人。他們要求被徵召到金門馬祖的軍隊，立刻撤退回台，將國民黨運到台灣的中國國寶和公產，儘速歸還中國。

六、在一段特定時間之後，並在各方同意的條件之下，台灣人民應為他們的未來地位，作成決定。有了選擇的自由，而不受脅迫，他們或許寧願成立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或者可能會選擇與中國聯繫。不論結果如何，選擇權在於他們，那應是台灣人自己的抉擇。所有與會人士都深信，不論聯合國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如何決定，台灣問題在未來一段很長

的時間，有待解決。

一個月之後，十月十八日，在紐約和世界各地同時，台灣人集體戲劇性地將自己鏈鎖在一起，企圖引起舉世注意他們要求擺脫中國人——不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的——控制，成立一個獨立的台灣。他們要求聯合國承認中共為中國席位的正當合法所有者，同時要求聯合國會員國為一千四百萬台灣人民敞開聯合國大門，呼籲它們支持從自由選擇而產生的台灣共和國——聯合國的未來會員國。

一九七一年十月，聯合國解決了聯合國內中國代表權的問題，但它並未解決台灣問題。

台灣人民為要爭取自決的權利和獲得自由的奮鬥，仍然有一段漫長而艱鉅的路程在前面等着。

〔全文完〕

附錄(一)

以言論自由推翻國民黨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六日「新聞週刊」訪問彭明敏

過去二十年來一直被蔣介石國民政府當作基地的台灣島，有其「沉默的大眾」。他們是佔全島一千四百萬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台灣本地人。今天，他們之所以沉默，非但由於他們在島上享有繁榮的權益使他們對於政治冷漠，更因為在島上活躍的反蔣份子會遭迅速的逮捕、秘密的審判和囚禁。

對於反蔣的代價，能夠提供第一手證言的，是四十六歲的台灣人彭明敏。一般認為，如果台灣有自由選舉，彭將會成為有潛力的總統候選人。最近，經過了十三個月的監禁和五年的軟禁，彭秘密地逃離台灣而出現於瑞典。儘管害怕蔣家的特務會把他幹掉，上星期，他還是接受了「新聞週刊」記者的訪問：

「假如我在台灣有一個月的自由言論，我可以把政府推翻。」彭平靜地，煞有介事地說。「任何一個有相當表達能力的人都可以，只要他能夠喚醒大眾，讓他們去想，現在的政府所代表的是誰。這不是中國的政府，也不是台灣人民的政府。」

一九六三年，彭被選為「十大傑出青年」(當時的彭四十歲，但是以中國人的標準，還算年輕)。那時候，國民黨並不知道他有這種想法。他們曾經派他出席聯合國，後來又成為國立台灣

大學的教授。在台大，他晉升至政治系系主任。然而，在一九六四年，彭被捲入一個印行推翻蔣家政權的傳單的計劃，因而被判刑八年（後來改為軟禁）。即使在禁錮中，他仍然化名寫反蔣的文章。

現在，彭希望利用他重新獲得的自由去為台灣獨立而工作。雖然他坦誠承認他「沒有政黨，沒有政治組織，沒有政治力量」，他已成為海外台灣團體中類似英雄式的人物。像許多來自台灣的放逐者，他相信，只要老蔣一死，他的五十九歲的兒子，現任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企圖繼位的話，他的機會就來了。「我認識老蔣和他的兒子，」彭說：「我對他們並沒有偏見，但是，聲望是不能私相授受的。你可以繼承警察權力或頭銜，但是，特別是亞洲，你不可能繼承聲望。當一個極權者死後，是很難預料將會發生什麼事的。」

「有些美國人對我說：『等老蔣死了再說吧。』對於這些美國人，我是可以理解的。」彭繼續說：「但是，我覺得這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對那些在納粹統治下的人說，忍耐一下，等希特勒死了再說一樣。」

大戰期間，彭的一隻手臂被美國的炸彈轟掉，不過他對美國的怨恨並不強烈。儘管他認為，蔣氏政權之所以能夠維持，是有賴美國的援助。在他看來，一個不捲入中國內戰的台灣，將會對美國更有好處。他相信，如果共產中國對一個經由民主選舉而產生的政府所統治的島要求管轄權，在外交上是尷尬的。他覺得，要是台灣從國共冷戰中解脫出來，將會有助於緩和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緊張局面。不過，在衡量這些條件能否在不久的將來成為事實時，彭是很現實的。「假如我要影響台灣的前途，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美國的政策，」他說：「但是我不能在瑞典影響美國的

附錄(二)

助他一臂之力

——李敖談彭明敏

(本文原載「先鋒時代」週刊一〇三、一〇四期(合訂本)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我們很難從自許爲「黨外先知」的李敖口中，聽到讚美任何台籍政治人物的言語。可是，對十五年前曾經傳奇式擺脫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網，偷渡離台的彭明敏先生，李敖卻稱讚他爲「最有志氣的台灣人！」

爲了製作本期的封面故事，我們特地訪問李敖先生，請他談談六十年代國民黨高壓統治下，他與彭明敏先生交往的心路歷程。

■：可否談談您跟彭明敏的交往過程？

□：當時最大的特色，好像整個反抗勢力就只有我們這幾個人，不像現在人數衆多，相當熱鬧。因此，相形之下，當時氣氛顯得很悲涼！

我跟彭先生初次認識，是他當台大政治系主任，而我在文星的時候，他請我到他家吃飯。後來，我就請他寫篇文章。文章題目是「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發表於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一日的文星雜誌，他詳細評論非洲爲獲得認同和獨立所做的鬭爭，曾造成一陣騷動。

■：當時您是文星總編？

□：是的，最有趣的一點，是我在該期「編輯室報告」中，介紹他這篇文章的一段文字，我說「彭先生這篇『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使我們知道在現代思潮中，竟有一種思想『像泛非主

義那樣，以那麼慘痛的體驗和暗澹的感情，作為成立的基礎。」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們可從這段思潮的激盪中，得到觸類旁通的領悟。」，沒想到這些話，竟成言近旨遠的一段「罪狀」。

■：爲什麼呢？

□：他在他的回憶錄「自由的滋味」裏頭有一段話，便提到這件事——

研究非洲與台灣形勢，並不是從表面看那樣毫無相干。我研究報告的一部份，題為「泛非思想的感情因素」發表於台北的文藝雜誌「文星」，造成一陣騷動。我詳細評論非洲為獲得認同和獨立所做的鬥爭。我呼籲注意一些人民因殖民統治而與過去斷絕關係，如今則正為掌握自己的命運而掙扎。我並非有意要寫一篇政治文章，但是編者按語則說「讀了這篇文章，使我們可從這段思潮的激盪中，得到觸類旁通的領悟」。

這篇文章發表，是一九六三年年底的事，後來，我記得，他就在一九六四年的中秋時候被抓了。

■：同案被捕的謝聰敏、魏廷朝，您原本就認識嗎？

□：謝聰敏是我台中一中的同學，魏廷朝則是我台大畢業後才認識的。案發時，我人在文星，聽到國民黨高階層人士傳來的風聲，要給彭先生特赦。因爲那時，他們也同樣的要拉廖文毅回台灣。後來，在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三日，彭先生終於特赦回來。他以爲，既然特赦了，就應恢復原狀，不料官方很小氣，不願讓他再回台大教書。

■：那他上那兒去？

□：當時明志工專剛剛創辦，本來想請彭先生當校長，他答應了。同時，調查局長沈之岳，安排了個飯局，請彭先生和我，席中沈之岳說，官方同意彭先生做明志校長，但盼他同時接受「國際關係研究所」（現在的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的職務，他也答應了。國關所主任吳俊才隨後將聘書送去溫州街彭宅，彭先生也接受了。不料，國民黨出爾反爾，不讓他幹明志工專校長，彭先生當時非常氣憤。後來，那段時間，他沒工作，而文星也結束了，我們倆就常在一塊兒喝酒聊天。

人都走了三星期，還有監視報告呢？

■：彭明敏偷渡離台，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安抵瑞典，這段經歷一直仍是個謎，不知道您知道多少？

□：由於他基於保護目前在台的朋友，一直沒有公布這段偷渡真相。不過，我猜，彭先生的美國朋友唐培理夫婦（後來被驅逐出境），可能在這段偷渡過程中，幫助很大。另外，我的美國朋友梅心怡（Lynn Miles）也幫了不少忙。彭先生曾託我轉寄一封信到國外，我就交給我弟弟，請他送梅心怡上飛機時，偷帶出境。梅心怡在登飛機時向我弟弟打了個手勢，表示沒問題了，我就將結果跟彭先生講，他聽了後很高興。後來，梅心怡也因此再也無法入境了。更妙的是，日後我被逮捕入獄，判決書裏，竟將我託梅心怡轉運信件，列為我的罪狀。你看，這是我判決書裏的一段——

李敖明知彭明敏有叛亂前科，其叛亂之念未泯，仍秘密與之交往，五十八年三月間，介紹某外籍人士與彭相識，嗣於彭逆託該外籍人士攜帶信件出境時，非惟不予檢舉，且囑其弟李敖藉送行之便，察看該外籍人士登機手勢之暗示，是否信件安全帶出，以走告彭明敏。

■：彭明敏偷渡之事，你事先知道嗎？

□：不曉得。他走之前，曾跟我約好了下次見面時間，可是，當魏廷朝告訴我「明妹已經到瑞典了」，我就曉得他無法赴約了。爲什麼叫「明妹」呢？因爲彭先生常寫信給自己，測驗看看能不能收到信，信裏就自稱「明妹」。寫給魏廷朝，也用「明妹」之名。有趣的是，當外電報導，彭先生已偷渡出境，每天跟踪他的特務不但毫不知情，甚至還謊報軍情。國民黨高級官員手頭拿到特務的報告，在彭先生離台三個星期後，還說彭仍不斷在台灣到處旅行呢！這些特務爲什麼謊報，可以浮報監視和跟踪的開支，從中飽。

■：事後這些特務豈不慘了？

□：是啊，彭一走，調查局高級官員整個垮台。沈之岳局長「自請處分」，副局長被革職，那些二十四小時監視彭先生的特務，通通被關起來！其中有位劉科長，柏楊案就是他承辦的，事後被整的最慘。我記得魏廷朝當時會講一句有趣的話，他說「國民黨拉廖文毅回來，是拉回來一個會撒尿的；彭明敏走了，是跑了一個會拉屎的。」

■：難道查不出到底是誰暗中助彭偷渡？

□：彭先生不講，誰也不知道。後來，魏廷朝、謝聰敏與我同關在獄中，我們交換意見，他們也不曉得實際經過如何。不過，據我猜測，彭先生走，跟一位紐約時報的記者有關。這記者不

是別人，正是國民黨捧過的「苦海餘生」作者包德甫。彭先生偷渡前一週，包德甫突然來台灣一趟，匆匆跟我見一次面。我問他，你這次來幹什麼？他神秘兮兮的笑著答道：「你看好啦，有好戲可看！」不過他走的時候，在松山機場上機前，曾全身被徹底的「洗」過一次。

■：長期以來，一般人都懷疑彭是得到美國中情局（CIA）的協助，才能逃過國民黨特務的嚴密監視網。

□：我不相信美國官方會暗中幫他的忙。我們中國人會「雪中送炭」，可是美國官方不會作「燒冷灶」的行爲。那時，美國副總統安格紐來華訪問，就有人謠傳，彭明敏是搭這架專機跑走的。我可不相信。我比較相信彭先生是得到美國私人朋友的暗中協助，易裝整容，持假護照出去的。

我要事先知道，早跟他一起走了

■：聽起來好像非常神奇呢？

□：彭先生雖是個學者，就他能偷渡成功來看，實在精明得超過情報員。調查局王處長王淦曾訊問我，我不知道他如何偷渡出去？我就開玩笑地答道：「我要是事先知道，早跟他一起走了，他非帶我走不可，不帶不行，否則我就『告密』！」

■：說說你們被監視的情形吧。

□：彭先生特赦出來後，直到偷渡前，都遭到特務二十四小時監視。有件事頂有趣的，他很惱人

被人跟蹤，有一回，他突然拿著照相機回身去照監視他的特務，他們就把他的照相機搶走。過了一會兒，彭先生立刻到警察局報案，說遭到搶劫。結果那個派出所主管，竟然從抽屜裏拿出一架照相機，問道，「這大概是你的吧？剛剛有個小孩子撿到送來派出所。」他們故意這樣作弄他。事後，我跟彭先生講，乾脆我幫你照好了。於是，我就開著汽車，到溫州街彭宅對面的巷子，由黃三幫忙，拿著長鏡頭偷照。後來，我照的這張特務監視相片，刊登在「台灣青年」，彭先生非常高興。

■：甩不掉他們的跟蹤嗎？

□：我看彭先生被跟蹤成這樣子，爲他打抱不平。有一回，李翰祥請吃飯，中央黨部第六組總幹事陳綏民也在座。陳綏民曾代表國民黨出面處理過文星訟案、殷海光教職等案子，相當於現在跟黨外人士調停折衝的人物。我就質問他，爲什麼要跟彭先生跟那麼緊？他居然否認。我就說好，我們現在就去看。我飯後便開車前往彭宅，果然有人站崗，陳綏民看了之後，啞口無言。

被跟蹤是他媽的多彆扭

■：被特務二十四小時監視的滋味您嚐過嗎？

□：彭先生走後，我也享受二十四小時三班制的監視待遇。因爲我開汽車，較豪華，他們也派部車子，另配四名特務，而謝、魏他們各配兩人跟蹤。我被跟蹤十四個月，才深深體會到被跟

踪是他媽的多彆扭。謝聰敏說，他被跟得使自己都神經兮兮，覺得連洗澡時都有人偷看。

■：十幾年來，你們有沒有再聯絡？

□：他出去以後，只寫給我一封信，還附帶瑞典美女相片。信裏戲稱，裏頭的美女，是李敖在瑞典的讀者。我被抓時，信與照片都被警總搜去。我還記得當時警總軍法處軍法官王雲濤開調查庭時，當庭在卷宗中掏出美女相片，手一揚，對我笑道：「你們的美女已被我們沒收了！」彭先生與我就只有那次，以後我們再也沒有聯絡。

■：他出去後，曾說過什麼最令國民黨難堪的話？

□：彭先生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抵達瑞典，得到當地政府的政治庇護。二月十六日接受「新聞週刊」專訪時，曾說過一句豪語：「只要讓我在台灣自由演講一個月，就能使國民黨政權倒台。」(If we're given one month's free speech on Formosa I could overthrow the government.) 我相信他的話。

■：彭明敏離台後，您心中感受如何？

□：魏廷朝、謝聰敏都是他的學生。而我不是，雖然也稱呼他為彭老師，但兩人以朋友相交，我相信我最能了解他當時心境上的變化。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台大劉慶瑞教授逝世，彭先生曾在傳記文學上發表一篇「追念劉慶瑞教授」。他將台灣人原先對大陸人的嚮往，而後轉變失望的情境，於文中表露得極為動人。彭先生前後整個的心路歷程，我想我比他的學生們還了解。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跟我多次聯絡，是朋友式的，並無拘束。

你失掉了你的左臂，我卻失掉了我的右臂

■：您個人突然失去這樣一位朋友，心境如何？

□：容我掉掉書袋。美國南北戰爭時，南方總司令李將軍（Gen. Robert Lee）手下有位大將傑克森（Stonewall Jackson），受了重傷，失去左臂。當他受傷時，李將軍曾寫封信給他，說道：「你的情況比我還好些，你失掉了你的左臂，我卻丟掉了我的右臂。」（You are better off than I am, for while you have lost left, I have lost my right arm.）傑克森收到這封信六天以後，便與世長辭了。還有，我們中國漢朝有句古話，說使西域是要斷匈奴右臂，右臂之喻，東西方語言是相通的。剛好，彭先生當年在日本失去了他的左臂，所以，李將軍那句話正好可以表達我當時的心境。

今天的副總統應該是彭明敏

■：您認為彭明敏才氣如何？

□：彭先生是國民黨當年最早提拔的青年才俊，你看看他的資歷，博士，台大政治系主任、聯合國代表團顧問、陽明山會談參加者，跟錢復同為第一屆十大傑出青年……，只要他不那麼鋒芒畢露的話，我敢斷言，今天的副總統是彭明敏，而不是李登輝。李登輝那時只不過是農復會的一名技正而已。李登輝成名在我之後，像這樣的笨東西，國民黨竟然會提拔他幹副總

統！原因無他，典型奴才耳！

■：彭明敏這樣優秀的人才，國民黨拉攏不到，是他個性使然呢，還是另有其他因素？

□：我認爲彭先生這個人非常有志氣，台灣在日本與國民黨前後摧殘八十多年，像這樣有志氣的台灣人真是不可多見！你看看，像黨外人士，像高玉樹、像張賢東、像邱連輝之流，國民黨稍爲給了一點好處，就馬上變。而彭先生則不然，他是蔣介石「召見」過的人，可說是幾乎到手的東西，他卻棄若敝屣，甘願當個反叛者。關於這點，他的回憶錄裏就有下述一段話：「不久，一些高級黨政官員來訪問我，勸我加入國民黨。他們暗示如果我入黨，一定會獲得非常高階層的職務。但我對此事，完全未曾考慮。」彭先生的有志氣，真爲台灣人爭光。

■：除了覺得他是個非常有志氣的台灣人，您感到他還有什麼特質。

□：他給我印象，是位高雅的紳士，待人接物，非常有禮貌。但是禮貌也不妨礙我們之間有時開玩笑笑。但有兩件事，我從來不跟他談，第一，關於他斷臂的事，他從不主動講，我也不問；第二，我們從不談台獨的事。大概這兩個話題雙方都太敏感，也都知道對方的答案吧？

■：他從不提台獨？

□：他從不提，我也絕口不問。而且，彭案爆發之前，我也從未看過他們那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直到今天，猶未看過。案發後，李煥請我吃飯，就旁敲側擊道，聽說這份宣言文章寫得極好，是經過你李先生指點或潤飾過的？我笑著答道，若是我寫的或經我潤飾過的，一定更好！多年以後謝聰敏搞了份該宣言的英文譯本給我看。說來好玩，那英文是誰譯的，

你們知道嗎？就是現在堂堂的交通部長連戰，他當時在美的台獨份子。

■：爲什麼日後他們一口咬定你是台獨份子？

□：那份中文版的自救宣言我看都沒看過，而英文版的宣言，因爲我忙，也連看都沒看。可是，警總抄家時，將其搜去，竟誣指我是台獨本部的委員！

■：你確信那份宣言是連戰翻譯的？

□：是的，當時他在美國搞台獨運動，後來投降回台的。我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明，當年搞台獨的，大有人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三日彭逃抵瑞典，而一月二十九日在日本宣布這項消息的，就是當時擔任「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代表辜寬敏。後來，辜寬敏同連戰一樣，投降返台了。

彭先生可以在海外當「孫科」

■：彭明敏曾被國民黨列爲台獨分子，現在他任FAPA會長，您希不希望他返台？

□：我反對他回來。因爲彭先生一回來，會給人有一種錯覺，以爲國民黨又再度招安成功。

■：可是政治人物離開鄉土群眾，那能發揮力量？

□：那要因人而異。像老毛（毛澤東），把同志一個個秘密派出去外國，而自己仍留在國內，掌權之前從未踏出國門一步。可是，彭先生則不然，依他個人優異的外交能力，他可以長期的在海外當「孫科」（孫中山、「柯」梅尼），發揮海外台灣人遊說團體的力量。



■：你最後有何感想和期望？

□：我希望台灣人能夠以彭先生爲師，學他的志氣。一般來說，台灣人太沒志氣，而彭先生卻是一個例外。沒志氣是打不倒國民黨的。海外台灣人對彭先生的支持，是七折八扣式的，甚至還有人攻擊他，這顯然是忘恩負義，數典忘祖的小家子氣行爲。（他們之中，有的人也匿名攻擊我，當然這也是同一等級的行爲。）彭先生是台灣人反國民黨的先進與先知，他從孤軍奮鬥中走出並出走，又從出走中鼓動風潮，造成時勢。他是最優秀的，大家應該追隨他。對反對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我說來，彭先生領導的方向，容有可議，但在「國民黨下馬、自由民主上路」一點上，彭先生卻是偉大中國人的代表，我祝他的好運。

附錄(三)

台灣只要能自由演講一個月，國民黨就會倒

——鄭南榕、魏廷昱越洋專訪 FAPA 會長彭明敏

(本文原載「先鋒時代」週刊一〇三、一〇四期(合訂本)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魏：喂！請問是彭教授嗎？我想訪問他。

彭：我就是。

魏：我是魏廷昱，我台語說得不流利，可不可以用北京話訪問，你用台語回答。

彭：好，請。

魏：李敖交代我們，向您問候。

彭：好，謝謝，請你轉告他，我也很想念他！請告訴他，我們都希望他多多保重！

魏：好，我會轉告他，他也想念你們。你說台語好了，我聽得懂。

彭：我用北京話好了。你好嗎？

魏：我很好，恐怕你對我也已經沒有印象，因為你來我家時，我還在唸初三。

彭：記得，我還記得。魏廷朝身體怎麼樣？

魏：他現在還在牢裏，每天做六十個伏地挺身。

彭：六十個啊，什麼時候可以出來？

魏：明年五月。

彭：今年還是明年？

魏：明年，一九八七年五月，因為要補上一次與謝聰敏、李敖一起坐牢時減掉的三分之一刑期，所以明年才可以出獄。

彭：喔，真可惡！

魏：沒有變化就要到明年五月，有變化就不一定了。

彭：是的，是的。你在那一家雜誌社？

魏：時代，台灣的自由時代雜誌社。

海內外要互相合作支持

彭：這個訪問能夠印出來嗎？

魏：應該沒有問題，我們幾乎每期都被查禁，早就習慣了，也不差這一期。我們談話一定被監聽，不過說什麼都無所謂，本刊的尺度沒有限制。你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代為轉達嗎？

彭：大家對你們台灣黨外的努力非常欽佩，請多多保重！

魏：我有十多個問題想請教您，不知道您有沒有時間？

彭：好。

魏：你在美國十幾年，過去在「台灣自救宣言」的主張與對台灣前途的看法，有無重大的改變？

彭：沒有，我在這邊也公開表示：雖然事情變了很多，但是我所提出來的原則，在今天仍然適用。

，我一點也沒有改變。

魏：忘了恭喜您當選FAPPA的會長，請問FAPPA對台灣問題的看法？

彭：對內，台灣要民主化，具體的主張就是台灣應廢除戒嚴，要有言論、組黨、結社……等自由，中央民意代表要全面改選，這是台灣民主的基本條件。所謂結社的自由，是廣義的，不僅是指政黨，還包括工會的組織與所有的人民團體。對外，台灣需由台灣多數人來決定自己的命運，這是FAPPA清楚並且堅持的主張。在台灣，黨外的民主運動是站在第一線，海外是站在第二線；在國際上，FAPPA為台灣的自決運動奮鬥，是站在第一線，而黨外在台灣是站在第二線，彼此需要充分地支持與合作。

魏：聽說FAPPA要在台灣設立分會，並已委託許榮淑女士處理？

彭：有這麼提過，我們的理想是這樣，不曉得反應如何？

魏：報紙已披露，我想黨外應該很歡迎。

使台灣人的心聲得以在國際間表達

魏：設立分會，除了經濟貿易之外，有無其他預期的功能？

彭：能夠做到多少，我們儘量做。我們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和島內的民主力量，互相溝通、了解，

使台灣人的心聲能夠在國際間表達。

魏：可否談談台灣設立分會，由那些成員來組織？

彭：我們FAPPA的章程中規定：凡是贊成FAPPA主張的人都可以參加，不限定台灣人，外國

人也可以參加。只是我們要了解每一個申請參加者的背景，先由兩個會員推薦，經過會長批准，這中間需要經過背景調查，當然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自由地進來FAPA。

魏：分會與總會的關係如何？

彭：分會的章程很簡單，分會要負責推廣他們地方的工作以及FAPA分配的工作，並與總會保持聯絡就可以了，這在FAPA的章程中有詳盡的說明。你說台灣已經報導過這個消息，反應怎麼樣？

魏：報刊以及黨外雜誌都已經報導過FAPA要在台灣設立分會的消息，我們現在正式向你求證，也想請你判斷國民黨將有什麼反應？

彭：我不知道，我也想知道。

魏：FAPA在今年有什麼新的年度計劃？

彭：我們想盡量擴大我們的工作，擴大吸收會員，因為我們的目的與宗旨都規定在FAPA的章程中，怎麼更有效的達成這些目的，並推進這些工作是我們努力的目標，所以第一，我要擴大基礎，草根的基礎要打好。第二，在國外、在國內台灣也一樣，擴大與國際上的接觸，不僅是官方的組織，私人的組織，譬如說教會、工會、商會……各方面民間的組織，我們也願意擴大接觸，使他們了解台灣的情形，使他們能夠支持台灣民主自決的原則。

魏：我們剛剛談到FAPA成員中有美國籍的，是否外國籍的會員以美國人爲限？

彭：不，FAPA外籍成員有加拿大、法國、日本等國籍。

魏：FAPA目前有多少分會？

彭：這，我不便答覆，它是台灣人的社團中最大的一個組織，而且現在很快地在增加擴大中。

魏：FAPA會不會因爲你當選會長，而有重大的變化？

國民黨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認同台灣

彭：不會，我們只是加強工作，沒有新的變化。

魏：我們聽到一個消息：國民黨駐美辦事處的錢復代表跟你有過接觸，請問這個消息可靠嗎？如果有，可否向我們透露會談內容的重點？

彭：沒有這回事，過去FAPA開會時，曾邀請國共雙方的人來跟我們會談，可是他們都沒有來，所以沒有正式的接觸過。不過FAPA的委員中，有人私下跟錢復接觸過，也不是官式的接觸，我本人則從沒有與錢復接觸過。

魏：請問你對國民黨的印象與出國前比較，有無改變？

彭：基本上沒有變化。國民黨最大的毛病就是沒有認同台灣，不肯真正的爲台灣百年、千年的大計來打算，只是一天拖一天，這是最嚴重的問題，在外交上、國際上、在環境衛生上……等問題也一樣，沒有靜靜的坐下來爲台灣的利益著想。台灣本身沒有變成目的，在他們眼中台灣永遠只是一個工具、一個手段，或者「反攻大陸」啦，或者「和平統一」啦……：台灣從來都不會是一個目的。我們要替台灣爭取，使台灣變成一個目的，而不是手段。台灣的主權是整體的，不是一個國家的一部份。但是國民黨政府認同的不是台灣，是一個四十年來已不存在的中國。

黨外的努力，我們很欽佩

魏：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你對現階段台灣黨外運動的看法？

彭：黨外的各種問題我瞭解得不够詳細，不過我可以這麼說：無論是那一種黨外立場，他們所做的努力，都是在很危險的環境之下，在許多限制之下所做的，我們很欽佩。你們內部有一些問題，我知道，不過，大家爲了顧全大局，應該合作，我就只能這麼說。

魏：你對黨外的「路線之爭」瞭解嗎？

彭：我瞭解，不過我認爲海外的人不應該向島內的人說你們要怎麼怎麼做。因爲是你們在付代價在犧牲，海外的人應該支持你們。你們該怎麼做，我不便表示意見，你們自己應該可以判斷。

魏：你一九七〇年離開台灣，請簡單介紹在美國的生活，與爲台灣前途奮鬥的過程。

彭：我是一個人在這裏流浪，不過有很多人支持我，才能生存到現在。目前我辭掉教職，全心投入台灣人前途的工作上。從前我剛來此地時，發現海外台灣人的意識十分強烈，不過，台灣的前途應由全體台灣住民決定，這個原則相信已得到普遍的支持，這點成果對我而言，是最大的鼓勵。在海外的台灣人運動、台灣的黨外運動，甚至是我個人，都有許多問題發生，不過這在政治上是難免的，因此也不必太悲觀，只要儘量去努力就好了。

我們就是為了回台灣而努力

魏：你們想不想回台灣？

彭：我們都接到當局的邀請，要求我們回台灣看一看。我到美國後，這種邀請就有了。不過，我相信：時機還不成熟，在有生之年回去，還要看台灣的變化到什麼程度，所以我很難回答。

當然，每一個人都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夠回去，但却不是我單方面所能決定的。希望有一天，我們海外的台灣人全部都能夠回去，為著台灣的將來，台灣的民主、全體台灣人的利益，在台灣島內來努力。我希望這一天會來到，我希望如此，至於會怎麼發展，我無法預料。但是我們就是為著這一天在努力的。

魏：我們的創辦人鄭南榕向你問好，介意由他來請教你幾個問題嗎？

彭：等一下，見到魏廷朝，請代為問候，李敖這些朋友也請問候。

魏：去年令堂彭伯母……，有什麼交代嗎？

彭：我知道，她已經去世了。

魏：還有其他家人在美嗎？

彭：他們都在台北。

魏：還在台北啊！很艱苦喔？

彭：沒有啦！請問候大家，請大家一起來努力。

魏：你願不願意將FAPA的訊息與活動的內容，提供給國內？

彭：寄得到嗎？我們希望與台灣的民主力量建立更密切的關係，如果有聯絡人的話，就非常方便

。還有一點請轉告大家，在國際上，台灣自決的權利能夠得到承認，這個目的我們正全力以赴。

魏：你認爲現階段，國民黨和FAPA可能在某個共同的方向上合作嗎，或彼此做某程度的妥協？

彭：我不知道啊，合作是沒有過，他們對我們不太友善。假如國民黨爲台灣的將來著想的話，應該會同意FAPA的宗旨與目標。他們到現在爲止，不願意了解我們的工作。

只要能自由演講，國民黨就會倒

魏：不過有時候，國民黨爲了生存，很可能在海內外同時有兩種標準、兩種原則存在。這種差異，島內的人比較想要知道。

彭：我還沒有看出來，他們對FAPA的態度還沒有明朗化，恐怕他們內部的意見也不一致，對FAPA而言，還看不出他們有什麼明確的立場。

魏：國民黨排斥你們很厲害甚至打擊嗎？

彭：到現在爲止沒有公開排斥，不過不是友善的，彼此也沒有正式的接觸。

魏：換鄭先生訪問你。

鄭：嗨！彭教授，我叫鄭南榕。我讀大學時，大約是一九六九—一九七〇年間，常從你家經過，我住附近，我跟殷海光教授比較熟。真不好意思，打擾你了。

彭：那裏，那裏。

鄭：李敖李先生交代我問你，以前你從瑞典寄來台灣的美女照片，因為他被捕已被沒收。

彭：你跟他有聯絡嗎？

鄭：時常在一起。

彭：向他請安，大家真想念他。他不想出來一趙？

鄭：從前你離開台灣後，在新聞週刊上看到你在瑞典接受訪問時說：如果台灣開放總統直接民選，在自由的演說與選舉中，只要三個月，你就有把握讓蔣家的總統候選人倒台。

彭：略有差異，我不是說要競選總統，也不是三個月，是一個月。在台灣，只要能夠自由演說一個月，國民黨就會倒台，你同意不同意？

鄭：我同意。依照我的雜誌被壓制得這麼緊的程度來判斷，我相信是這樣的。

彭：是怎麼想的。

鄭：到現在仍然維持相同的看法嗎？

彭：是的，我始終都相信。你不要誤會，不是我要競選總統，只要有一個月自由演講，國民黨就會垮台。

鄭：去年行憲紀念日，蔣經國爲了蔣家人是否繼續擔任總統，國民黨是否將實施軍事統治，而做了「不能，也不會」的聲明，請問你注意到這則消息嗎？你有什麼看法？

彭：我注意到了。誰當總統並不重要，實際的權力在那裏，比名義上誰擔任總統重要。過去蔣介石不當總統的時候，他也可以控制一切嘛！也就是說，實際上的權力由誰控制才是關鍵。軍

事統治會不會出現，不是以文人出任行政院長並組成內閣爲標準，如果實際上的權力運作仍由軍人控制，那還不是一樣嗎？一切的發展要用事實來證明，光是講話沒有什麼用的，這是我的看法。

魏：南榕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鄭：另外本刊還要介紹你個人，想爲你寫個小傳，除了你的自傳「自由的滋味」之外，彭教授想補充什麼？

彭：沒有，請向大家請安。

鄭：打擾了，謝謝你接受我們的訪問。

附錄(四)

一千九百萬人命運之所繫

——一九八六年五月七日彭明敏在美國衆院

亞太小組台灣人權聽證會證詞

(本文原載「新台政論」半月刊第二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

主席及各位小組委員，本人以能列席在這個重要的聽證會作證，爲莫大之光榮。

我，彭明敏是現任 FAPP 主席。我是一個具有美國籍的台灣人，我曾於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六四年間擔任台灣大學政治系的教授兼系主任，同時我也擔任過當時台灣政府駐聯合國代表團的顧問。

一九六四年，我與兩位我的學生共同發表台灣人自救宣言，呼籲台灣當局放棄代表全中國的偽態，建立一真正代表台灣的民主政府而被捕。戒嚴法下，我們被迫坐牢，後來我被軟禁，我於一九七〇年逃離台灣，在台灣當局的眼中，我至今仍然是一個逃犯。

現在我提出貴小組所關心的一些問題：

台灣關係法內的人權部份條文

行政部門對台灣關係法的執行有不平衡的現象存在。在維護一般性的人權案件方面，國務院在表示美國的關切方面表現良好，過去幾年來，雷根政權在台灣政治犯醫療照顧及假釋方面頗有成果，在促成台灣政府放棄關閉台南神學院的努力亦獲得重要成果。

在另一方面，我也發現，歷任的政權對執行關係法並不熱心。關係法立法過程很清楚地表明須以此法來促進台灣的民主。自一九七九年起，參議員貝爾很明確的表示，台灣人民的言論、宗教、結社及政治參與的自由應予維護。李奇衆議員也表示多數統治，尊重個人權益是美國的立國精神及外交政策，美國應毫不遲疑地爲台灣人民維護這些權益。

我很高興美國去年以通過一個維護台灣關係法的決議來重申其在台灣推行民主的決心。

但在台灣，實行多數統治，尊重個人權益的障礙是很大的。國民黨用世界上最長的戒嚴法來統治台灣已達卅七年，正如最近國務院的報告中透露：「戒嚴法也被二次大戰後的中國的一小群老人用來掌握所有政治實權，包括國民黨、安全機構及行政部門」。

戒嚴法凍結憲法上的人民自由權，禁止對基本國策的批評，其中包括政府代表全中國的最可笑聲明。

有些人也許覺得這個聲明已成老調重彈，其實不然。因爲此聲明也用來作爲國會不能全面改選的藉口，致使台灣人民繳全部的稅，盡全部的義務却僅有八·一五%的代表性。

卡特及雷根政府從未對此「維護台灣人權政治結構上的障礙」表示抗議，我認爲美國人權的

立場上應對台灣的戒嚴法與波蘭及南非等量齊觀。

執政的雷根政權不但未充份應用有效的方法來促進台灣人權的基本改善，正當美國人民聆聽議員們怒斥江南案的可惡罪行的同一天，美國政府卻售八千五百萬的軍火給那個發令謀殺江南的軍事政權。

同樣的事實也發生在交易方面，美國在應用優待關稅來促成受惠國家改善對待勞工的措施並沒有有效地對台灣執行。FAPA最近已針對每天發生於台灣的違反勞工權利的事情向 *Ways and means subcommittee* 提出書面證明。

我代表FAPA表示我們支持台美貿易及防衛武器交易，但美國政府有責任使交易行為符合人權法律的政策。

爲了使美國在台灣有效探討台灣的人權情況，我建議AIT應聘一個全職人員專門負責台灣的人權調查。

我也願意指出關於卡特及雷根所欲採用的沉默外交政策，不如用公開的方法來得有效。最近李亞蘋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證明。最後，我認爲美國政府並沒有有效阻止台灣特務來美國校園監視台灣人民的行動。最近在北卡州大學的例子可資證明。

歷年來的案件，自陳文成、江南、李亞蘋，到王保羅牧師夫婦的連續被害，我們可看出長期而有計劃的在美國境內威脅，殘害美國土地上的人民甚爲明顯，同時也清楚地顯出這是一種由國

家主謀的恐怖行爲，我呼籲美國政府應立即採取適當措施、偵察，阻止這種恐怖的行爲。

台灣的政治演化（一九八四到現在）

依我看，台灣的政治情況正在加速頹退之中。在自由表達意識方面——除了查禁雜誌以外，國民黨加強查禁其他出版物——禁止用羅馬字聖經，限制電視節目用非北京話的時間，提出公開場合用北京話的法案，此法案的不實際馬上顯現在競選政見會上，因爲即使國民黨自己的候選人也必須用福佬及客家話向群眾爭取票源，甚至於高級官員如俞國華的北京話也詞難達意。

在自由結社方面也是大開倒車，國民黨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陳舊法令來刁難民間團體，要求同性質僅能有一組織，這條文抄自歐洲法西斯政權，而引用來壓迫公政會、人權會等黨外組織，目的是阻止這些黨外組織從事的草根性運動。

尊重宗教信仰方面亦有倒退現象，基督長老教會持續的被迫害，訂定宗教法企圖強迫牧師須申請執照，傳教用北京話等，甚至以偽證將教會議長高俊明牧師送入監牢。

最近政府更開始向山地偏遠地區教會課稅，企圖枯竭教會的財源而分化教會的團結。對台灣新約教會也進行同樣的迫害。國務院報告透露，國民黨禁止一些佛教團體、統一教在

台灣傳教。

我相信貴小組對國民黨濫用法律、安全來懲治異己已甚瞭解，不幸的是這行爲已蔓延到其他方面。自一九八四年起，他制定管束流氓、掃黑等法規，黨外吳振明等人因此被捕。到目前爲止，國民黨仍然拒絕公佈政治犯名單、其生活情況及監禁地點，我建議國會及執政單位應加倍努力於尋求台灣政治良心犯的釋放。

警察暴行不僅止於政治犯，即使是一般嫌犯亦不斷地遭受身心的酷刑。對於他們所憎恨的反對派的支持者如尤清先生的助選員，警察也加以殺害。這些我們稱之爲殺雞做猴。

爲了台灣的未來，NDJ的利益，台灣人民的幸福及美國本身的利益，一個更有代表性的台灣政府是必要的。更有甚者，防衛台灣的共識只有從更民主的社會才能產生。

國民黨三中全會

三月底舉行的三中全會，烟幕多於實際，會中除了重溫返回大陸的老夢外，並沒有面對台灣目前所面臨的問題，如接班人的問題。

雖然會中多產生兩位台籍中央委員及把台籍副總統李登輝的名位排前列第三名，但這種高階層的逐步台灣化，與自下而上的社會民主化，並沒有必然的關聯。

新聞自由

二年來，新聞自由的質與量在台灣正加速下降。一九五〇年新聞紙欠缺而限制新聞發行的規定仍然存在。不管其理由爲何，辦報須獲准才能發行是與一個自由表達意識的社會不能相稱的。國民黨及其高幹一直控制著所有報紙，少數民間的報紙也須遵循黨的指導，犯者常被查禁，如去年的民衆日報就被以爲匪宣傳而禁刊十天。

反對派只好發行雜誌、週刊等，但經常被以「混淆視聽，影響民心士氣」而被查禁。隨附一件國民黨決定大量掃清黨外雜誌的秘密文件，經倫敦的 Index on Censorship 翻譯發表，洩密者有一位被判刑。文件中很清楚的指國民黨文工會的宋楚瑜，新聞局長張京育等號稱西式溫和派人物也參與其中。

一九八五年鑑於江南案及十信案傷害到國民黨政權的國際信譽，NLI 推行「中興專案」，上千特務人員廿四小時監視搜查所有書報社，沒收所有黨外書籍雜誌等，企圖使反對派經濟破產。

在荷蘭發行的台灣通訊 (Taiwan communiqué) 對此有詳細的統計資料。很明顯的從一九八五年五月起，國民黨已停止對雜誌內容的審查，因爲他們已以全部封閉，

消滅反對派出版物爲目標。根據保護新聞記者協會的資料，國民黨所監禁的新聞記者比任何共產國家還多。

許榮淑案

我想台灣的現況當以用最近國民黨對立法委員許榮淑的案件作一結論。

許是位四十七歲的教師，丈夫張俊宏，省議員兼新聞工作者，於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被捕，許女士則於一九八〇年當選爲立法委員，並連獲連任三年，去年參選台中市長因國民黨的大量買票、做票而高票落選。

許女士大膽地用她的地位爲人權、民主作長期的呼籲，她所出版的雜誌是最常被查禁的一本。許女士最近正準備爲FAPA在台灣設一辦事處，她亦於三月間走訪菲律賓，顯然因此而觸怒當局。

三月十二日警政單位開始採取行動，強行搜索她的雜誌社，趁工作人員不在的半夜，搶走近一萬本的書籍。當許女士向國防部與師問罪時，國防部長卻說這些書內容詆毀、妨害安全並有叛亂文件在內。我隨後驚奇地發現其中一本是我的回憶錄。

幾天後，這政權再度搜竊另一個反對派雜誌社及許的服務處，又趁人不在時，沒收七千本。

不久以後一群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聯名公開要求國民黨以叛亂罪逮捕許女士。去年九月許家及服務處又遭洗竊並誣告說有人密告許女士家秘藏武器。

許委員自始至終未主張暴力，我從未聽說她有任何妨害國家安全的舉動。隨附她在立法院的一篇質詢稿，我要求 貴小組努力責成，停止對這位決心奉獻台灣民主的許女士無端迫害。

一九八六年的選舉

如果今年年底的選舉仍與以往一樣，在選罷法、戒嚴法及所有反動性的限制之下舉行，則是難以達到公平與公開的。觀之去年地方選舉，不的作弊、買票、做票、調包，及幽靈人口等案，台灣的人民是不可能以選舉來改變他們的政府的，何況大部份的席次都不在重選的範圍，行政部門更是在選舉範圍以外。

現行法僅允許十五天的競選，但一半時間是公辦，助選員數受限制，禁止聚集遊行，及不同類的候選人不得同時出現在同一政見發表會上等。

每人只能為一個候選人助選，禁止越區助選，學生、政治犯不能助選，禁止政治廣告，政見宣傳貼處受限制……。

每位候選人只能派四十位監票員，儘管大選區投票所多達一千。票箱只能由指定人員轉運，票數因此在搬運途中改變，選舉委員會監視及錄影競選活動，違規者可判罰重金，甚至坐牢。

政府甚至審查政見及競選傳單內容。一九八三年黨外政見主張以自決為主題但被拒絕。一九

八五年黨外被拒絕以釋放政治犯爲政見，至少有一位候選人因發表主張自決而被罰。一般來說，候選人不能對「基本國策」持有異議。

政黨

國民黨堅持台灣已有兩個反對黨，不需要新黨，事實是這兩個小黨一直受國民黨資助，去年選舉在全部三五七個候選人中僅有兩個是以此兩個黨的名義出來選舉。其實台灣是一黨制，因爲戒嚴法禁止組新黨，但反對派人士已逐漸堅決表示他們有組黨的權利，去年他們聯合以黨外後援會名義提名候選人參與競爭，而FDP也派員觀察選舉過程，我們向中央選舉委員會詢問爲何不允許黨外成一政黨，他們答以人民已有充分管道參與政治，且新黨將增加社會的不安。

我們認爲這種理由是不能接受的，台灣也是一個繁榮，多元且高文明的國家，人民已有能力作成熟的政治判斷。

新黨會造成安全上的考慮也是不成立的，世界上有許多例子，如以色列、南韓及美國等都在內亂、外患中舉行公開選舉的例子。

儘管黨外不能成立政黨，其提出或支持的候選人卻能高比率當選（六八%）。因此又有人說黨外名義上不是黨，但主要的是實質上已是一個黨，名份上的爭執只能造成被逮捕的危險，基於以下兩點理由我必須反對此種說法。

1. 在形式上，正式政黨的建立將使黨外在現存政治體系內合法化。2. 實質上，一個政黨可以對其所支持的候選人作更有系統，有組織的支持，可以發展草根性的運動，這將使其能與黨外作更公平的競爭。更有甚者，合法的黨外將可推派選舉委員。

貴小組更應該注意一件事，自一九七九以來，一直放逐在美國的黨外領袖之一許信良先生，最近宣佈他即將回去台灣參與新黨成立的努力，以推進台灣的民主。黨外要求組黨的權利將與日俱增。我希望貴小組與雷根政權能規勸黨外，爲了台灣的民主化，應讓黨外組織新黨。黨外已表示將對黨外的要求進行壓制，美國應該對該行爲提出譴責。

台灣關係法下的商業關係

除了台灣商人關心美國保護主義所可能影響外，外交上對商業並沒造成問題，台美經濟關係自一九七九一直持續增繁。

移民問題

二萬移民額爲台灣人民帶來好處，此應歸功於索拉茲衆議員的努力。由於AIC在台辦事人

員的不友善，造成新移民申請者有排長龍的現象，還有文件須送香港辦事處審查也造成不必要的負擔。但我必須指出，「A-1」高階層官員，在DC或在台北均甚負責尋找並克服難題。

有一個相關的問題我必須提出，台籍美人的父母均被迫在護照上的出生地籍填上「中國」而非「台灣」，負責發護照的單位告訴我們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並說如果他們願意，可填上出生的縣、市，依據國際法，台灣地位仍屬未定，這個觀點亦經國務院於一九七一年四月廿八日認定，除非台灣人民有機會應用他們的自決權，任何人不能替之決定。

無論如何，我願意說明，我出生時，台灣是由日本統治，絕非是中國的一部份，所以如果我不能被允許以台灣為我的出生地，那我必須以日本為出生地了，我們不明白用護照來反映真正出生地的事實竟然會如此不方便。

結論

我很欽佩貴小組的努力，也很感激你們給我這個作證的機會。台灣的命運牽連到一千九百萬人民，那裏有我許多親戚、朋友與學生。美國有龐大的能力去改變台灣的政治環境與維護台灣人民的安全。我迫切期待貴小組能幫助與促成美國善加利用其能力來造福台灣。